

Ancient Chinese Armour

中国古代 军戎服饰

刘永华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Ancient Chinese Armour
中国古代军戎服饰

刘永华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序



肩車將騎驃

中国是衣冠古国。在漫长的中国古代服饰画廊中，军戎服饰是其中光彩夺目的一部分。遗憾的是，迟迟起步的中国服饰史研究尚未系统地整理这部分宝贵的文化遗产。一般人对于中国古代武士穿着的印象多半来自传统戏曲舞台，或者寺庙里的四大金刚；为数不多的几本中国古代服饰史著作留给军戎服饰的空间，也是极其有限的。我们需要中国古代军戎服饰的专著，否则将愧对古人在这方面给予我们的慷慨馈赠——如像秦始皇陵兵马俑这样举世罕见的古代军戎服饰宝库。

军戎服饰也就是军服，作为一种物质产品，它自然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如防身、御寒等。此外，它又有审美价值，由此创造了一个个不同时代的威风凛凛的武士形象。但是，仅仅从实用与审美的角度来研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服饰，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从文化符号学的意义上说，服饰是一种符号。因此，我们面对的中国古代军戎服饰，是一个有待接受者加以读解的文本。解释要有代码。在所有的服饰中，军服的代码是最为明确的和严格的，军服是军事集团的制服。任何制服都是群体的标志，用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话来说，它属于“社会分类学”。军服表示军事集团与其他社会集团的区别，以及军事集团内部的组织状况和等级系统。由于军事活动需要高度的组织性，军服是完全被制度化了的。如果说现代的时装突出的是个人编码的话，那末军服的编码是完全独立于个体之外的。从这点来看，军服是最为符号化的。研究军戎服饰自然要研究穿着军戎服饰的制度。但是仅仅根据这一代码来读解中国古代军戎服饰是不够的。因为中国古代军戎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文本，不只体现一种代码。由于军戎服饰处于多重文本交织的关联域中，它必然受到诸多代码系统的影响，如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科技的、宗教的、习俗的、审美的，等等。因此，对中国古代军戎服饰的读解必须使其与文化中的其他文本相参照，更确切地说，与同时代人的行为相参照。只有这样，才能揭示隐藏在文本底层的意识形态结构，才能发现在繁杂的中国古代文化中存在着意义的统一性。当然，达到这一步得走过一段漫长的路程。任何学术研究在其起步阶段必须占有材料，加以识别、归



纳和分类。不进行形态学的研究，搞清词法与句法，那是难以深入到语义学层面的。刘永华在《中国古代军戎服饰》中企图进行的，正是这项基础工作。

本书的贡献在于：对中国古代军戎服饰进行了历史性的系统描述。迄今为止，它可以说是关于中国古代军戎服饰史的第一本学术专著。本书材料丰富，论述严谨，图文并茂，插图精美，很有分量。为了写作这本书，作者先后共跑了二十二个省市的博物馆、图书馆、名胜古迹和考古发掘地，其中的辛苦是不言而喻的。本书最大的特点是汇聚了丰富的图像资料，而且多数是作者根据实物、塑像亲手绘制的，数量多达400余幅。此外，作者还为每一个朝代的军戎服饰绘制了复原图。由于作者本人就是一位具有深厚写实功底画家，故其绘制的复原图和插图不仅具有真实性和实用性，而且栩栩如生，具有很高的观赏性，而这是一般服饰史专著所望尘莫及的。

作者刘永华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现为该院副教授和舞台美术系副主任。他的专业领域是舞台设计。过去他曾协助周锡保教授绘制《中国古代服饰史》的插图，后来又参与大型画册《中国民族服饰》的编绘工作。1986年，中国军事博物馆委托他设计战国、唐、宋、清几个朝代共7件古代武士的蜡像，由此激发了他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军戎服饰的意向。此后，他不断地搜集有关资料，1991年得到了上海青年学术基金的资助，终于使他完成了这本著作。

胡妙胜

在中国灿烂的文化遗产中，有一件珍藏至今还鲜为人知的瑰宝，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军戎服饰。

军戎服饰按现代的说法就是军服。现代的军服相对比较单纯，主要由服装和表明军衔、军种的标识组成；而在古代，则至少包括两大类型的服饰：一是戎服，一是防身护体的甲冑。戎服是军人在军营内和日常生活中穿着的便服，武官除这类服饰外有时还要加上一些表示官职的官服。甲冑是军人作战时用于防护的装备（有时在一些重要典礼上也使用），如根据它的制造材料和作用来分类，应属于兵器一类。但因为甲冑是穿戴在军人身上的，直接影响到军人的服饰造型，所以它又是军戎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

封建社会的军队作为政权的支柱，在国家政治中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历朝历代的帝王、政治家无一不对军队的建设给予高度的重视，这其中自然包括督造、制定最能发挥军队战斗力、便于指挥的军戎服饰和服饰制度。所以中国古代的军戎服饰是比较系统、规范的服饰，这种系统和规范的程度，能体现出历代的战争、军队的建设和武官制度的发展演变。

军戎服饰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这些特征有的体现了统治阶层的政治需要和封建帝王的个人好恶，有的则是受了当时文化艺术及审美倾向的熏陶，在整个社会风俗、时尚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在这些具有特点的服饰中，有一部分后来成为从宫廷到民间，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男女老幼都喜欢服用的流行时装。少数服饰还曾为前后几个朝代连续采用，流行时间达一千多年，直到今天，在现代服装中依然可以看到它的痕迹。所以军戎服饰还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出古代社会的政治文化、宗教艺术等方面的变异与进步。

同时，生产和制造戎服甲冑，在生产力和生产技术还比较落后的封建社会，是一项很重大的经济活动。一般都由皇室和国家最高军事机构直接经营、掌管、布署，他们有权征调和指挥最有技术的工匠和最优良的生产资料，因而这种军备生产一般能代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水平。所以，研究中国古代的军戎服饰，不仅具有了解古代军事史的价值，而且具有探索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历史的重要价值。



研究中国古代军戎服饰，是从新中国建立以后开始的，其重点集中在甲冑方面，研究的方法基本上是按照兵器研究的范畴来进行的。5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一系列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给甲冑的研究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实物资料，所以迄今为止，对甲冑的研究是比较系统和全面的。相比之下，对戎服的研究则要薄弱一些。这些年来虽然发表了不少关于深衣、腰带、发式等方面的论文，但都有局限性，而且刊载这些论文的一般都是文化层次较高、专业性较强的杂志，读者面比较窄。再加上这些文章又分别登载在各期、各种不同的杂志、文集上，因此，对这部分研究成果知之者甚少。而几本已出版的古代服饰史著作，对军戎服饰的介绍也比较简略浅显。这种现象与军戎服饰的漫长历史相对照，显得很不相称，因此可以说军戎服饰的研究至今还是一块亟待开垦的文化园地。

我是七年前由于一项偶然的设计任务而进入这一领域的，当时只是受到强烈的兴趣受好的驱使，才“初生牛犊不怕虎”地闯进了这座学术殿堂。几年来，在各方面的帮助、支持下编成的这本书，只能作为一部抛砖引玉之作，期望它的面世能引起更多的专家、学者的注意和兴趣，共同把军戎服饰的研究深入下去。

由于各方面知识水平有限，本书一定有不少疏漏或谬误，恳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书中有很多由我绘制的复原图，都是根据出土实物或参照古籍文献的记载，经过考证后进行的，手法写实，目的是想加深读者对历代军戎服饰的印象，或者提供一些形象的参考以弥补文字叙述的不足，如有不确之处，也请一并予以指正。

作者

目录

序	
1	
前言	
3	
商代	
1	
西周	
9	
东周 (春秋战国)	
13	
秦代	
23	
汉代	
35	
魏晋时期	
49	
南北朝	
61	
隋代	
75	
唐代	
83	
五代十国	
107	
宋代	
115	
辽	
135	
金	
143	
西夏	
151	
元代	
155	
明代	
169	
清代	
191	
附录	
一、历代铠甲的形制图解	
203	
二、唐宋时期的甲冑制造技术	
205	
三、唐宋时期的甲冑制造技术	
209	



约公元前17世纪至
约公元前11世纪

商代

Ancient Chinese Armour

商代武士复原图

衣、裳、帛根据广汉商代祭祀坑出土青铜像和石边璋线刻人像复原，冑采用江西新干县商墓出土实物，甲参考安阳殷墟遗址遗迹，兵器参照《中国古代兵器图集》，惟弓上的铜弓秘安装法保留了笔者个人的观点。





图 A-1 商代皮甲片残迹，摘自（日）林已奈夫《中国殷周时代之武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1972 年出版。



A-1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青铜冑，上为饕餮纹冑，下为圆葵纹冑，见《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 年第七期图版 34。



A-2 江西新干县商墓出土青铜冑，江西省博物馆藏。

商代

（约公元前 17 世纪至约公元前 11 世纪）

在距今约五十万年前的遥远年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已经开始在北京周口店附近的区域内繁衍、生息，考古学上称他们为“北京人”。北京人在漫长岁月的进化过程中，通过与自然界的斗争，逐步学会和掌握了最原始的生产方式和生存技能，其中包括缝制衣服。

1927 年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古人类遗址中，发掘出一枚骨针，据此推断，山顶洞人在一万八千年前就已经开始用兽皮缝衣服了。至于用皮革做甲衣来保护身体，《史记》上说是帝杼“作甲者也”（《夏本纪》）。杼是夏代（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第七代君，因此甲似乎在夏前期（约公元前 19 世纪前后）就已经有了。而《管子·地数篇》则说甲是蚩尤发明的，并“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史记·五帝本纪》），同时又是青铜冶炼的发明者。这种说法把甲和青铜兵器的出现，又推前了几千年。究竟哪种说法比较可靠，现在尚无法确证。

1935 年在河南安阳侯家庄 1004 号墓的南墓道中发现了商代的皮甲残迹，出土时皮革已腐烂成粉末，只有甲面用黑、红、白、黄四色漆彩绘的图案纹理仍遗留在土上。残迹的最大直径均在 40 厘米左右，据此认为是整片的皮甲，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比较可信的一个实例，时间可以推定为商代后期（图 A-1）。

与皮甲残迹同时出土的还有 140 顶左右的青铜冑，它们和兵器放在一起。铜冑都是用范浇铸的，合范的缝在冑的正中间，冑顶有竖立的铜管，用于安插羽毛之类的缨饰，冑的左右两边和后脑部向下延伸，用以保护耳、面颊和后项。冑的剖面为 O 形，表面都经过打磨，但是里面却很粗糙。这说明冑的里面是有织物或皮革做内衬的，否则不堪使用。除了安阳出土的铜冑外，近年在江西新干县大泽洲乡商墓也出土了一顶青铜冑，造型与安阳的略有不同，花纹和制作比安阳的更为精美，这是南方地区发现的第一件青铜冑（彩图 A-1、2）。



约公元前17世纪至
约公元前11世纪

商代

Ancient Chinese Armour



图 A—2 云南傈僳族皮甲



图 A—3 云南傈僳族皮甲穿戴示意图



A—3 台湾耶美人原始藤甲背面

由于殷商前后的甲,既没有较为完整的实物出土,又没有发现其他的资料可作参考,因此很难描绘出当时的甲的形象,只能根据现在还保存有实物、本世纪初还在使用的一些原始状态的甲进行推测、想象。这种原始甲胄有两个实例,一是30年代云南傈僳族使用过的皮甲,这种皮甲用两块长约一米的长条形生牛皮相叠、缝合而成,在约三分之二处开挖一条舌形缝,沿剖开的缝将三分之一的皮革向下折而做成胸甲,另外三分之二的皮革与竖起的舌形做成保护后脑、项的颈护和背甲(图A—2)。使用时,将头套入孔内,前后两片用带在腋下系牢(图A—3)。二是台湾兰屿耶美人用藤条编织而成的藤甲,形如现代的坎肩,穿时在胸前用麻绳系扎。为了增强防护效能,还在藤甲的表面蒙上鲑鱼皮,胄也是用藤条编成的(彩图A—3、A—4)。这两种原始甲胄的制作方法都很简陋,而安阳发现的皮甲残迹,从甲面的彩绘花纹来看,应该比这两种甲胄制作要考究,技术要进步一些。胄的出土实物较多,进行复原比甲要可靠得多。

商代有没有戎服,现在尚无形象资料可以证实,但根据古文献记载和商代卜辞进行分析和推测,至少在商后期已经具备了。

原始社会晚期以来,随着氏族部落的不断兼并,战争越来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商代的卜辞曾记载一次出兵的人数可达三千至五千,多时曾到一万三千人,并“王作三吕(师,商朝军队的基本单位),右、中、左”(陈群《中国兵制简史》)。到武王伐纣时,“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拒武王”(《史记·周本纪》,七十万人,现代学者认为是十七万之误)。规模如此庞大的军队,又是几支部队配合行动,如果没有统一的服装,指挥起来必定十分困难。

再从商朝军队的组织成分上看,也能发现戎服存在的可能性。商军的主干是由贵族王室的全体成员(贵族包括商王族的本族成员与低于王族的子族阶层成员)组成,师中的士卒则由居住在商都及周围地区的自由民担任。自由民是商军的基本来源,奴隶也有从军的,但只能服杂役,不能编进师中。根据这种情况,徒兵和杂役没有戎

中 A-4 台湾耶美人原始藤
甲冑穿戴示意复原图

国
占
代
军
戎
服
饰



服是完全有可能的，但作为当时的这部分军人，特别是王族成员，必定有较统一的“军事之服”。我们现在虽然不可能知道商代戎装的具体，可有一点能基本肯定，则这种戎装必定是上衣下裳制。

上古之人为了遮羞蔽体，先在身体前后围以毛皮，是谓蔽前蔽后，后又把整张毛皮中间开孔，套入身体中做成上衣。待到发明智，开始用布把蔽前蔽后物，连缀缝合起来，形成下裳。裳就是现在的裙子，这种衣裳制即所谓新时“始去又服布”（《吕氏春秋》），并“上衣裳九尺，下裳”（《易经·系辞下》），成为古代服饰的早期形制。

这一衣裳制从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一尊2米高的青铜立人像身上的服饰，即可以证实（参看图A—5及《三星堆遗址考古报告》，见《文物》1989年第5期。见彩图A—5）。这尊像

铸造精美，除面部、手的造型比较夸张外，其余各部细节都很真实，衣服上的花纹图案和系衣带的垂带、衣领都刻画得十分清晰，是非常难得的服饰研究参考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铜人下裳在右膝盖的上方开衣衩，与今天裤子上的裤衩形式一致，这或许是在提醒我们，汉代和战国时期所穿的裤子就是从商代流传下来的。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也出土过一些陶器、石雕人象，其衣服也是上衣下裳制（图A—4）。因此可以基本肯定，我国在商代不可能出现其他形制的裤子。

我们的祖先，尚未有修眉、发眉习惯，头发披肩发之父母，与子很亲的，甚至不可侵犯，是父母的时候起，直到男女都要拜父，发髻好高，后来把髻等物扎起来，并逐渐形成了各种首、冠饰。



A-5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坑出土商代青铜立人像，四川省博物馆藏。像高二米，头戴花形冠，束回纹额带，后脑额带下有二个斜方形孔，原来可能插有笄，上穿V形领左衽上衣，衽边似有钮束衣，衣领处有带，从背后绕过左肩斜横胸前系于右腋后。下着裳，裳后两侧垂有燕尾形尖角。衣、裳上都有阴线刻的花纹，衣上为龙纹，裳上为回纹和异兽纹。小腿上戴有脚镯，耳朵有孔，原来可能戴有耳环。



图 A—4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雕（左），
残石雕（右）人像，安阳殷墟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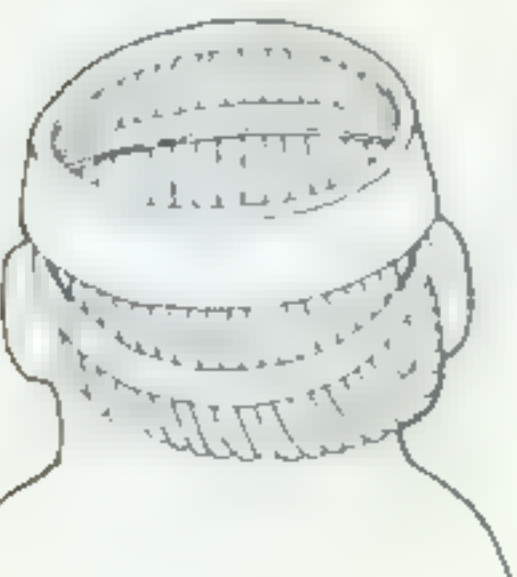


图 A—5 安阳殷墟
遗址出土石雕像，安
阳殷墟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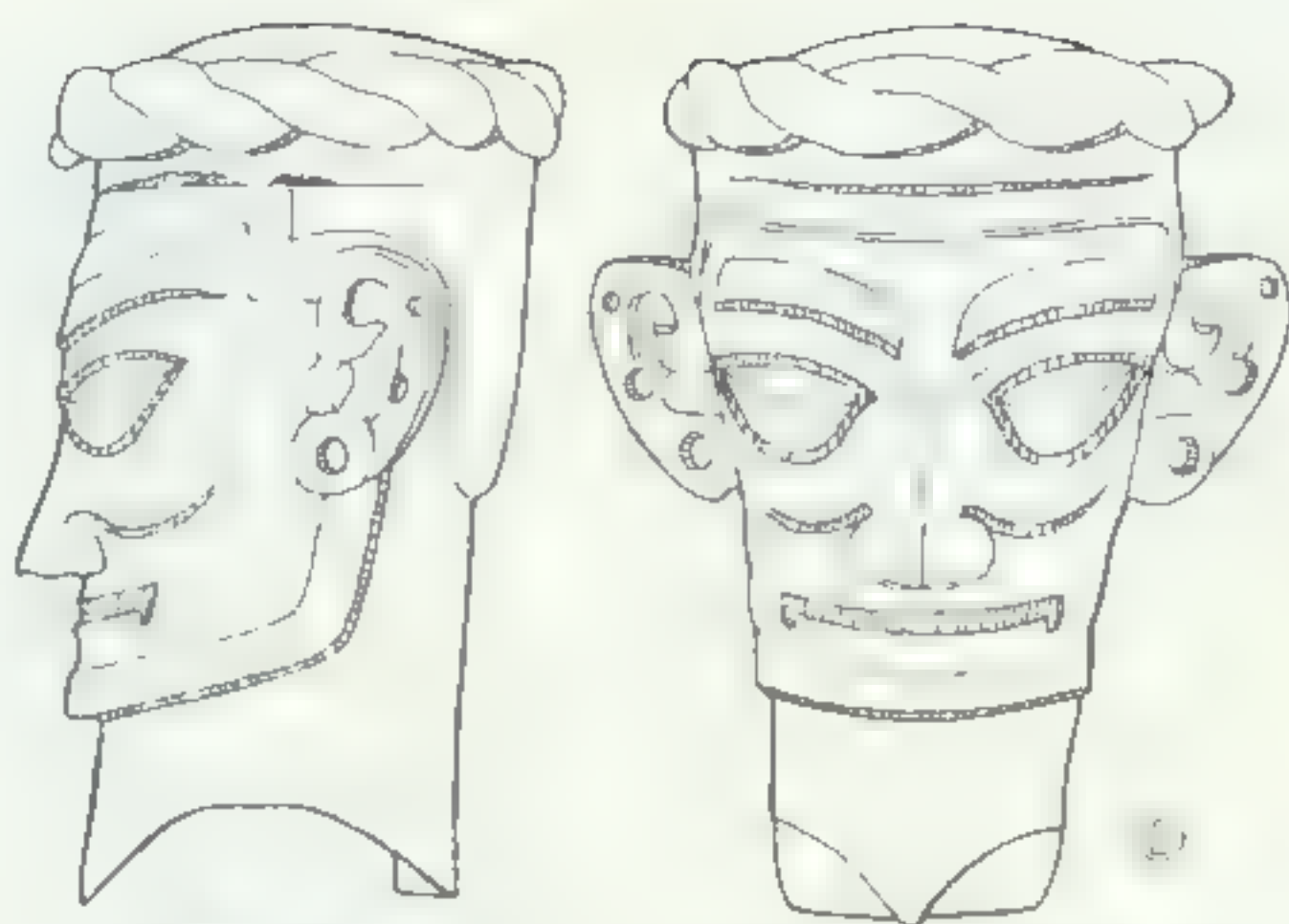
商代男子的冠饰主要是额带，额带又称“颊”（颊的定名，参见丁乙《说颊和额带》，《考古》1984年第10期）。安阳出土的玉、石雕像和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很多铜人头像上都有这种颊（参见图A—4左、图A—5、图A—6①、②）。从这些人像的衣饰造型上，可以分辨出有的是奴隶，有的则是奴隶主。由此可见，

商代男子的冠饰主要是额带，额带又称“颊”（颊的定名，参见丁乙《说颊和额带》，《考古》1984年第10期）。安阳出土的玉、石雕像和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很多铜人头像上都有这种颊（参见图A—4左、图A—5、图A—6①、②）。从这些人像的衣饰造型上，可以分辨出有的是奴隶，有的则是奴隶主。由此可见，

商代男子的冠饰主要是额带，额带又称“颊”（颊的定名，参见丁乙《说颊和额带》，《考古》1984年第10期）。安阳出土的玉、石雕像和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很多铜人头像上都有这种颊（参见图A—4左、图A—5、图A—6①、②）。从这些人像的衣饰造型上，可以分辨出有的是奴隶，有的则是奴隶主。由此可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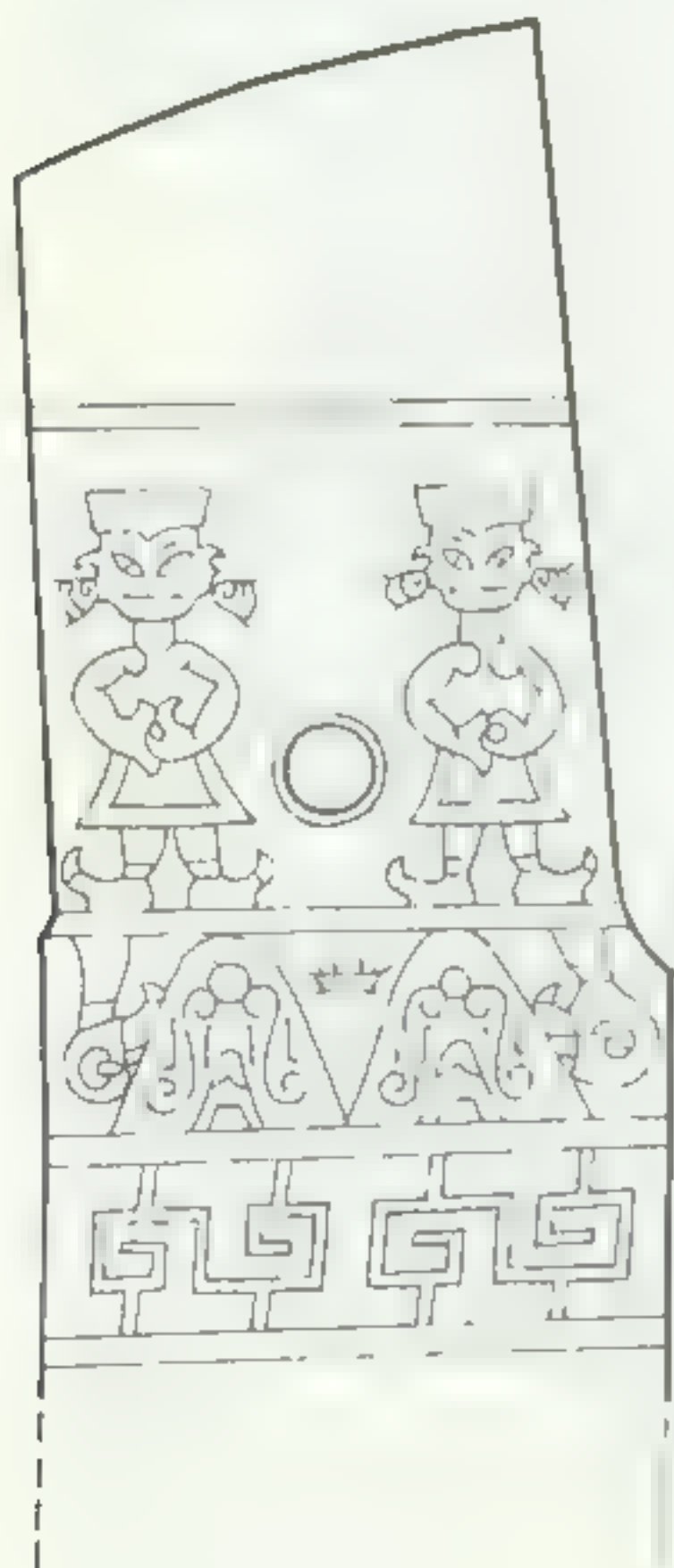
图 A—7 四川广汉商代祭祀坑出土青铜头像，四川省
博物馆藏。①长发梳向脑后，上端束扎，余发编成辫子。
②头发向后梳理，发上似罩有头巾，发辫在脑后盘结，
插以蝴蝶形花笄



乾腊不畏泥湿也。”
生活中，是一件奢侈品，
用。一般平民和奴才，
是完全可能的。

商人尚白，大事剑用日中。戎事乘翰（白马），牲用白，以白为徽号。朝燕服皐冠而缟衣……

既然，人的主力都是贵族子弟，而商王、贵族的服饰以白为主，那么戎服很可能也采用白色。白色中肯定也要掺入一些诸如红、黄、黑等其他的配色，既作为服饰图案、镶边的色彩，又能使各师之间的服色有所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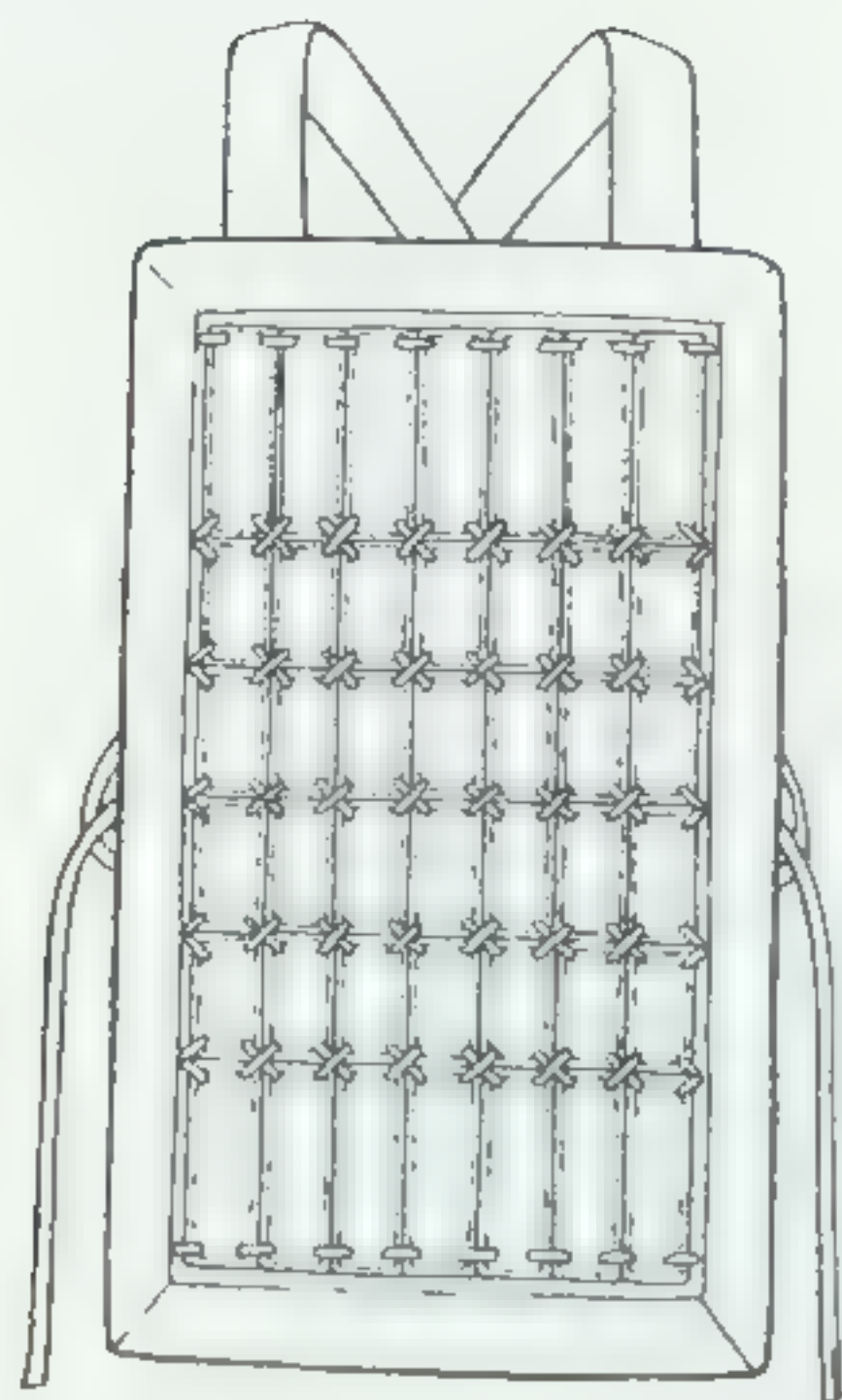


7

西周武士复原图

衣、裳、舄根据《新定三礼图》韦弁服插图。裳前为蔽膝，古时又称褻，用皮革制成，褻上有火、山纹饰，为诸侯使用（天子之褻有龙纹）。冑采用北京昌平出土实物，甲根据长安普渡村出土实物复原，兵器采用北京房山出土实物，佩于腰左侧的玉佩根据河南地区出土实物复原，系于身后的绶参照《三才图会》的插图设计，佩与绶是诸侯法服上必不可少的饰物





图B—2 长安普渡村西周墓出土铜甲复原图 甲片的四角都开一个孔，甲片编缀时互不叠压，孔眼较大，编缀的材料应是较粗的绳带或皮条，编缀的方法与西汉的金缕玉衣很相似。



图B—3 右：《新定三礼图》插图 诸侯韦弁服，录自郑振铎编《中国古代版画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8月出版。左：习射图、攻战图 战国青铜壶纹饰，故宫博物院藏

《周礼·函人》上说：“函人为甲，犀甲七属，兕甲六属，合甲五属。犀甲寿百年，兕甲寿二百年，合甲寿三百年。”即明白无误地说明了这一点。犀、兕都是古代犀牛一类的动物，其皮质坚韧，是制甲的理想材料。合甲即是把二层经过处理（剥去皮革内层肉质）的皮革合在一起制成，所以不易腐败，使用寿命较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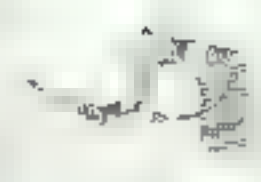
在古代兵制史上，西周初期开始实行“国”、“采”的制度，其分封诸侯法是我国最早的封建制。西周初年，天子分封诸侯，诸侯代天子管理地方，天子又设《周官》中设“甸”、“男”、“采”、“卫”、“蛮”、“夷”六卿，代天子管理地方，据《周礼·大东篇》释义考证，这三支军队由天子直接管辖，驻扎在镐京、成周、洛邑等地，为天子



战国武士复原图

皮甲胄采用湖北随县出土实物，袍服参照洛阳金村战国银人像，臂甲采用云南剑川出土实物，靴根据沈阳郑家洼子出土实物复原，带扣与带扣系法根据王仁湘先生复原图，剑的佩法根据《考古》1985年第1期《玉县剑与璚式佩剑法》一文设计





东周

东周（春秋战国）

（公元前 770 年—公元前 221 年）

公元前 770 年，周王室由于王位继承的斗争而引起了诸侯的叛变，他们联合大戎攻入镐京（今西安），杀了周王，灭了西周。叛乱平定后，周王朝东迁，迁都洛邑（今洛阳），洛邑在镐京东面，史称东周，又称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一个诸侯争霸、群雄并起的长期战乱年代，也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全面过渡、变革最激烈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我国古代的各种思想学说、科学技术都得到很大的发展，军事技术、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医学技术等，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一时期的一系列考古新发现，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其主要内容有：

1978 年在湖北随县擂鼓墩战国墓内发现的大量皮甲片，经过清理，复原了整套皮甲，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中，第一次发现完整的皮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图 C—1）。

皮甲由甲身、甲袖和甲裙组成。甲身由许多甲片组成，甲片的大小、形状、厚薄不一，甲片的大小一般在 10 厘米左右，甲片的形状多为长方形、正方形、梯形、三角形等，甲片的厚薄一般在 1 毫米左右。甲袖由许多甲片组成，甲片的大小、形状、厚薄不一，甲片的大小一般在 10 厘米左右，甲片的形状多为长方形、正方形、梯形、三角形等，甲片的厚薄一般在 1 毫米左右。甲裙由许多甲片组成，甲片的大小、形状、厚薄不一，甲片的大小一般在 10 厘米左右，甲片的形状多为长方形、正方形、梯形、三角形等，甲片的厚薄一般在 1 毫米左右。皮甲的制作方法是，将甲片用绳子或皮条穿起来，然后用绳子或皮条将甲片连接起来，这样就制成了一套完整的皮甲。皮甲的复原工作，是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将出土的甲片按照其形状、大小、厚薄等进行分类，然后将它们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起来，最后将它们用绳子或皮条穿起来，这样就制成了一套完整的皮甲。皮甲的复原工作，不仅为研究古代军事技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也为研究古代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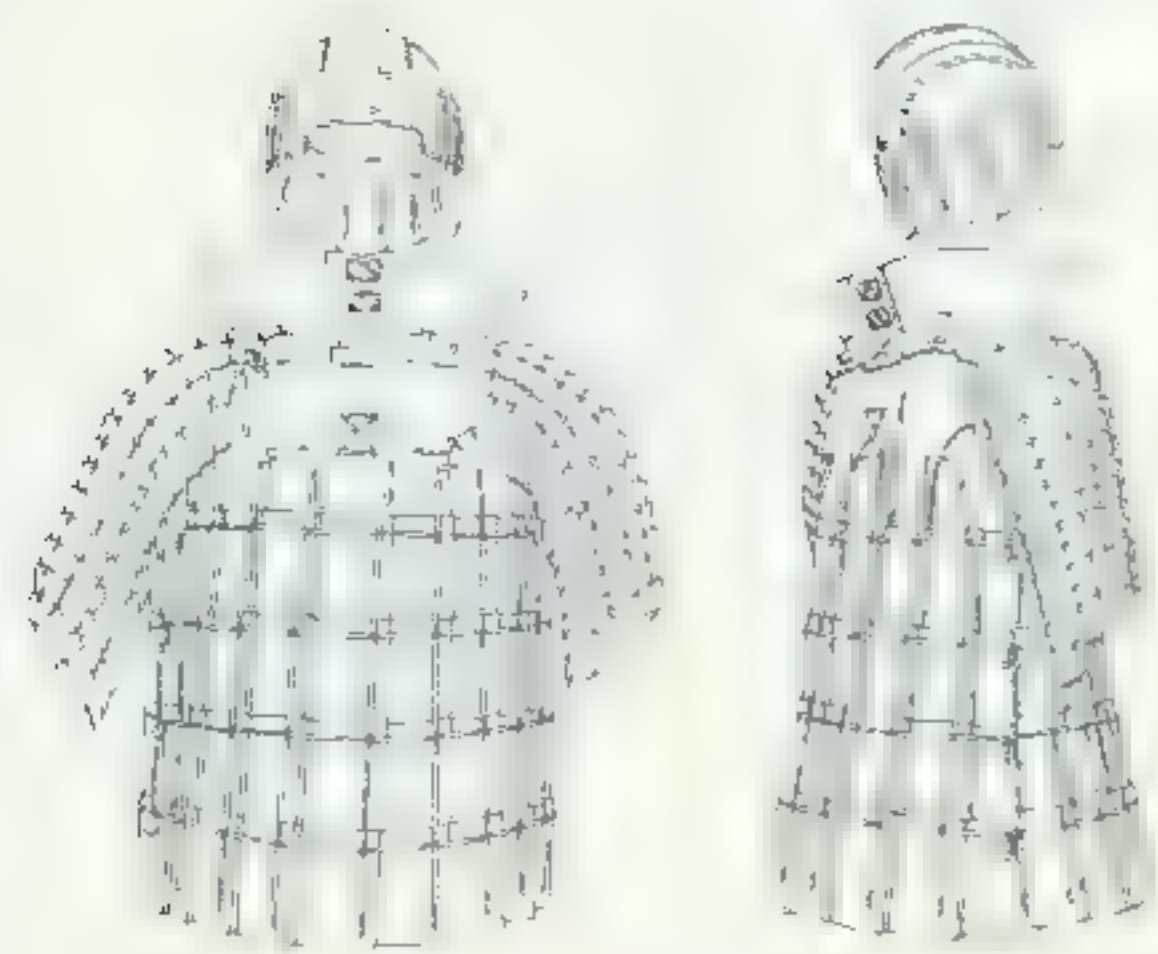


图 C—1 随县擂鼓墩战国墓出土皮甲复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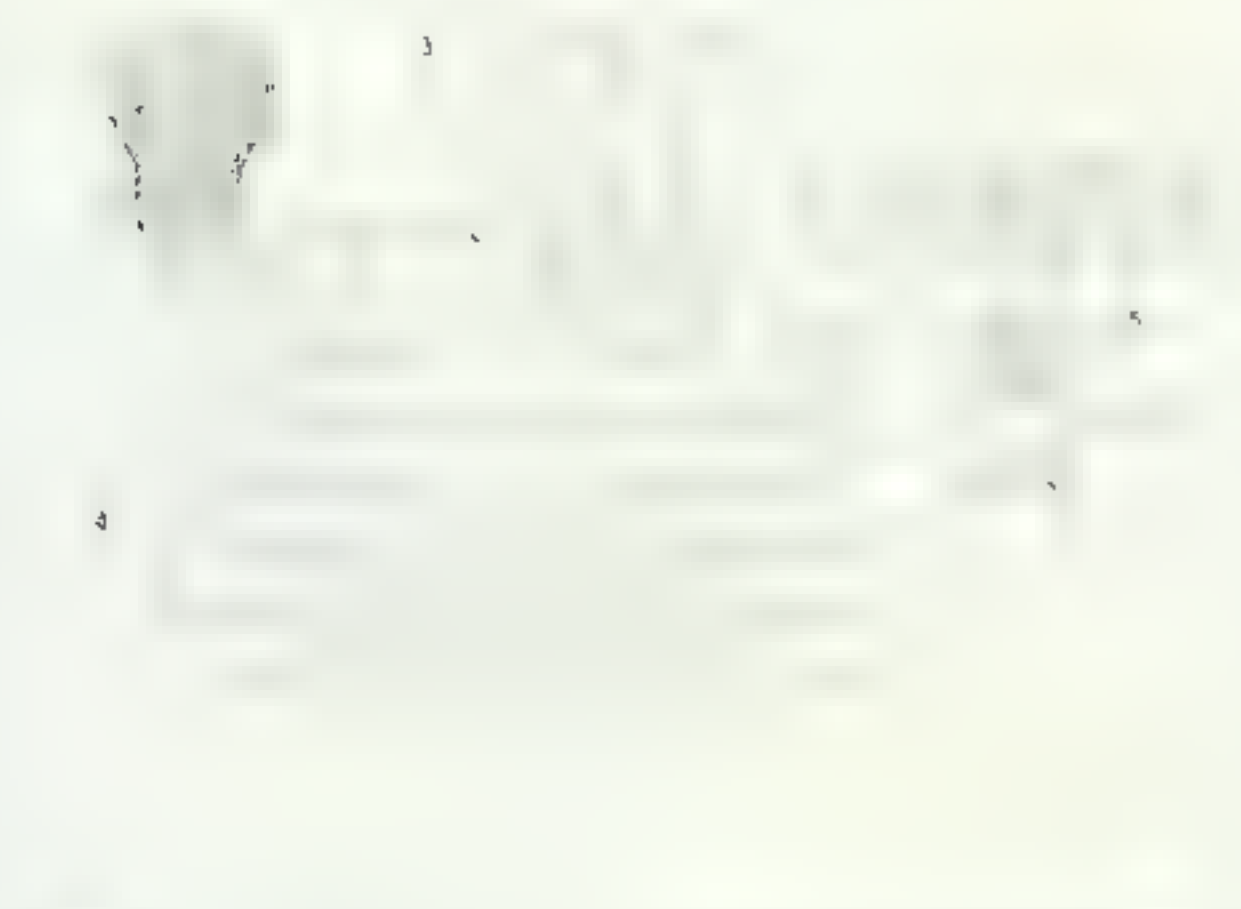


图 C—2 随县出土皮甲展开图 ①甲袖②胸、背甲③大领④甲裙⑤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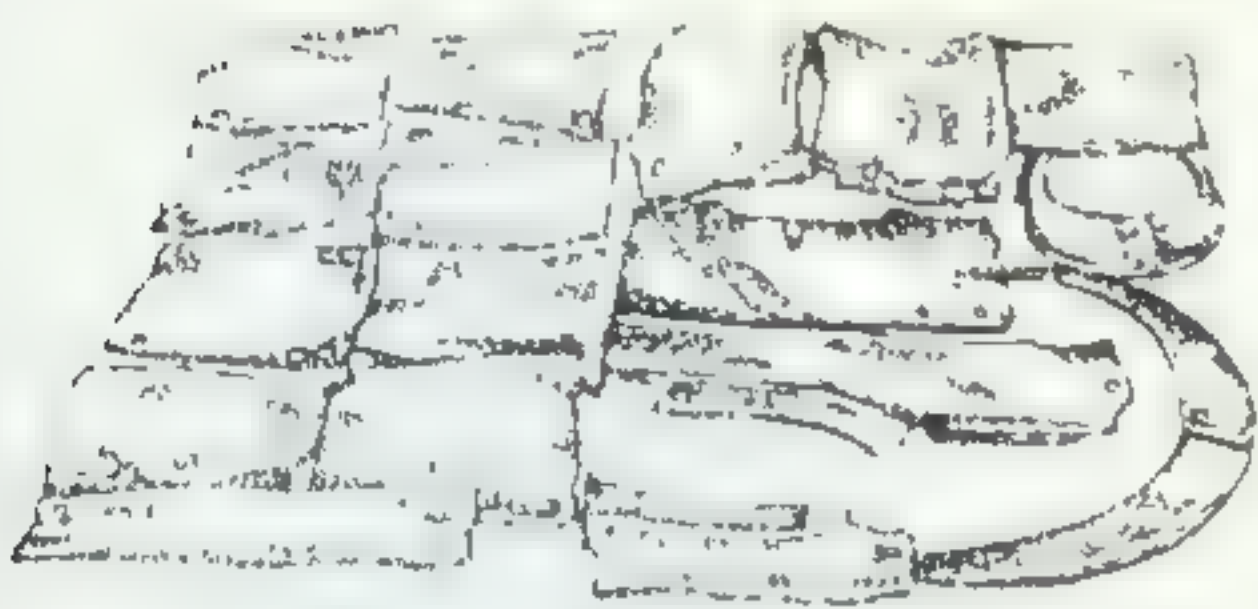


图 C—3 长沙浏城桥一号墓出土皮甲片（据照片绘制）



图C—4 长沙左家公山战国墓出土的皮甲（据照片绘制）

同时也反映出当时已采用了类似今天的流水作业生产方法，甲冑制造业的发展已具相当规模。

未能复原的实物有：长沙浏城桥一号墓（春秋晚期）内发现一领已散乱的皮甲，甲片呈深褐色，有六种式样。（图C—3，详见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浏城桥一号墓》，《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长沙左家公山战国墓内发现一领皮甲，原来是卷折放置的，出土时已无法揭开，只能从表面看出大概轮廓，上部是方形甲片，下部是施有彩绘的丝织物。（图C—4，详见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沙出土的三座大型木槨墓》，《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这件皮甲，一件传为长沙出土、现已流失国外的木槨上的形象十分相似（图C—5）。浏城桥一号墓（战国时期）内也发现有散乱的甲片，甲



图C—5 传为长沙出土的彩绘木俑，俑上甲衣的下面有两条彩绘花边，上面一条无疑应是皮甲内衬垂下的织物饰边。录自（日）林已奈夫《中国殷周时代的武器》。



C—2 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出土青铜铠甲部件 左上：臂甲；左下：胫甲；右上：颈甲；右下：背甲（据照片绘制）



C—3 辽宁宁城出土战国铜胄，《新中国出土文物》图版67，外文出版社1972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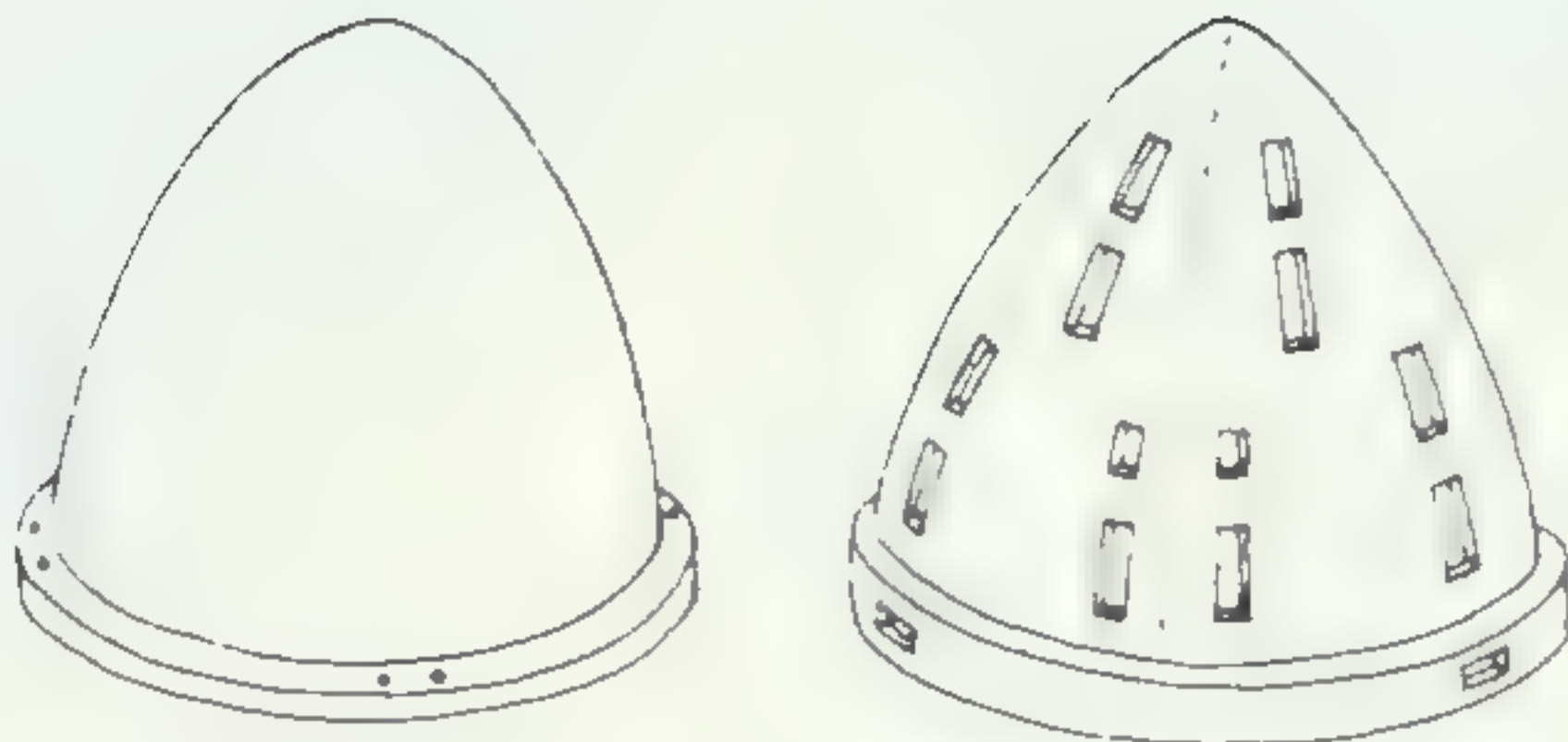
用青铜铠甲 1972年在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中曾出土很多青铜铠甲的部件和甲片，仔细观察这些部件和甲片，不难看出原来应是整套的铠甲，可惜残缺太甚，已无法进行复原。甲片和铠甲部件上印有线条组成的几何形花纹，充分反映了当时铸造技术和装饰艺术的高超水平。（图C—2、彩图C—2。详见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此外传世出土的铜铠甲，还有河北满城汉墓发现的铜胄（彩图C—3）。云南剑川螭凤山青铜文化墓地出土的铜臂甲（图C—8）和四川涪陵小田溪、成都百花潭中学出土的铜臂甲（图C—9）。铜胄的造型较之西周更趋简单、实用，铜胄顶部常可系扎皮革带。

战国后期，出现了铁制铠甲。我国是冶铁技术发源国家，1976年在河北燕城，1977年在湖南长沙出土的战国时代中期的铁刃铜铍（图版C—4），说明我国冶铁技术已发展到相当水平，不仅用于制作兵器，而且用于制造铠甲等生产工具，而不是人工冶炼的土法，掌握人工冶铁的技术，始于春秋初期，在铁器上



图C—8 云南剑川出土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铜臂甲，摘自《考古》1986年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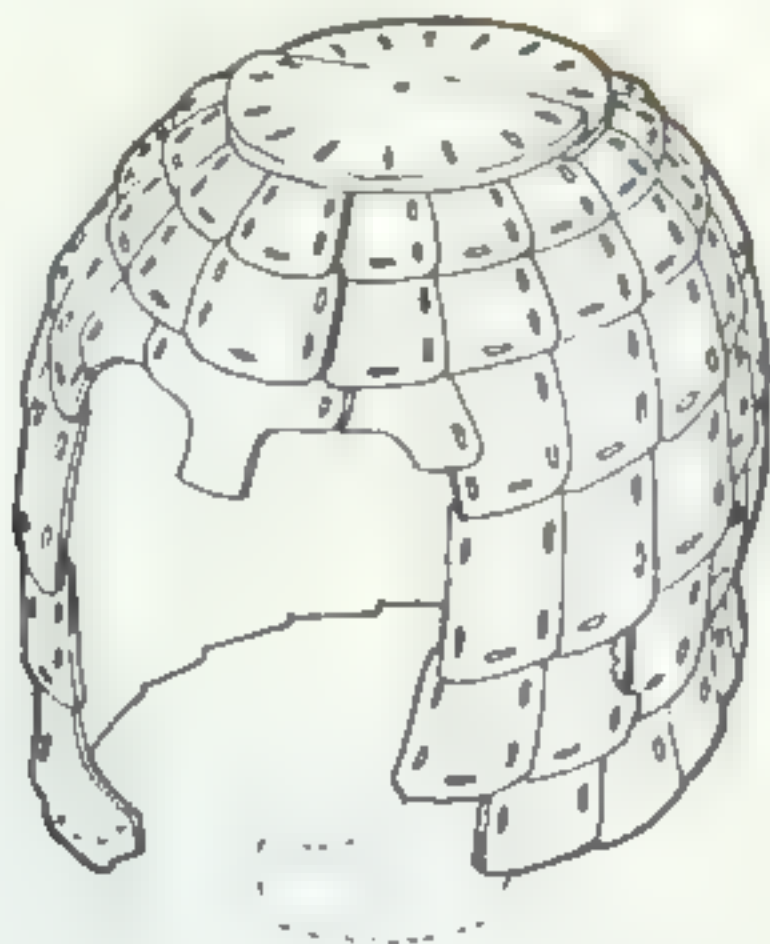
图C—9涪陵小田溪(左)、成都百花潭中学(右)出土的铜胄顶, 四川省博物馆藏



C—4河北藁城出土商代铁刃铜钺,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



图C—11传为洛阳金村出土的战国铜镜背面的线刻武士像



图C—10河北易县燕下都44号墓出土战国铁兜鍪复原图

又发明了生铁冶炼技术。这项技术的掌握,使由铁铸造兵器铠甲成为现实。关于铁铠甲,《吕氏春秋·贵卒》曾提到:“赵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者曰吾亡将,衣铁甲操铁杖以战。”

1965年,在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44号墓中,发现了一件战国时期铁铠甲片(图C—11,参见成东、锺少异《中国古代兵器图集》83页),从而证实了战国时期铁铠甲的存在。这件铁兜鍪的形制,与传为洛阳金村出土的战国铜镜上的武士像所戴的胄,极为相似。(图C—11,参见成东、锺少异《中国古代兵器图集》83页)。

很多文字资料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可能还要上溯到西周后期)的戎服,开始采用深衣。深衣是一种上衣与下裳连成体的衣服。有些像今天女士的连衣裙。开始时只是诸侯,士大夫平时闲居之服,后来逐渐取代上衣下裳成为正式服装。关于深衣《礼记·深衣》上说:

制:十有二幅,以应十有二月。袂圆以应规,曲袷如矩以应方,负绳及踝以应直,下齐如权衡以应平。故规者,行举手以为容;负绳、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义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下齐如权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圣人服之。故规、矩取其无私,绳取其直,权衡取其平,故先王贵之。故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摎相,可以治军旅。完且弗费,善衣之次也。

一件衣服具备了如此众多的含义和优点,难怪要登堂入室,成为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久的服装了。深衣的形制,陈祥道在《礼书》中绘有裁剪图(图C—12)。此图为我们提供了深衣的基本形制,从“短毋见肤,长毋被土”(《礼记·深衣》)的记载来看,可以肯定这时它的长度起码要达到脚踝。

战国末年,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赵武灵

王“胡服骑射”的变服事件。当时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地处北方,与林胡、楼烦等少数民族接壤。这些民族生习在草原游牧和起拔不平的丘陵地带,常年从事放牧、狩猎,善于骑射。从商代武丁时期起就经常南侵,抢掠财物,俘虏人口,给赵国的居民和国家的安全带来苦难和威胁。赵国人民一直持立独行,旧都因为受到战车作战而不能获得全胜,“文侯之季,中山复者,大抵皆在一谷之间,其地不能全,齐桓、晋文仅攘而欲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车故也”(《日知录》卷二十九《骑》)。要征服这些民族,只有改变作战方法,变车战为骑战,发展骑兵部队。关于骑兵,《史记》等文史资料表明,春秋时期黄河流域的不少诸侯国已经开始创建骑兵,如秦国就有“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史记·张仪列传》)。但骑兵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其原因,可能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当时还没有马鞍具,骑马就有一定的难度,而要在马上作战射箭,难度更高。其二,就是还没有合适的服装。传统的深衣戎服显然不便骑



图C—12 陈祥道《礼书》中的深衣形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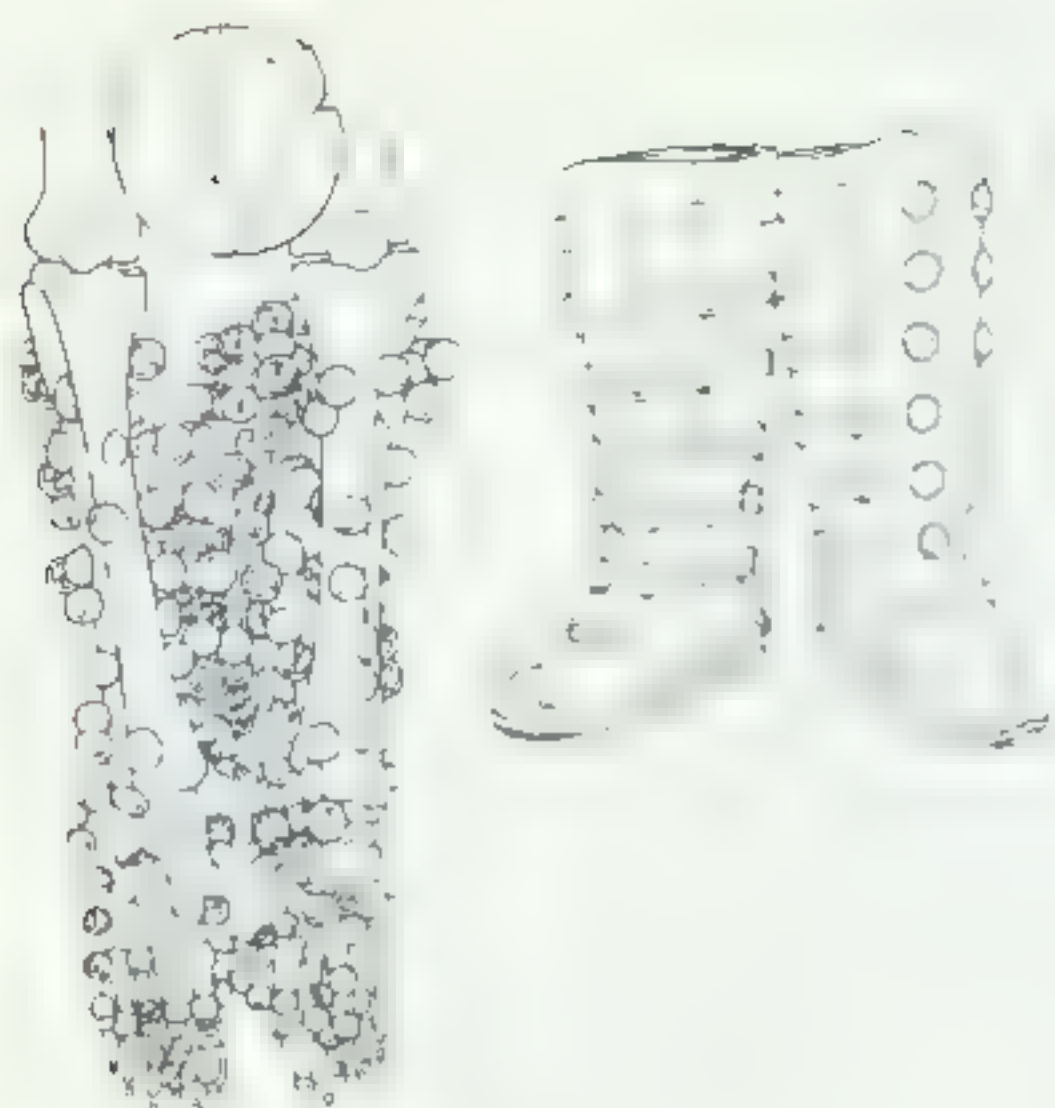


图 C—15 左：沈阳郑家洼子战国墓内皮靴泡饰出土情形 右：泡饰皮靴复原图



C—5 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战国匈奴金冠饰。

腐殖物附着，据分析死者葬时穿着一双钉满铜泡的长统皮靴。（图 C—15，详见沈阳故宫博物馆、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郑家洼子青铜时代墓葬》，《考古学报》1975 年第 1 期），从墓中随葬的兵器马具分析，死者生前可能是个武士。这个考古发现说明当时北方的军人已开始穿靴，但中原地区广泛使用靴要到魏晋以后才开始。

冠饰方面，这时出现了惠文冠，相传亦为赵武灵王所创。其形如帽有双耳，用细如蝉翼的丝织材料制成（惠即蟬，蝉类昆虫），额前有金钗之饰和貂皮暖额，用以表明尊贵的身份。这种冠开始并不是专门的武冠，秦汉以后才逐渐成为戎服的一种重要冠饰，并为以后历代不断使用。其具体形制可参见秦汉部分。

冠上用于表明身份的除了貂钗等饰品外，有时还用动物造型。1972 年在内蒙古阿鲁柴登附近的沙窝内发现一批战国时期的匈奴金银器，其中一件金冠饰十分引人注目。冠饰分冠带和鹰形冠顶饰两部分，冠带由三条半圆形金条组成，正面两条上下相连，背后一条。前后冠带连接处饰以虎、羊、马的浮雕图像。冠顶分四片组合成半球形，上面镌刻狼咬羊的浮雕图案，冠顶傲立着一只展翅雄鹰，鹰的头、颈部镶嵌两块绿松石，整个造型栩栩如生，金碧辉煌，真是难得的珍品。（彩图 C—5，详见田广金、郭素新《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遗物》，《考古》1973 年第 3 期），这件冠饰无疑是身份较高的匈奴贵族用品，而且很可能是个军事长官，因为猛禽猛兽历来是古代武士的一种象征，隋唐以后又常以其为绣纹绣在衣服上来区分武官品级。

腰带是服饰的重要配件，与裤一样，在华夏服饰中也早就存在，如帝王冕服中就有大带、革带一项。不过西周之前的腰带都是用帛或在皮革外包裹帛制成，系束也用帛带为之。以后发明了带钩，便开始用带勾勾连，不仅“所以拘带，且以捍矢”（朱剑心《金石学》），即系挂装矢的矢箛（箭筒），用途很多。近年对大量的实物进行研究后发现，带勾实际上有三大类：一类为衣襟勾，常被装在衣服衣襟处，用以系结衣襟；一类为佩挂勾，用于佩挂武器、饰品等；另一类就



中国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复原图

袍服参照洛阳金村出土战国银人像（织物绣纹根据湖南江陵楚墓出土实物）；冠根据文字记载，参照汉代出土实物设计；靴根据蒙古诺音乌拉匈奴墓出土实物复原；兵器根据湖南长沙、湖北随县出土实物复原；马具根据秦始皇陵兵马俑出土实物复原、设计。





秦代

秦代将军服饰复原图

根据秦始皇兵马俑二号坑出土将军俑复原，服饰颜色根据《秦侍卫甲俑的服饰与彩绘》一文（秦俑坑考古队王学理，《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





D—1 军吏俑，披一型铠甲

秦代

(公元前 221 年—公元前 20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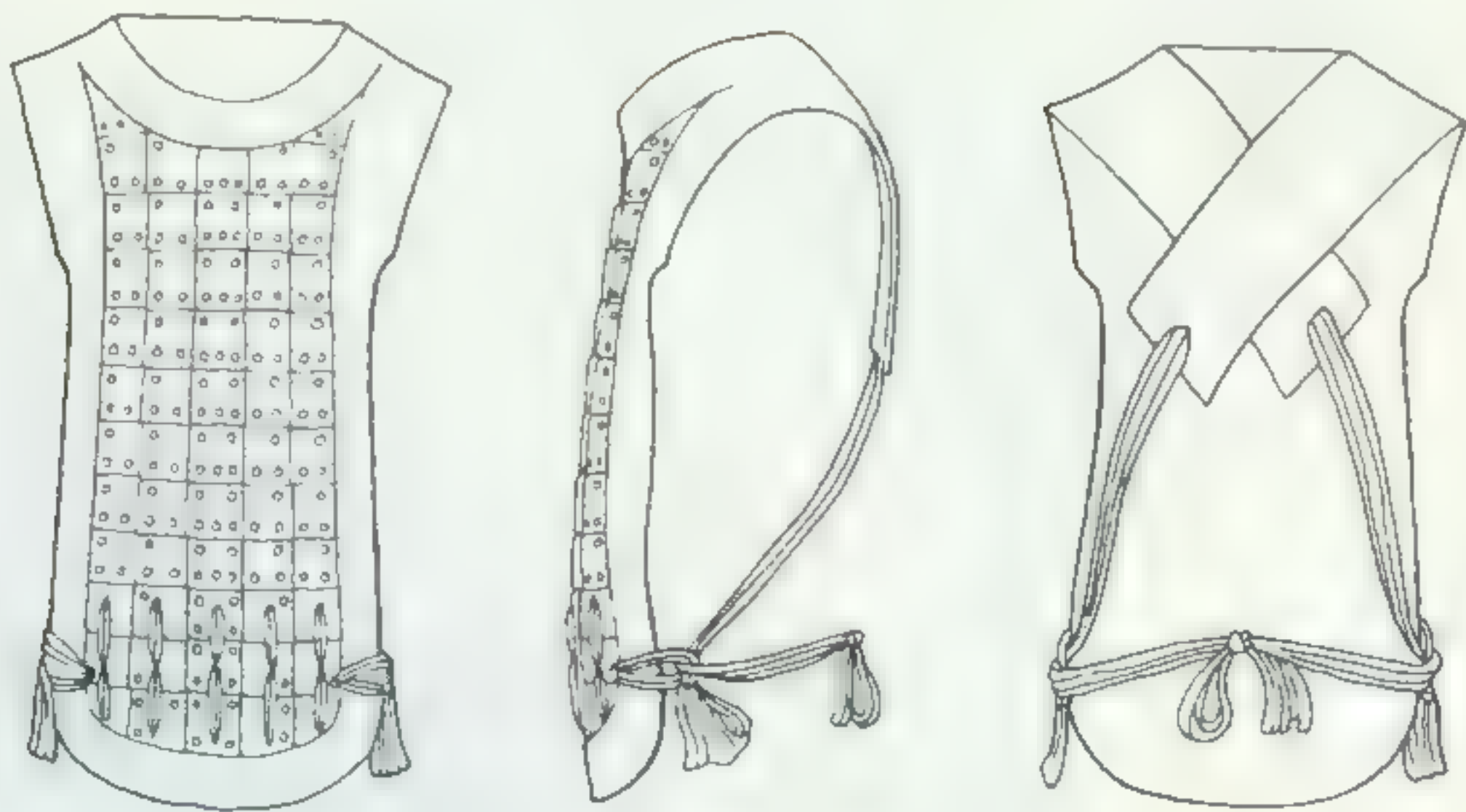
秦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军事强国

秦代的军戎服饰是至今资料最全面、最准确、最详实的朝代，这要归功于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目前在陕西临潼、^①、^②号坑内出土的陶兵马俑来看，这些兵马俑的雕塑手法极为写实，不仅人物的神态表情栩栩如生，而且发髻、靴鞋等每个细节都很逼真、准确，从而为研究古代服饰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已出土的兵马俑分为将军俑、车马俑、骑士俑、步兵俑、弓箭手俑和双手持盾俑几类，他们的铠甲、服饰款式都反映出秦代等级制度（详见秦始皇陵秦俑考古发掘队《临潼县秦俑坑试掘一号简报》，《文物》1975年第11期；《秦始皇陵东侧第二号兵马俑坑钻探试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5期；《秦始皇陵东侧第三号兵马俑坑清理简报》，《文物》1979年第12期）。

铠甲按形制可分为四型六种。第一型仅能护胸腹，与普渡村出土的西周铜甲很接近，应是较原始的铠甲（图D—1、彩图D—1）。这类铠甲在整个俑群中所占的数量很少。

第一型铠甲可分为两种：一种前身下缘呈三



图D—1一型铠甲



秦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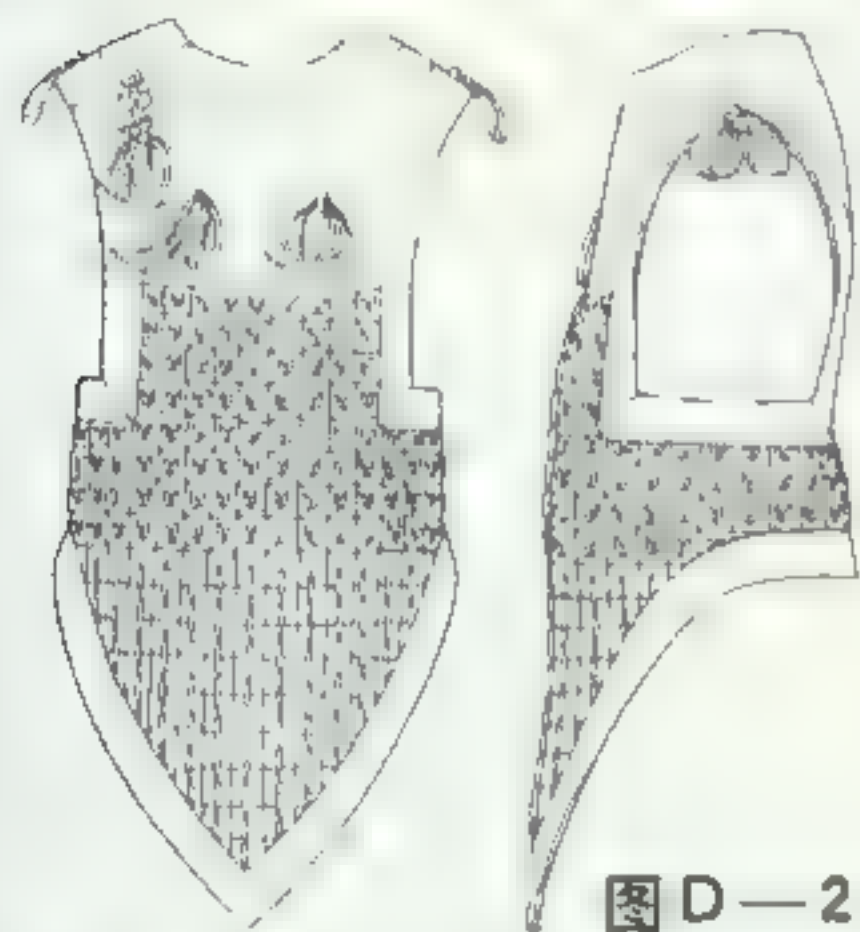


D—2 将军俑，披二型A种铠甲，有披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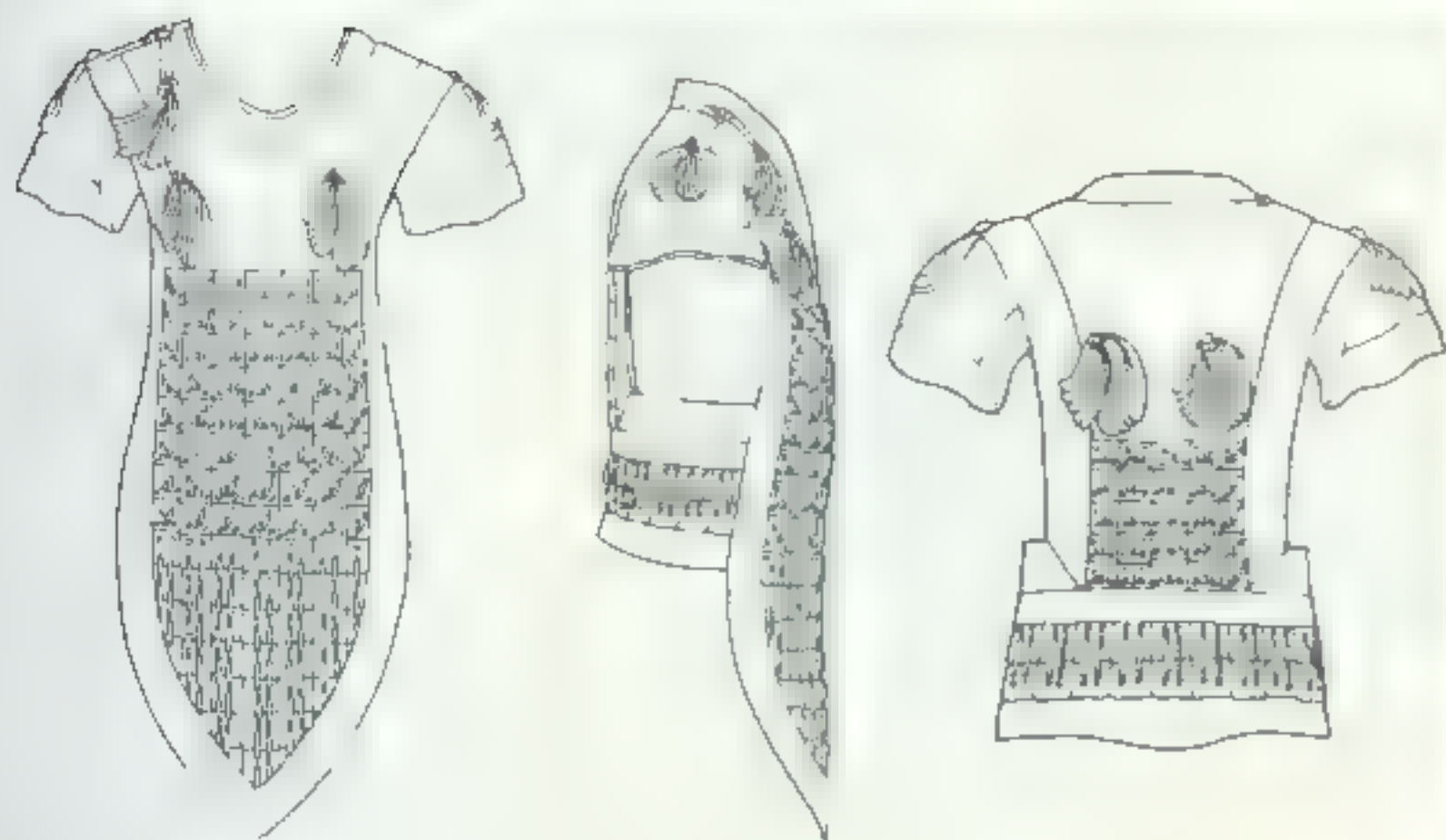
角形，长度至小腹下，有的有整片皮革做成的披膊，有的没有。铠甲的甲片比一、二型显得薄，很可能为模制铁甲片；甲片的表面、铠甲的胸前、两肩和后背，都有彩带做装饰。穿这种铠甲的都是将军俑，因此二型A种铠甲可能是秦代最优良的铠甲（图D—2；彩图D—2、3）。

另一和前身一样长，只及膝上，披膊也是用甲片编缀而成。这种铠甲的甲片比A种略薄，但可能也是模制铁甲片，铠甲上没有彩带装饰。穿这种铠甲的人的身份可能与步兵低，比步兵俑、骑马俑要低（图D—3；彩图D—4）。第三型铠甲的胸前、肩一都无甲片，但根据佩戴者身份都较高与前者来分析，不可能在要害部位没有防护，因此很可能上身是整片的护甲或护身甲片，这样每程便于穿戴，合于格斗。

第四型铠甲数量最多，将军俑和步兵俑都穿这种铠甲，胸前有彩带装饰，有的有披膊，有的则没有（图D—4；彩图D—5）。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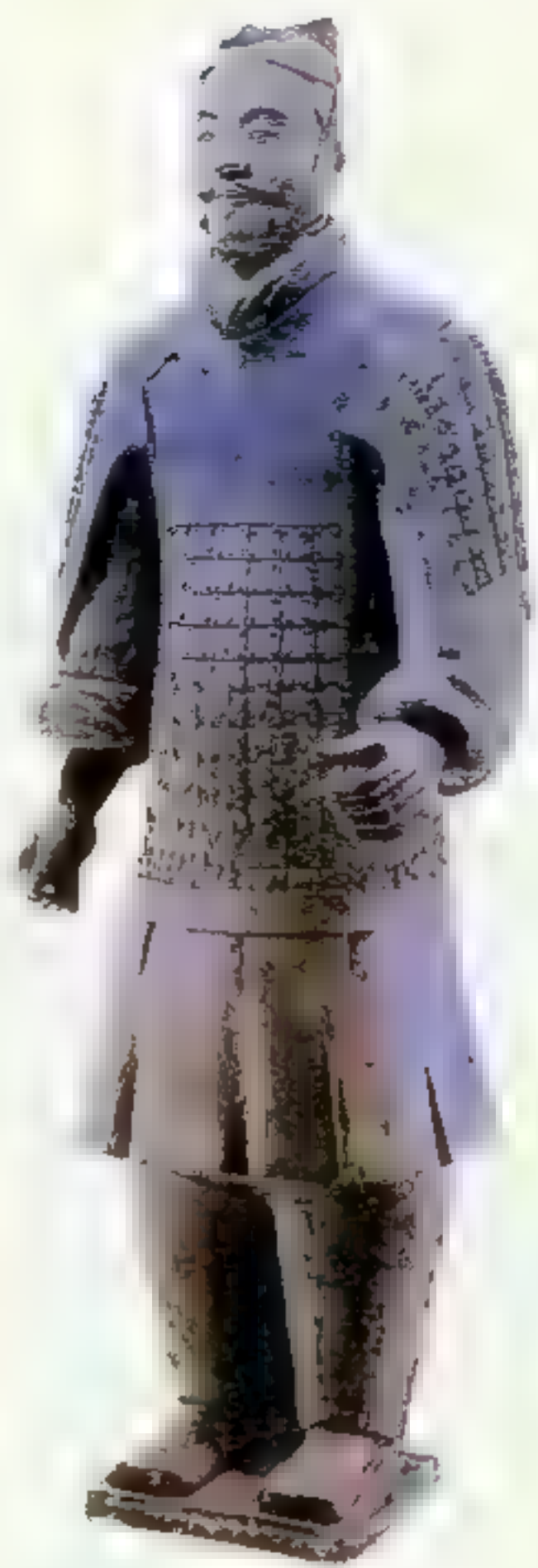
图D—2 二型A种铠甲，无披膊



图D—2 二型A种铠甲，有披膊。



D—3 将军俑，披二型A种铠甲，无披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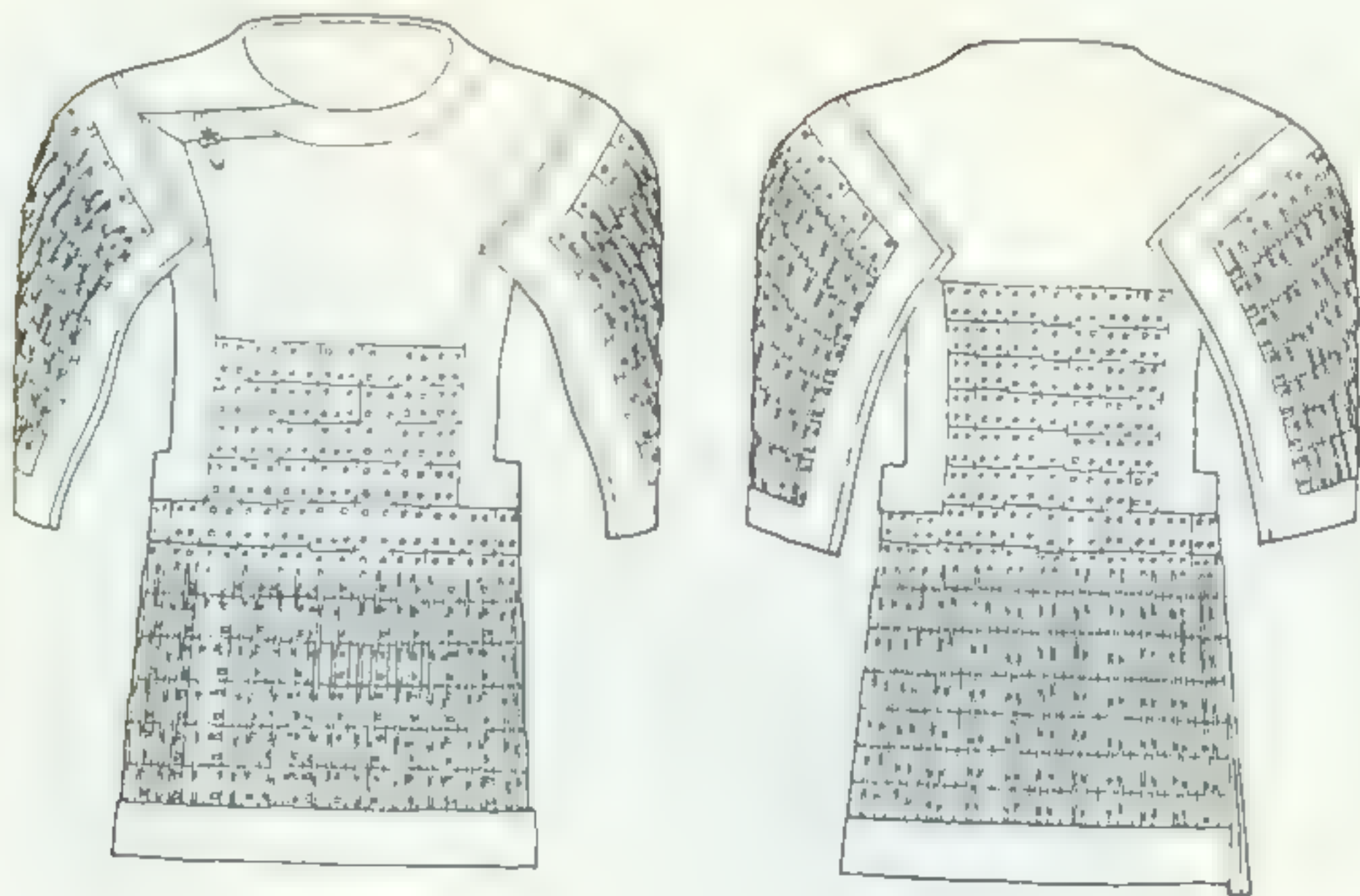


D—4 军吏俑，披二型B种铠甲

一型铠甲的甲片都比较大，而且厚，很多研究者都认为是模拟皮甲，从随同出土的兵器基本上都是青铜器这一点来看，这个推测应是正确的。铁铠甲的数量在当时毕竟还是很有限的。

第四型是驭手专用甲，甲身形制与第三型B种差不多，但甲片更小，甲身也要长得多，有高高竖起的盆领和长及手背的甲袖，甲袖的构造和随县战国的皮甲很相似（图D—5）。而且无论是铁甲还是皮甲，都在右侧肩、腋下开襟，也与战国时期的完全相同。这四型铠甲中，凡是铠甲，四周边缘都有包边，而皮甲都没有。

秦始皇陵区除了兵马俑之外，还出土有近似实物的石制甲冑，199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内，进行考古的时候，发现了大量的石制甲片，经过仔细的清理、辨认，共出土甲衣87领，冑43顶，马甲1副。其中，第一、二种甲衣，没有披膊，与兵马俑的三型A种皮甲相类似。第一种有披膊，与兵马俑的三型B种皮甲相近。第三种的形制与第二种基本相同，但甲片显得更小，制作更精细，甲身也要长些，甲裙的前后中部突



图D—3 二型B种铠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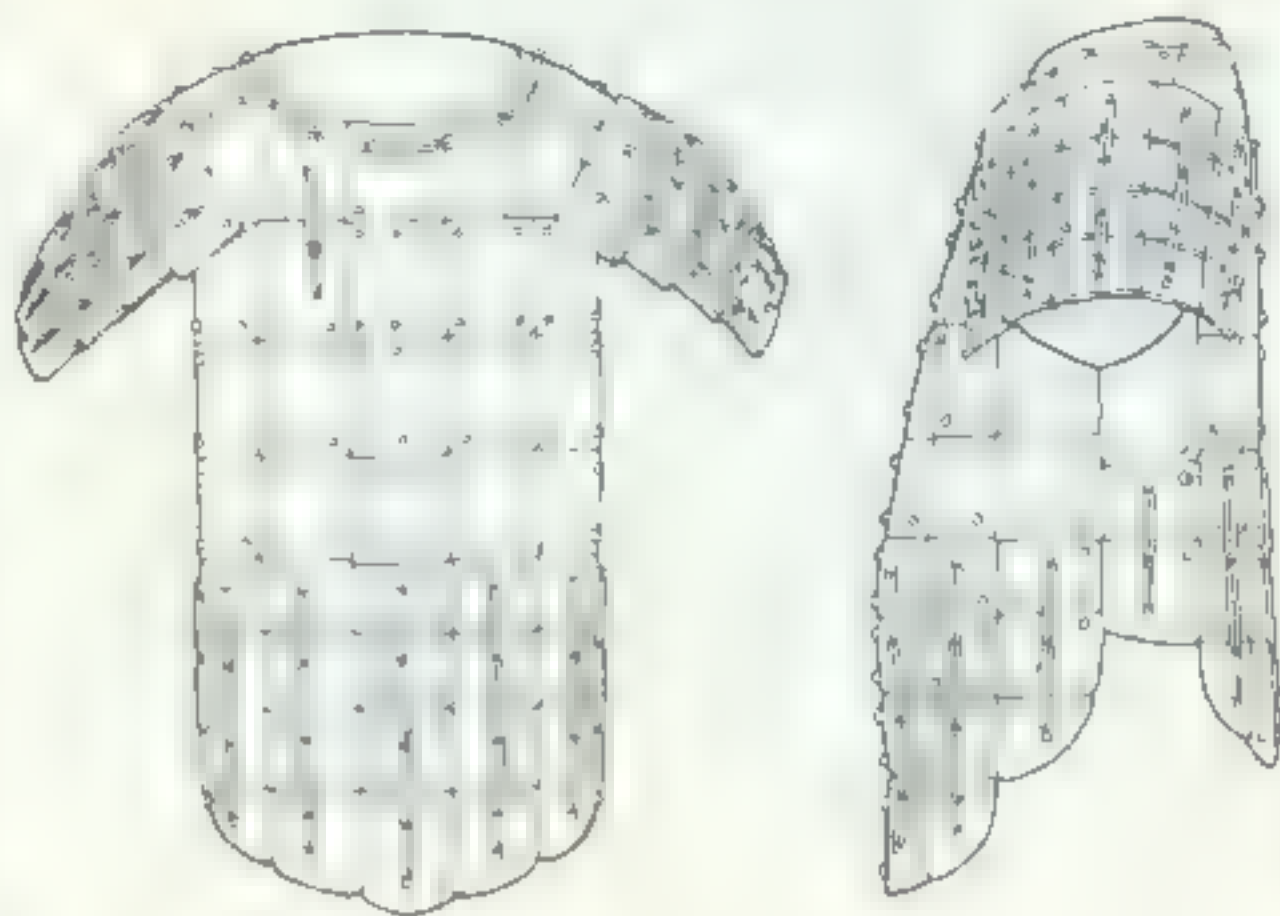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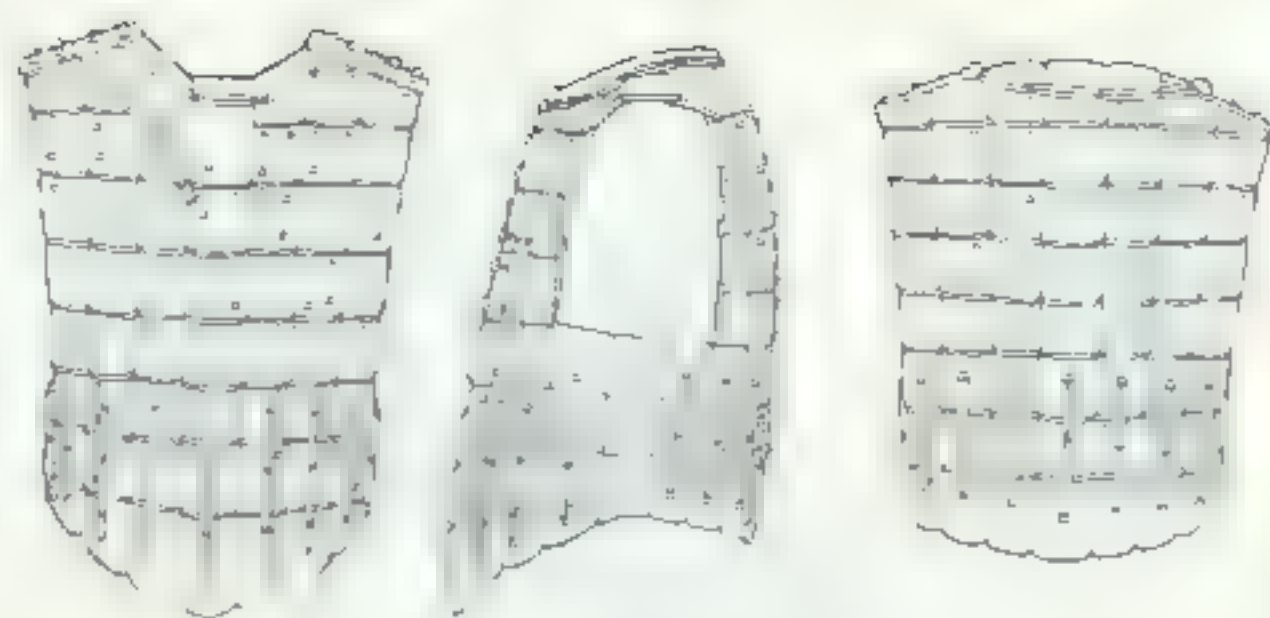


秦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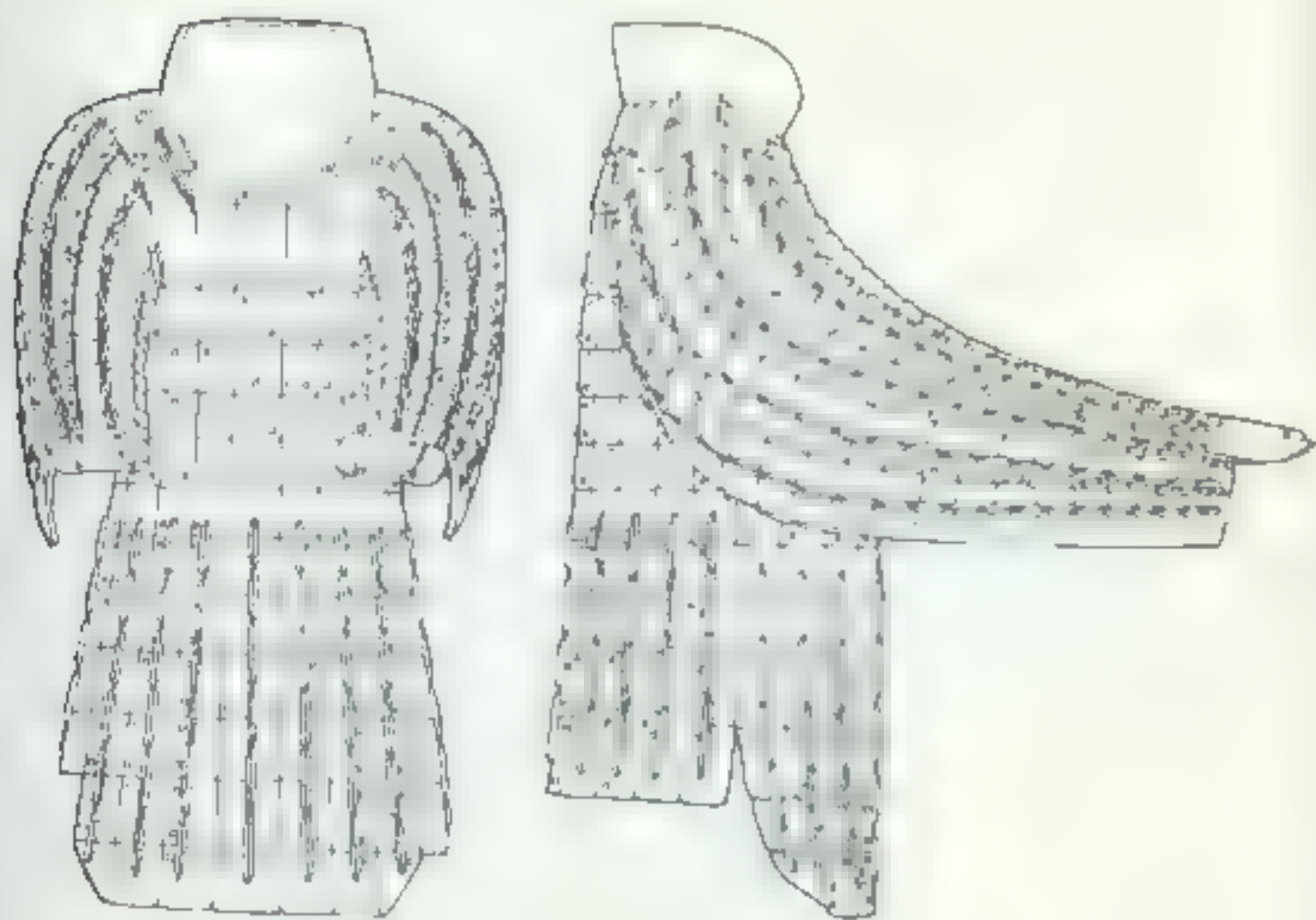
出成尖角。这一种甲衣的数量最多，占总数约百分之六十，出土的只是一件修复（图D—6）第四种甲衣最为精美，可惜残损较多，不能复原。这种甲的甲身很长，甲裙很短，甲片排列紧密，甲片薄而小，很多甲片的小角呈尖形，排列起来甲衣呈鱼鳞状，有的甲片上还有小孔，与军俑的甲相类似。据专家介绍，这种甲衣中有一种都是仿制皮甲，只在第四种甲衣中见到，而且是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仿制甲的实物（图D—7）。

胄的形制全都相同，令人惊讶的是，它的形和制作方法与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的战国时期完全相同，因此可以断定，这种胄也是仿制铁制品，它们在出土时，外面有漆，内衬有织物内衬的，所以在沿口处有漆皮（图D—8，详见《秦始皇帝陵兵马俑坑》《文物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

秦代的戎服，与甲衣的形制完全相同，一律上穿甲衣，下穿裤子，甲衣上有行绳，与军俑的甲衣（图D—6）相似，其形制与洛阳金村的银人像（图D—9）相似，其甲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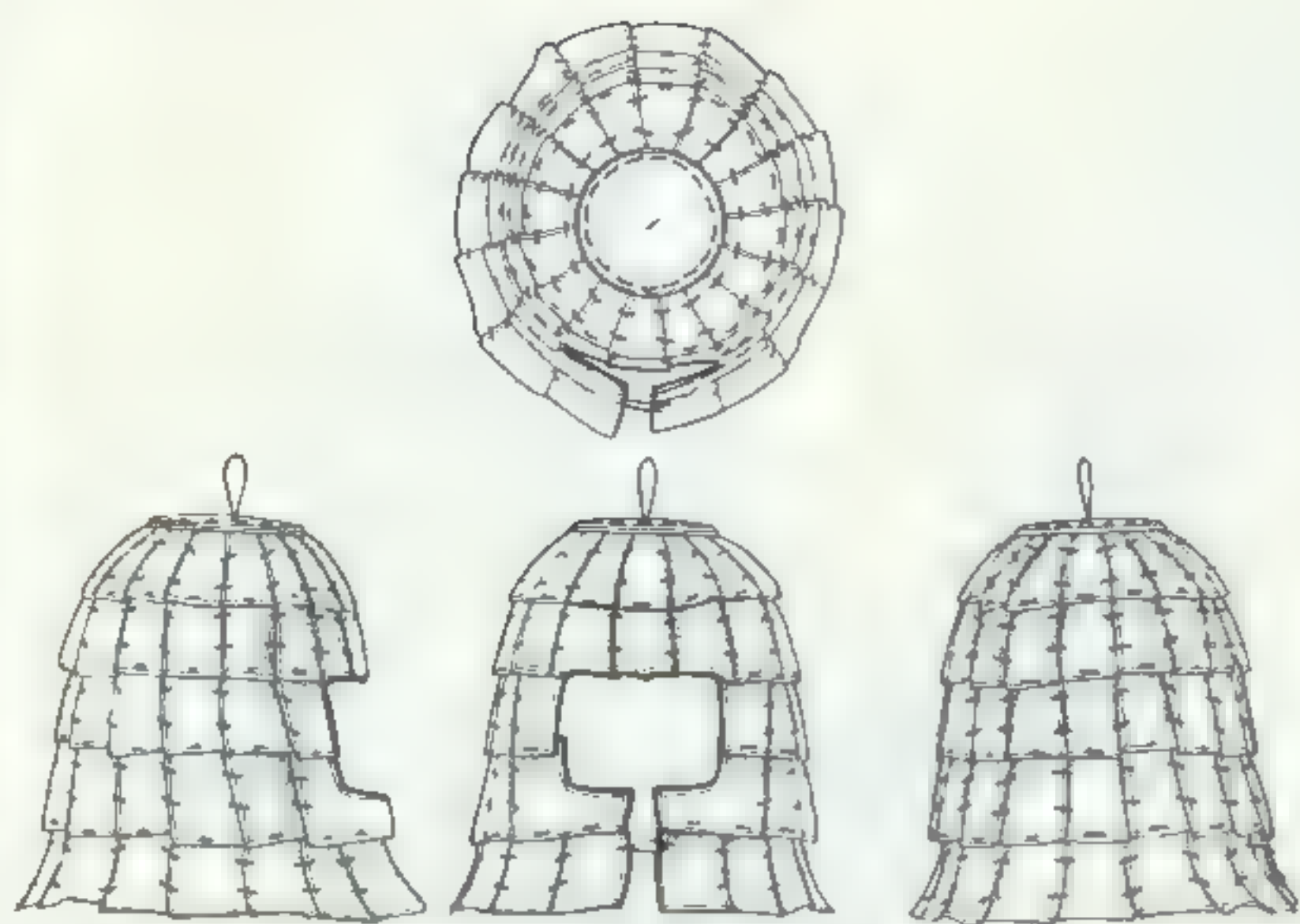
图D—4上：三型A种皮甲，骑兵用，无披膊。下：三型B种皮甲，步兵、射手用，有披膊



图D—5四型皮甲，驭手专用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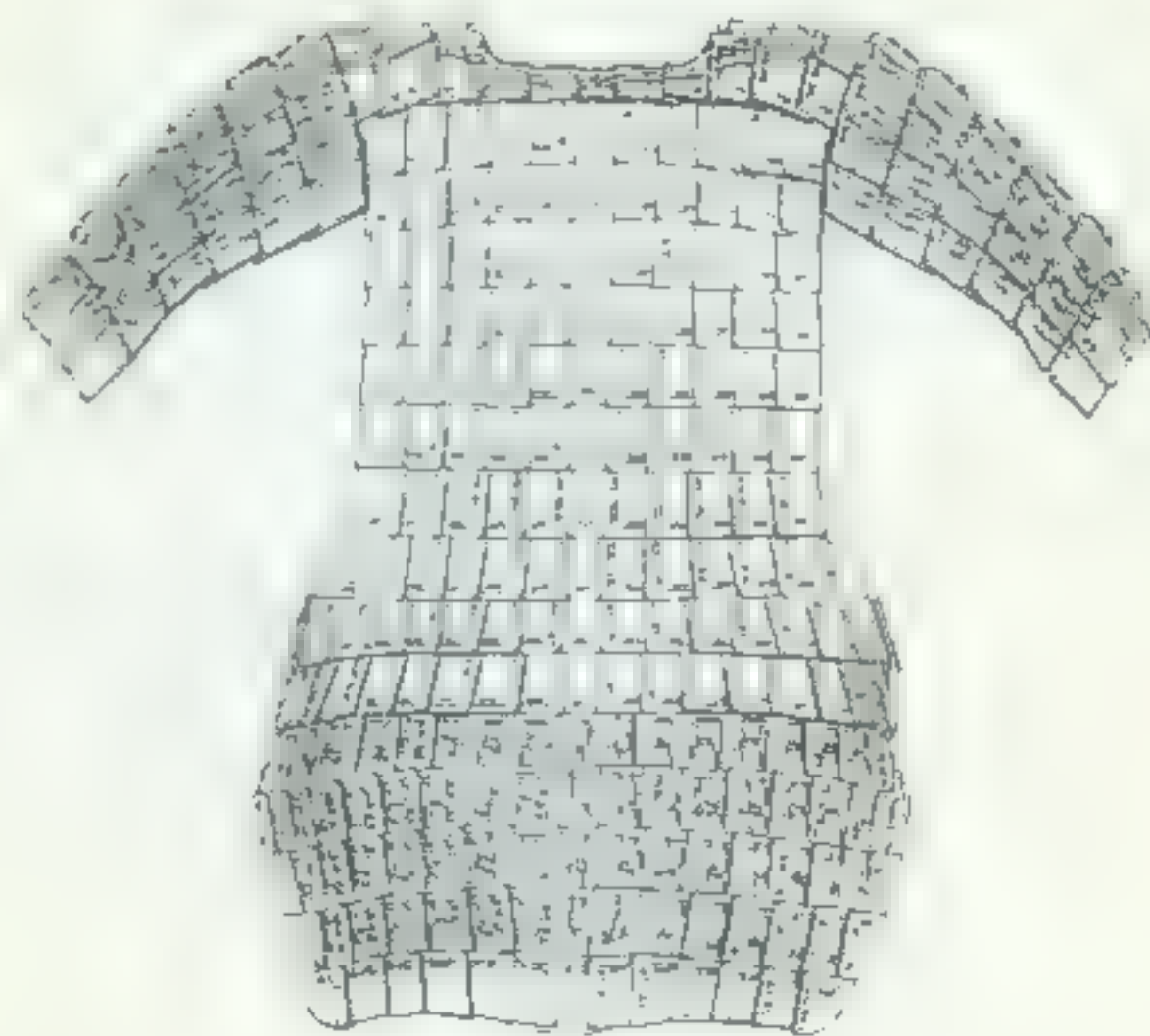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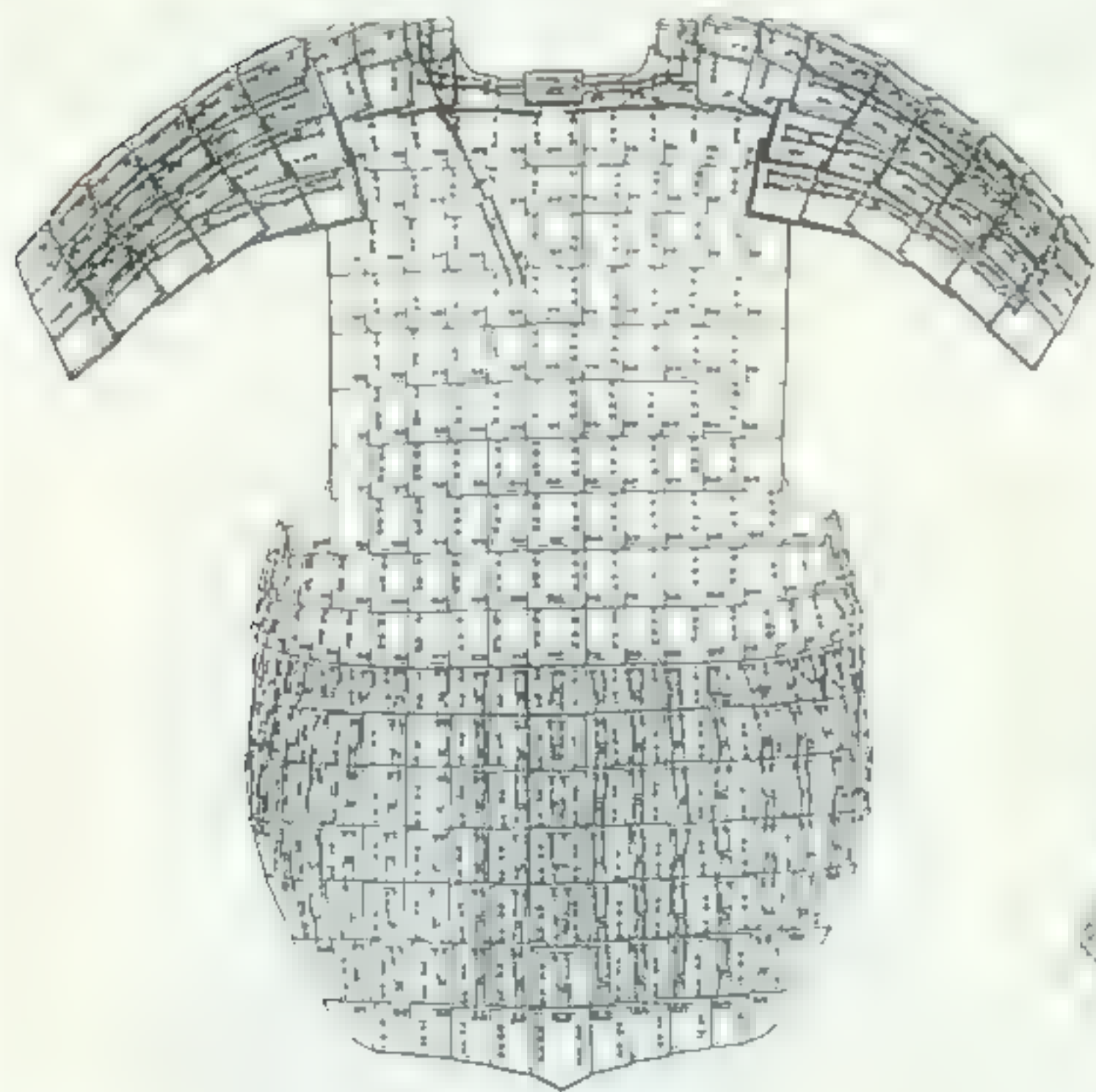
D—5射手俑，披三型B种铠甲，有披膊



图D—8 秦始皇陵园陪葬坑出土石质胄复原图，侧视（左）、正视（中）、背视（右）、顶视（上）。



图D—7 秦始皇陵园陪葬坑出土的石质，有鱼鳞形甲片的铠甲残件。



图D—6 秦始皇陵园陪葬坑出土石质铠甲复原图，正视（左），侧视（中），背视（右）。





秦代



D—8 戴帽的步兵俑

从袍服俑上可以看出，戎服外一般都束腰带，腰带用皮革做成，古称带、鞶革。《文献通考·带》曰：“革带古之鞶带也，文武众官牧守丞令下及骑寺皆服之。”“秦二世始名腰带”（《孔氏谈苑》卷五），带用带钩系接（参见彩图D—6）。

秦代之前各朝对于服饰和旌旗的尚色，被战国时期兴起的阴阳家所利用。他们根据道教有关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把这些尚色与金、木、水、火、土联系起来，解释演绎成朝代兴亡的原因。他们认为夏尚青属木德，殷尚白属金德，金克木，所以殷取代了夏；而周尚赤属火德，火克金，因此周灭掉了商；到秦始皇做了皇帝，他十分迷信这一套，觉得自己取代了



图D—11 四种发髻俑的发髻梳法、样式



图D—9 发髻束束的兵卒俑

周，一定属水德，所以“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史记·秦始皇本纪》）。但秦始皇兵马俑所反映出的情况并非如此，当时戎服的实际色彩还是很丰富的。

所有的兵马俑在当初都经彩绘，这从出土时残留、粘附在俑和泥土上的颜色就可以知道。其中袍服主要有紫、粉紫、朱红、粉红、绿、粉绿、蓝、粉蓝、黑等色；铠甲主要是赭色，上面的编缀绳带和包边有白、中黄、橘黄、朱红等色。

一型、二型铠甲的领口、胸前和背后的束带还绘有几何花纹图案。靴履则有赭黑、赭色、橘红色几种。



图D—12 从左至右：高统靴、方口翘头履、方口翘尖履、方口齐头履。



D—10 秦代骑兵、步兵服饰复原图

根据秦始皇兵马俑一、三号坑出土骑兵、士兵俑复原。兵器、马具采用秦俑坑、秦车马俑坑出土实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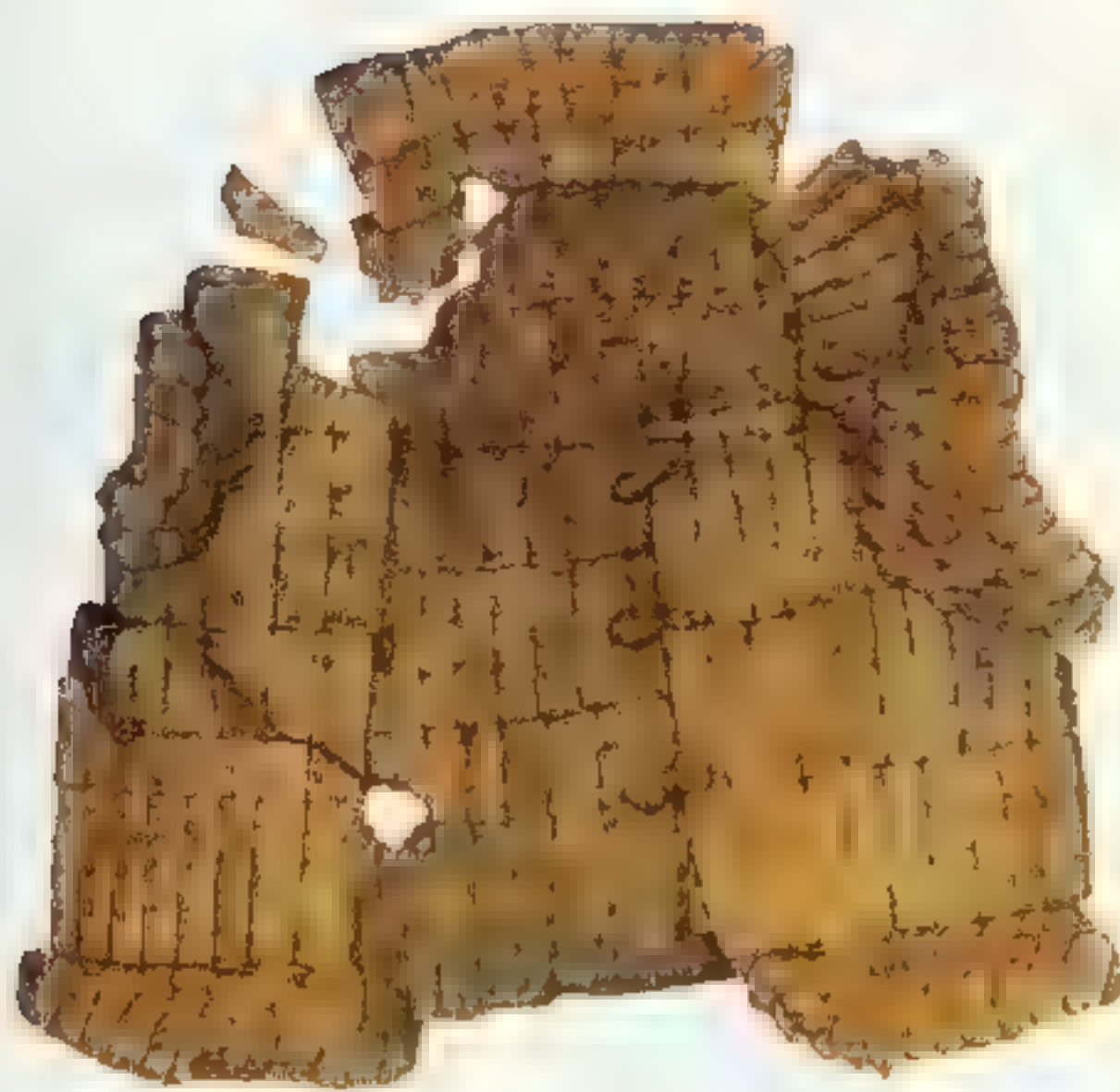
秦
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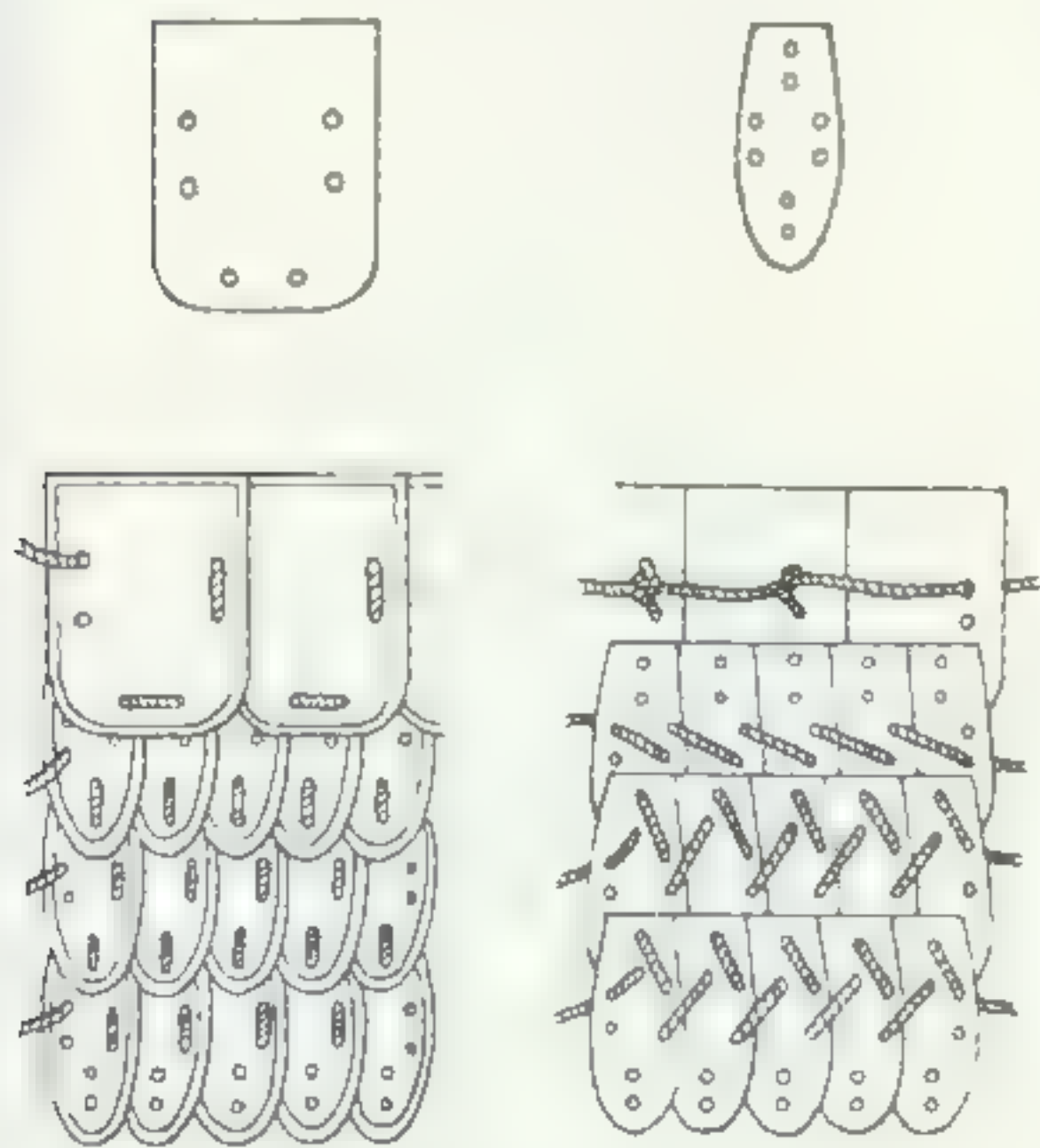
西汉将帅军戎服饰复原图

甲冑根据临淄齐王墓实物复原，戎服根据杨家湾兵马俑、河南偃师杏园东汉墓壁画形象设计，兵器采用河北满城汉刘胜墓、四川成渝、山东巨野出土实物，佩剑方法参考图E—18





E—1 呼和浩特二十家子古城出土铁铠扣（据照片绘制）



图E—1 洛阳西郊西汉墓出土铁铠甲
左：正面 右：背面

現代

(公元前 206 年—公元 220 年)

汉代以王莽新政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汉(又称西汉)的军戎服饰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基本上沿袭秦制。由于汉代的丧葬制度把兵器铠甲做为随葬品,所以从被发掘的汉墓中获得了大量出土实物,使汉代成了目前这方面掌握实物资料最多的一个朝代。

铁兵器经过战国后期和秦代的发展，到西汉时已占主要地位，近年来出土的西汉铠甲全都是铁甲，而且都是锻铁制成的。这些出土实物有：

1957年在洛阳西郊3032号西汉晚期墓中出土的残铁铠，由于锈蚀严重，仅保存下来328片。其中有：护心甲、护肋甲、护臂甲、护膝甲、护腿甲、护裆甲、护腰甲、护背甲、护腹甲、护臀甲、护踝甲、护足甲等。（见《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第2期）

城遗址的清理工作中，从第七发掘区的一座窖穴中出土了一领完整的铁铠，铁铠分身甲、钗和锻钲。甲片编缀而成，前身上下四排，背后五排，胸前开襟，用铁钩扣连。“钗”（汉代对披膊的称呼）和甲身垂缘用鱼鳞甲片编缀而成，钗上下六排，甲身垂缘上下三排。甲身开领处有用长条形甲片编缀成的“锻钲”（汉代对盆领的称呼），外形与随县出土的皮甲盆领十分相似。甲片的编缀方法是前片压后片，上排压下排，甲身和锻钲固定编缀，不能活动，钗和甲身垂缘是活动编缀，横向固定，上下可以伸缩自如，与秦始皇兵马俑铠甲的编法相同。甲片用麻绳组编，发掘简报中未提到发现有铠甲内衬痕迹的问题，但坚硬的铁甲一定会有内衬，否则穿着会非常不舒服。这领铠甲的年代据考证是汉武帝晚期遗物。（彩图E—1、彩图E—18；详见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呼和浩特二十家子古城出土的西汉铁甲》，《考古》1975年第4期）

在遗址的第四发掘区，还出土一领残铁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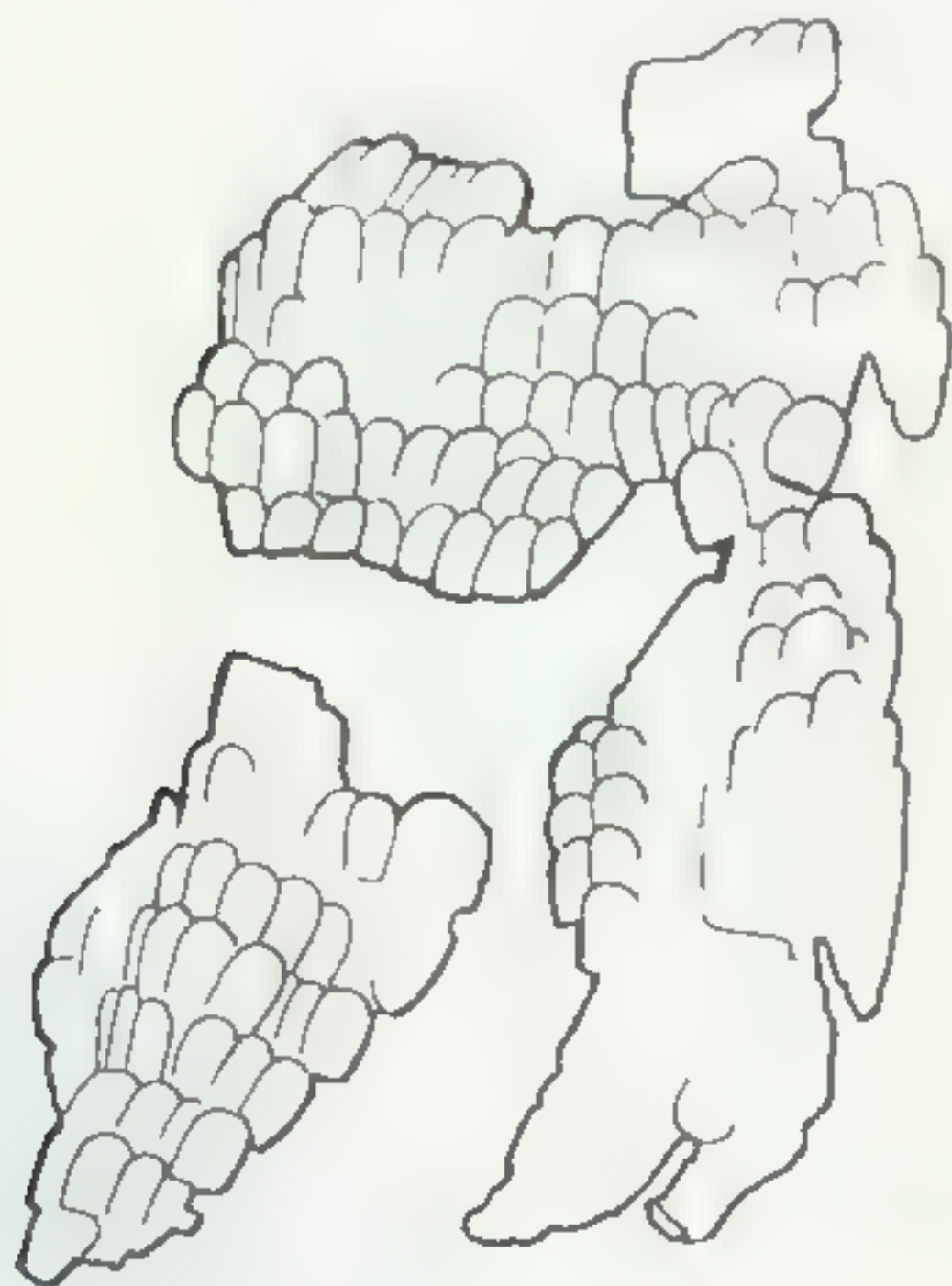
据简报介绍，由于损毁严重，发现时已呈零散不相隶属的几个部分，所以无法复原。根据出土时的现场观察，初步推测是用束保护身体的“解褫”（汉代对解褫的称），与同一墓葬物馆收藏的执刀俑上的形象有相似之处（图E—2）。

1968年在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刘胜墓中出土了一领铁铠甲，由2244片铁甲片编缀而成，方领，高肘，袖口微束，用细线将铁甲片用丝绳编缀，甲片编缀时，甲片与甲片之间与甲身下缘6排甲片之间编缀，其编缀方法定编缀（彩图E—2、《满城汉墓出土文物》、《文物》1972年第1期）。刘胜墓中出土的这件铁铠甲，是公元前134年即汉武帝元朔元年，属于西汉中期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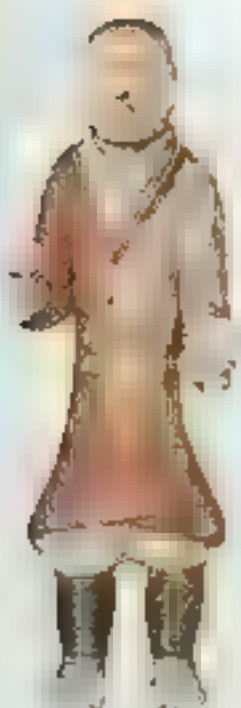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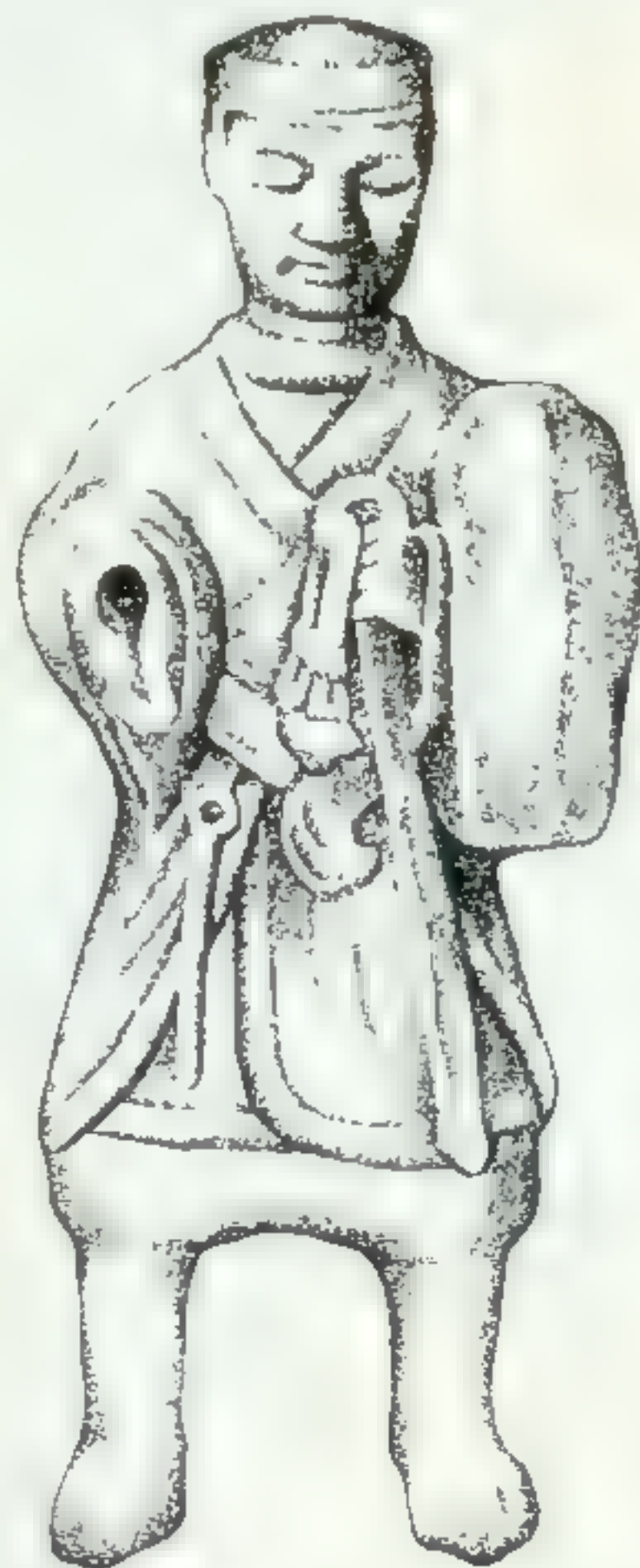
1970年在山东临沂大武村汉墓中出土的一件铁铠甲，出土时呈零散状态，由铁甲片编缀而成，方领，高肘，袖口微束，甲片编缀时，甲片与甲片之间与甲身下缘6排甲片之间编缀，其编缀方法定编缀（彩图E—2、《满城汉墓出土文物》、《文物》1972年第1期）。刘胜墓中出土的这件铁铠甲，是公元前134年即汉武帝元朔元年，属于西汉中期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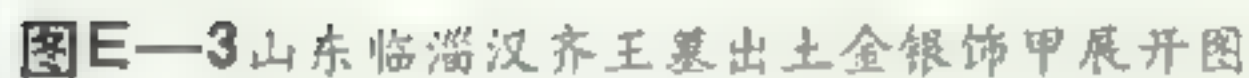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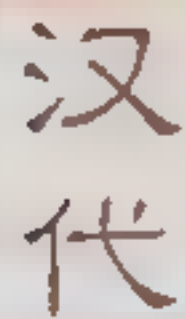


E—2 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铁铠复原图



图E—2左：二十家子残铁铠出土时的情况 右：汉执刀俑 四川省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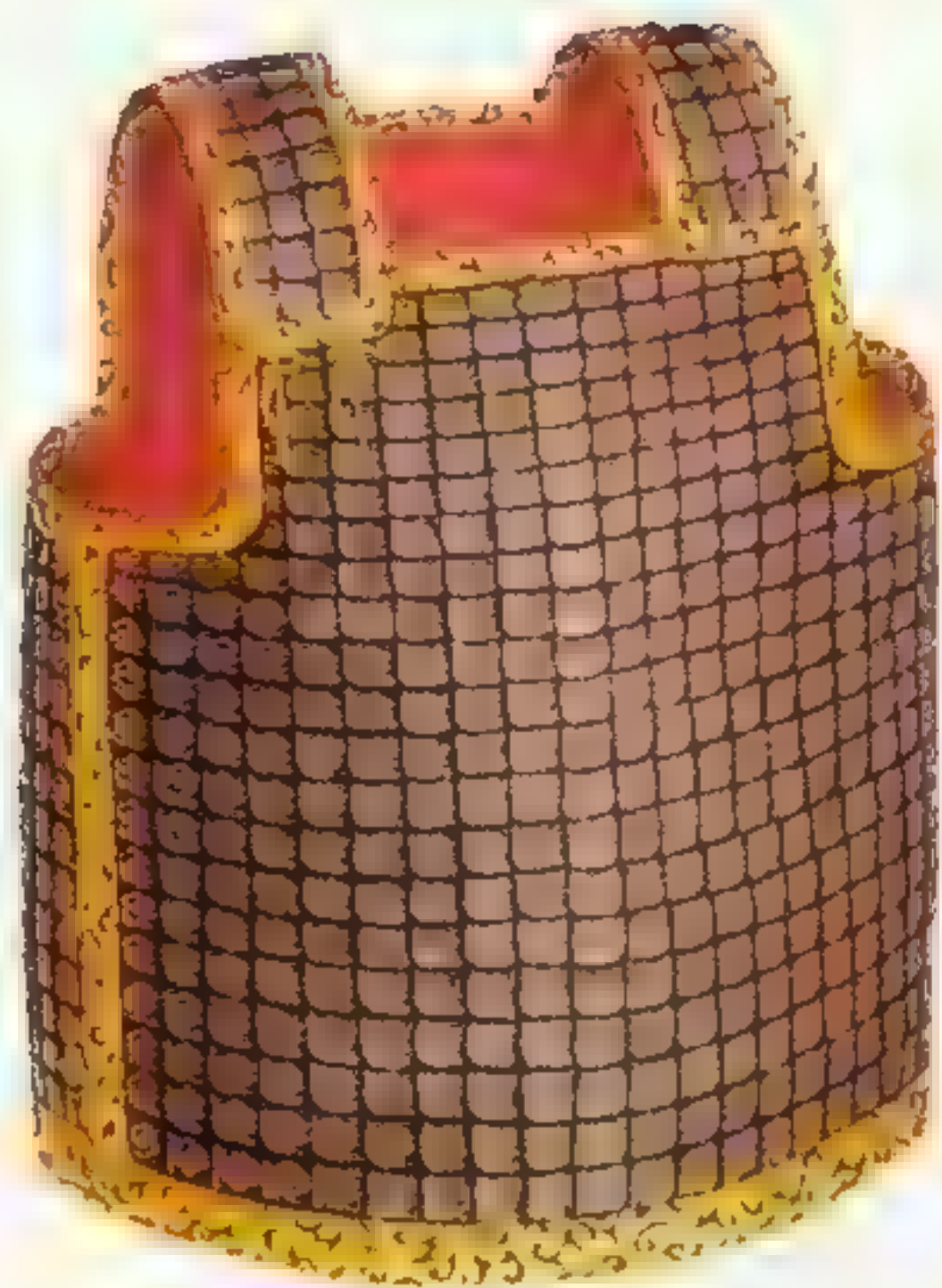




A 3D perspective drawing of a 4x4 grid of squares. The top row contains squares labeled 11, 9, and 10. The second row contains squares labeled 1, 2, 5, 7, and 8. The third and fourth rows are empty. The squares are arranged in a 3D perspective, with the top row being the highest and the bottom row being the lowest.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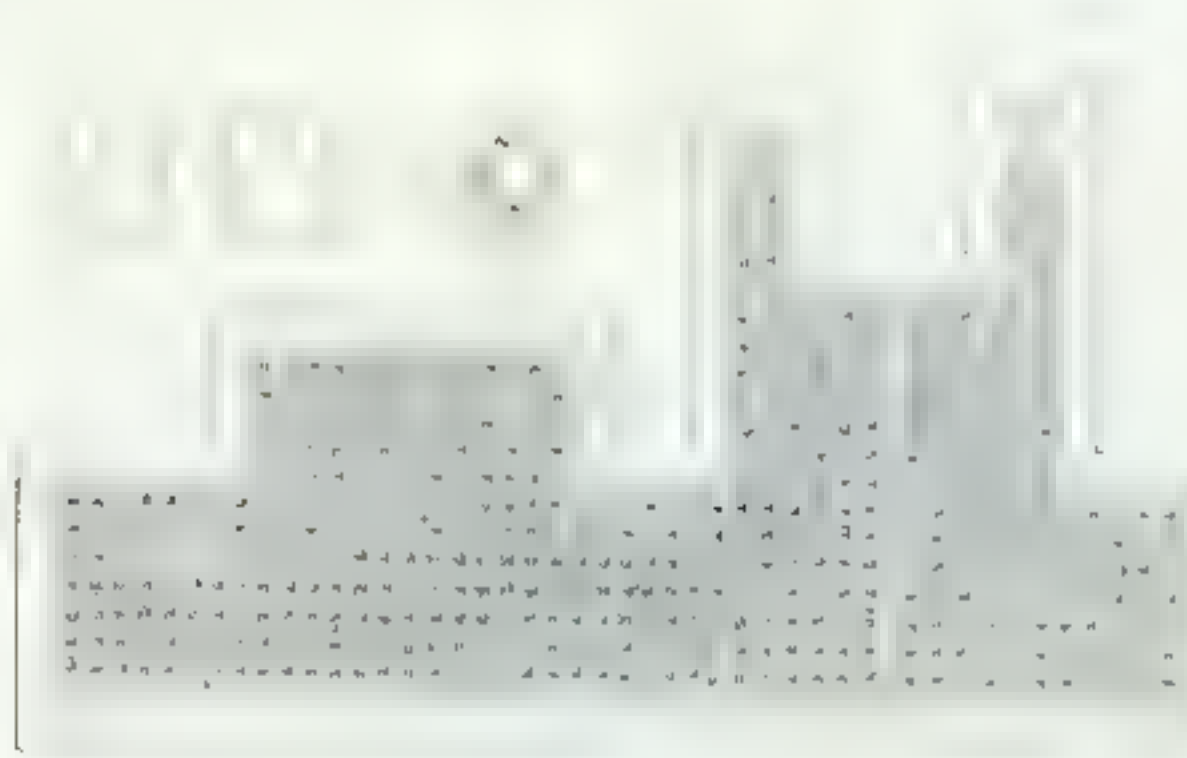
37



E—3 广州南越王墓铠甲复原图



E—4 山东临淄西汉齐王墓金银饰甲的复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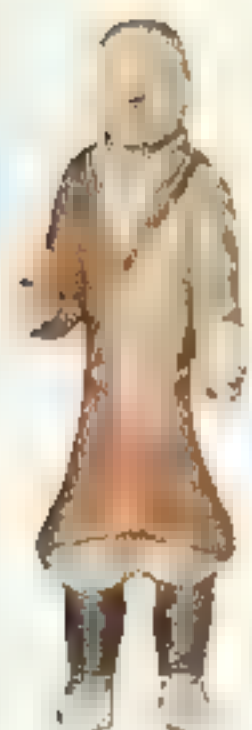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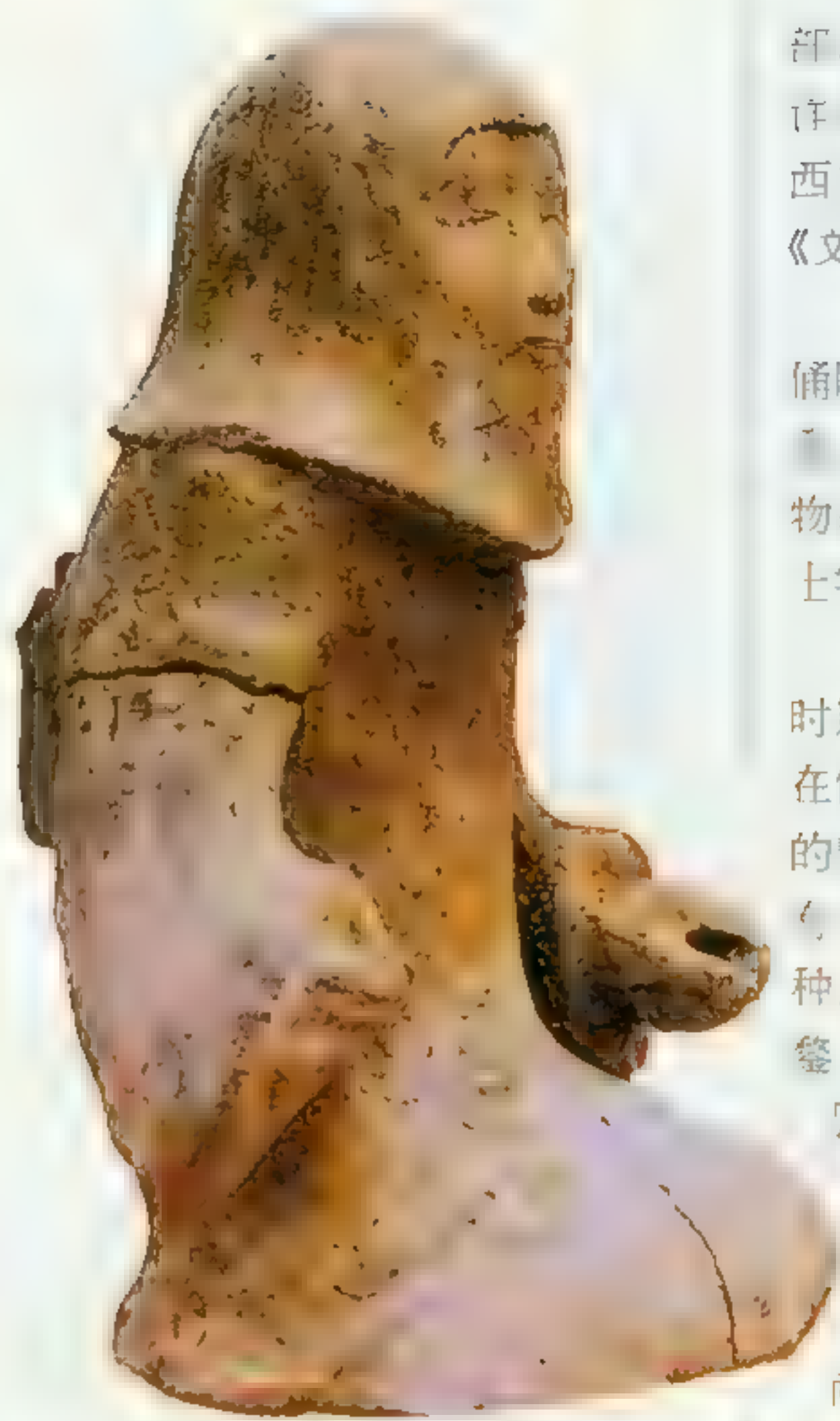
图E—5 ①广州汉南越王墓出土铠甲展开图
左上：铠甲甲片类型和丝带装饰编法（正面）
②铠甲展开分块示意图1.胸片2.腹片3.右前侧
4.左侧5.后背上段6.后背下段7.右后侧8.左肩
9.右肩

物中，也发现一领保存基本完整的铁铠甲，形制与齐王甲差不多，但无钎和甲身垂缘，因此全部甲片都是固定编缀的。甲片也用丝带组编，与齐王金银饰甲一样，身甲部分的甲片表面也有用不同于组编丝带颜色的丝带编成的互锁图案。（图E—5、彩图E—3）
刘胜甲约在公元前128—前117年之间，与刘胜墓属同一时期。（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术室、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铁铠甲的复原》，《考古》1987年第9期）

刘胜甲、齐王甲和南越王甲，都有衬里，内层是皮革，外层是绢类织物，甲的各部边缘用织锦包边。衬里除了用皮革、丝绢外，还使用麻布，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有这种实物（彩图E—6）。

上述五领完整的出土铠甲，除二十家子一领未经复原外，其余均得到复原（齐王甲是在九年以后复原的）。从时间上来说，都集中在汉武帝前后时期，跨度在公元前179年至前90





E—10 徐州狮子山出土汉兵马俑（跪射俑）

这些铠甲都是用红白两色勾画在俑身上，虽然式样不同，但均为黑色，上面用红白两色勾画出甲片细部，这些应该就是玄甲（彩图E—5、E—7；详见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咸阳市博物馆《陕西省咸阳市杨家湾出土大批西汉彩绘陶俑》，《文物》1966年第3期）

根据发掘简报和咸阳市博物馆（西汉兵马俑陈列馆）的归纳，杨家湾兵马俑铠甲分为二类四型，其中有一型小俑是皮甲，而第一类与出土实物基本相同，甲片上画出的红白细部材料与出土实物上的残留物正相符合（彩图E—8、9）。

1984年在江苏徐州狮子山也发掘出了西汉时期的兵马俑，这些兵马俑因墓坑坍塌，泥土压在俑上，出土时彩绘已荡然无存，只能从部分俑的塑造形象上依稀分辨出甲的大致形制。其中有一种与杨家湾二类甲相似（图E—5），另一种只能识别出包裹整个头部、露出面目的兜鍪，身上的铠甲已无法看清。（彩图E—10，详见徐州市博物馆《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坑第一次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1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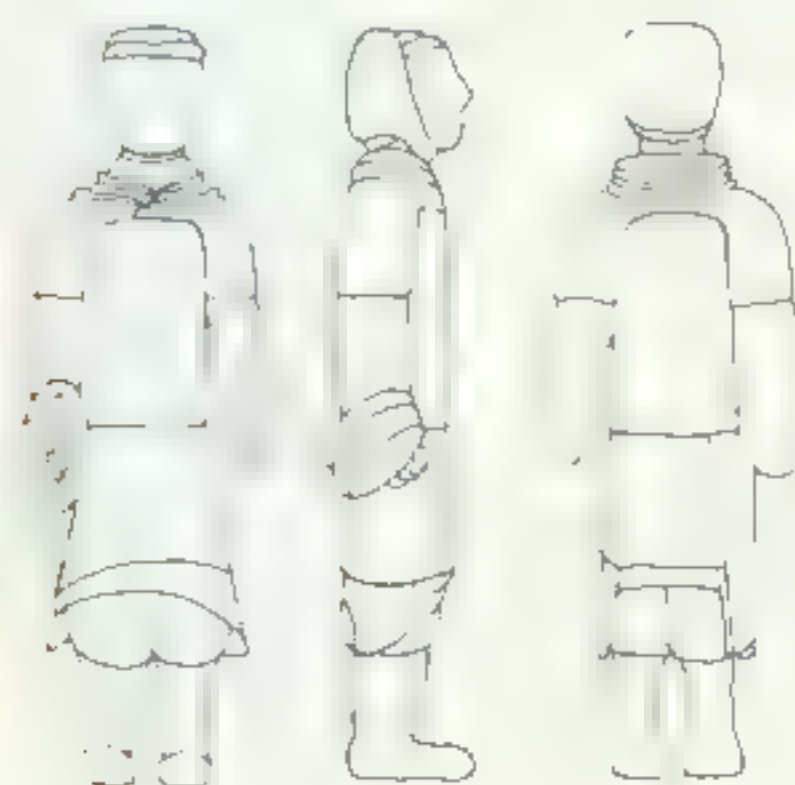
后汉（又称东汉）时期的甲冑资料目前发现十分稀少，从山东沂南和徐州十里铺的两件画像石上的形象可以明确看出，铠甲已有明显的变化（图E—7）。铠甲在东汉时期已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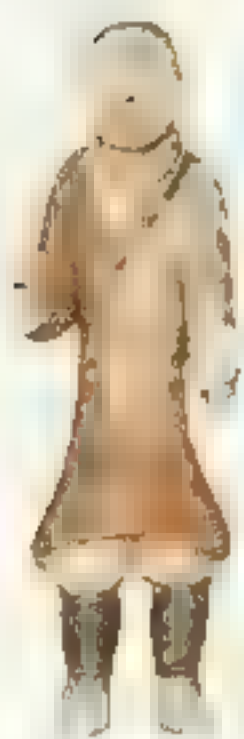
E—8—类二型甲，应是皮甲。



E—9—类一型玄甲（均由咸阳市博物馆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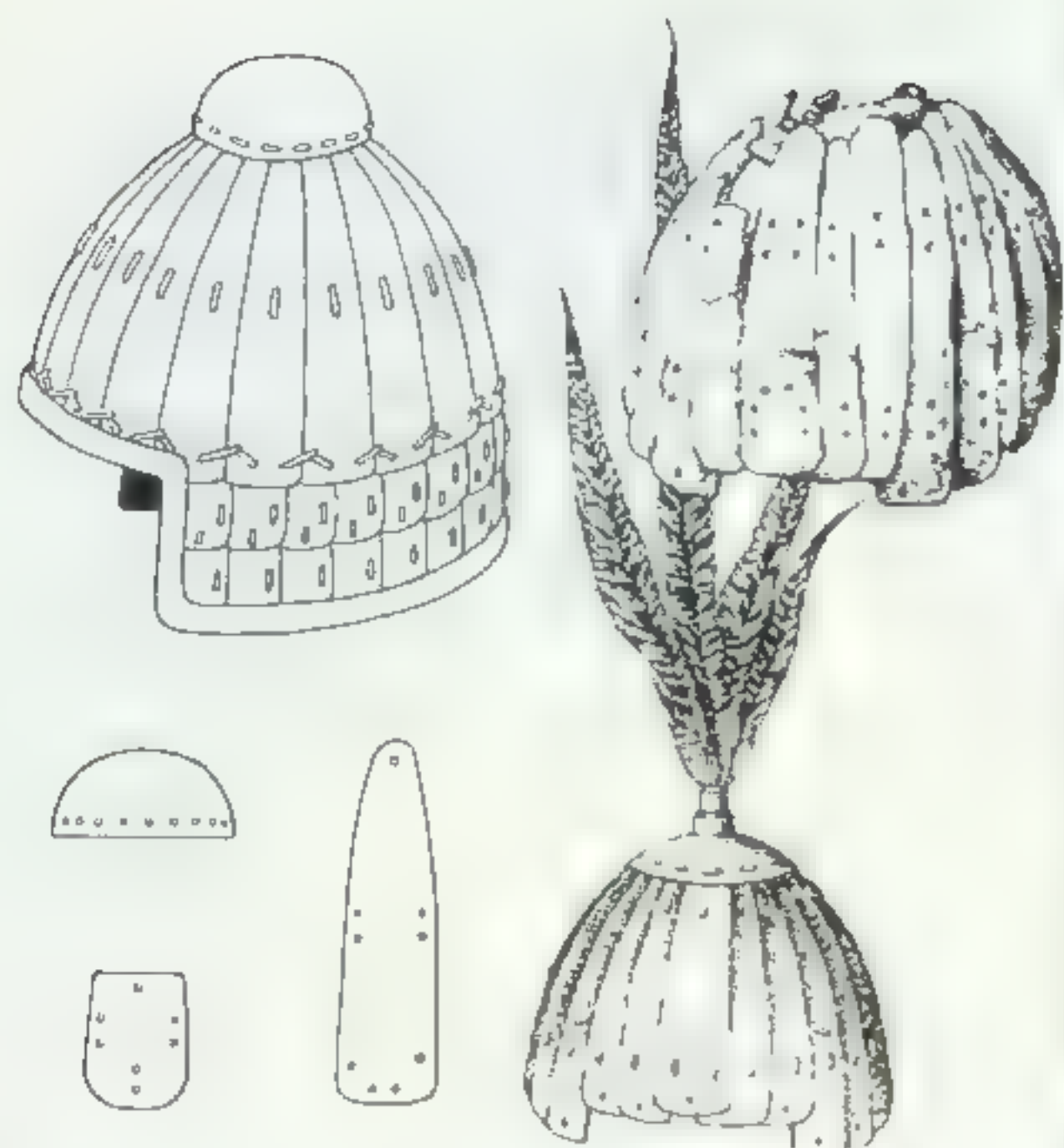


图E—6 徐州狮子山出土铠甲俑





汉代



图E—8左：老河深鲜卑墓出土铁胄复原图（上）和胄顶正视图与长、短二种胄片（下）右：1985年抚顺高尔山城出土高句丽铁胄（上）和复制品（下），沈阳市博物馆收藏、陈列



图E—7上：山东沂南画像石画像 下 徐州十里铺画像石画像 录自《考古学报》1976年第1期《中国古代的甲冑》、《考古》1966年第2期《江苏徐州十里铺汉画像石墓》

阵，早在考古学兴起前就被发现，许多骑兵俑的大腿部都有画出的甲片，这些甲片是做成髀鞬，周围还用黑土涂成甲片，这是表现甲的包边（彩图E—11）发现后，报纸和很多图册、文章均未提到这

胄的实物资料有：1980年在吉林省榆树县老河深村属于东汉初期，出土了铁胄。铁胄由胄顶和胄片组成，胄顶呈半球形，胄片有长短二种，出土时胄片已散，叠成一片（详见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榆树县老河深村鲜卑墓群部分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2期）笔者根据发掘简报提供复原，其复原后的形象见图E—8（左）又和云南出土的一件铜扣饰上的高句丽铁胄（彩图E—13），其形制直到魏晋时期，仍有使用，故其

汉代的戎服在整体上有许多方面与秦代相似，车队中不分尊卑都上穿铠甲，下穿短襦，铠甲为采衣制，又称纱縠单衣，《汉宫仪》卷上曰：“武



E—11杨家湾出土汉兵马俑（骑兵俑），咸阳市博物馆藏（笔者据实物写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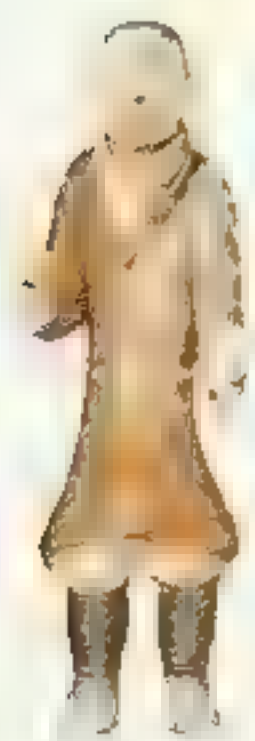


E—12徐州北洞山汉墓出土彩绘侍卫俑，徐州市博物馆藏（据实物写生）

“...穀衣，...亦...”
穀，即有...，...“伸衣...也”
（《释名...》），...制“有曲...
...（...）...
...“...”（...《...》）
...正是
...图E—
6）。...
...（...A—5）...
...“...”，“...
（《释名...》），...
...
汉代的壁画、俑和
...武士、武吏和侍卫身
...（图E—9，采“...—12”）
...等处出土的俑身上一一般都穿两层
...层，笔者疑为与秦俑相同，穿
...《汉书·晁错传》：“可赐
...，益以边郡之良骑。”



E—13 云南出土的汉代铜扣饰，云南省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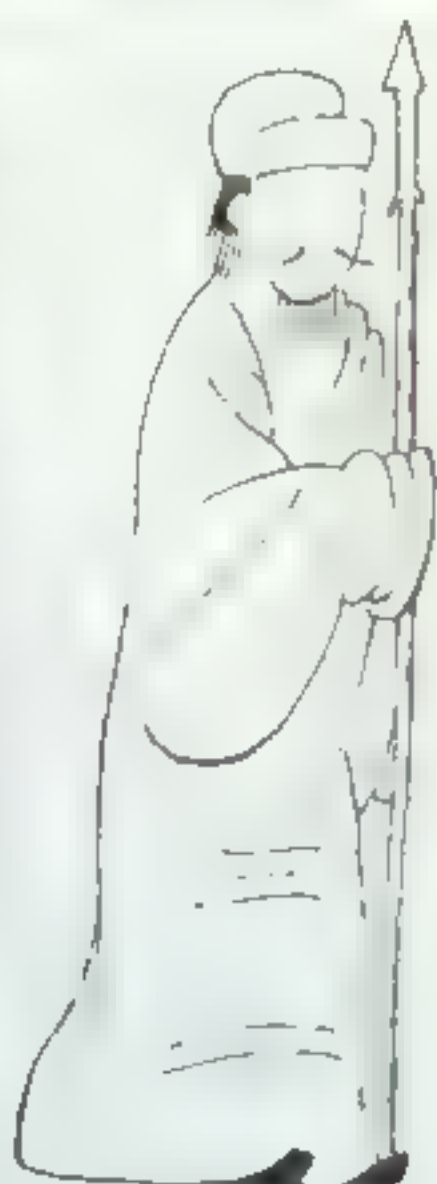
汉代



图E—10左：偃师杏园东汉墓壁画上的干巾帽 中 沂南画像石上有屋山的干巾帽 应属王莽所创； 右 偃师杏园东汉墓壁画上干巾帽加纱冠的形象



E—14 武伯图 河南偃师杏园汉墓壁画（据原景，参照照片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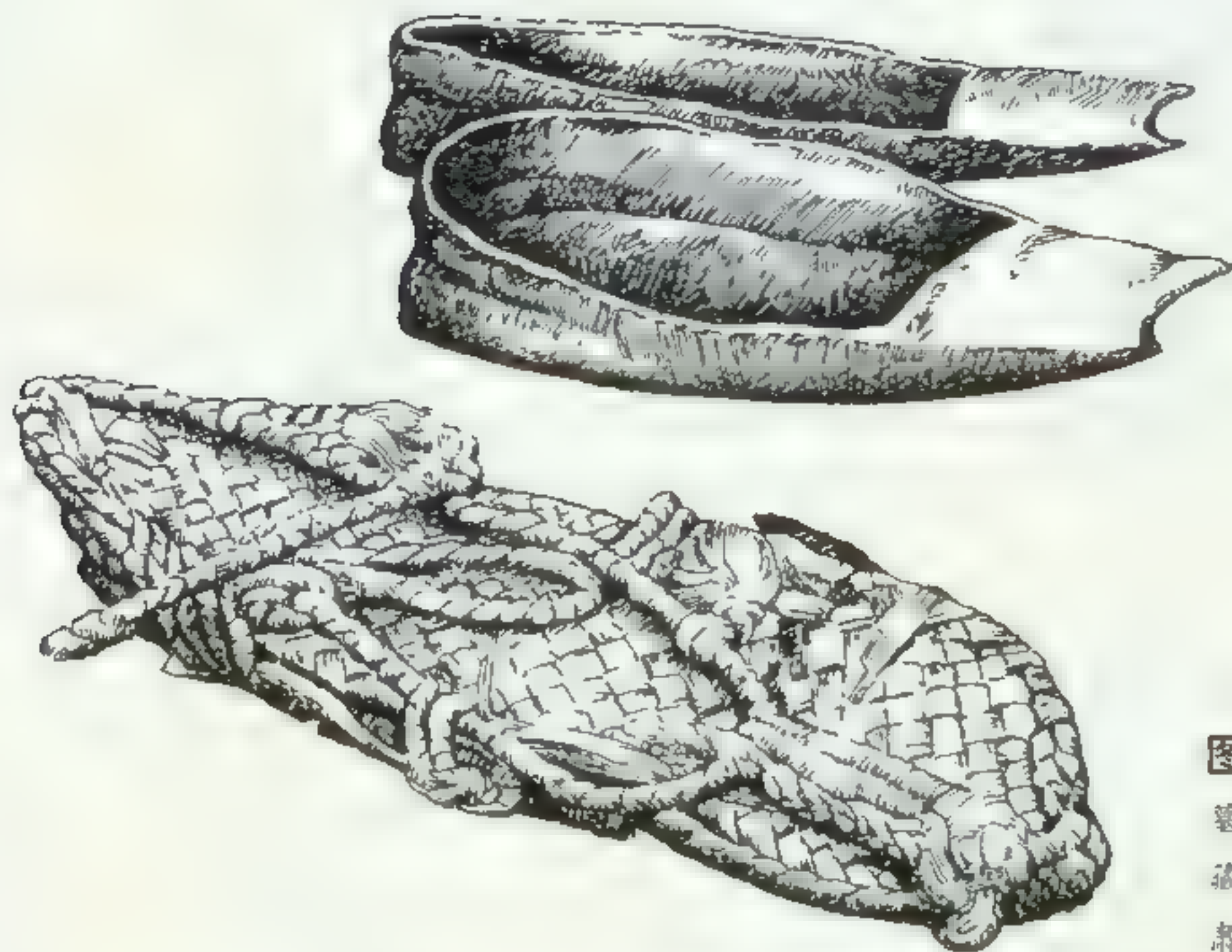
图E—9左：山东沂南汉画像石 右 四川望都汉墓壁画持戟武士图

汉代服饰，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在秦汉两朝，大加变革，大加发展的时期。在汉代，服饰的变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在服饰的形制上，出现了新的变化；二、在服饰的材料上，出现了新的变化；三、在服饰的装饰上，出现了新的变化。

在汉代，服饰的形制，出现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在袍服的形制上，出现了新的变化；二、在裙服的形制上，出现了新的变化；三、在裤服的形制上，出现了新的变化；四、在鞋履的形制上，出现了新的变化。

在汉代，服饰的材料，出现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在丝织品的材料上，出现了新的变化；二、在麻织品的材料上，出现了新的变化；三、在棉织品的材料上，出现了新的变化；四、在毛织品的材料上，出现了新的变化。

在汉代，服饰的装饰，出现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在纹样的装饰上，出现了新的变化；二、在色彩的装饰上，出现了新的变化；三、在配饰的装饰上，出现了新的变化；四、在发饰的装饰上，出现了新的变化。



图E—13上：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麻履实物，湖北省博物馆藏。下：甘肃敦煌出土麻鞋实物，甘肃省博物馆藏。（据实物写生和照片绘制）



E—15云南江川李家山51号汉墓出土鼓座铜俑（据实物写生），云南省江川县博物馆藏



E—16 杨家湾出土兵马俑、发髻俑，身上所披为幡，咸阳市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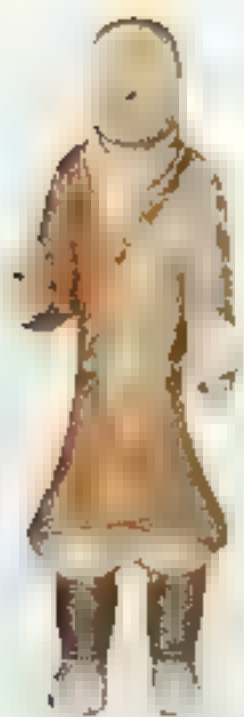
E—17 左：徐州北洞山出土仪卫俑，背上所负应是矢箠。右：杨家湾出土兵马俑，背上所负为章。徐州市博物馆、咸阳市博物馆藏。

威。”西汉的禁军“缇骑”是一支装备华丽精良的骑兵队伍，其名称中的“缇”，指的就是服饰的颜色。赤、纁、绛、缇都属红色。《说文解字注》的注解是：“绛，大赤也，今俗称谓大红也；纯赤者，今俗称为朱红也。”“纁，浅绛也”。“缇，丹黄色也”。由此可见这些红色是在大红至橘红之间，杨家湾兵马俑和汉墓壁画中武士服饰的彩绘颜色与上述注解基本相符。

汉代服饰的主色，若按五行说应该是土克水，为黄色。但汉高祖在起兵造反时，为了笼络人心，曾利用酒后斩蛇的事，编造了一个赤子子母图，使人相信他是非凡，未来的真命天子（见《史记·高祖本纪》）。汉文帝时，文帝又下诏，规定天子尚赤色。汉文帝时对这个问题曾重新讨论过，认为赤色为火德，应符，应为火德，此后至东汉，服饰旗帜一直以红色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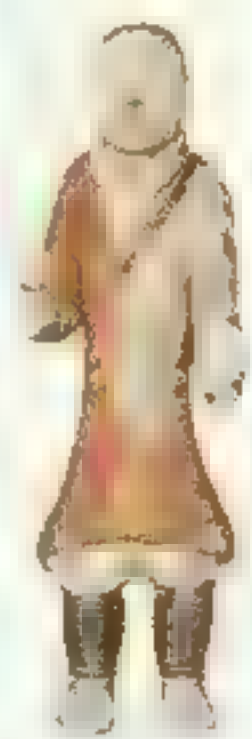
汉代是武官制度初步形成的时期。春秋之前我国原没有专职的武官，军队由天子和诸侯统领。春秋以后，军队规模日益扩大，兵、车种和战略战术也不断复杂，于是出现了一些专门的军事家，形成了实际上的专职武官。秦汉东征西讨大量用兵，任用了许多将帅，使武官制度有了一个雏型。到了西汉，从高祖刘邦拜韩信为将时起，西汉的军事已直接由“大将军”指挥。汉武帝时，更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武官制度，武官与士兵的服饰也开始产生比较明显的区别。杨家湾兵马俑中，有一件身穿鱼鳞甲、头戴帻、脚上穿着一双绣花高统靴的俑就是代表作，它的服饰的各方面与其他步兵、骑兵俑已有比较显著的差别。（参见彩图E—5）

区别官兵身份的不仅是服饰，还有军服上的徽识。军服上标出徽识在先秦时代已有制度。汉代的徽识，主要有章、幡和负羽三种。章的级别较低，为士卒和临时参战的平民佩戴；幡的等级比章高，为武官所佩戴；负羽则大约军官和士卒均可用。（参见孙机《汉代军服上的徽识》，《文物》1988年第8期）



中国
古代
军
戎
服
饰

西汉骑兵军戎服饰复原图
戎服、冠饰，根据杨家湾兵马俑形象复原，铠甲根据呼和浩特二十家子出土实物复原，兵器参考《中国古代兵器图集》，佩剑方法根据《玉具剑与璲式佩剑法》一文设计





时魏 期晋

魏晋时期军戎服饰复原图

甲冑根据偃师杏园出土的武士陶俑，参照有关出土实物复原。戎服根据江苏南京出土的持盾武士俑、辽宁朝阳县袁台子东晋墓壁画上武士像复原。革带根据带铐出土实物复原。兵器参照《中国古代兵器图集》。马具根据吉林集安高句丽墓出土实物复原。



魏晋时期

(公元 220 年—公元 420 年)

东汉末年，统治集团内部士族与宦官两股势力的激烈斗争，引发了封建军阀之间的残酷大混战。经过长期兼并，最后剩下曹魏、刘蜀和孙吴三大政治集团，形成了相互鼎立的局面。这种局面以蜀的先亡而告结束，以后曹魏也因内部矛盾激化而为豪强士族司马氏所取代。司马氏在灭吴后统一了全国，建立了晋朝（史称西晋）。由于皇族内部不断倾轧而酿成了晋惠帝时的“八王之乱”，加之外族的入侵，使统一的国家再次分裂，出现了东晋十六国的更大的割据局面。

这一时期频繁激烈的战争，虽然促使战争的战略战术等军事科学得到发展，但给社会经济生产造成的破坏却极其巨大，因此在武器装备方面，与汉代相比并没有明显的进步。



F—1河南偃师杏园村魏晋墓出土武士俑（据实物写生），河南省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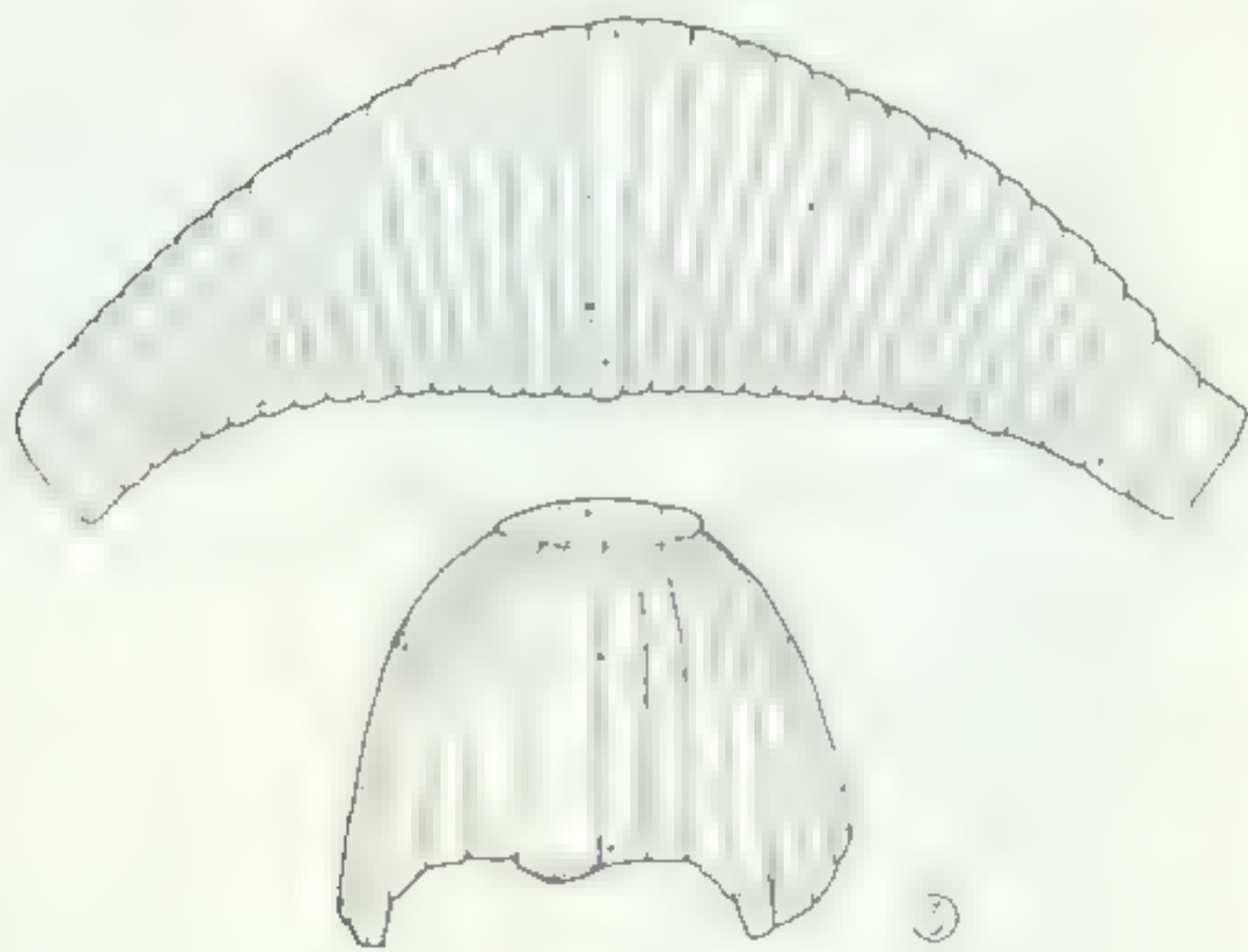
时魏
期晋



D



1



⑤

图F—1①：朝鲜黄海北道安岳冬寿墓壁画中武士形象。②：陕西西安出土东晋时期陶武士俑 西安历史博物馆藏。③ 辽宁朝阳十二台乡砖厂唐燕墓出土铁盆领、铁冑



图F—2 湖南长沙出土西晋陶骑俑，据《湖南省文物图录》照片绘制。

种打铁技术，直到现代农村地区还在使用。用这种钢铁制造铠甲，无疑要比以前的铁甲精良得多。骑兵使用箭袖铠时，还配有腿裙（即汉代的髀裙），这种腿裙比汉代要长，因而更能有效地保护骑兵的腿部（图F—1）。

骑兵在汉末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要归功于马鞍、马镫的发明。1974年在河南安阳孝民屯出土了一套完整的马具，这套工艺精湛的鎏金鞍辔已具有现代马具的全部构件，是全世界最早的马具（彩图F—2）。不足之处在于设计上还不够先进，鞍座较宽平，后鞍桥比前鞍桥还高，坐上去显然不舒服。马镫也是单个的，主要供上马时踩踏之用，上马以后便不再踩镫，湖南长沙出土的一件西晋陶骑俑，非常清楚地表现了这种情况（图F—2）。虽然如此，比起无鞍无镫时代来，骑马的难度已大大降低，而同时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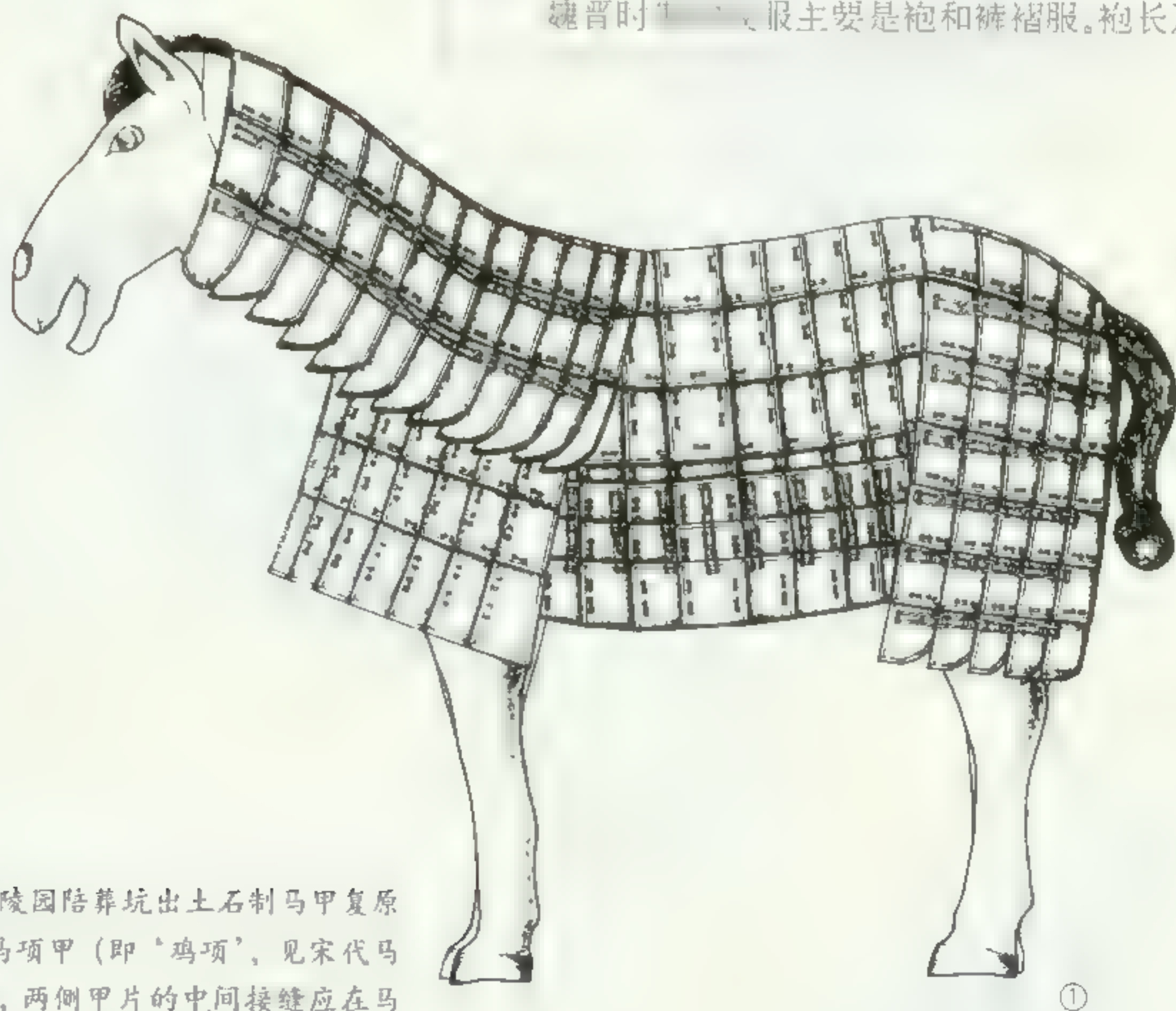


F—2 河南安阳孝民屯出土鎏金马鞍具复原图（详见《安阳孝民屯晋墓发掘报告》，《考古》1983年第6期）



隋代山阴县出土了一件完整的马胄和马身甲的残片，制作较精良。1987年在湖北荆门包山楚墓也发现了一件完整的皮马甲（图F—3下，详见孙周吉等《荆门包山2号楚墓部分青铜器的清理与复原》，《文物》1986年第5期）。马身甲的复原问题，在《文物》1986年第5期《马身甲的复原》一文中，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马身甲的复原，应以《说文解字》为据（详见《说文解字》第100页，中华书局2000年10月出版）。但从复原图上可以看出，这领甲的复原准确性还值得讨论。东汉时起，马甲开始用铁制，就是在出土胄与盆等物时，还同时出土了一件保存十分完好的铁马胄，（图F—4②，详见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11期）。马甲的使用在汉末已较普遍，曹操的《军令》中就提到：“本初马，百具，吾不能……”之数与南北朝时“范马万群”相比，虽为小数目，但在当时也就十分可观了。

魏晋时，戎服主要是袍和裤褶服。袍长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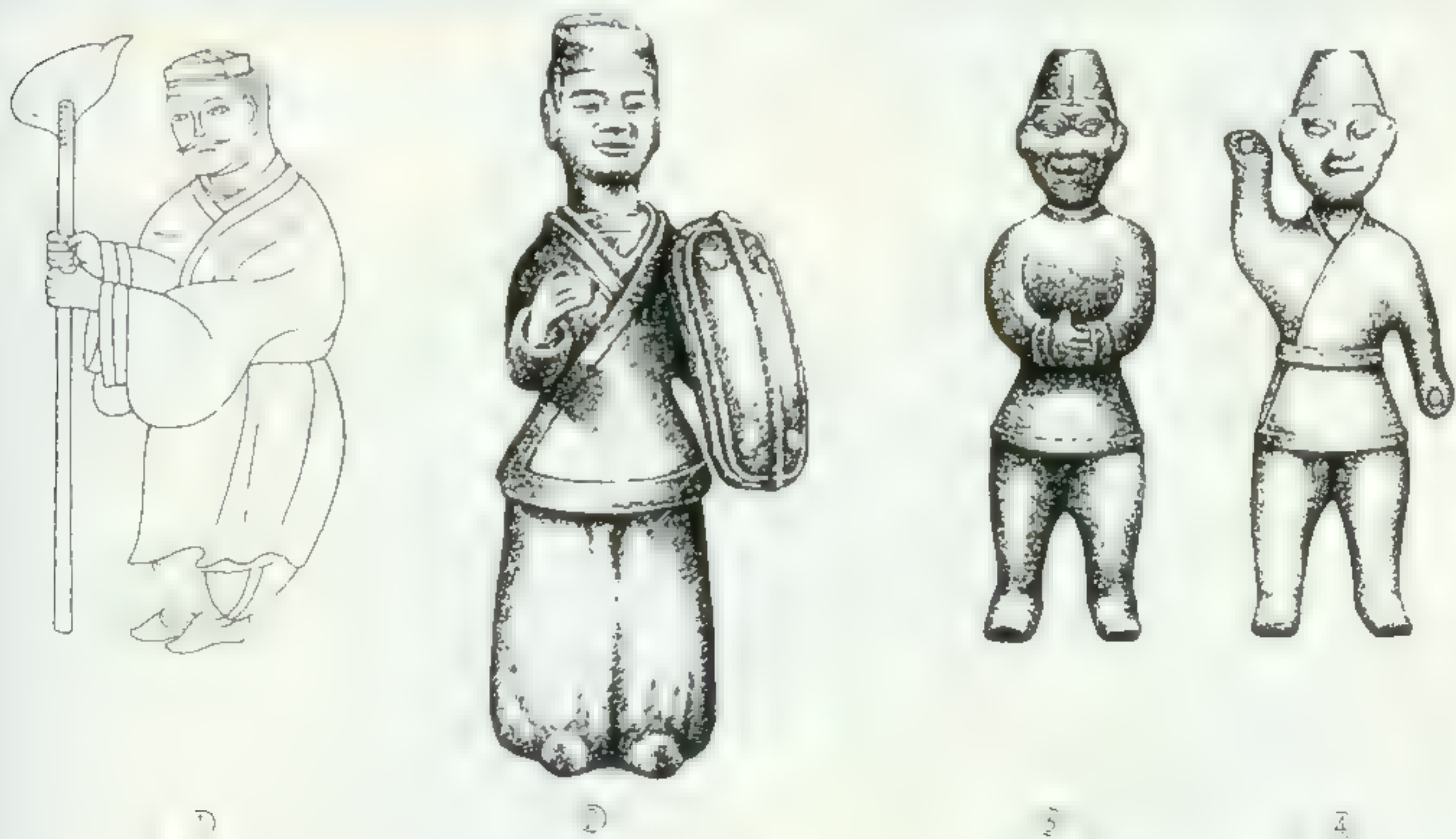
图F—4 ①秦始皇陵园陪葬坑出土石制马甲复原图。这幅复原图的马项甲（即“鸡项”，见宋代马甲部分）问题较突出，两侧甲片的中间接缝应在马颈下，而不应在马颈上（鬃毛处），所以应将项甲从现在的位置颠倒过来，但如此则胸甲（即荡胸）的复原又要重新考虑。② 辽宁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号墓出土铁马胄。



时魏
期晋



F—3 辽宁朝阳市东晋墓西壁壁画

[illegible][illegible]

图F—5 ①成都扬子山晋墓墓门石刻门吏像, ②江苏南京出土东晋持盾武士俑, 江苏省博物馆藏 ③④河南偃师杏园魏晋墓出土武士俑, 河南省博物馆藏。



弓 一般为青瓷出土的陶俑头上戴的一种平
顶、四周有短耳的冠，冠上有交叉的纹线，从外
形上看与武冠很象（图F—6①）《晋书·舆服
志》有这二 记载：“晋武帝时，武冠，今名
武冠。冠上又有短耳，今平上帻也。始时各随
官阶，遂因冠为号。介冑服文吏，平上帻服武官
”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按晋书的记载，比较 ① 的画像资料尚未发
现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①

图F—6 ①朝鲜北道安岳冬寿墓壁画，
冬寿像，录自《文物》 980 年第3期孙
机《月扇纶巾》一文插图 ②各阳出土
北魏宁粲石室石刻画像，（美）波士顿
博物馆藏



时魏 期晋

却敌冠，前高四寸，首长四寸，后高一寸，制如神犀。凡武官皆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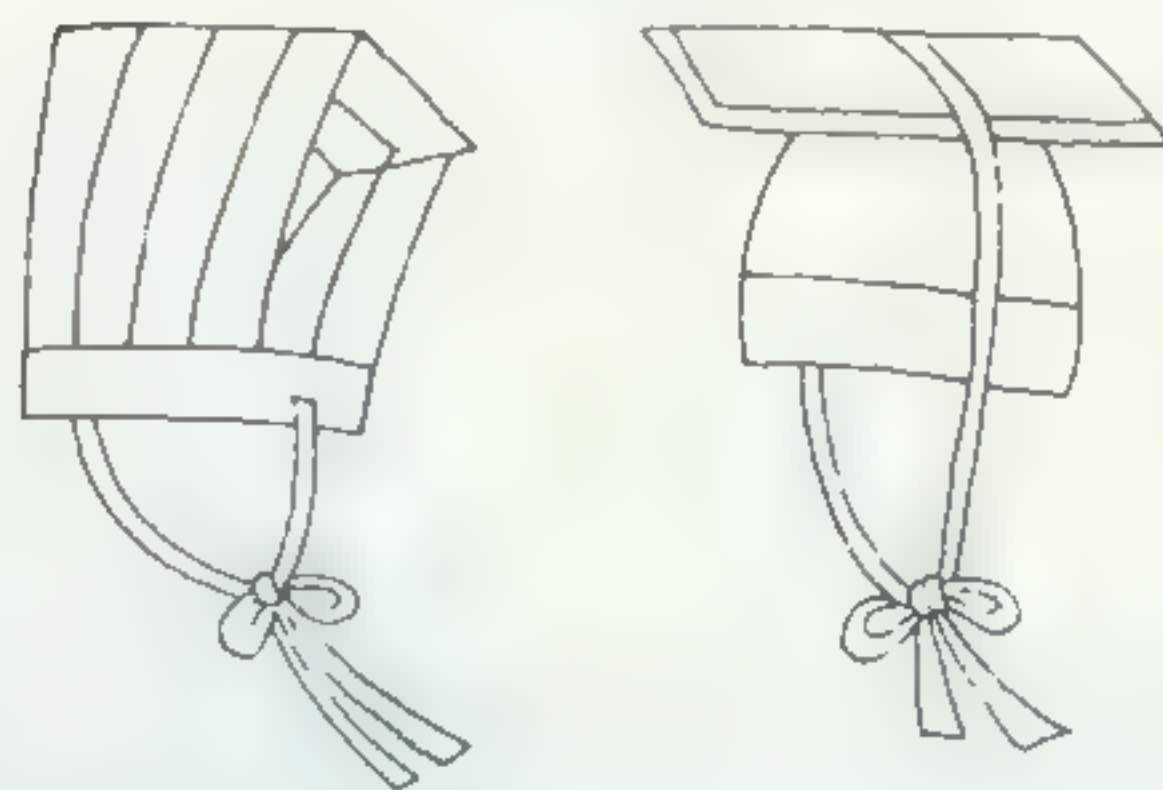
樊哙冠，广九寸，高七寸，前后各出四寸，制如神犀。晋书汉会典云：凡籍图范高祖，樊哙持铁楯，高帝乃裂裳范楯，戴以范冠，排入宫，因数言罪，又王莽得出一言入其宫，乃制范楯，凡武官皆服之。

此冠在东汉时已使用，北齐时的刻本《礼图》亦有记载，可以提供大致上的形象参考（图F—8）。

樊哙冠在汉代时已使用，北齐时的刻本《礼图》亦有记载，可以提供大致上的形象参考（图F—9）。



图F—7 吉林省集安县高句丽壁画上的骑射图



图F—8 左：却敌冠 右：樊哙冠《二礼图》插图。录自《中国古代版画丛刊》



③



④

图F—6 ③唐范履冰像，录自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④晋墓出土陶俑（出土地点不详），录自《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



图F—9上：武汉黄陂漫口晋墓出土残骑俑，武汉市博物馆藏。
下：四川涂井蜀汉崖墓出土武士俑，四川省博物馆藏

魏晋时期军队中使用最普遍的冠饰是帻。《古今注》曰：“帻(帟)，魏武帝所制，初以章身，又作五色帻，以表方面(指军队的各方面军)。”《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敛以时服”条下注引《傅子》曰：“魏太祖以天下未定，常以军为务，拟古皮弁，裁缣(细绢)帛以作帻，合于简号随时之义，以色别其贵贱。”又《晋书·五行志》载：“初，魏有白帻，横缝其前以别后，名之曰颜帻，传行之。至永嘉之间，稍去其缝，名无颜帻。”这些记载说明，帻的使用面很广，功能也很多。既能以色表明武官的品级，又可区别军队的各方面军。它的式样前后也有过一些变化。从出土的铜俑来看，其形制与我国30年代流行的瓜皮帽很相似。制作的材料，除了缣之外，还有皮、布、纸等。南北朝以后，帻已不再作为军服使用。(图F—10)。

《古今注》还记载的有前引《武帝纪》裴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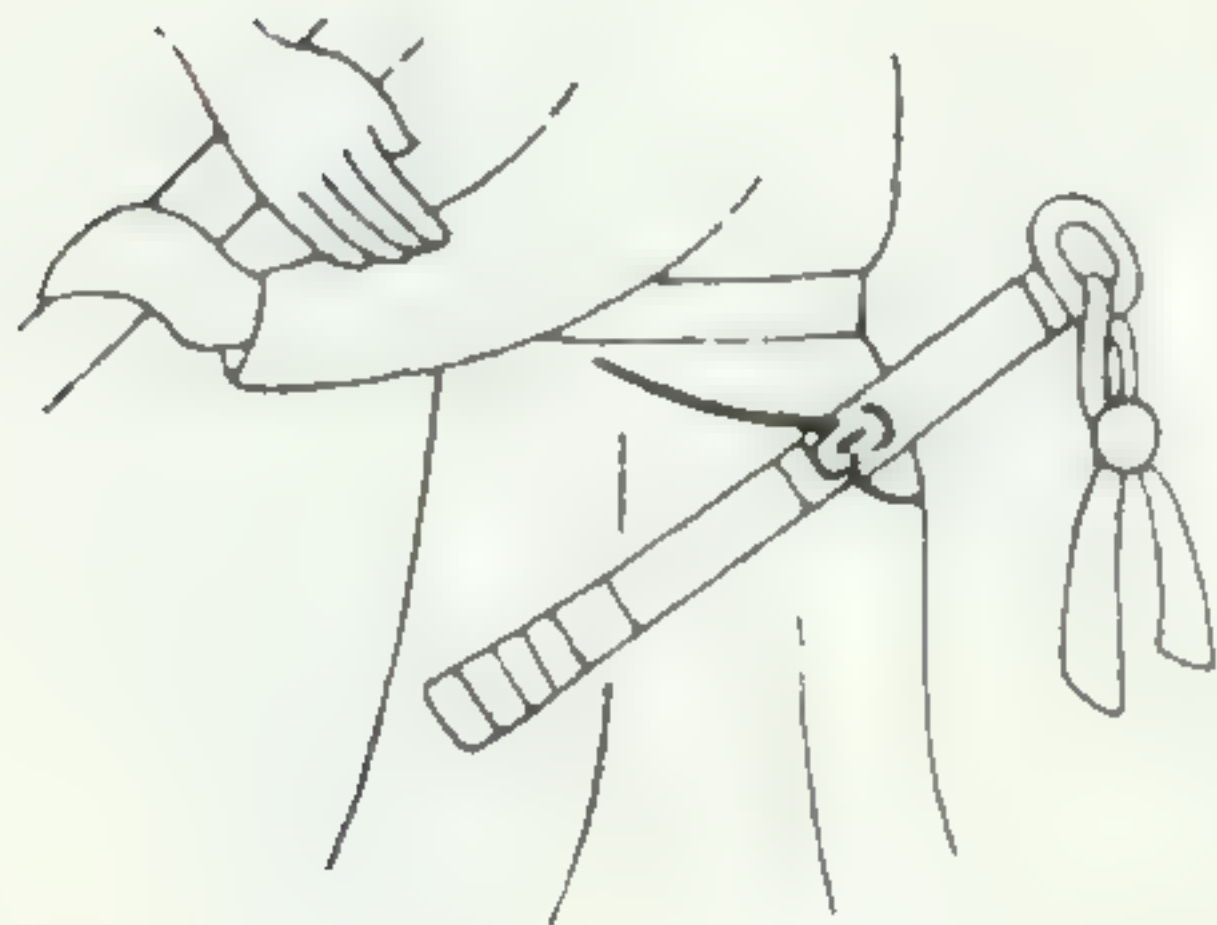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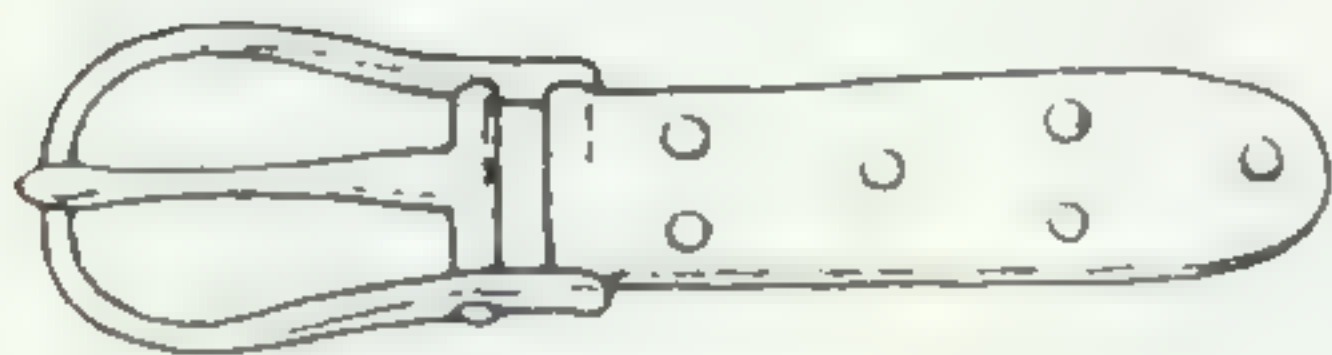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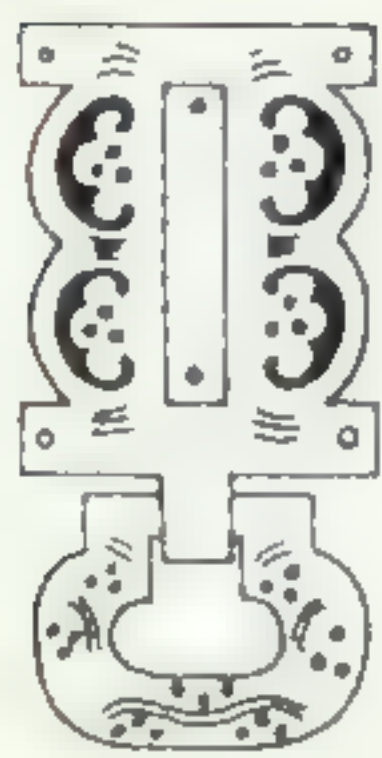


②

③

图F—10

自汉代打破了五行定色法以后，后继的朝代便无法严格按照相生相克的理论来制定服色，只能采用刘邦的办法，利用一些所谓吉兆瑞符，来牵强附会地解释、决定应属何德。据《通志略·礼略》记载，魏尚土德，服尚黄；而晋尚金德，服色尚白。由于魏晋时期各种形象资料较少，事实究竟如何，目前尚难以断定；但从已掌握的部分材料来看，基本还是与文字记载相符合的。



图F—11上：洛阳晋墓出土，鎏金铜铐（左），鎏金铜带扣（右），录自《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中：辽宁朝阳袁台子东晋墓出土银带扣，录自《文物》1984年第6期。下左：山东临沂白庄出土东汉画像石上的佩刀者。下右：汉代装于剑鞘上的玉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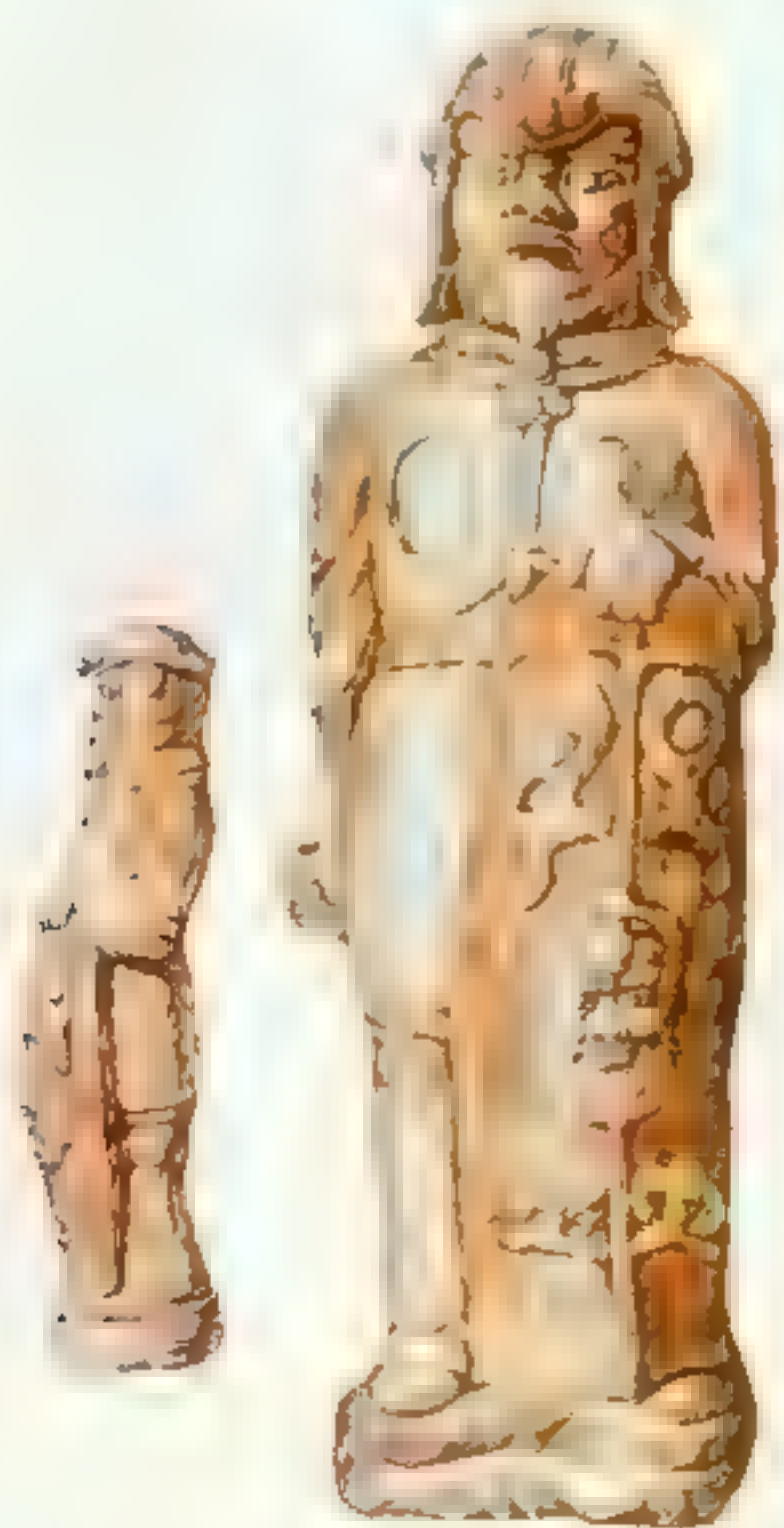
南北朝武士复原图

铠甲根据河北吴桥北朝墓、洛阳北魏元邵墓俑复原，胄采用呼和浩特市出土实物，戎服根据河北磁县东魏墓和元邵墓等出土武士俑复原。兵器采用宁夏固原北周墓出土实物。马铠根据河南邓县出土画像砖上的形象，参照日本出土的马面帘实物复原。





G—1左：陕西汉中市出土西魏武士俑，身上的两当甲好像是皮甲，西安历史博物馆藏。右：河南洛阳北魏元邵墓出土持盾武士俑，洛阳市博物馆藏。两图均据实物写生。



G—2河北省吴桥北朝墓出土武士俑（据照片绘制），录自《文物》1984年第9期。

南北朝

（公元420年—公元589年）

历史上把公元386年至581年间在北方建立的北魏、东魏、北齐、北周等称为北朝，420至589年在南方建立的南朝宋、南齐、梁、陈等称为南朝。在这些割据政权中，北魏立国的时间最长（148年），影响也较大。这些割据政权之间经常发生残杀和兼并战争，开国帝王无一不是手握重兵的将帅，因此往往采用极其残暴的手段，来促进和提高武器军备的生产，从而使武器装备生产在这一时期内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在铠甲方面，这一时期不但种类多样，而且质量和制造技术也很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铠甲是两当铠。《释名·释衣服》曰：“两当，其一当胸，其二当背也。”两当甲长至膝上，腰部以上是胸背甲，有的用小甲片编缀而成，有的用整块大甲片。两当甲的甲片，有的用整块大甲片，有的用小甲片编缀而成。两当甲的甲片，有的用整块大甲片，有的用小甲片编缀而成。两当甲的甲片，有的用整块大甲片，有的用小甲片编缀而成。



图 G—1两当甲的形象左：山西太原南部北齐墓出土武士俑，山西省博物馆藏。右上：河北曲阳北魏墓出土武士俑，录自《考古》1972年第5期。右下：河北吴桥北朝墓出土负矢箠武士俑，录自《文物》1984年第9期。



出，宽度为20厘米，这是为了扩大胸部的保护面积，前片上缘半圆突起形成一三角形，用于保护颈部。腰部以下是用麦草制成的筒形短裙，以代替裙摆，一般没有袖口（图G—1、和图G—2）的筒裙是新一代筒裙，白陶筒甲壳，体现了“新式”筒裙式样。

大明宣化朝陽縣的墓中出土的武士俑，都穿一種圓領、后有曲形圓拱的鎧甲，這是明光甲。明光甲是一種比較精緻、貴重的鎧甲，不僅有披膊、胸甲，還有护膝（李重元的墓所變化較小），貼地而鋪，用皮帶繫成各種型制大小等件。目前，是中央的甲一種，其他都用牛、羊、羖羊皮製成（參見圖 2、3、4、5、6、7、8、9）。

[illegible]

G—3 北魏持盾武士俑 (据实物写生, 出土地点不详), 河南省博物馆藏



图 G—2 左 山西太原北齐娄睿墓出土持盾武士俑，太原市博物馆藏 右，河北磁县东陈村东魏墓出土持盾武士俑，河北省博物馆藏



G—4 呼和浩特市北魏墓出土武士俑



图 G—3 江苏丹阳出土南朝墓室砖画，录自《文物》1980 年第 2 期。

地在胸背甲上特地安上两个凸出的圆镜。汉代的铜镜背面，常铸有“见日之光，天下大明”的铭文，取明与光之意，明光甲之名可能即由此而来。从穿这种铠甲的俑一般比同墓中其他俑都要高大这一点来分析，当时能配备明光甲的可能都是官品较高、兵种重要的武官将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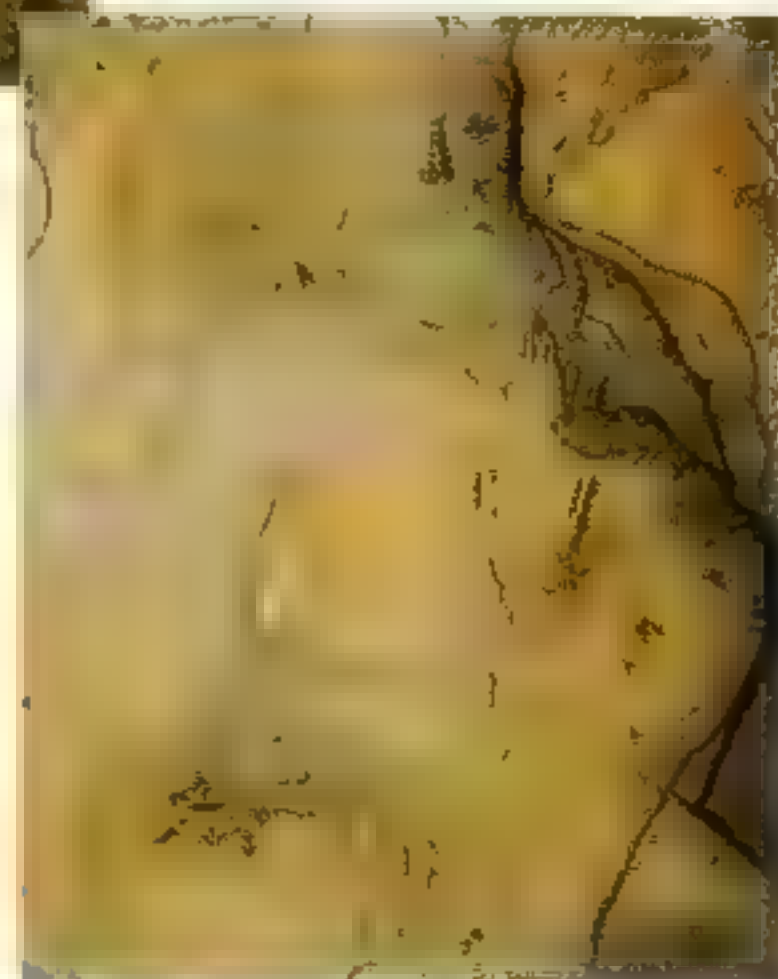
南北朝后期，明光甲开始用束甲绊束甲，以便它较贴身，便于行动。束甲绊的材料可能是皮条、布条或绳索。使用时将甲绊套于领间，在领口处打结后向下纵束，至腹前再打结，分成两头围裹腰部后束于背后。这种束甲方法一直沿用到唐末（参见彩图 G—5）。

黑光甲与明光甲同见于东汉末曹植的《先帝赐臣铠表》，两种甲可能是相同类型，区别在于前者胸背甲上没有圆镜，甲面用漆漆髹，犹如汉代时的玄甲。关于黑光甲没有详细的文字描述，上述看法只是推测，其形制可参见图 G—3。

除了上述几种具有代表性的铠甲以外，魏晋时期的筒袖铠也仍在继续使用，从一件制作比较粗劣的北魏俑上，可依稀分辨出仍保持着的原来形制（彩图 G—4）。



G—5 河北邯郸北响堂寺北齐石刻（第三窟中心柱宝床下小龛内神王雕像）





G—6 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出土具装甲骑俑，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保护头部的有兜鍪、冑、盔等。兜鍪仍像战国时期那样，顶部是一个半球形的冒顶，兜体用生铁片或熟铁片扣制而成，但颈项（兜盔口）和脑后下垂的、用于保护耳颊与后脑的表盖）既短且窄，有的包裹整个颈部，背面则还有护肩部（图G-6）。这种兜盔的实物在河北满城汉墓保存很完整的实物出土（1980年，河北省满城县在汉南古城址的朱明门外城壕中发掘出：一铁甲胄、其内有一件铁兜鍪，按形制可分Ⅰ型、Ⅱ型并是已介绍的赵武灵王时的那种（图G-4③），从复原来看，可以肯定，这种型制的铁兜鍪，它的边缘并不是一圈口，为封闭材料不可一在这种边缘上设开口，只靠自然下垂的挂带执于内。Ⅱ型兜盔的背面、其外形与前者类似，但其内部有一块呈圆形的器物，似能活动，又似能转动，使人对这种类型的铁兜盔，又有新的认识。合、服系列中的铠甲，古人也有假说（图H—42，见《考古发现与古史研究》、《考古》1990年第1期）。当时利用生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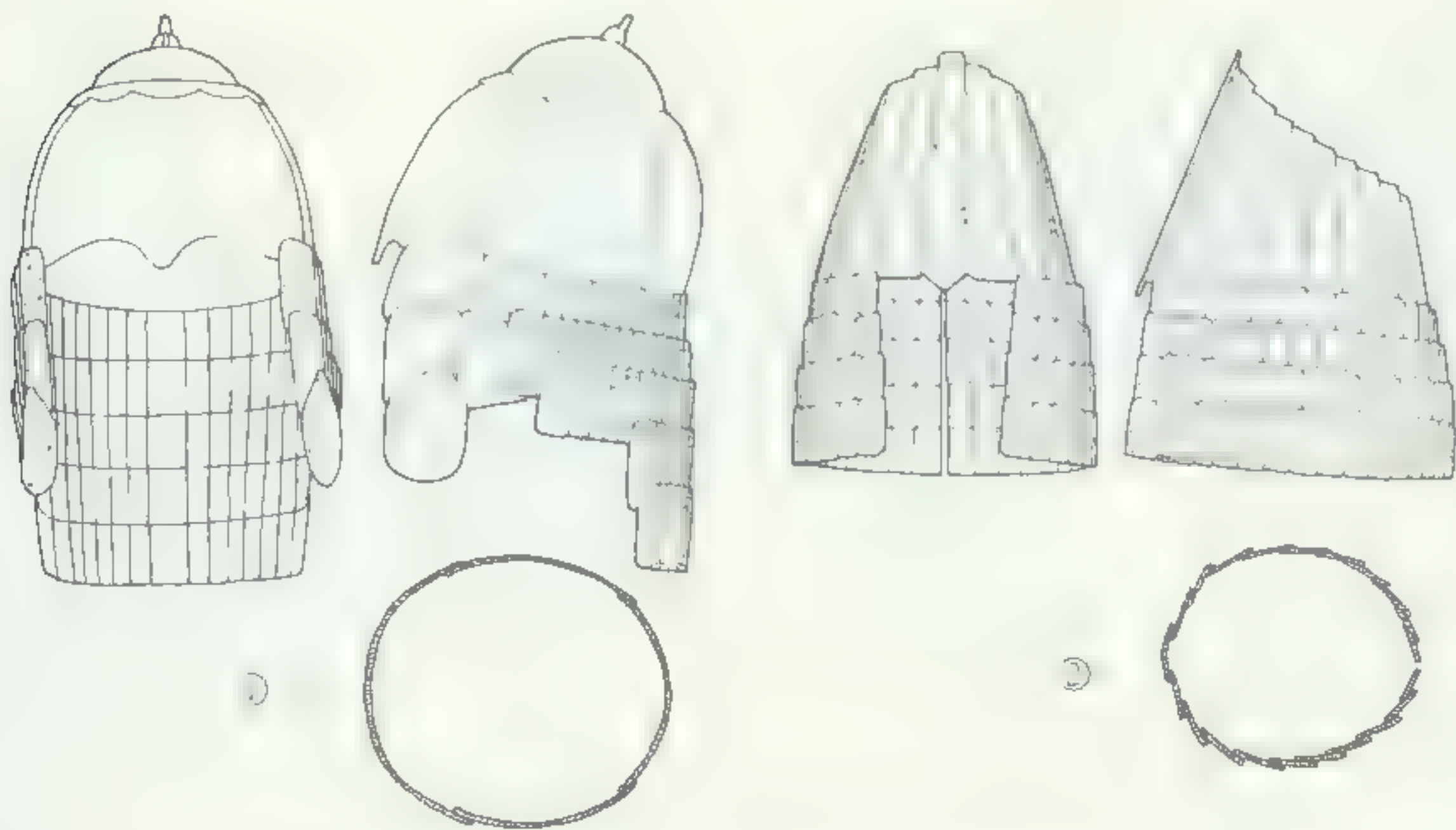


图 G—4 ① I 型兜攀正、侧视图, 剖面图 ② II 型兜攀正、侧视图, 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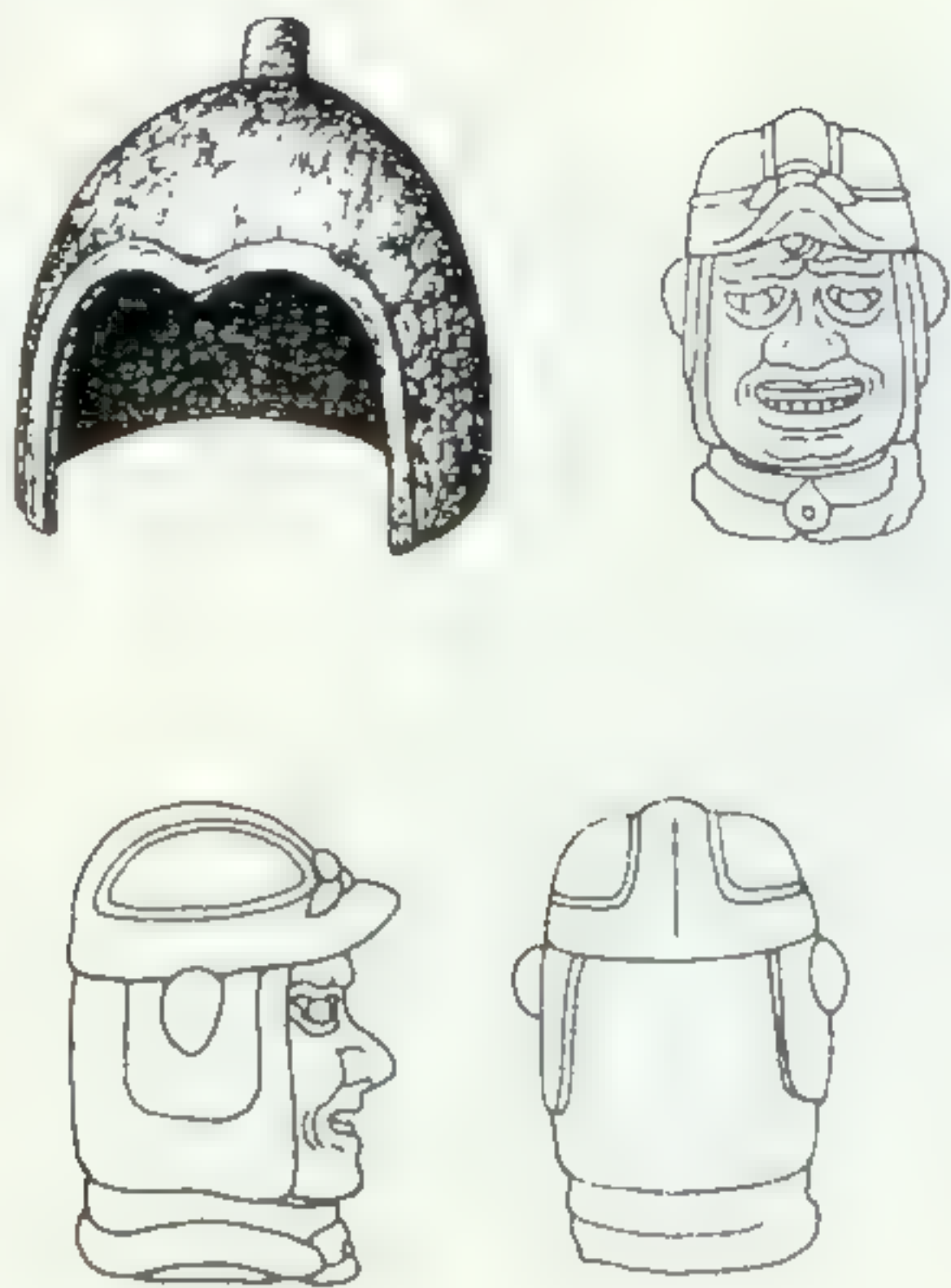


图 G—5 左：呼和浩特市出土北魏铁冑，呼和浩特市博物馆藏。右：河北吴桥北朝墓出土武士俑头，录自《文物》1984 年第 9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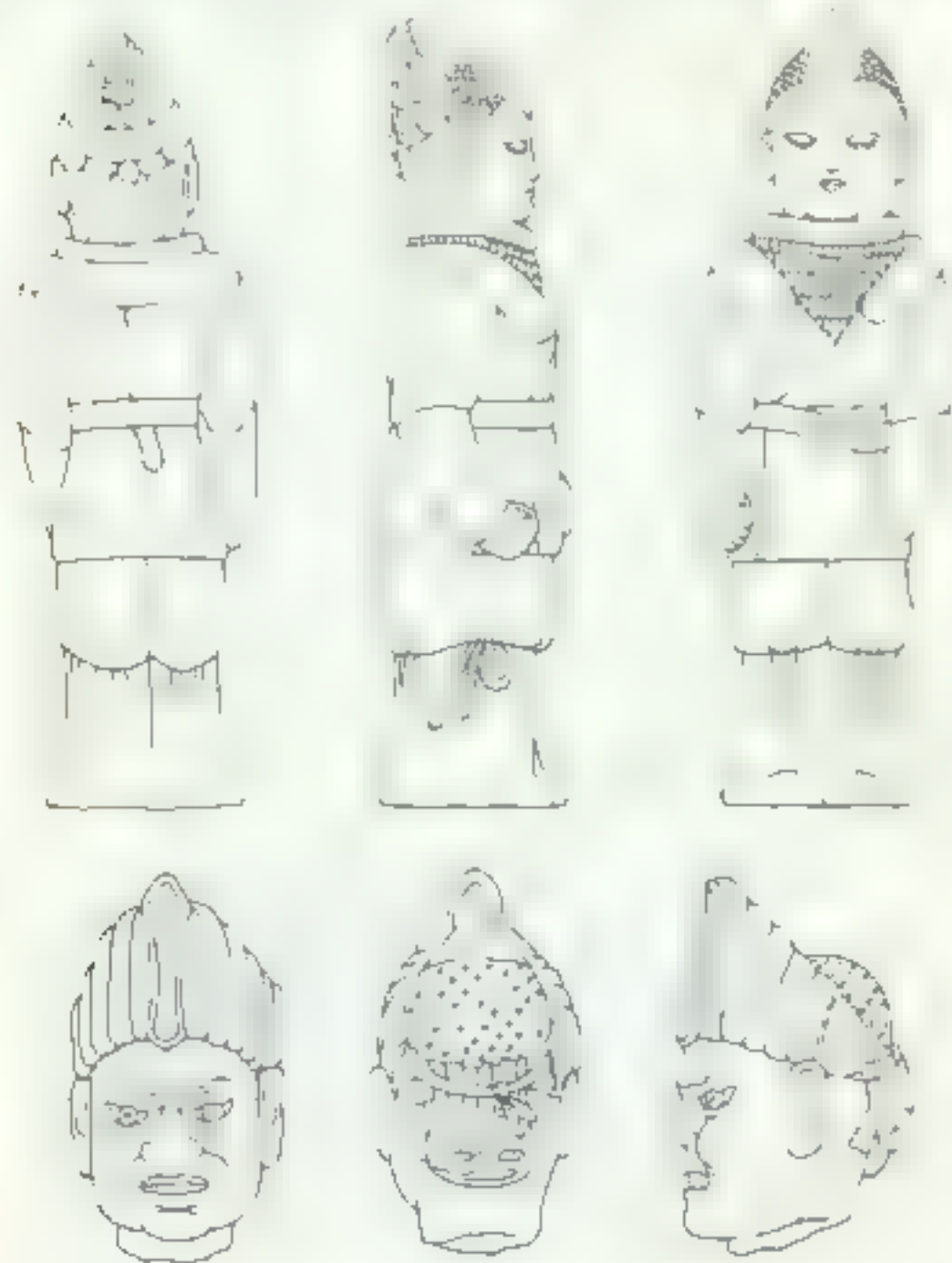


图 G—6 上：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墓出土侍卫俑，录自《考古》1990 年第 7 期。下：河北吴桥北朝墓出土武士俑头。这两种冑甲内均先用巾包裹头发，冑甲缚于头巾的外面。

整体铸成，在呼和浩特市曾出土过一件实物，其外形与彩图 G—5 陶俑头上的冑完全相同，冑顶的短管是插羽毛缨饰的（图 G—5 左）。盔的形制很有特点，一般以盔架铆上甲片制成（彩图 G—3 陶俑盔上的铆钉清晰可辨），前额有突出的冲角。这种盔有时可能也用铁架、皮革甲片铆合制成，在革制顿项的两耳处，有时为了便于耳朵听音还钉有圆形甲泡，甲泡上可能还开孔（图 G—5 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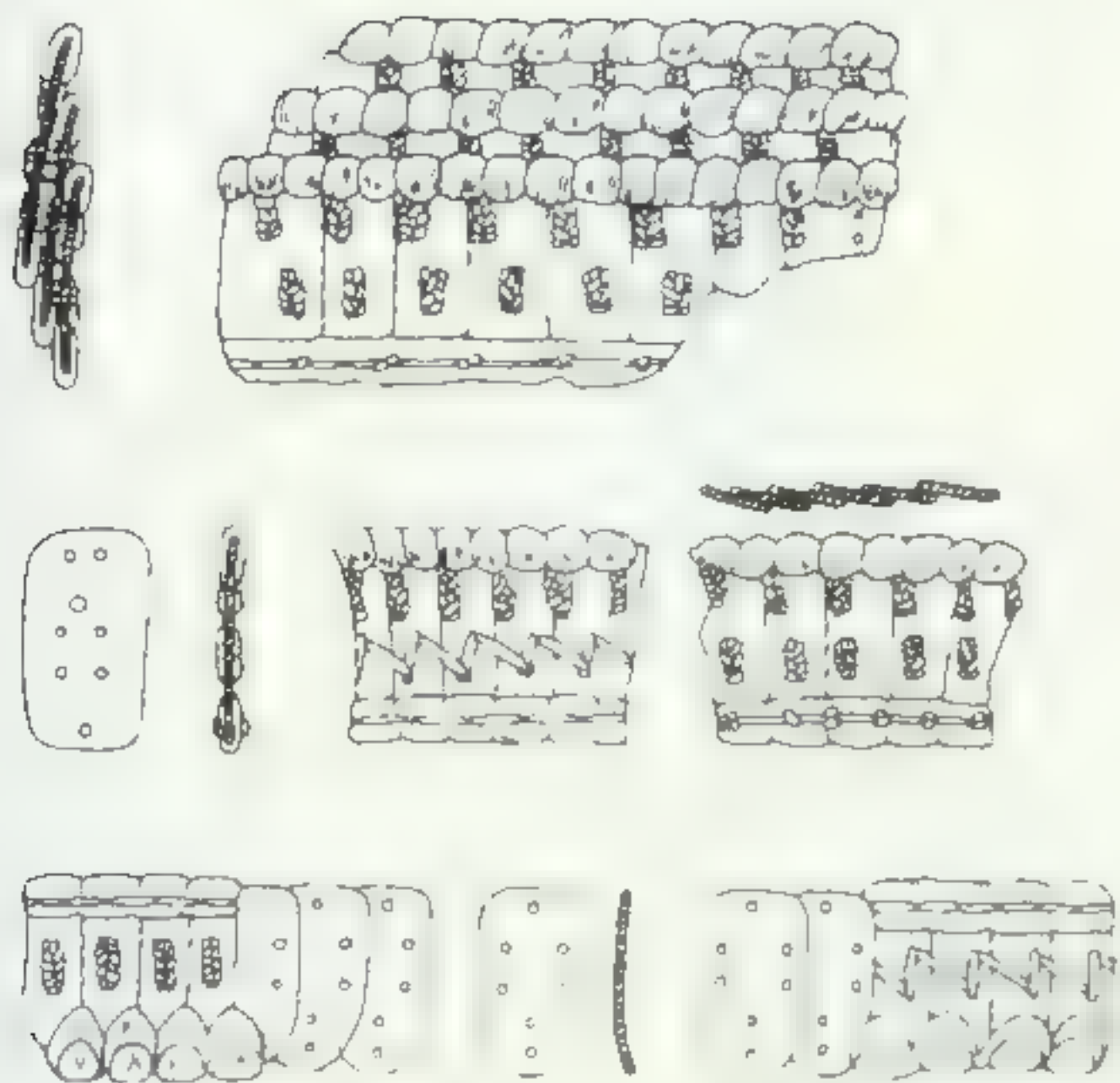
在首铠中还有一种罩甲，可能用铁片，也可用革片制成，缚于额前用于保护前额部（图 G—6）。这种罩甲大概为一般不太重要的军种的校尉、士兵所配备，在唐宋时期的俑和雕像上偶尔也能发现。

南北朝时期的铠甲虽然大量使用铁制，但也仍用皮革，或者两种材料结合使用（参见图 G—7）。其制作技术也有新的改进，北燕曾出土了多种残甲联片，甲片全用皮线缀连成排，每排上缘都包以皮边。经过包边的排甲联缀成甲衣后，不再会因为弯折而使上下甲片自行磨擦损坏，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制甲工艺的精湛（图 G—7）。



图 G—7 左：陕西安康市出土南朝部曲俑，铠甲都用皮革制成，只有盔、甲裙上钉有铁制盔顶和甲泡，西安历史博物馆藏。右：山西太原北齐墓出土武士俑，胸甲是用铁甲片编缀的，甲裙和披膊则是用大块皮革制成，太原市博物馆藏。





南北朝时期还有一种大量使用的铠甲，就是“具装”铠。《北史·侯景传》曰：“甲骑具装，一人一马也；具装，马铠也。”文字资料证实，这一时期，步兵中少数精锐、万计地装备具装铠。《南齐书·魏虏传》记载侯景北伐时，“收铠马六万匹”。从都挖铠的重装骑兵是当时军队的主力。从南北朝时期墓葬出土的陶俑来看，其具装铠与汉代时期的马铠相似，只是在马铠的基础上增加了步兵的具装。步兵的具装形状多种多样，铠片材料也各不相同（见G—1），有的用铁板铸造，有的用皮。从南北朝大部分陶俑来看，具装铠的具装部分与肩胛骨和出土的具装铠甲的具装部分，都反映了南北朝时期具装铠（见G—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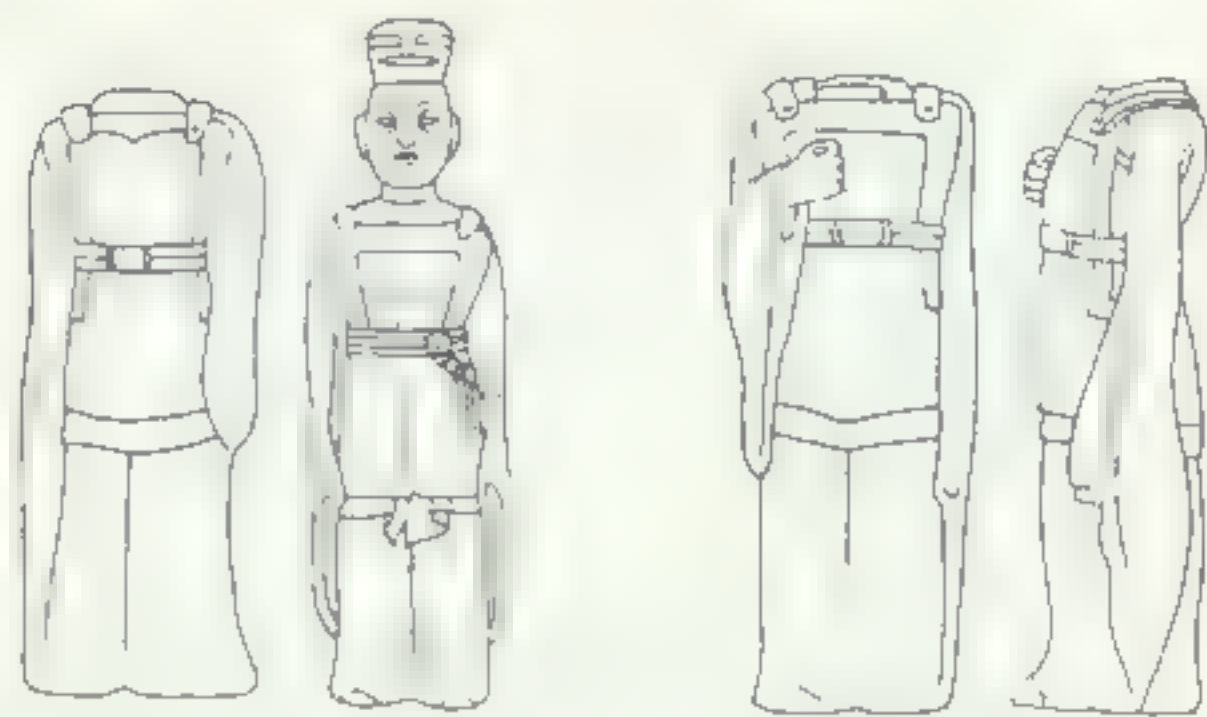


图G—10 上、中：北燕冯素弗墓出土大型铁甲片，录自《文物》1973年第3期。下：吉林集安高句丽墓出土大型残甲片，录自《考古》1977年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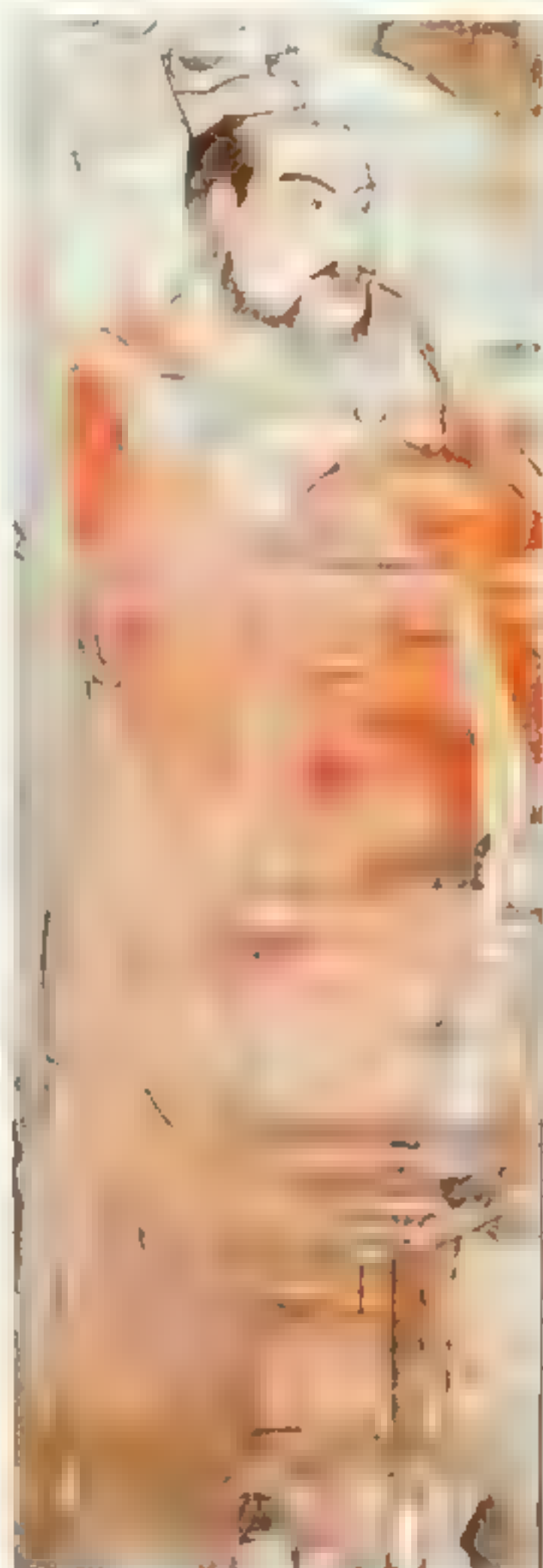


图G—11 左、右衽式裋裆衫。左：河北磁县东陈村东魏墓出土武士俑，录自《考古》1977年第6期。中：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壁画，录自《文物》1985年第11期。右：太原北齐娄睿墓出土武士俑，录自《文物》1983年第10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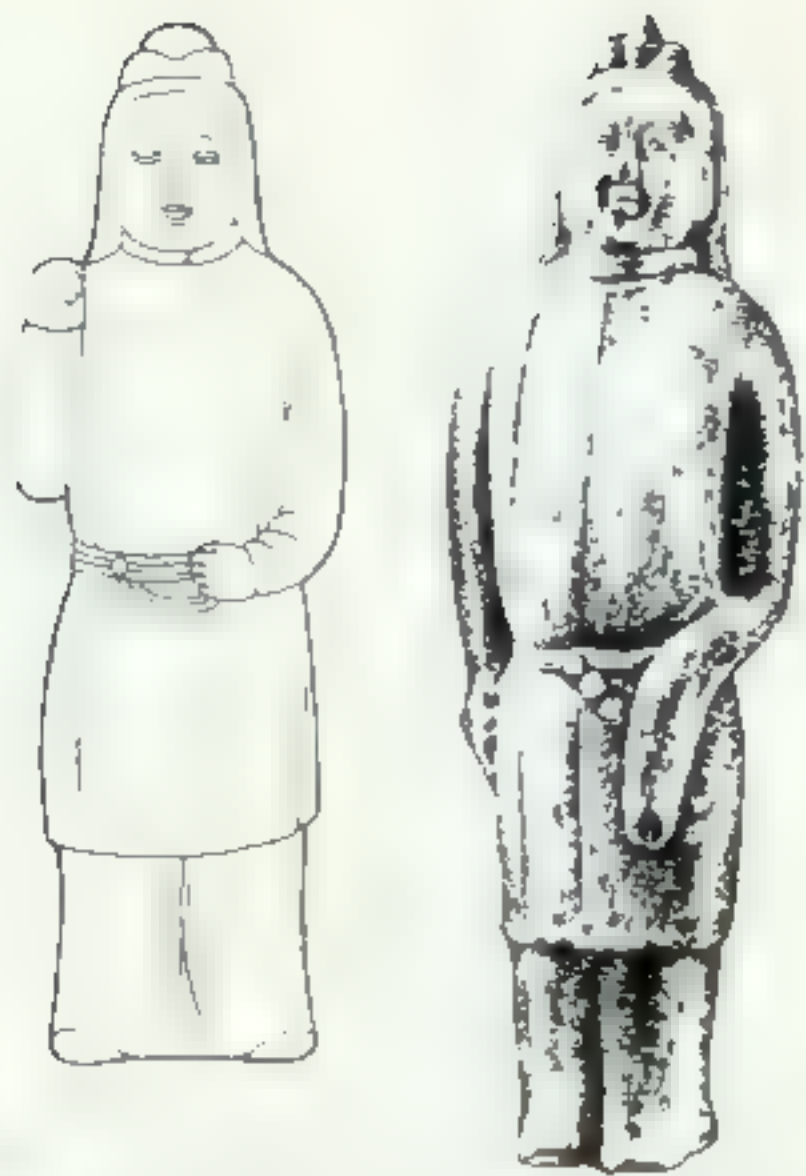
裋裆衫。”这种裋裆衫长至膝上，直领宽袖，左、右衽都有，原来可能是作为两当甲的一种内衬戎服，军官和士兵都可服用。后来武官在裋裆衫外披上与两当甲形制完全相同的布制或革制两当，作为武官的公事制服，一直使用到唐代中期（图G—11、12、彩图G—7）



图G—12 裋裆衫外披布制两当甲的形象。左、右都是河北吴桥北齐墓出土武官俑，录自《文物》1984年第9期。



图G—7 山西太原北齐娄睿墓壁画门吏像（据照片绘制），身上所披的两当可以清楚地看出是布制的。



图G—15 左：河北吴桥北朝墓出土仪仗俑。右：山西太原南郊北齐墓出土陶俑，录自《文物》1990年1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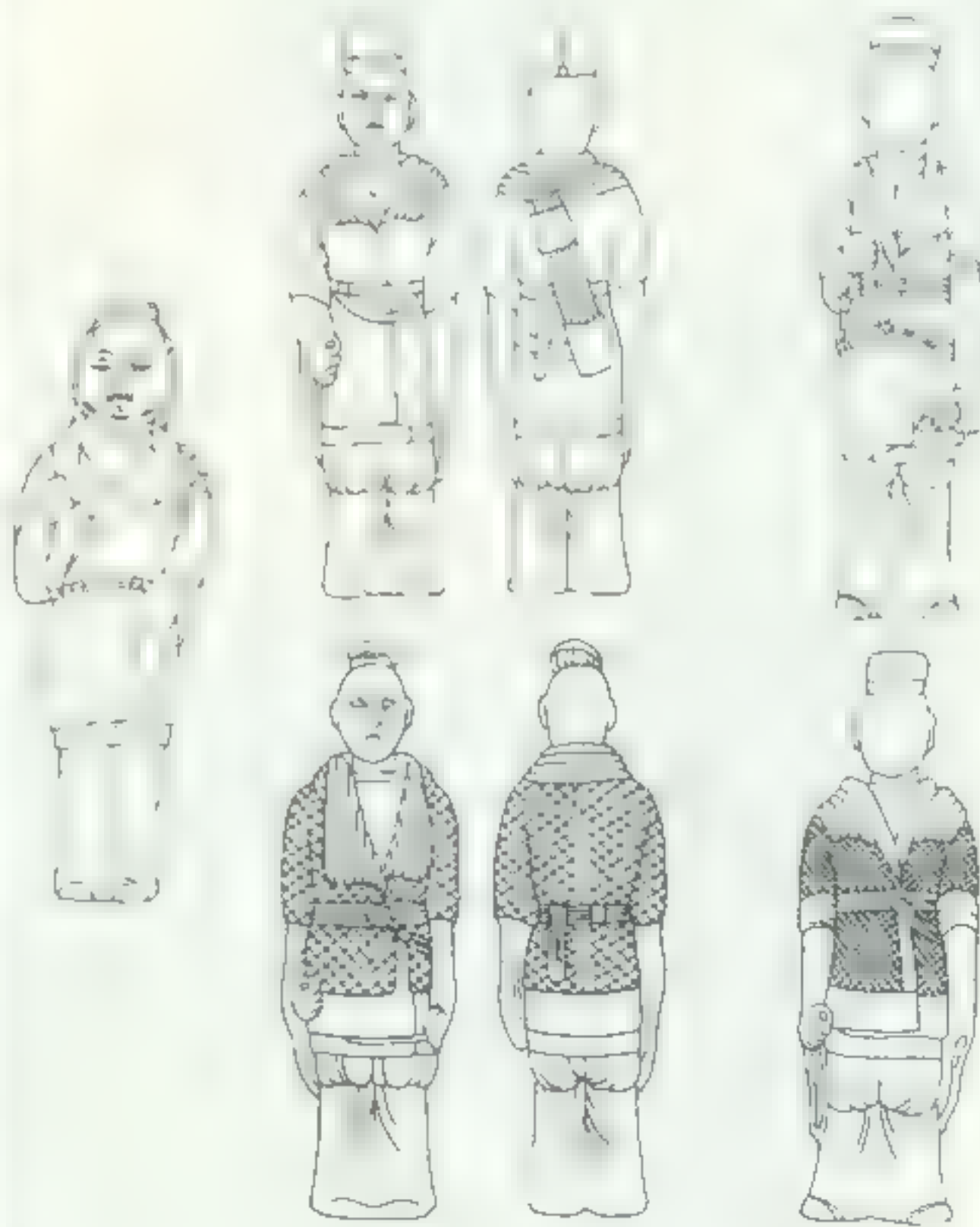
图G—14 左：襦裆衫袒露一臂的穿法，河北磁县茹茹公主墓壁画，录自《文物》1984年第4期。右：河北磁县湾漳北朝陶俑，短袖襦袒露一臂的穿法，录自《考古》1990年第7期

短袖襦也是这一时期比较流行的服装，其形制更具胡服特点：小袖口，左衽、右衽式样，大翻领，单、棉都有。棉的可能多系皮甲的副衣，河北等地出土的一些陶俑身穿的短袖衫就有交叉形线条，反映的应该是这种皮甲，前者以为这种线条可能是表示固定棉絮的缝线，很像现代的切线棉袄。穿这种软甲的可能都是不太重要的兵种和普通士兵（图G—13）。穿短袖襦有时还袒露一臂，襦裆衫和帔风也有这种穿法（帔风这种穿法为隋唐代）（图G—14）

襦袒一臂穿在短衫或皮甲内，也可直接穿在外面。衣长至膝，单、棉，衣襟在领右侧垂直向下，窄长衣袖，单、棉都有。棉的袖长盖手，这是北方民族服饰的特点，作用应是为了手的保暖。这种长袖在唐代戎服中也有流行，唐代时，更变化成能卷起放下的马臂袖（图G—15）

北朝墓中出土的武士俑，披帔风戴风帽的很多，反映出当时这类服饰使用很普遍，这可能与北方的气候比较寒冷有关。南北朝时期的帔风与汉代不同，它的形制像一件大衣，有袖和领，但穿时一般袖都空悬，并不套入。衣领在胸前交叉，用带或扣系接，长及小腿中部（图G—8、9、10）。

戎服裤基本沿袭东晋样式，一般都是大口裤，裤脚在膝下用带扎住，称为“缚裤”，“缚裤”



图G—13 左：山西寿县北齐库狄回洛墓出土武士俑，襦为右衽，录自《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中上、下：河北吴桥北朝墓出土武士俑，襦为左衽，录自《文物》1984年第9期。右上、下：河北磁县东魏墓出土武士俑，上为前开襟，下为左衽，录自《考古》1977年第6期



G—8同图9，该俑的侧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垂于一旁的笠袖。



G—9北齐将军俑，帷风罩在身上的正面形象，选自《中国美术全集》雕塑专集。



G—10洛阳北魏元邵墓出土武士俑，帷风与G—8略有不同，领为厚棉领，洛阳市博物馆藏。



图G—16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壁画持刀武士像，脚上为行缠。

不舒散也”（《旧唐书·舆服志》，彩图G—11），有时也用行缠（图G—16）。除大口裤之外，还有直统裤，河北磁县茹茹公主墓壁画上的仪卫武士均着直统裤（参见图G—14左），脚上穿圆头皮靴或尖头履，以穿靴为多。

戎服的冠饰以平巾幘、帽较为普遍。平巾幘的形制在魏晋时期变化成一种小冠，后部突起，簪固定于发上（详见图G—17）。帽有合欢帽、突骑帽、风帽等几种。合欢帽之名见于《邺中记》：“石季龙出猎，著金缕织成合欢帽”，其形象参见图G—18②。突骑帽之名见于《隋书·礼仪志》：“突骑帽，盖索发之遗像也”，其形象参见图G—18②、③、④。风帽一般与帷风同时使用。还有一些名称无考的小冠和帽，也经常出现在这一时期的武士俑、仪卫俑头上（图G—19）。

戎服、铠甲外均束革带，带用带扣扣束。带扣经过魏晋时期的改进以后，其外形、结构与我们今天使用的带扣相似。带扣束在腰的左侧或右侧，而不像现代是放在正中间。带扣束在腰的左侧或右侧，而不像现代是放在正中间。带扣束在腰的左侧或右侧，而不像现代是放在正中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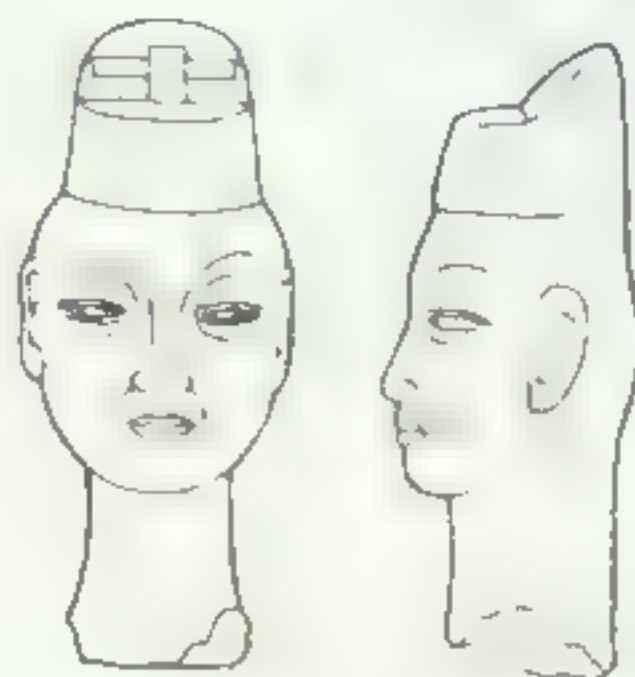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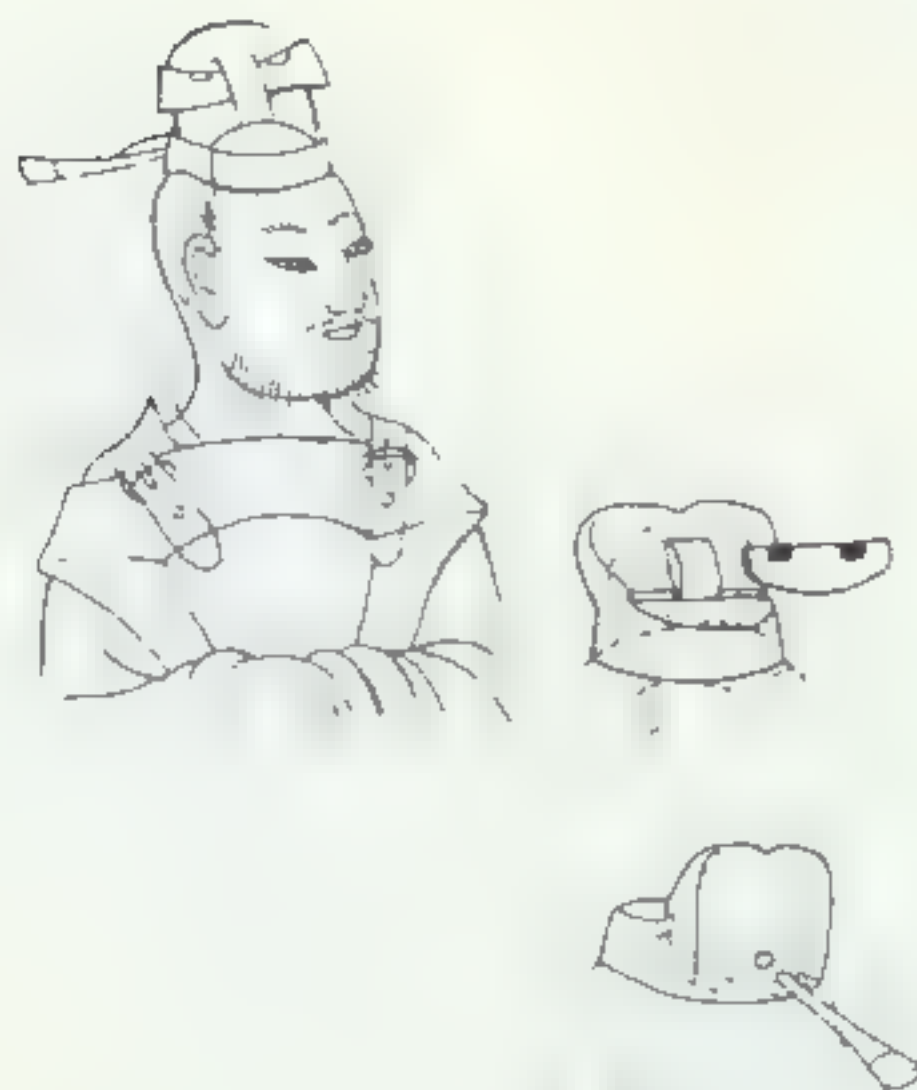


图 G—18 ① 突骑帽形象之一，洛阳古墓博物馆藏北魏彩绘仪卫俑。②③ 突骑帽形象之二、三，河北吴桥北朝墓出土武士俑头。④ 合欢帽形象，西安草厂坡北魏墓出土佩弓武士俑，西安历史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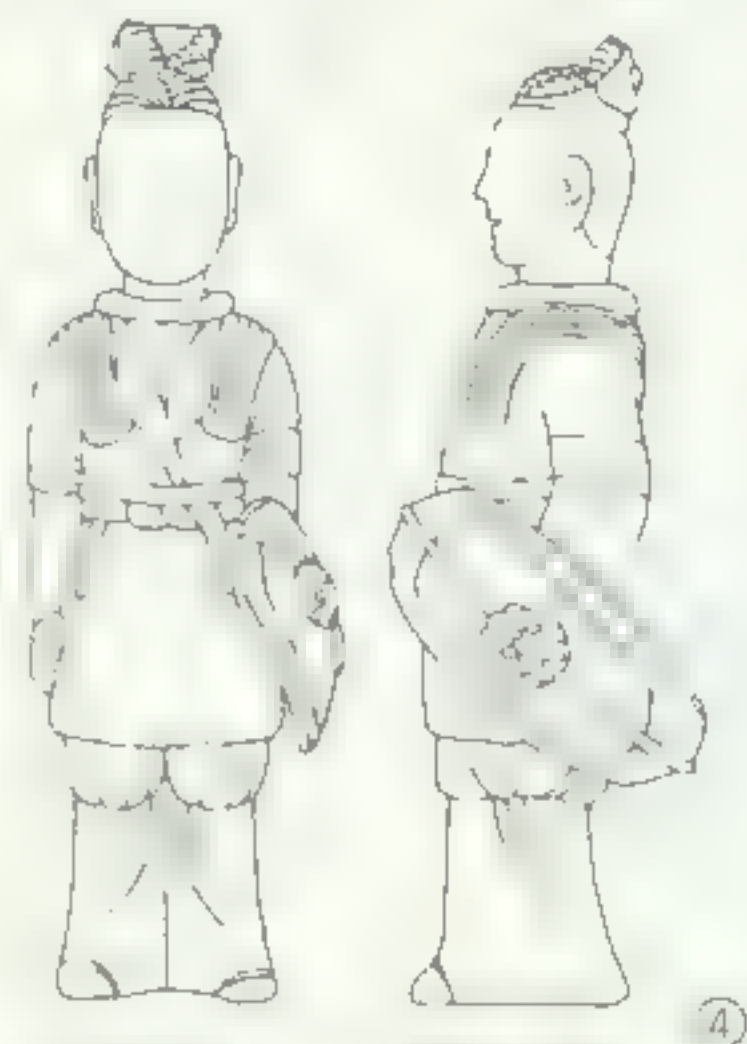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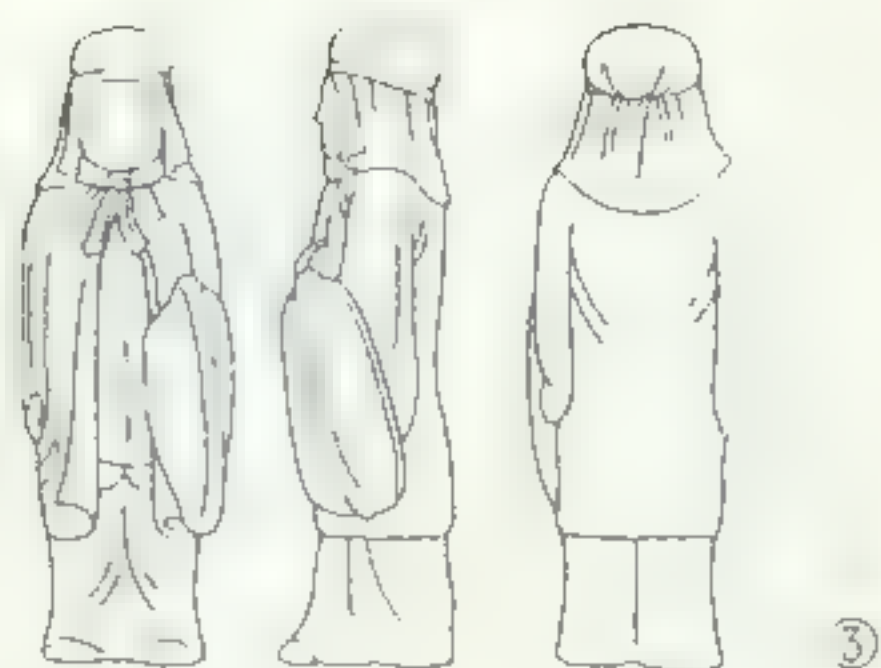
图 G—17 上，洛阳出土北魏升仙石棺前檐石刻画像。中，平巾帻戴法示意图（供参考）。下，江苏丹阳全家村南朝墓出土武士俑头，录自《文物》1980年第2期。



G—11 河南邓县出土彩色画像砖，两武士均头戴平巾帻，着大口裤、缚屣。

如《孔氏谈苑》所说：“占有革带，反插垂头。”革带表面钉饰的铜件数量也明显增多，带尾末端还增加了称作铊尾的新铜件（参见图G—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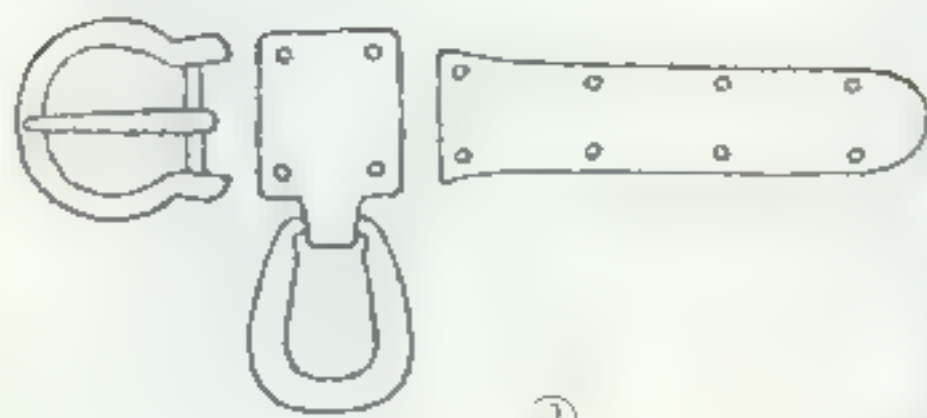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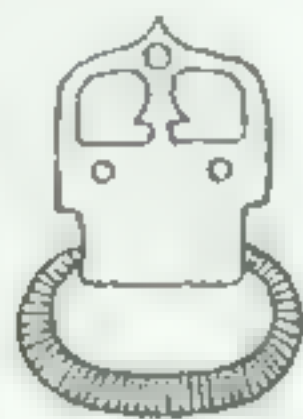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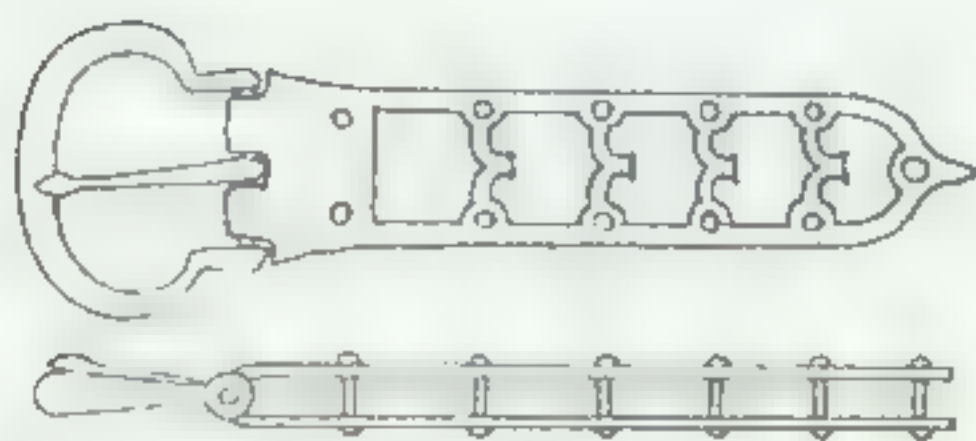
根据史书记载，南北朝中北齐、陈尚木德，色以青为主；梁属火德，以红色为尚；南朝宋、西魏、北周用水德，色尚黑；北魏为土德，色尚黄。但从大量出土的彩绘俑身上可以看出，戎服的色彩以红、白色为主，一般是朱衣白裤，有时是白衣白裤，只在衣服的镶边、铠甲外缘的包边上采用其他颜色。这种现象反映了汉代以后，军戎服饰的颜色更多地注重明亮、鲜丽；而大量使用红白等色，则与南北朝时期佛教、儒教的影响逐渐增大有关。儒教认为红、白、



图G—19 ①③风帽形象，河北吴桥北朝墓出土风帽俑和俑头。②⑥河北吴桥北朝墓出土持盾武士俑和两种俑头。④河北磁县东陈村东魏墓出土持盾武士俑。⑤山西太原北齐娄睿墓出土骑俑。②—⑥的冠帽名称都无考，②的形象看上去像皮革制成的小冠，④的形象很可能是一种发髻。⑤的这种帽在隋代时仍然使用，⑥上的小冠好像是用布帛裹发束成的形象。⑥下所戴应称为一种帽，从盖住半个耳朵的情况来看，很可能是一种暖帽。



黑、蓝、黄是土色，其余土两种以上色相混配或杂色是杂色；凡是在正式场合使用的重裘暖服，都多用土色。天子对于官服的紫色品级居“九等”之首，就表示了极大的不满，“紫微之在朱也”（《尚志·附注》），认为紫色比朱色，决不能比朱色土色。戎服用红白等色，白色也含有土色土色土色，堂皇之制与土色。另一方面，紫色也令人有一种威严、令人折服的印象，而白色则有神圣、不可侵犯之意，因此，紫色都具有一种威慑的作用。因此，基本上都用紫色。铜器、银器、铁器、金器、玉器、漆器、陶器、丝织品、皮革、木材、竹器、石器等，也都含有土色，极少量的杂色，如黑、蓝、黄、绿、红等色。



②

图 G—20 ①宁夏朝阳八宝村出土北燕时期的金带扣、带铸 ②河北定县北魏石函中所出带扣、带铸和钝尾 ③山西太原北齐娄睿墓出土武士俑 ④《历代帝王图卷》陈宣帝像中之执扇侍臣，图中腰带为反插垂头的形象

隋代武士复原图

甲冑根据安徽合肥、亳县隋墓出土武士俑复原；戎服根据河南安阳、宁夏固原等隋墓出土武士俑实物复原；革带带具采用宁夏固原隋墓出土实物；兵器根据安阳等地出土瓷俑上的形象复原





隋代

隋代

(公元581年—公元61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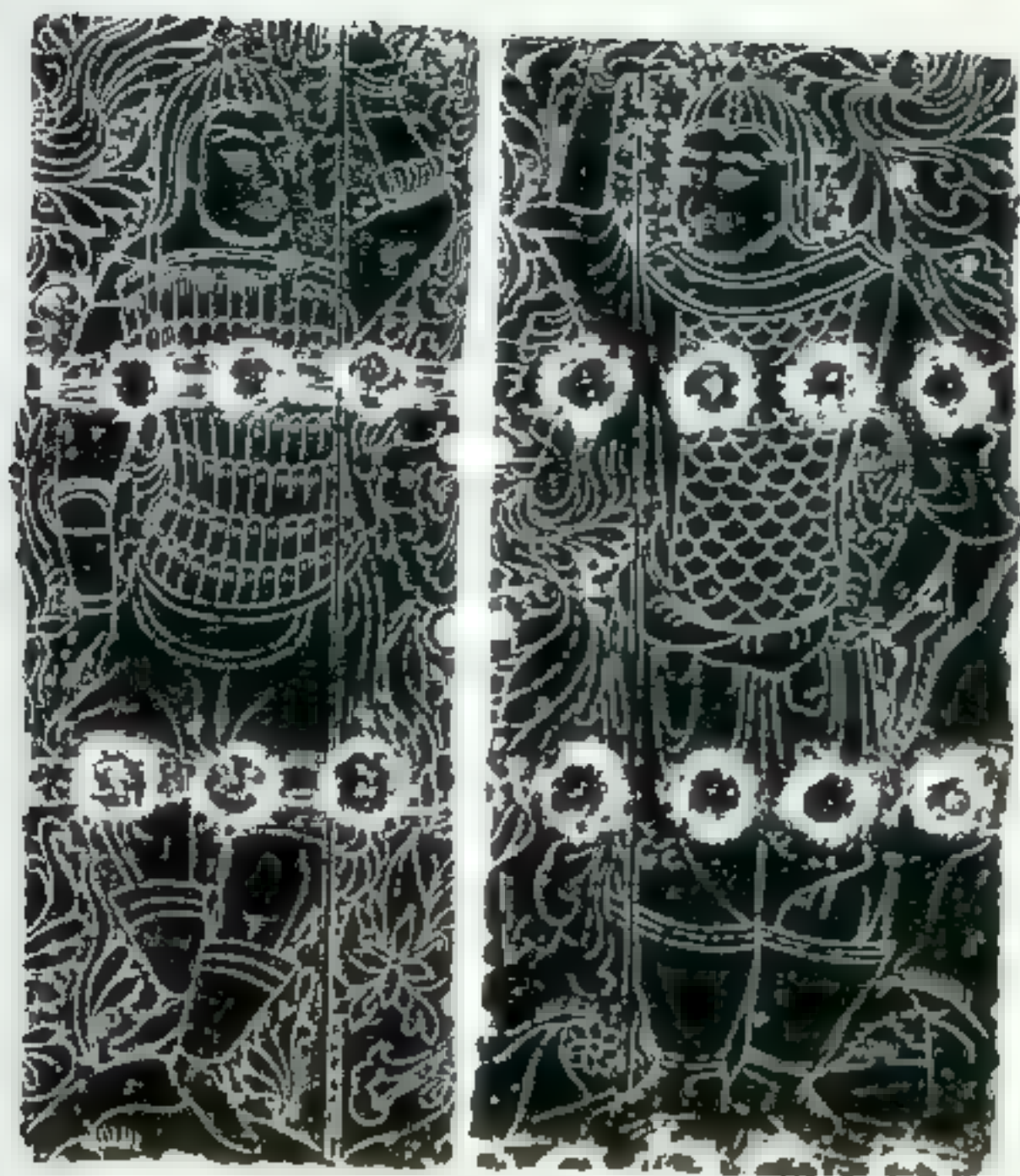
隋朝是一个短暂而又一个生命的、统一的封建王朝。

隋朝建立之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另一方面，其基本国策在军事上的失败，军队内部的腐败，以及

隋朝末年农民起义的爆发，都说明了隋朝的

灭亡。隋朝是一个短暂而又一个生命的、统一的封建王朝。隋朝建立之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另一方面，其基本国策在军事上的失败，军队内部的腐败，以及隋朝末年农民起义的爆发，都说明了隋朝的

灭亡。隋朝是一个短暂而又一个生命的、统一的封建王朝。隋朝建立之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另一方面，其基本国策在军事上的失败，军队内部的腐败，以及隋朝末年农民起义的爆发，都说明了隋朝的



图H—1 陕西省二原县隋李和墓石刻画线画(拓片局部)，两武士头戴式样相同的兜鍪、均穿两当铠和长靴，臂甲的式样也相同，只有两当铠的甲片和形制略有差别



H—1 安徽合肥西郊隋墓出土持盾步兵俑，选自《中国美术全集》雕塑专集

湖北武汉出土的一件瓷武士俑身披的明光甲与兜鍪、顿项连成一体，就像现代的潜水服，其防护之严可见一斑（彩图 H—2）。

除了上述两种铠甲之外，也有胸背甲全部用铁甲片编缀的铠甲，这类铠甲是否即是记载中所说的黑光甲（图 H—2）。

可能由于连年战争，采矿冶炼等生产遭受破坏的原因，隋代还大量使用皮革制甲。《隋书·礼仪志》载：“大业七年，征辽东……，第一团，皆青丝连明光甲，铁具装，青纓拂，建狻猊旗。第二团，绛丝连朱犀甲，兽文具装，赤纓拂，建貔貅旗。第三团，黑丝连明光甲，铁具装，素纓拂，建辟邪旗。第四团，乌丝连玄犀甲，兽文具装，建纓拂（应为乌纓拂之误），建六驳旗。”这则记载表明，当时军队装备的铠甲有一半是皮甲。而根据多种形象资料分析，这时的皮甲实际上已不同于战国时期，并不一定全都用皮革制造，在各个要害部位都用了铁甲片来进行加固，其防护功能比纯粹的皮甲肯定要强得多。



H—2 湖北武汉出土持盾步兵俑（据照片绘制），湖北省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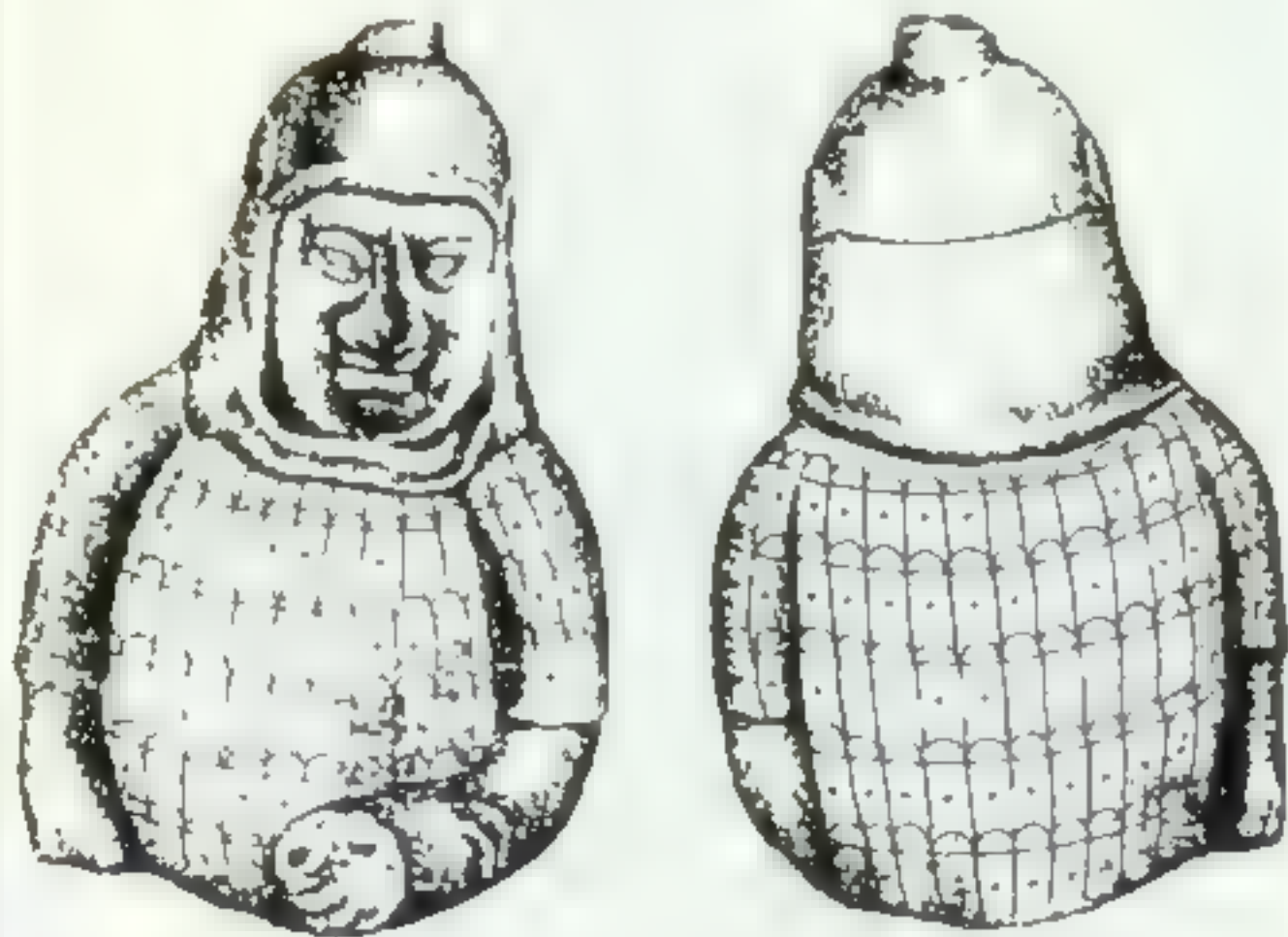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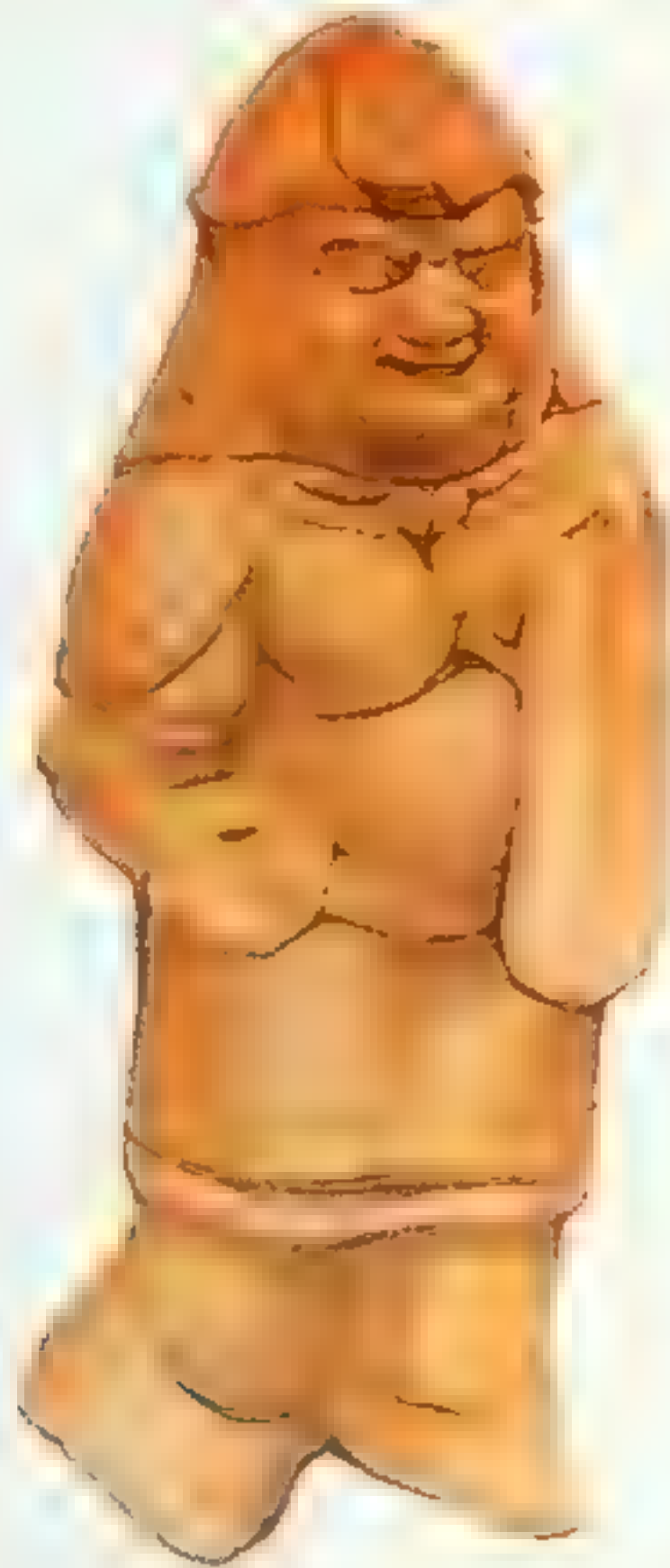


图 H—2 陕西三原隋李和墓出土残骑俑，陕西省博物馆藏。



H—3 河南陕县隋墓出土持盾武士俑，甲身部分铁制，其余好像都是革制（据实物写生），西安历史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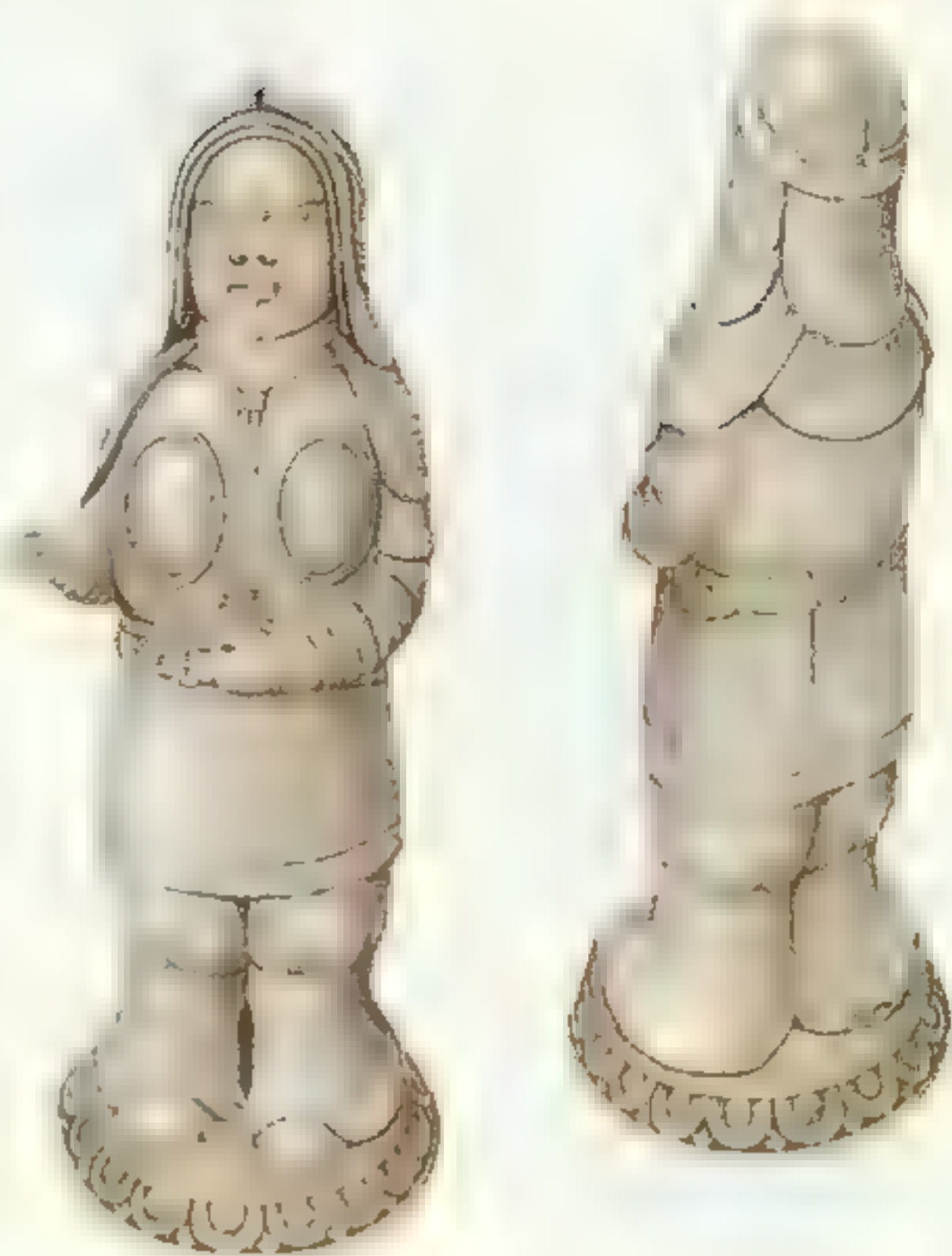
隋代

图H—3、彩图H—3、4的几件陶俑很明显地展示了这种皮铁合甲。当然，也会有全部用皮革制造的铠甲，陕西三原隋李和墓的石棺槨上有一幅线刻武士像，身上的铠甲还保留着汉代的干褶的形制，甲片也较大，很可能就是全部用皮革制成的皮甲（图H—3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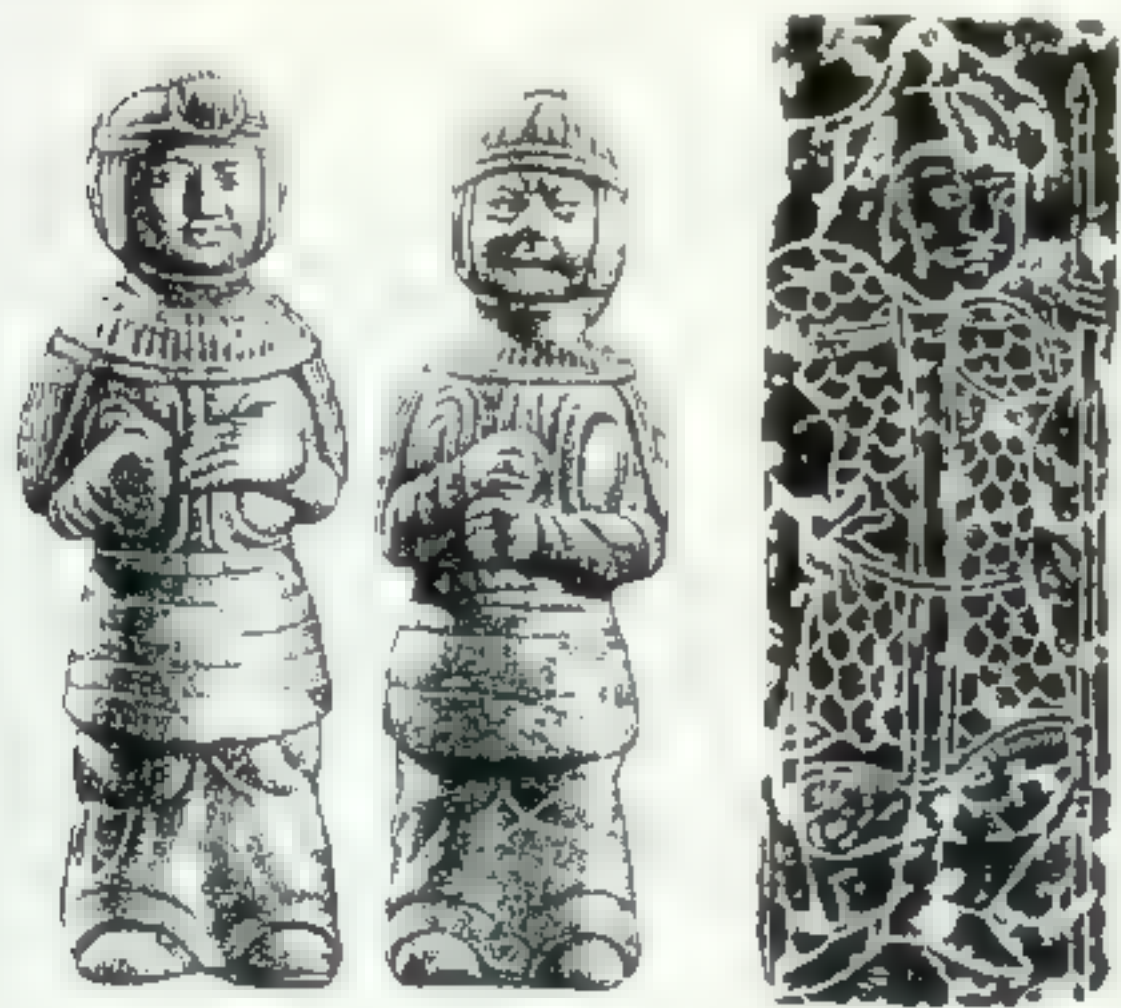
这时兜鍪、盔、冑除了继续采用南北朝时期的形制以外（参见图H—1、3、4），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式样，彩图H—2的那种带水服头盔的兜鍪，就是一种前所未见的新型。

作为铠甲部件的臂甲，这时出现了铁制的新样式，较之薄片型的应该更加坚固。敦煌莫高窟420窟壁画上有一幅隋代武士图，胫部好像还有胫甲（图H—4）。胫甲见载于《汉书·艺文志》：“魏氏武卒衣三属之甲”，注引“服虔曰：‘三属，竟人身也。’苏林曰：‘兜鍪也，盆领也，髀褶也。’如淳曰：‘上身一、髀褶一、胫缴一，凡三属也。’”其中胫缴即胫甲，战国时期所用胫甲已由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青铜胫甲得到了证实，但其后直到南北朝，各种文献资料上都没有发现胫甲。这可能与当时的军事技术有关，但或可说明隋代又出现了使用胫甲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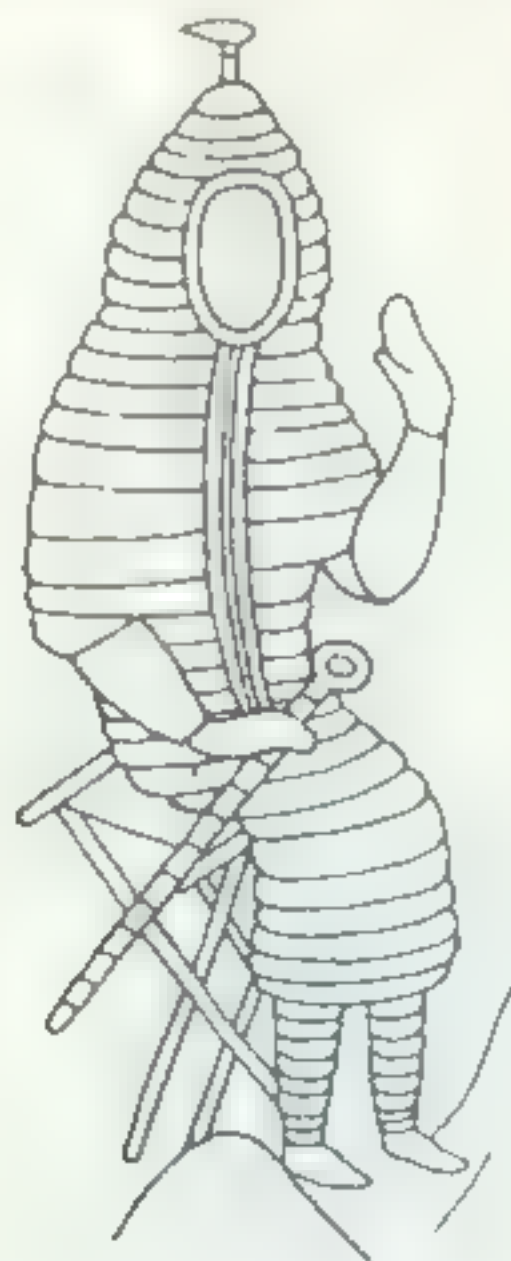
隋代铠甲的式样，见《隋书·礼仪志》、《隋书·食货志》。



H—4 河南安阳隋张盛墓出土武士俑，铠甲的胸甲圆护、兜鍪顿项、披膊、臂甲似为铁制，其余的为革制（据实物写生），河南省博物馆藏。



图H—3 左、中：安徽亳县隋墓出土武士俑，俑的兜鍪、披膊、胸甲圆护很像铁制，而顿项、护肩、臂甲、腿裙都是革制，但护肩上还另缀有铁甲片。右：陕西三原隋李和墓石棺槨石刻像拓片，身上铠甲似为皮甲。



图H—4 敦煌莫高窟420窟武士像，图中铠甲俱为横线表示，胫部也有，所以疑是胫甲。



隋代



图H—8 山西太原隋斛律武墓出土仪仗俑（上），武士俑（中），持盾俑（下），选自《文物》1992年第10期。武士俑的袂风只穿一袖，另一袖空悬身后，持盾俑亦如此。



图H—7 宁夏固原史射勿墓壁画柱侧武士图，选自《文物》1992年第10期。

未发现明确的文字记载。(图H—7)中、高级武官除了常服外，还有专门的朝服，《隋书·礼仪志》载：“左右卫、左右武侯大将军、领左右大将军，并武弁，绛朝服，剑、佩、绶。侍从则平巾幘、紫衫，大口裤褶，金玳瑁装两当甲。……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侯将军，领左右将军，左右卫将军，太子左右卫、左右宗卫、左右内卫等，左右卫门郎将及诸副率，并武弁，绛朝服，剑、佩、绶。侍从则平巾幘，紫衫，大口裤，金玳瑁装两当甲。……直阁将军、直寝、直斋、太子直舍等，并武弁，绛朝服，剑，佩，绶。侍从则平巾幘，紫衫，大口裤褶，银装两当甲。”隋代朝服的形象资料，目前还未具体掌握，只能参考唐代的有关资料。由此我们可以发现，隋代武官实际上具有三种服饰：出征作战的戎服铠甲，平时的公服和朝服，这种从侧面反映了武官服饰的等级制度。史载隋文帝建国以后，在继承北齐、北周武官制的基础上，曾采用曹魏以来的九品制，制定了一套比较具体、明确

的武官服饰制度，其目的是为了建立封建等级制度，强化封建等级制度，从而巩固封建统治。

隋代武官的服饰，仍然是南北朝以来服饰的延续。此外还有帔风，帔风除在朝服中穿着外，其余各部分形制都没有变化，在戎服中亦如此(图H—8)，当然，也在朝服中出现。

《隋书·礼仪志》云：“隋文帝征辽，诏武官服缺胯衫，紫。”所谓缺胯衫，实际上是一种开衩的长衫。从宁夏固原史射勿墓壁画、河南安阳和安徽亳县隋墓出土的陶俑上可以看出，衫长至胫中部或脚背，盘圆领、右衽、小袖、开衩的情况资料上反映不甚清楚，可能是右侧衣纽扣至胯间，左侧裁开(唐代的有关资料上反映得比较清楚，可以借鉴图H—9)。武官穿缺胯衫时以颜色和织料来区分等级。缺胯衫无论式样、结构都与南北朝的襦袍十分相似，应该说是从襦袍变化而来的。这种服饰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很流行，到了隋代，无论男女都喜欢穿着，成了十分流行的时装，风靡了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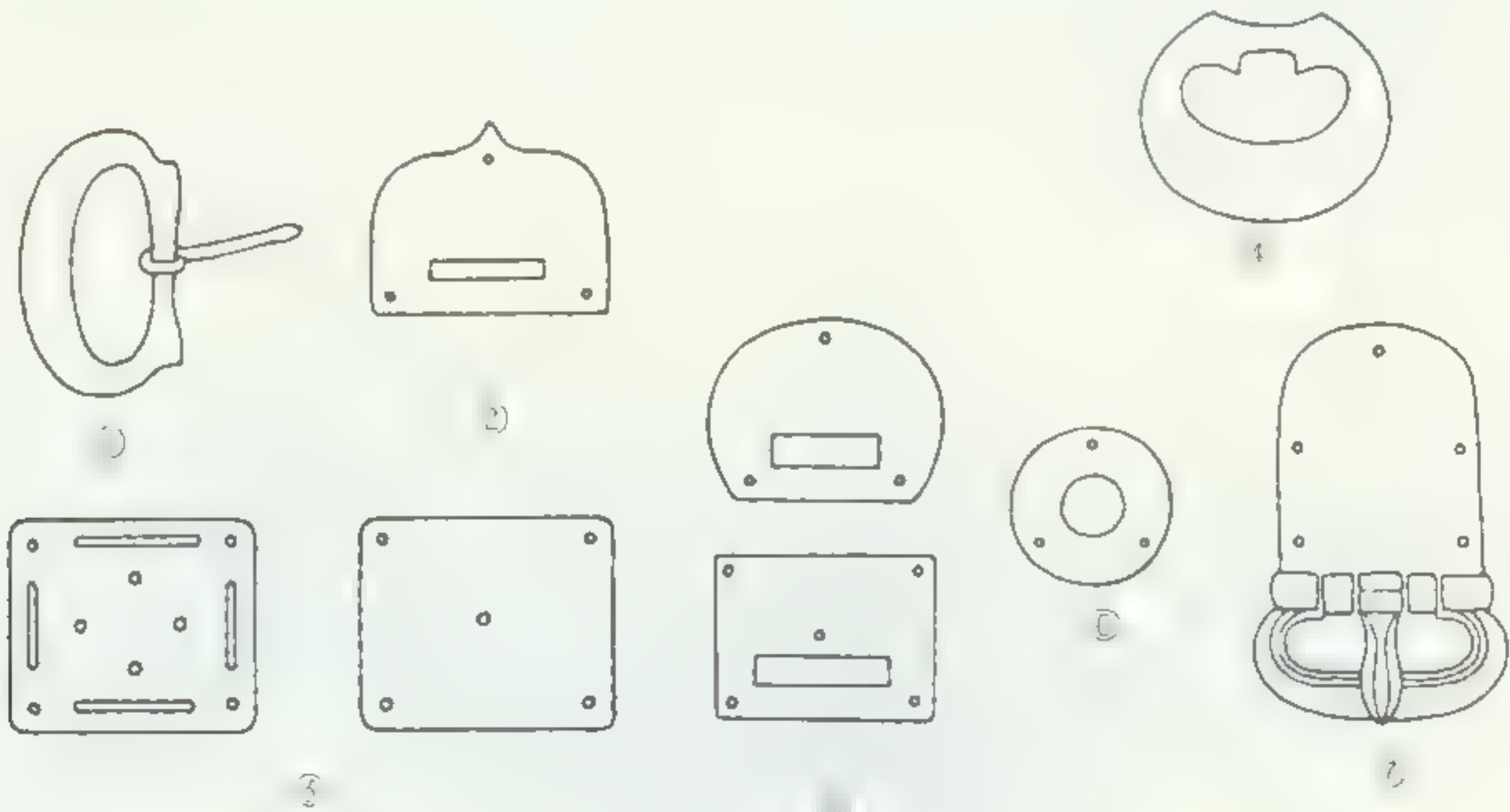
隋代

彩图 II—3、5)。其背面装饰的带铐已偏在整条腰带，而且往往在一根腰带上装饰数件以上造型相异的带铐，(参·图 II—3 靖边威灵(地点不详)、宁夏固原史国故城出土的带铐实物)革带的带尾垂入插法与商代铜带扣不同，带尾由上至下插入腰带，(宁夏固原史国故城出土)或从下插入腰带。这种插法据《释名·车服志》的解释，称“铉尾，取顺下之意”。其同好摩言有一书载述的铉尾：古时以“朝”字为头、个上，则又与“下”音，又是“又”字在“下”，又结为“铉”字有顺下作尾的语义了。

[illegible]

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黄（与帝王的服饰黄色有明显不同）。

由此可见，戎服的颜色、衫袖以紫、绯、绿、青为主色如左，而朝服以浅红、浅绿、浅黄、米白、深青等五色形成七、九品之制。两图中见有金钗、玉钗、金钿冠等几种，大口鞋一般以口宽为半寸，鞋上巾、靴、履一般为甲色，铠甲的装饰纹样多在盔帽上作彩线勾画分饰，则以朱、黑、青三色为主，图案也包括内当甲的几种色彩。

[illegible]

图H—13 ①—④隋姬威墓出土玉带具（出处、出土地点不详）。①带扣②③带铤④附环⑤—⑦宁夏固原史射勿墓出土金带具。⑤⑥带铤⑦带扣 录自《文物》1992年第10期。





唐代武士复原图

甲冑据洛阳、乾县、吐鲁番阿斯塔那和陕西礼泉昭陵陪葬墓等唐墓出土彩绘武士俑、三彩武士俑等形象复原；戎服根据西安长孙公主墓壁画、鲜于庭海墓出土参军戏俑等形象复原；织物纹样根据阿斯塔那唐墓出土实物描绘；革带根据日本白鹤美术馆藏西安何家村出土实物复原；兵器根据内蒙古科尔沁出土实物、西安杨思勖墓石刻形象复原。



唐代



唐代



1—2 洛阳龙门石窟杨氏洞外北壁左侧天王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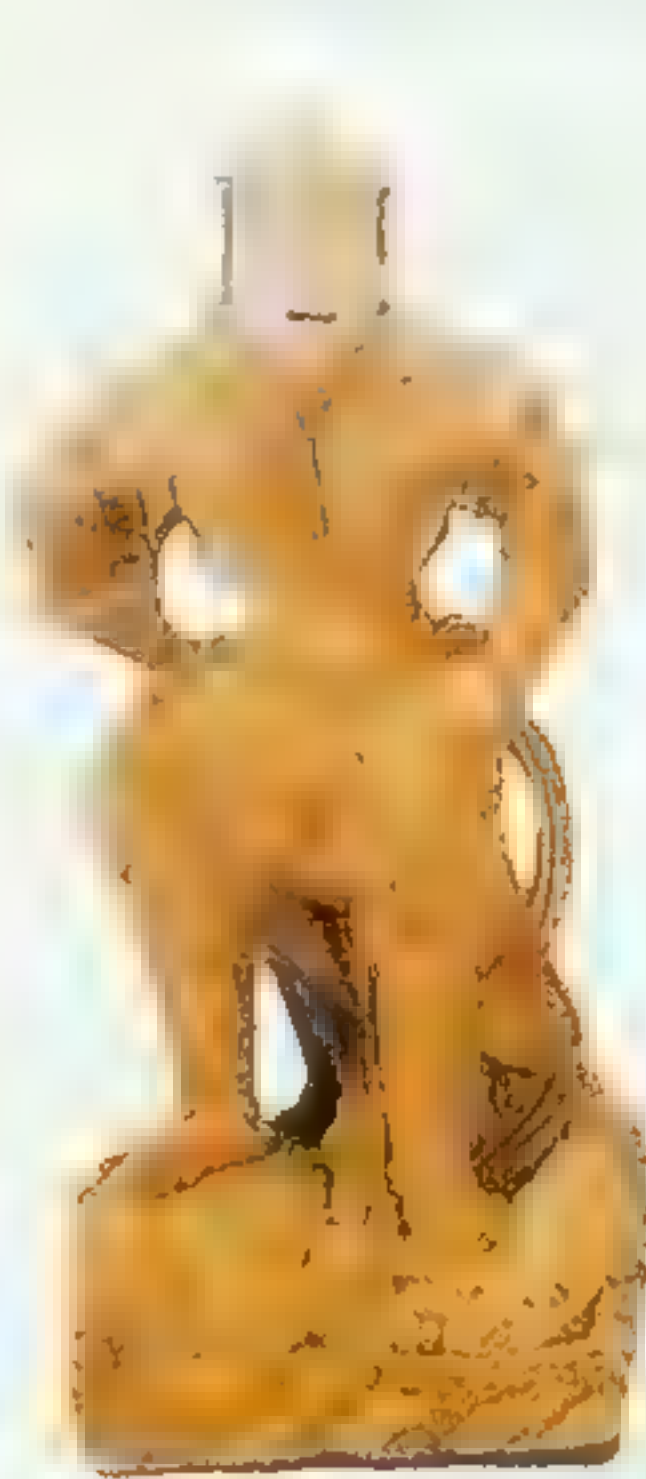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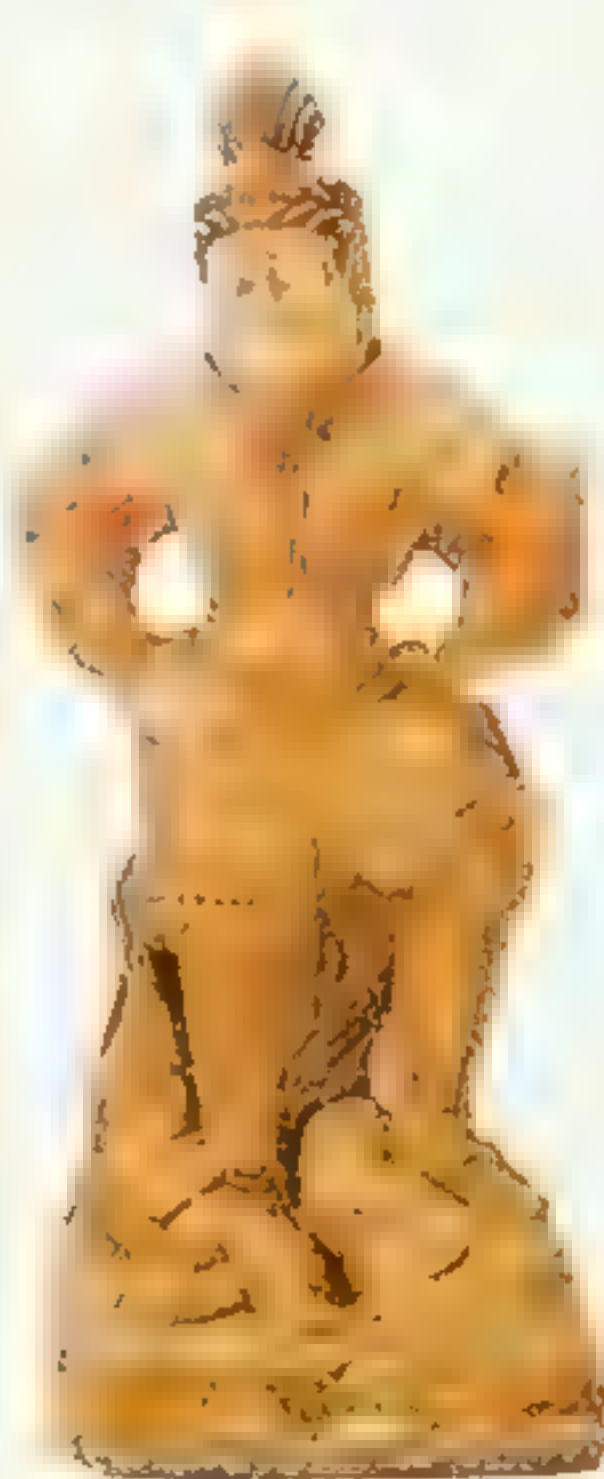
1—3 洛阳龙门石窟潜溪寺石刻天王像，此窟开凿于永徽元年(650)。



1—4 巩县石窟寺石刻天王像



1—5 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石刻造像，像身似未穿铠甲，但束甲部分刻勒清晰，四川省博物馆藏。



1—6 西安南郊出土汉白玉天王像，西安市文物研究所藏。



1—7 陕西礼泉昭仁泰墓出土贴金彩绘武士俑（据文物与生），西安历史博物馆藏



1—8 敦煌莫高窟 264 窟彩塑天王像



图1—2 河南安阳修定寺塔外壁砖雕（据照片绘制）

唐代（图1—6、7）对肩部防护的加强，可说是一种“大刀”的兵器大量使用所致。唐代中期以后，长1.5—2米的砍刀，对肩部的威胁较大，冲击力也要比矛戟等穿刺兵器强得多，因此需要加强肩部的半身防护。臂甲的改进，出现了类似撑开的伞一样的护甲，臂甲的改进，使身甲的腹部增加了与胸背甲上不同的装饰（图1—2：左；图1—7、8、9）。宋代（图1—10）开始，1992年在陕西乾县乾陵出土了宋代的一条铜扣金腰带，腰带上装饰有25厘米左右的圆形镜，镜面上刻有“大宋”字样，镜背是一个起角尖形，这种装饰在宋代 armor 中很常见，好几种装饰的肩甲，这种装饰是肩甲的起始（图1—3）。在腿甲的改进中，出现了保护下腹部的护甲，这种护甲在宋代 armor 中很常见，胫甲好像是同肩甲一样，用皮绳从横束绑住的（参见图1—6、8、9、10）。

宋代 armor 中，腹部的圆护上也出现了各种装饰、生龙等图案形象，这种改变使护甲更具备了装饰性的作用。从图1—11可以看出，这



唐代



1—9 洛阳出土唐代三彩镇墓武士俑，洛阳市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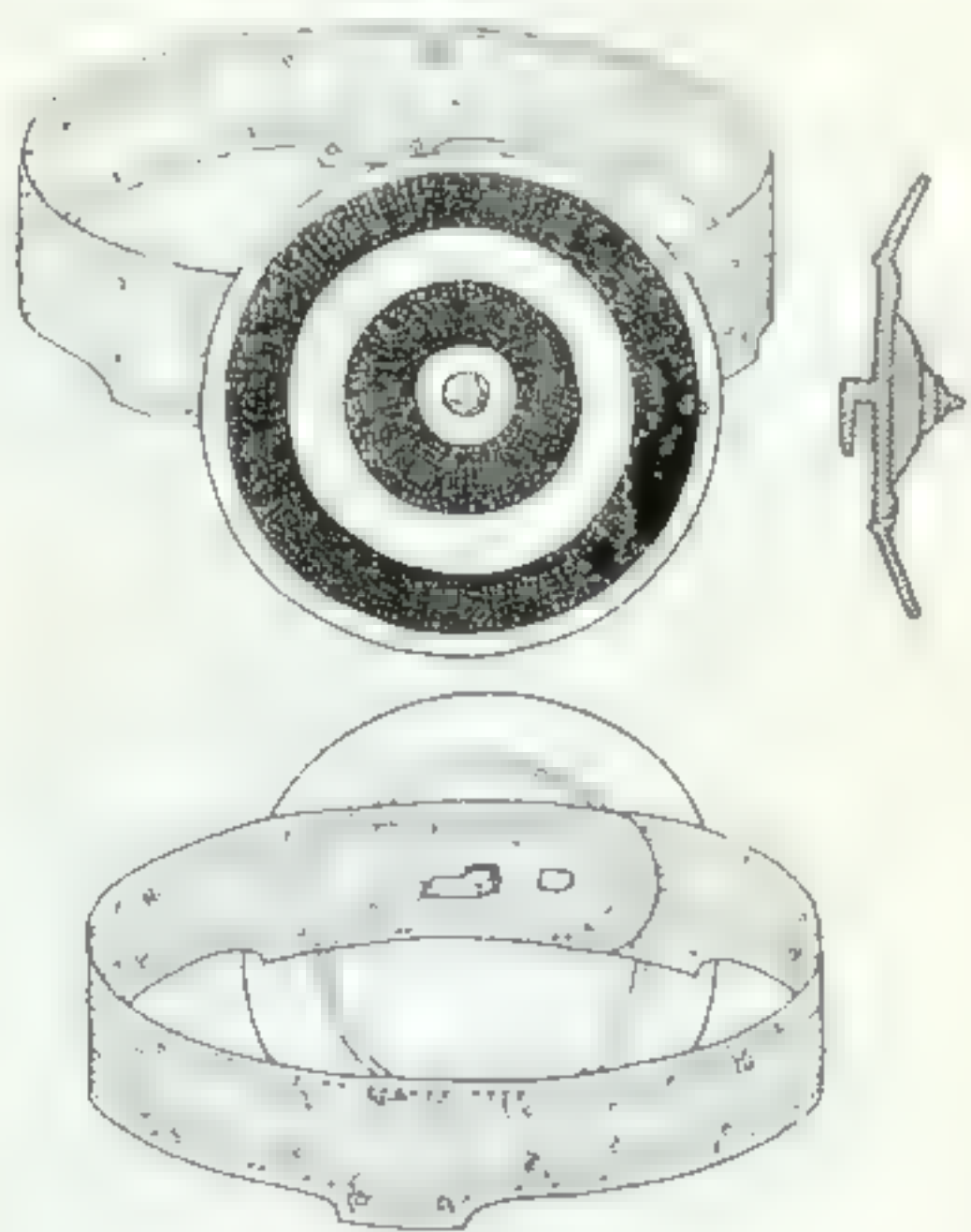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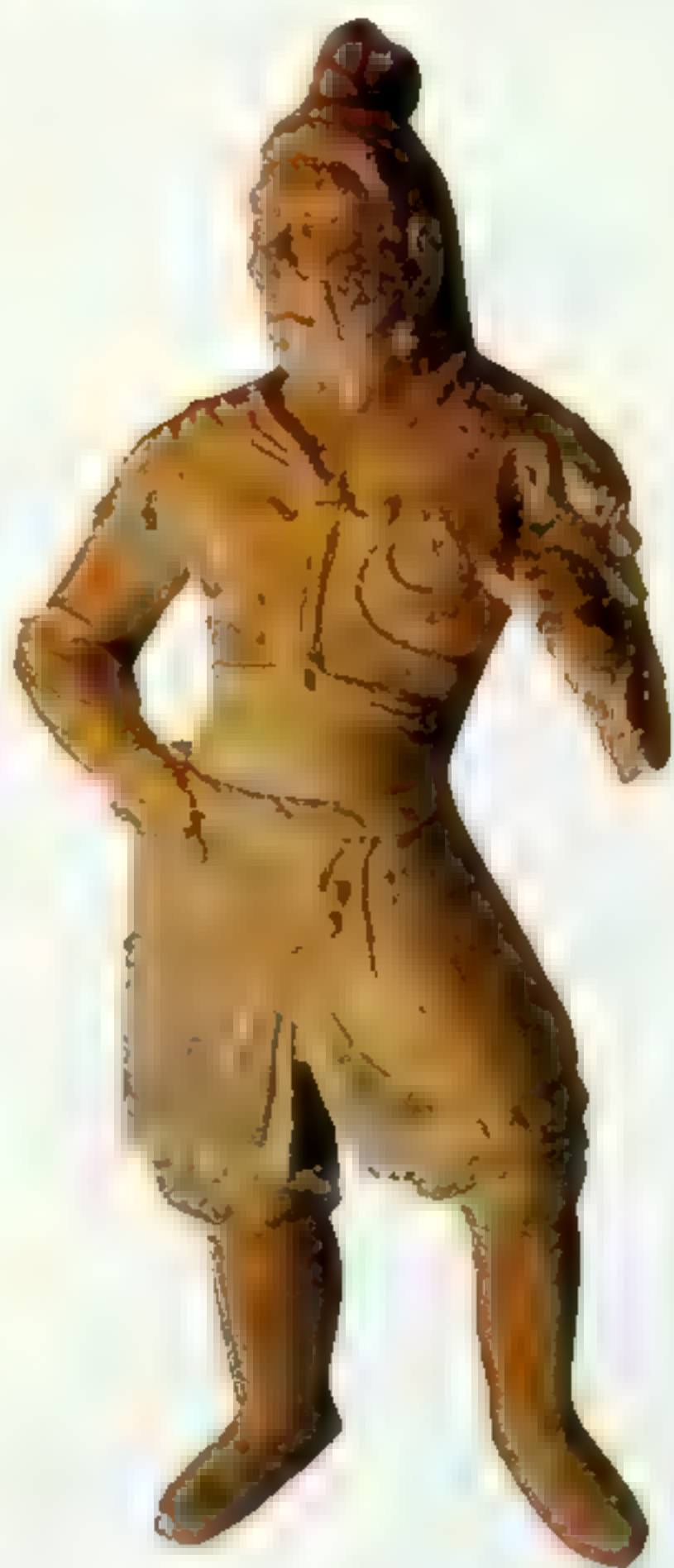


图1—3 云南江川李家山西汉墓出土铜扣金腰带，这件实物与同墓出土的鼓座铜俑身上的腰带完全相同（参见汉代彩图E—17上：正面 下：背面 上右：圆镜剖面图）。

时期的大部分铠甲又重新开始全部用小甲片编制，结构上仍保持了明光甲的形制，用于护甲的绳索或皮条已为皮革所取代，保护小腹的裙属物还向大裙宽扩起来（图1—4；彩图1—10、11、12、13）。

细鳞甲与明光甲的区别，目前尚无可靠资料可供参考。至于细鳞、山文、乌锤等甲，细鳞甲的鳞片较小，为的另一种叫法，可能这时期的这种鳞片特小，所以称作细鳞；山纹甲片在唐代铠甲中也有发现出土（图1—5），这种凸型甲片与图1—4、彩图1—11的天王像铠甲上的甲片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唐代铠甲上还经常出现一种长条形，上缘有一小圆孔的甲片，或许就是乌锤甲片（参见彩图1—12、13等图）。

唐代步兵甲也是比较重要的，与骑兵甲相比，步兵甲的腿裙比较长，且不开衩；如果开衩，也要使两片相交合拢处相互重叠，胸前甲片有时仿照明



1—10 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168窟彩塑天王像



图1—4唐代石刻天王像(据实物写生,像上腹前与身后的飘带,为这时期出现的佛像上的装饰,实际生活中并无此物),上海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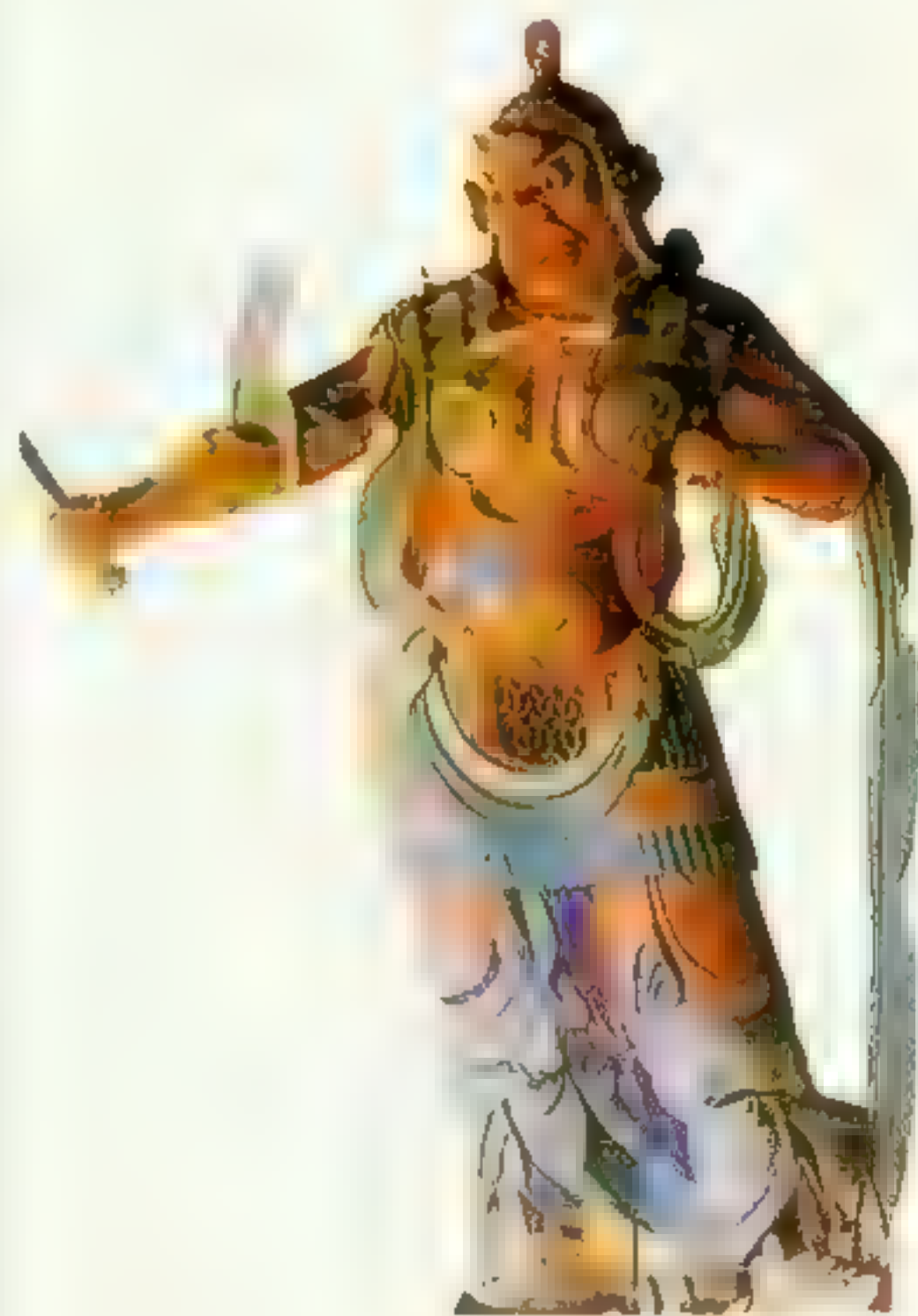
1—12日本教王护国寺藏唐木造毗沙门天王像,像身铠甲雕刻细致,质感逼真,弥足珍贵



1—11山西五台山南禅寺大殿彩塑天王像,寺建于建中三年(782)。



图1—5北燕冯素弗墓出土凸型甲片,来自《文物》1973年第3期。



1—13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彩塑天王像,寺建于大中十一年(857)。



唐代



I—14 西安昭陵陪葬墓唐长乐公主墓壁画上：武士出行图（局部）。右：右起第一人临摹像（据西安历史博物馆复制品临摹）。



I—15 敦煌莫高窟第322窟彩塑天王像

光甲，上缀圆形铁护（参见图I—6；彩图I—14）。

唐代的皮甲，在形制上都仿照明光甲。唐初，各部结构与外形都沿袭隋代，贞观之后，出现了具有唐代特点的胸甲、披膊和腿裙。唐末的皮甲，则与盛唐时期的明光甲在形制上相差无几（图I—7；彩图I—15）。从图像资料上可以明显看出，在皮甲的重要部位和某些部件上，都缀有铁制圆护、甲片（参见步兵甲）。这种现象可以说明，区分唐代的铁、皮甲，应以铠甲甲片主要用何种材料制成为据。

唐代的铠甲制造技术十分先进。在新疆和西安曲池地区出土的铁、皮甲片、尺寸都很小，加工十分精致，甲片的编连有用麻绳、皮线，也有用铆钉铆接的（图I—8）。甲片编连成甲衣后，用皮革和绢帛上下两层做内衬，各部分的边缘还用织锦包出宽宽的包边，有的还在包边上缀虎、豹、熊等毛皮，或用锦缎打褶做装饰（见彩图I—6、7；图I—4、6）。

盛唐时期的彩塑、墓中出土的陶俑以及石刻天王、武士造像上，经常出现一些装饰十分繁缛、华美的铠甲，这些铠甲一望而知既不是铁甲，也不像用皮革制成，实际上就是《唐六典》中说的绢甲。绢甲是一种仪仗甲，一般不用于实战，只是宫廷侍卫、武士的戎服，它直接继承了汉代以来所穿的帛制襦裆甲的启源。绢甲是用绢或织绵作面料，其装饰与铁甲一样，绢甲上也缀有铁制圆护、甲片。绢甲的形制，合铠甲的形制也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式样，这种式样使整件甲衣上下连成一体（在此之前，铠甲的腿裙与身甲不相连属），摊开时就象一块裁剪开的衣片，披挂上身后，从后向前围裹起来，用胸部和腰部上下两重束甲的方法，使甲衣紧紧地包裹在身上。这种式样较之以前的任何式样，在穿着上都更加利索、合理，它更清楚地反映绢甲的结构、形制的形成过程，自西安昭陵陪葬墓唐长乐公主墓出土的约2米的镇墓武士俑，和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张盛唐武士俑，都是唐代武士甲衣的实物，有幸见了



图1—6 左：西安高氏墓出土武士俑（据照片绘制），来自《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中、右：西安唐李寿墓石槨线刻画（据实物写生、描摹），陕西省博物馆藏。这三像中，左图的披膊和胸甲可以明显看出是皮革制成，中、右图除了中的披膊以外，其余好像都是革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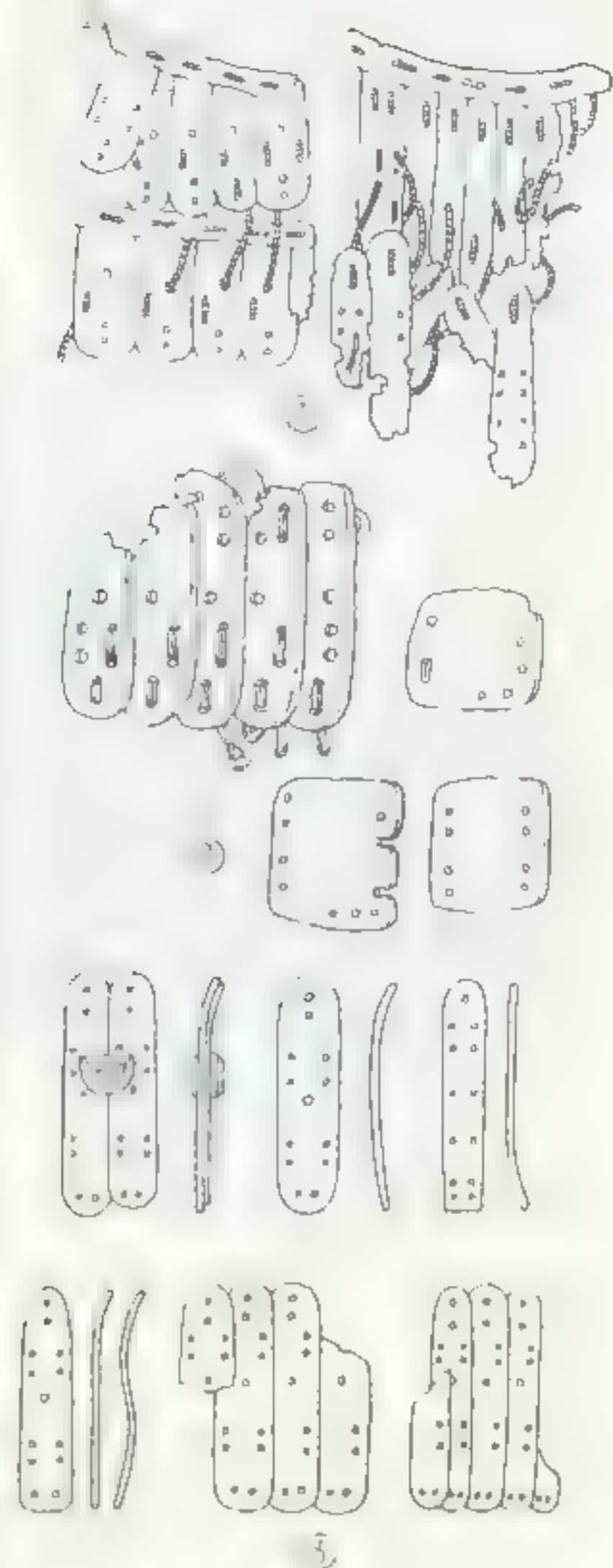


图1—8 ①新疆出土铁甲片②新疆出土皮甲片摘自（日）原田淑人《支那古器图考·兵器篇》③西安曲池地区出土铁甲片④新疆出土铁甲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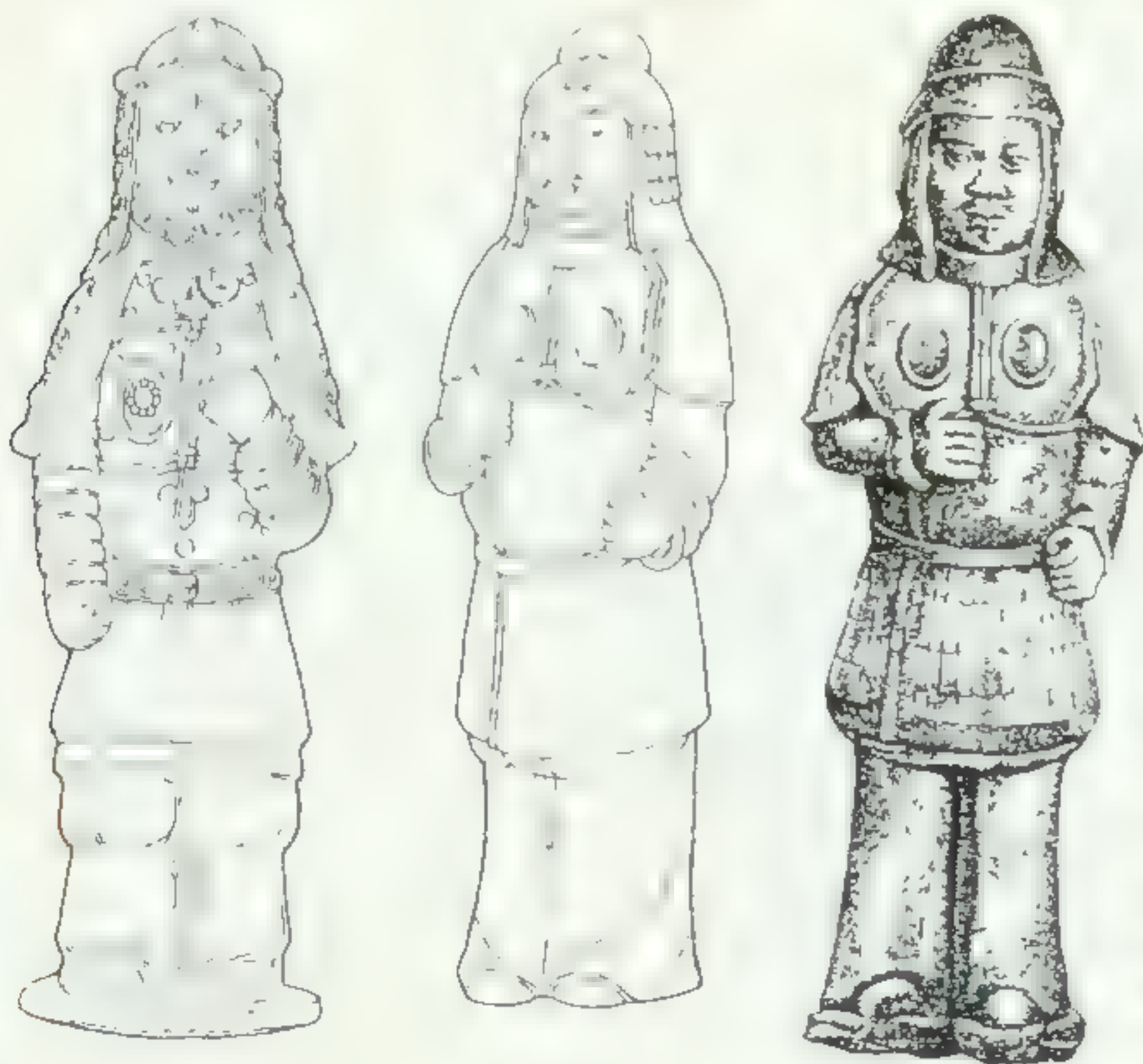


图1—7 左 陕西咸阳唐墓出土武士俑，摘自《中国古俑白描》，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中 陕西礼泉唐昭陵陪葬墓出土武士俑，昭陵博物馆藏 右 河南洛阳偃师唐邙冢出土武士俑（据照片绘制），洛阳市博物馆藏



这些极为珍贵的文物，并对它们作了仔细的观察和写生记录，从这两件俑身上，基本可以了解唐代这种绚丽多姿的绢甲的面貌（见彩图I—20、21）。其余如上海博物馆展出的甘肃敦煌出土的三彩武士俑、敦煌莫高窟194窟的彩塑天王像等，也都是典型的参考资料（彩图I—16、17、18、19）。

《唐六典》中的布背甲，应也属于绢甲一类。笔者在西安考察时，于唐代艺术博物馆内发现一尊彩绘天王俑（色已褪尽），其铠甲的背甲形象吸引了我：那块又宽又厚、上缘向后弯垂的背甲，很可能就是布背甲（图I—9）。因为若用数层皮革叠成如此厚度，一定坚硬如铁，决不可能出现塑像上那种因束甲绊勒束而出现的内陷凹痕和上缘外弯的情况。

唐代的木甲和锁子甲，现在没有形象资料可以参考。木甲的制造很可能仍用战国时的“木甲”，外包皮革的方法。锁子甲在唐代是最精良的甲，《二老堂诗知》云：“甲之精细者，谓之锁子甲。”



I—16 三彩镇墓天王俑（据实物写生），甘肃敦煌出土，上海市博物馆藏。



I—17 敦煌莫高窟（194窟）彩塑天王像



I—18 汉白玉雕天王造像（残，据实物写生），陕西省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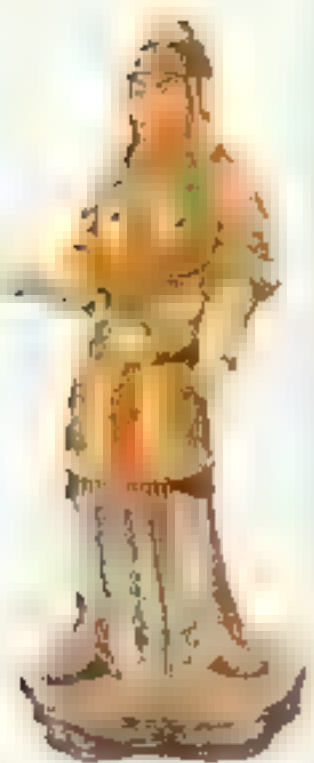
1—19 敦煌莫高窟 194 窟彩塑天王俑



1—20 陕西乾县唐永泰公主墓出土彩绘镇墓武士俑（据照片绘制），此俑背部损坏较严重，大部分颜色已褪去。陕西乾县乾陵博物馆藏。



1—21 彩绘木雕天王俑（据实物写生），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 206 号墓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唐代



图1—9 彩绘天王俑（根据实物写生），西安唐代艺术博物馆藏。此像铠甲的胸、腹、鸭尾、胫甲好像由皮革制成，兽头护肩应是金属制成，其余可能都是绢制。

据记载唐代还使用过纸甲。《新唐书·徐商传》：“徐商裳纸为铠，劲矢不能洞。”其形制现在同样没有资料可以参考，但据推测，必定是用很多层纸叠粘在一起，做成较大的甲片拼缀而成。纸叠到一定程度，的确具有相当的抵御能力，但如果做成小甲片，其硬度必然降低且极易损坏，这种纸铠如果遇到火攻、水淹，其后果一定不堪设想。

唐代兜鍪、盔的形制随着铠甲的变化，也有一个变化过程。初期，明显可以看出与隋代的相同之处（参见图1—1左、7左；彩图1—14），贞观以后，盔的顶上多以半圆形铁胄顶取代隋代的盔脊（参见图1—1右、6左、7中、8、9、10、11、12、13、14、15、16、17）。盛唐以后，盔的顿项有的整个向上翻起，有的向两侧斜卷，盔顶或装饰羽毛，或装饰铁珠。（参见图1—10；图1—11、16、17）盔顶有铁珠的铁盔，黑龙江宁安县渤海国遗址出土唐代铁盔（图1—11）。

在这一时期出土的天王俑上，还大量出现盔顶饰有鸟雀形象的头盔（图1—12、彩图1—22）。从这种头盔来看，墓中出土的陶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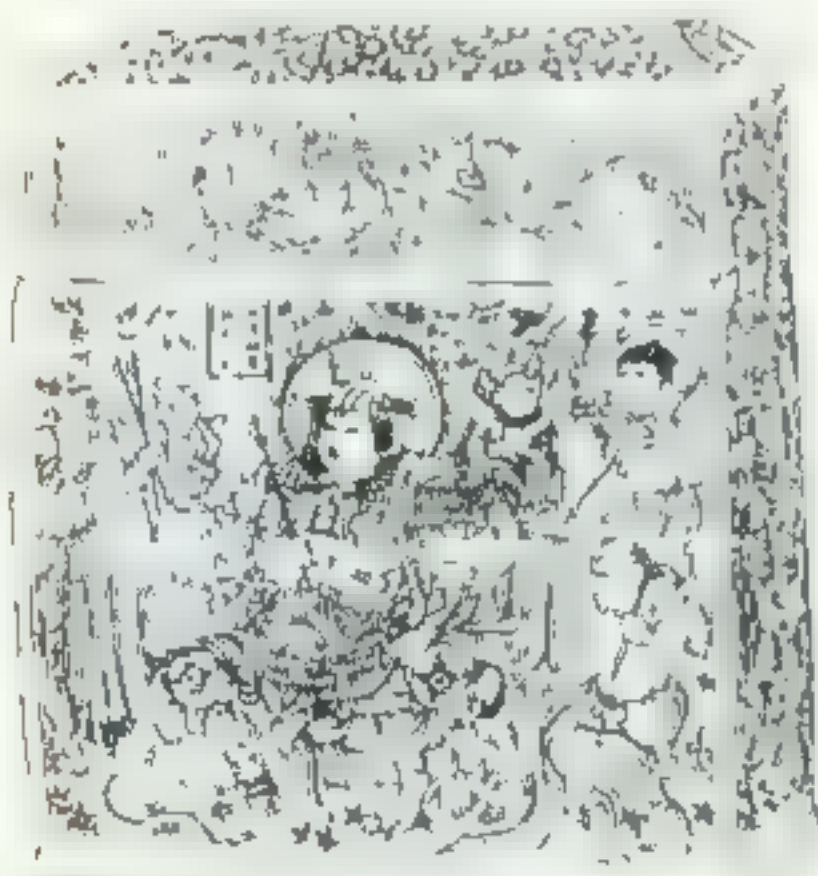


图1—10 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鎏金舍利宝函（法门寺博物馆藏）。宝函镂刻的天王像头上的兜鍪顿项向上翻起，这种式样为唐末、五代时期普遍采用，兜鍪顶上的圆球形胄顶与黑龙江的出土实物完全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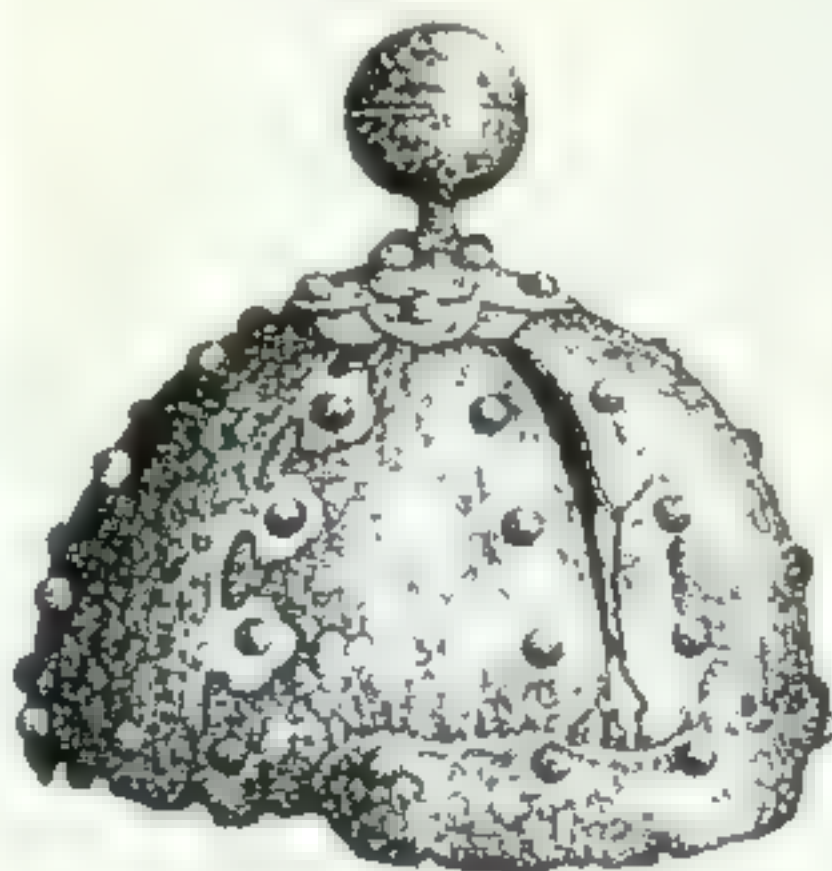


图1—11 黑龙江宁安县渤海国遗址出土唐代铁盔，盔用十二块铁片铆接而成（据实物写生），哈尔滨市博物馆收藏。



图1—12 三彩镇墓天王俑（据实物写生），洛阳市博物馆藏。



I—22 三彩天王俑，洛阳市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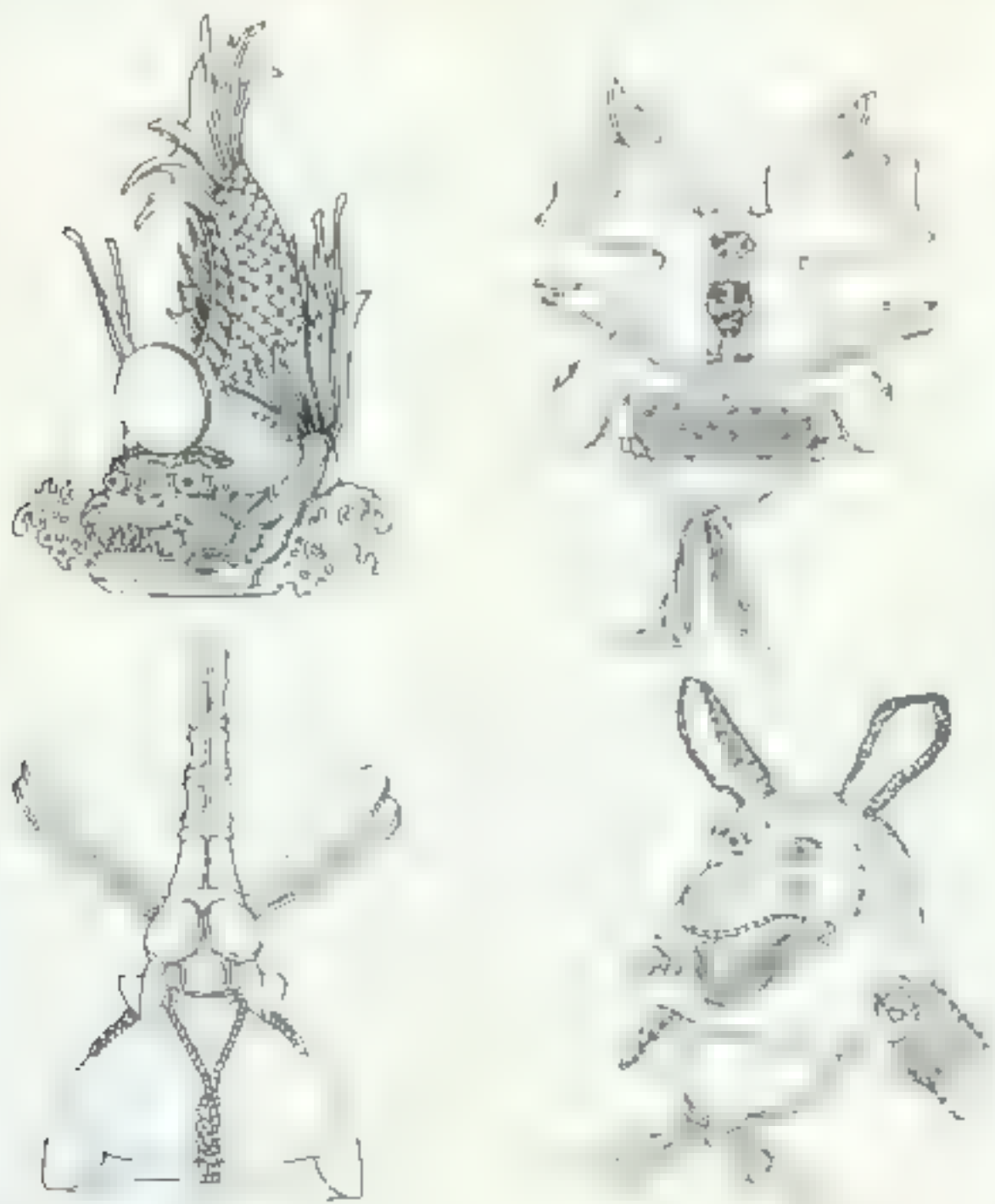


图 I—13 日本室町时期的大盔上左 鲛鱼形上右 蝶形下左 蜻蜓形下右，能头形摘自 [日] 笹间良彦著《日本甲冑图解词典》，雄山阁出版株式会社 1988 年 10 月出版。

上，而不见于同期的壁画、彩塑和雕刻作品这一现象来判断，可能与很多鼻子和角高高卷起的龙首状的护肩一样，是一种夸张的艺术装饰，实际上并不存在。

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有的可能，唐代与东南亚各国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我国古代的很多文化科学技术都是在这时传播到世界各国的，为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吸收运用，铠甲制造也如此。在日本古代铠甲的头盔中，就有很多是以动物作为盔顶装饰造型的（图 I—13）。因此，不能完全否定唐代鸟雀装饰的头盔的存在。

晚唐的盔顶开始用大朵红缨做装饰，盔的左右两侧、后脑部开始向下延伸至耳轮、髁骨下，两侧出现了凤翅形的装饰（参见彩图 I—11、13）。这种式样的盔和中期护颊、护项向上翻起的盔，后来流行于五代和宋朝，西夏、辽等朝也竞相模仿。

唐代还使用兽头盔。这种盔从图 I—14 的形象来看，好像是用野兽头骨、皮毛所制（前面可见兽脚，后面还拖了一条兽尾），内衬铁或皮帽衬，帽衬有时还与假面连成一体。假面是一种用薄金属制作的保护面部的面铠，在商代时就开始使用（图 I—15·①），北齐时代的歌舞《兰陵王》表演的就是兰陵王戴假面作战的故事。还有一种称作半面的面铠，这种面铠不罩住面部，只遮盖在前额和两颊。洛阳曾出土一件三彩武士俑，发表此俑的图册注解为戴假面武士俑（彩图 I—23），可笔者认为此俑所戴其实是半面。半面的实物目前还未发现，日本保存的很多面铠，可以给我们提供形象上的参考（图 I—15）。

唐代也使用马铠，但一般不是用于实战。从文字记载和形象资料所反映的情况来看，重装骑兵在隋末已逐渐退出战场，一系列反映唐初战争场面的石窟、墓室壁画和雕刻（如昭陵六骏），几乎看不到战马披铠的形象，只有在一些帝王墓室的随葬俑中，才能见到装饰华丽、贴金彩绘的骑甲俑。这些俑，数量大于墓主时的最为突出（图 I—16；彩图 I—24），这种具装可以明显看出是作为仪仗用的，而非使用的。古代皇家典礼中，用铠马作仪仗早已有之，魏晋时期的冬寿墓壁画



唐代

上就有这种场面的描绘(图I—17)。

唐代的戎服在初期也基本沿袭隋制,贞观以后,由于与边疆少数民族和世界各国的交往日多,受到外来文化习俗的影响,首先从宫廷、上层社会开始,形成一种“尚胡”的风气。《旧唐书·舆服志》说:“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饌,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故有范阳羯胡之乱,兆于好尚远矣。”这种风气自然也影响到军戎服饰。“安史之乱”以后,唐皇朝试图通过实行某些矫枉过正的变革措施来挽救政治上的颓势,重新对服饰等方面的制度做了一些新的规定,明令禁止了一些明显具有外来服饰影响的宫廷礼服,恢复了一部分古典传统服饰,但总体上还是保留了原有的风格特点。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武官制度全面建成的时期,因此唐代武官的服饰比过去历代更为完备,官服有朝服和常服之分,服用范围是朝廷九品以上的文武官员,朝服的形制参见彩图I—25。

常服在初唐时期仍然沿袭了隋代的平巾幘制,《新唐书·车服志》载:

平巾幘者,武官,卫官公事之服也。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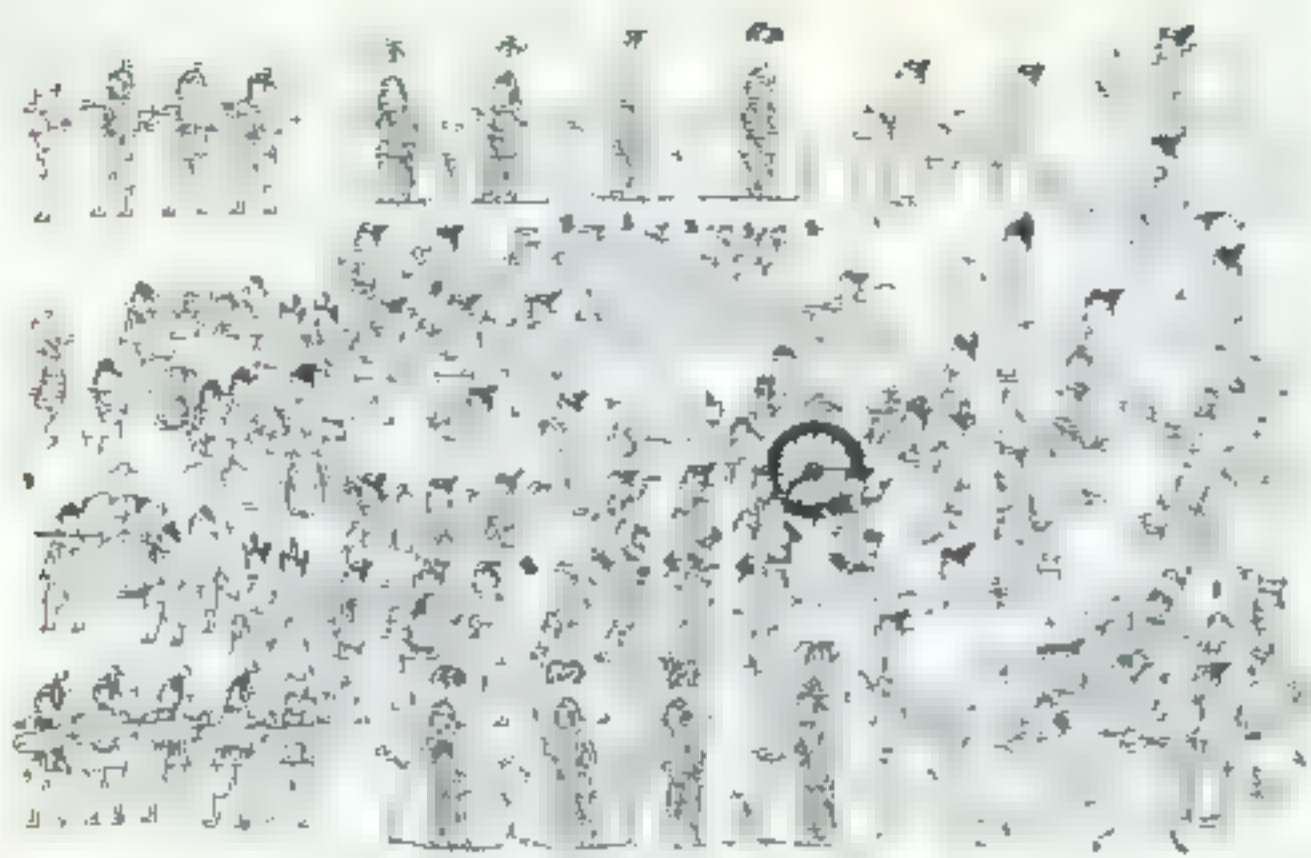
I—23 三彩武士俑,头部可以清楚地看出戴有半面,半面的式样与日本古代的半面很相似。河南洛阳唐墓出土,见《中国美术全集》雕塑卷



图I—14三彩镇墓武士俑正、侧背面(据实物写生),西安唐代艺术博物馆藏。



图I—15①商代青铜假面,陕西城周出土,故宫博物院藏。②日本的半面③浮世绘上戴半面的日本武士④⑤日本安土、桃山时代的铁假面摘自《日本甲冑图解词典》。



图I—17 朝鲜黄海北道安岳冬寿墓壁画《冬寿出行图》，录自《考古》1959年第1期。



图I—16 甲马武士俑（根据照片绘制），陕西咸阳底张湾唐墓出土，录自《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0期。此俑的人、马甲都好像是绢甲，甲上的虎纹应像汉代那样，是印染或绘上去的。



I—25 陕西乾县唐章怀太子墓壁画“礼宾图”从左至右，第一至第三人为唐代官员朝服形象，第四人为东罗马国使者，第五人为高句丽国使者。

饰，五品以上兼用玉，大口裤，乌皮鞋（即靴），白练裙、襦，起梁带。陪大仗，有裯裆、螭蛇。朝集从事、州县佐史、岳渎祝史、外州品子、庶民任掌事者服之，有绯褶、大口裤，紫附襦（襦相当于现今的袖套，形如臂甲）一文武官皆服之，其上襦裆、膝丸。……裯裆之制：一当胸，一当背，短袖覆膊。螭蛇之制：以锦为表，长八尺，中实以绵，象蛇形。

这里说的襦、褶，实际上就是裯裆衫，与隋代一样，裯裆衫外也可不披裯裆甲。这种常服制，至唐代中期仍继续使用。其中说的有短袖的裯裆和螭蛇，还未在至今所掌握的形象资料中发现或识别出来（参见图I—18；彩图I—26）。盛唐后期，开始出现一些变化，首先是平巾幘开始慢慢地变成高耸的大冠，冠顶两个外翻的圆角尚保留着一点平巾幘的遗像。贞元十五年（799）以后，因唐宗皇帝下诏废止裯褶制（指朝、常服，其余不），……（参见图I—19；彩图I—27、28）。

武官的专门戎服为缺胯衫，衫的形制与隋代



I—24 彩绘贴金骑马俑（据实物写生），陕西乾县懿德太子墓出土，陕西省博物馆藏。



唐代



图 I—27 唐建陵神道武臣石像，陵建于宝应元年(762)。



图 I—28 三彩武官俑 (据实物写生，出土地点不详)，冠上的金饰和玉珠饰与《新唐书·舆服志》所载相符，上海市博物馆藏

体的古深衣制的遗像。(参见图 I—20、22)

士兵的戎服有两种，一种是盘领窄袍，另一种就是缺胯袍。士兵的缺胯袍自然不会像军官那样绣有纹饰，盘领窄袍和南北朝、隋朝的襦袍有相似之处，但衣服下摆明显大于襦袍，左侧不开衣袂，衣和袖好像比缺胯衫更窄更紧，下着大口裤，头戴折上巾，唐代称幞头。(参见图 I—18、22)

幞头使用的范围在唐代时已扩大到军队，



图 I—20 左、中：唐永泰公主墓墓室右门、石棺椁线刻画，录自《文物》1964年第1期。中一人似为女服男装，这是唐代的时尚。右：西安王家坟唐唐安公主墓壁画男侍图，像上两侧开衩的情况画得十分清楚，录自《文物》1991年第9期。



图 I—21 唐画《纨扇仕女图》中人物



图1—22 唐李寿墓壁画四列戟图局部



1—29 陕西乾县唐李贤墓壁画，见《中国美术全集》墓室壁画专集

皇帝和文武百官、文人学士都喜欢戴这种冠饰。在整个唐代，幞头曾流行过多种不同的式样，《云麓漫钞》卷三云：

唐武德中，尚平头小样者，嗣圣二年见天临朝，以丝葛为之，以赐百官，呼为武家样。又有高头巾子，亦呼为武家诸王样巾子。景龙四年，内宴赐百官内样巾子，高而后隆，目为英王样巾子。明皇开元十四年，赐臣下内样巾子，圆其头是也。

这则记载告诉我们，从高祖至玄宗时期，先后出现了平头小样、武家诸王样、英王样和开元内样四种幞头。为了说明这四种幞头的差别，笔者根据各个时期的形象资料，列出对照图表（图1—23），供读者参考。开元以后，幞头的造型仍有一些小的变化，但区别已不甚明显，到了晚唐幞头已变成一种无须系裹、随时可戴的帽子。

在幞头发生变化的同时，幞头的系脚也在发生变化。唐初只是两条下垂的带子，盛唐时有的系脚下垂少许再上折搭于脑后，幞脚有的采用绢一类较软的材料制作，使其能随着人的活动而飘拂；有的用纱、罗等稍硬的材料制作，使其两脚微微分开像燕尾，形成一个固定的造型。晚唐时幞脚都用硬质材料（铁等）作骨架，使其向两边撑开，有时还微微上翘（参见图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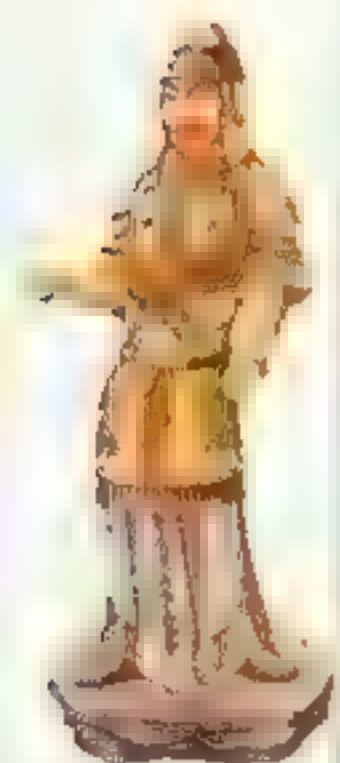
唐代的武士还时兴在幞头外包一块红色或白色的罗帕，称作“抹额”。《新唐书·娄师德传》载：“……后募猛士讨吐蕃，乃自奋戴红抹额来”，高宗假朝散大夫，使从军。”抹额的形象在李贤墓壁画上有所描绘（参见彩图1—29），推测其系裹方法当如图1—24。据《中华古今注》云：

昔禹王集诸侯于涂山之夕，忽大风雷震，云中甲马及九十一千余人，中有金甲及铁甲，不被甲者以红绡抹其首额，禹王问之，对曰：此抹额，益武士之首服。

似乎抹额的出现远远早于唐代，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其中明显带有后人述说神话的口吻。

唐代也出现过一些新的戎服，很多有关唐代的文献中经常提到的“短后衣”，就是其中之

年代 样式	段元哲墓俑 公元639年	独孤开远墓俑 公元642年	郑仁泰墓俑 公元664年	李爽墓俑 公元668年	吐鲁番铜画 公元676年	
平头小样						
年代 样式	懿德太子墓壁画 公元706年	斜干庭海墓俑 公元723年	巧思和里石像 公元723年	史丹墓俑 公元723年	苏思勖墓壁画 公元745年	
英一蹈样						
年代 样式	曹景林墓俑 公元782年	张旂墓俑 公元845年	何溢墓俑 公元850年	<p>图1—23 唐代幞头形象对照图表</p> <p>此图表参照了傅永年先生《关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年代的探讨》一文的附图，详见《文物》1978年第11期</p>		
升几内样						
年代 样式	李寿墓壁画 公元631年	李爽墓俑 公元668年	郑仁泰墓俑 公元664年	永泰公主墓 墓门线刻画 公元706年	永泰公主墓俑 公元706年	韦洞墓石刻线画 公元706年
武家诸上样						
年代 样式	张大千摹敦煌壁画 供养人像（年代不详）	敦煌220窟壁画 约公元907年前后	敦煌61窟壁画 公元907—960年	敦煌绢画 （年代不详）		
晚唐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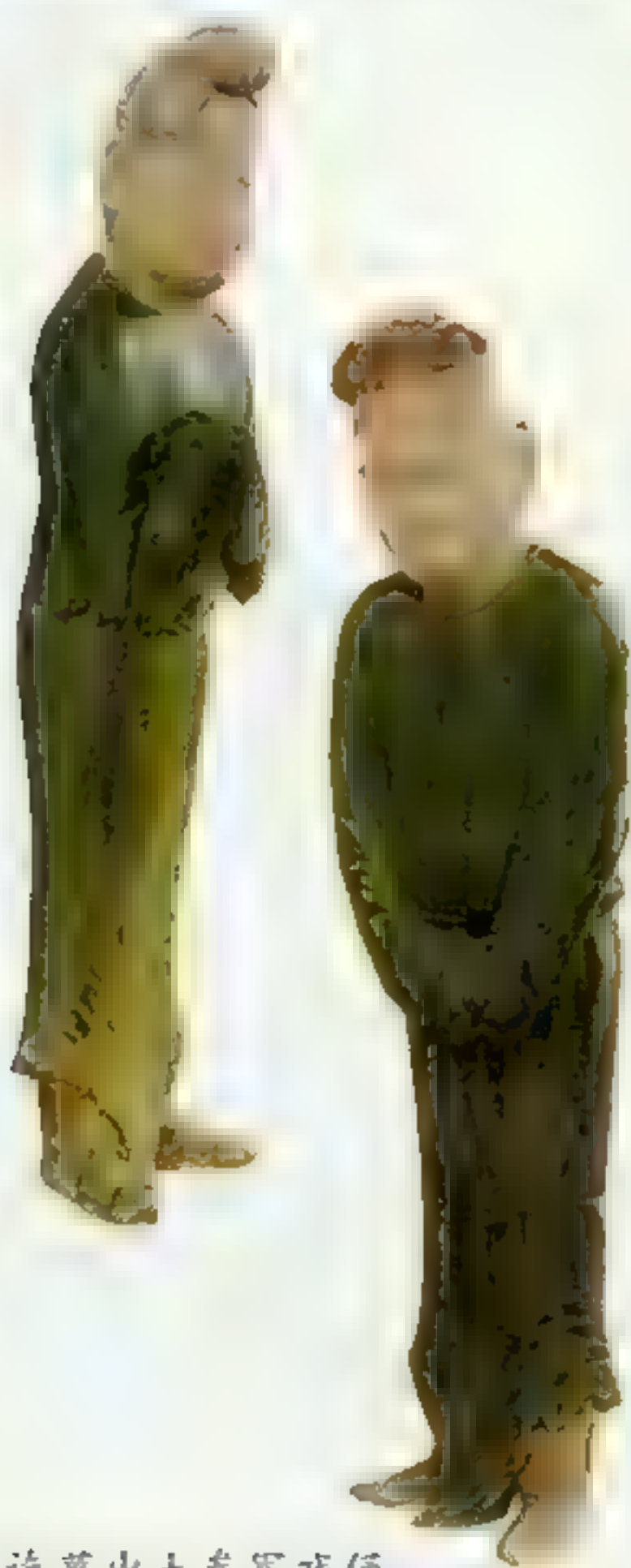


图 1—24 抹额的系裹方法示意图

[illegible]

在出土文献中，还有一种称作“半臂”的服装。《汉书·食货志》载：“晚甫又作，为半臂，同，白表，短袂衣，袖半臂、可半袖、半袖、半袖、半袖。”半臂又叫背子（《石林燕语》载：“予手书半臂，武王服。”），

据记载起自秦代，隋炀帝时后宫嫔妃好服，至唐代以后，军人武士也经常服用，其形象可参考西安长乐公主墓壁画“出行图”中之人物服饰（彩图I—33）。

唐代后期出现了一种后来称作“抱肚”的戎服附件，抱肚成半圆形围于腰间，初期一般都束于铠甲之外，其作用可能是为了防止腰间佩挂的武器与铁甲因碰击、磨擦而相互损坏，或发出响声影响军事行动。后来在戎服外也束抱肚，成为戎服的一种装饰，至元、明时仍使用，颇为时尚。唐代抱肚的式样参见图I—4；彩图I—11、12、34。

唐代无论男女尊卑、文臣武将，都好穿长靽短靽乌皮靴，靴头尖而起翘。但武官着朝服、常服时，也穿鞋头饰有尖头装饰的舄履或麻鞋，新疆吐鲁番曾出土了一双基本完好的唐代麻鞋（图I—25），这双鞋与唐道因法师碑上线刻武士像脚上的鞋（图I—26）极为相似。

唐代的革带吸收了少数民族的特点，在革带饰件——带铐下面的环上，装有一根根的小皮带，称作“鞞鞶带”，这种鞞鞶带是为了便于佩挂东西。唐代初期，鞞鞶带最高等级为十三铐，《新唐书·李靖传》载：“靖破萧铣时，所赐于闐玉带十三胯，七方六利（即圆），胯各附环，以金固之，所以佩物者。”由此可见，一根革带上有两种造型不同的铐，从出土实物来看，以方形为主，配以圆形、拱形（图I—28）。盛唐以后，铐下的环逐渐废去，鞞鞶小带直接穿



图I—25 新疆吐鲁番出土唐代麻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I—32 敦煌莫高窟159窟彩塑天王像（盛唐时期作品）



I—34 四川大足石刻第五窟毗沙门天王像



唐代



1—33 西安唐长乐公主墓壁画
出行图中人物，根据西安历史
博物馆复制品临摹。



唐代



图1—29 ①：西安韦洞墓石梓线刻中佩刀子人物。
②：日本正仓院藏唐沉香鞘把金银绘饰嵌珠玉刀子。
③：日本正仓院藏唐紺玉革带。带面髹黑漆，上缀紺玉（深青杂金红色的琉璃）方铐三块，圆铐七块，漆金带扣、铤尾。



图1—30 左：陕西乾县李贤墓壁画上佩鱼袋的武士；
右：敦煌莫高窟156窟晚唐壁画中佩鱼袋的官员

以金，四品以银，五品以铜。中宗初，罢龟袋，复给以鱼。郡王、嗣王亦佩金鱼袋。”（同上）开元时期，“百官赏绯、紫，必兼鱼袋，谓之章服”（《旧唐书·舆服志》）。后来还把鱼袋作为褒奖军功的赏赐，因此下级校尉佩鱼袋也很多。鱼袋的形象可参考图1—30。

唐代带铐的制作材料也有严格规定，《新唐书·车服志》载：“一品、二品铐以金，六品以上以犀，九品以上以银，庶人以铁。”革带的带面称鞞，鞞有时用锦帛包裹，有时髹油漆，初中期为黑鞞，唐末至五代改用红鞞。革带垂头的插法仍按隋制。

唐末，还出现了双带扣、双铤尾的革带，这种革带由长短两条腰带组成，最初只用一扣束铠甲，五代以后袍服外也开始束用（图1—31，彩图1—34）。

唐代戎服的色彩，前文已多涉及，一般以黑、红、白、紫为主；盛唐时期的绢甲则五彩斑斓，色彩艳丽。武官的常服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深紫，五品服紫，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青，十品服黑。武则天时期，紫色乱紫，改为八、九品着碧。黄色在唐高宗乾封年以前的历朝服饰中，并不是皇帝的专用色，从总章元年起，才禁止官民一律不许穿黄。铠甲则以金、银、黑色为主，这可以从很多贴金涂银的彩绘俑（包括敦煌等地的唐代彩塑）上得到证实。唐代的鍍金、贴金、包金等金属装饰工艺闻名遐迩，这对于装饰铠甲应是绰绰有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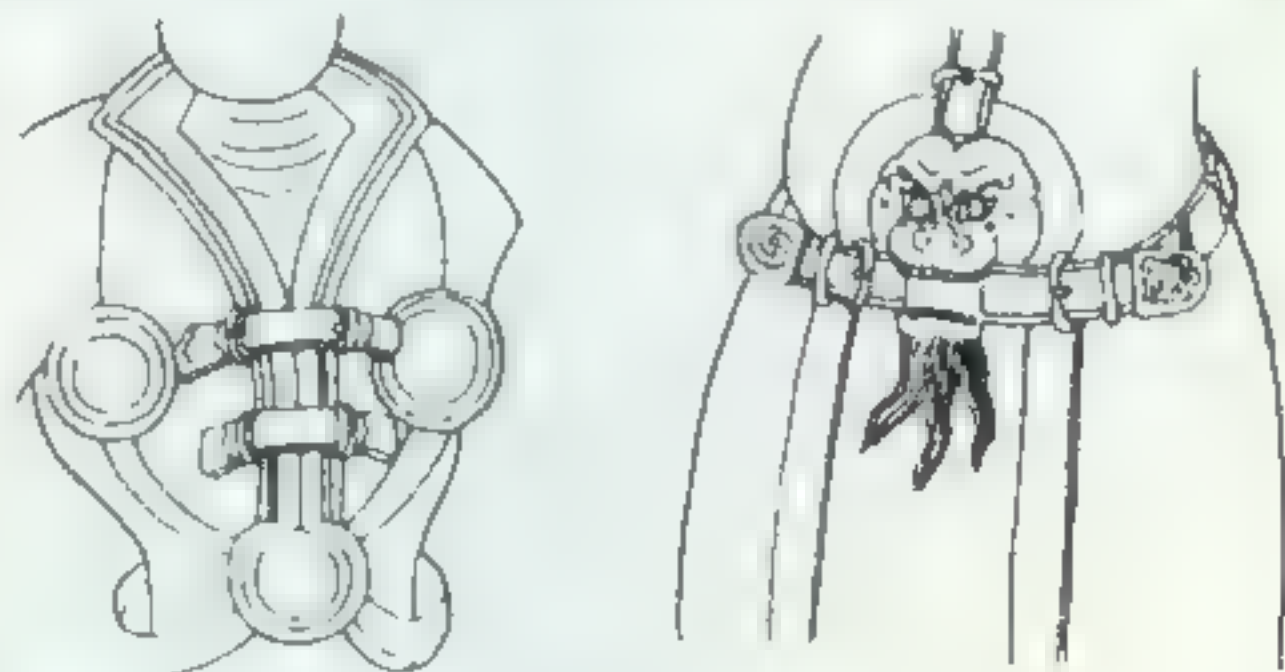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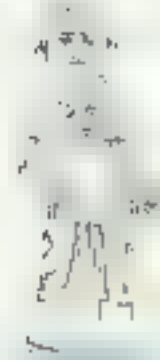


图1—31 左：敦煌莫高窟154窟中唐壁画毗沙门天王像中的双带扣、双铤尾带。右：日本教王护国寺毗沙门天王像上的双带扣、双铤尾腰带。

唐代武士复原图

铠甲根据郑仁泰墓、洛阳等地出土陶俑、三彩墓俑以及敦煌、炳灵寺彩塑天王像复原、设计；胄根据黑龙江宁安县出土实物复原；戎服根据陕西三原唐李寿墓壁画形象复原；革带根据辽宁朝阳唐墓出土实物复原；佩剑采用日本正仓院藏唐样大刀实物形象。





十 五 国 代

五代时期武士复原图

甲冑根据成都王建墓石刻银饰片上的形象复原；戎服根据福建王审知墓出土陶俑、敦煌壁画上的形象复原。革带根据王建墓出土实物、参照该墓石刻和敦煌壁画上的形象复原；兵器根据敦煌壁画和王建墓出土的银饰片上的形象复原。





图 J—1 四川成都前蜀王建墓石棺周围的石刻力士像
上：玄武，石棺西面第三尊 中：天后，石棺西面第一尊 下：同中，为天后的背面 石棺四周一共有十二尊石像，均为半身，成都王建墓博物馆藏

五代十国

(公元 907 年—公元 960 年)

五代十国，从唐末南唐建立后兴起，前后约五十年，这期间政权更迭，朝令夕改，绝大部分朝代是由皇帝从各地的封疆大吏建立起来，因此在服饰等方面基本上沿袭唐制。

铠甲方面，唐末五代比较集中的是四川、南京、在津等地出土的义袍和教型铠甲，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南唐、南唐等，铠甲的式样基本沿袭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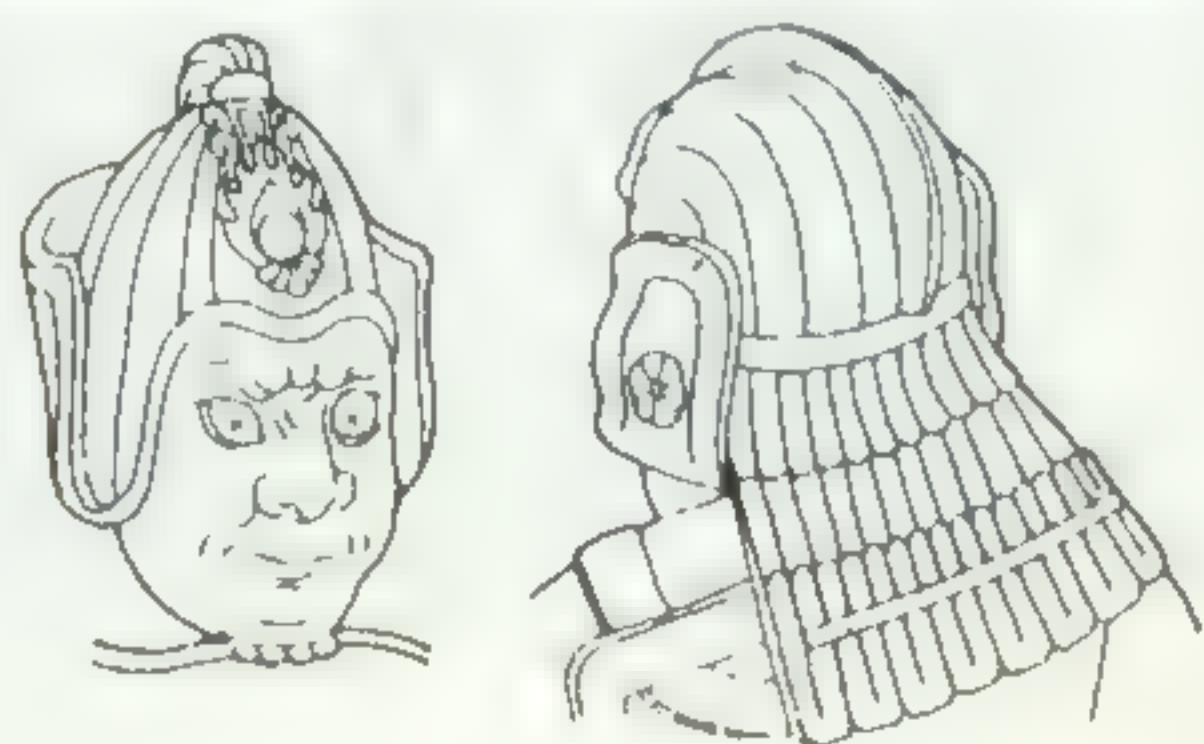
明光甲这时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铠甲重又全用甲片编制，形制上变成两件套装。从前线出土的石棺周围的石雕像上可以看出，披膊与护肩连成一件，像嵌肩一样套在肩上；背甲与胸甲连成一件，以两根肩带前后系紧，套在披膊之上。这种铠甲的式样，与唐代的铠甲有相似之处，但一件的胸背部分如用铁甲编制，另一件的胸背甲则用皮革或布帛制作，这种铠甲仍用铁甲编制（图 J—1、2）。有记载说，五代十国时期，铠甲的式样基本沿袭唐制，盖上有四件武士像，这种铠甲的式样，与唐代的铠甲有相似之处（图 J—3）。这种两件套形制的铠甲，是晚唐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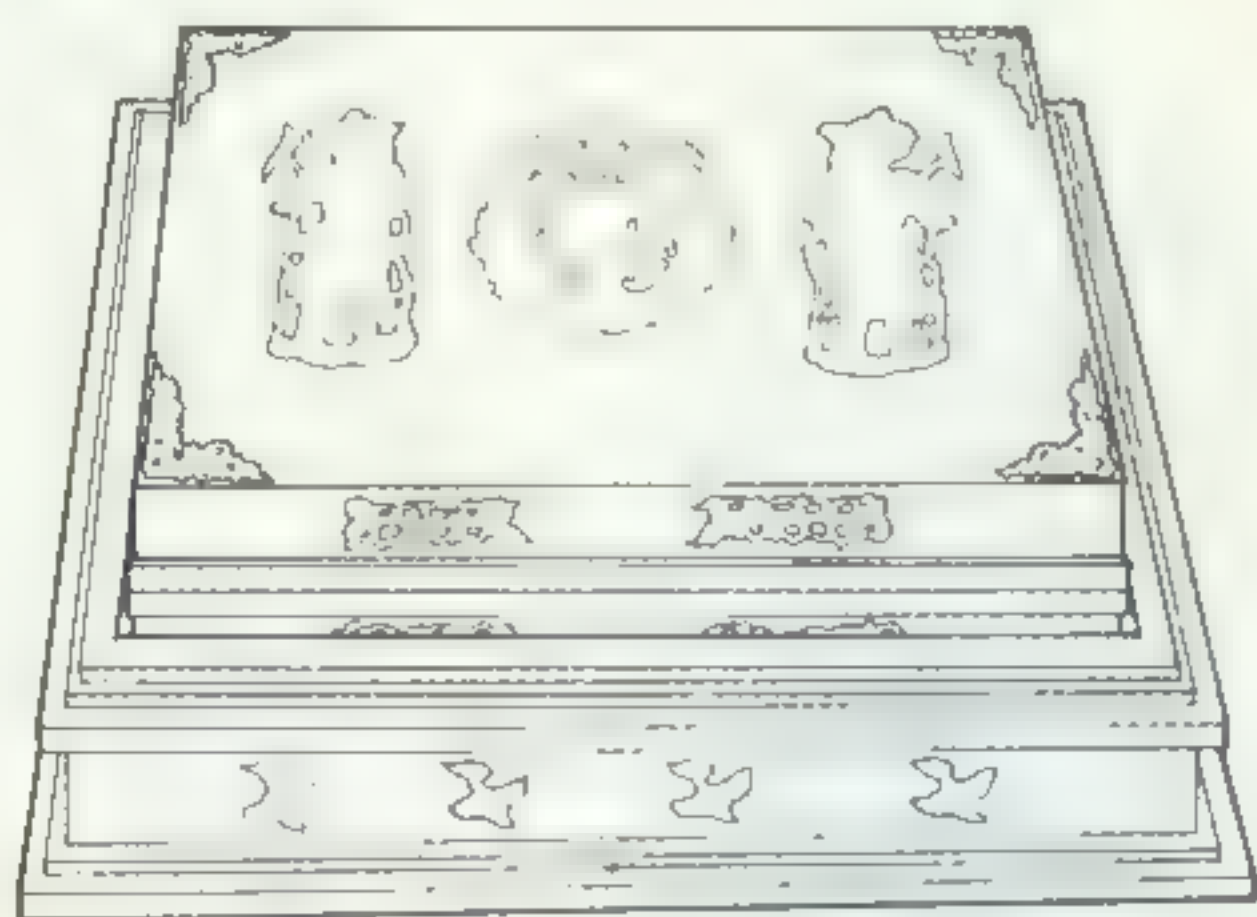
图 J—2 石雕力士像与石棺床的情况

来出现的又一种新式样。保护腹部的圆腹甲，有的钉缀在外件甲衣上，有的用皮带另外束上（参见图J—3）。腿裙与初、盛唐时期相比已明显加长，一般要掩至膝下，因前后开衩而成为左、右两片。腿裙的这种形制一直到铠甲被废除之前，也没有再改变。铠甲的甲片除了长方形之外，主要是山纹和细鳞形。纵向勒甲索已不使用，而改为在胸部用丝或帛带横束（参见图J—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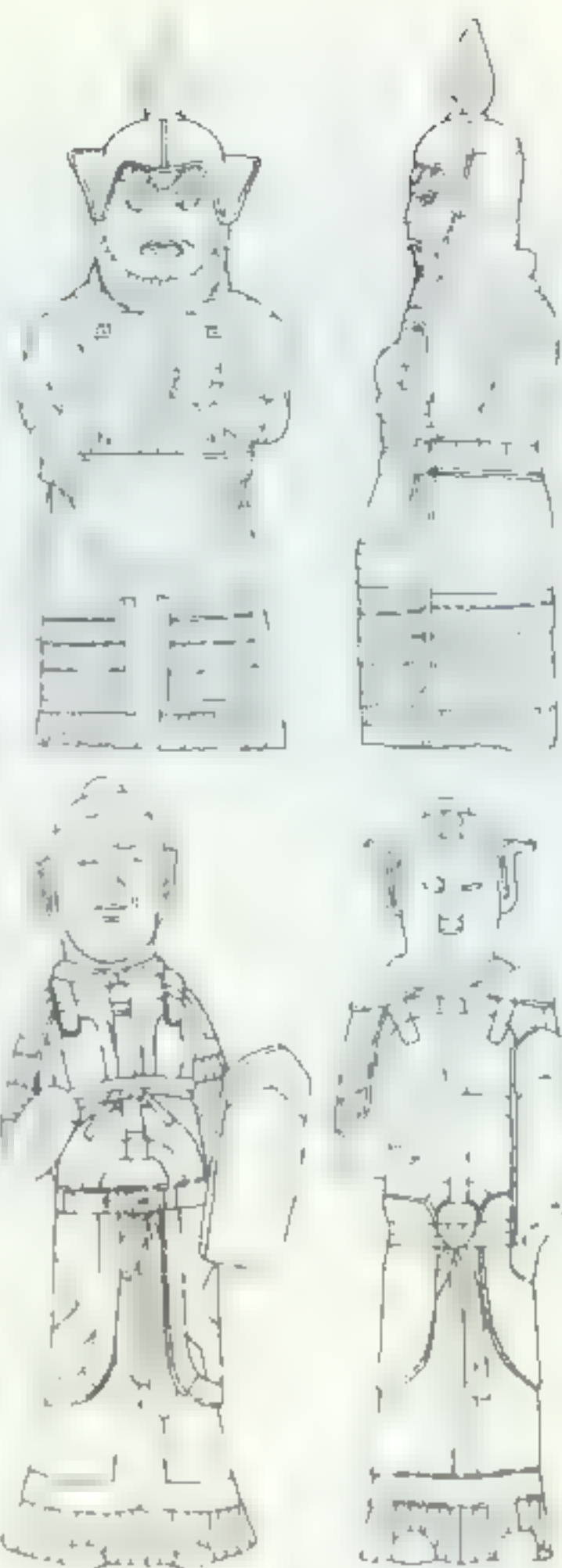
唐末以来，引起铠甲腿裙加长的直接原因是马具的进一步完善后，骑兵的战斗能力加强了，从而对骑兵的保护要求，也更高了。自魏晋时期出现全副马具以后，经过隋唐的不断改进，马鞍的结构已日趋完美，马镫也早已成为双镫，战士骑在马上可以脚踩双镫，不仅容易保持身体平衡，而且能脱出双手，左右开弓、随心所欲地使



图J—5 王建墓石刻原大盔甲部图



图J—3 左 成都王建墓出土的宝盖。用于收藏唐朝册封蜀王的宝盖，分内外二层，图上外层的宝盖盖已去掉没有画上，武士银饰片即是钉在盖盖上的。内、外层各二枚。中 内层宝盖盖银武士饰片右：外层宝盖盖银武士饰片



图J—4上：福建闽王王审知夫妇墓出土武士俑，此俑身上的铠甲已与后来宋代的铠甲基本上完全相同了。录自《文物》1991年第5期。下：江苏江宁南唐李昇墓出土陶武士俑，左一俑的胸甲好像还保留着唐代明光甲的式样，录自《南唐二陵》文物出版社1957年出版。





J—1 敦煌莫高窟 346 窟南壁射手图，射手腰带前的圆型带铐，曾有隋代实物出土。



J—2 敦煌莫高窟 261 窟彩塑天王像

用兵器。这样一来，敌我双方都能骑着马进行比较复杂的战斗，在马上使用兵器的武术也就迅速发展起来。作战方法的改变，使身体的任何暴露部分都可能受到伤害，于是要求铠甲尽可能地扩大遮盖面积，事实上不仅是腿裙，披膊也加宽加长了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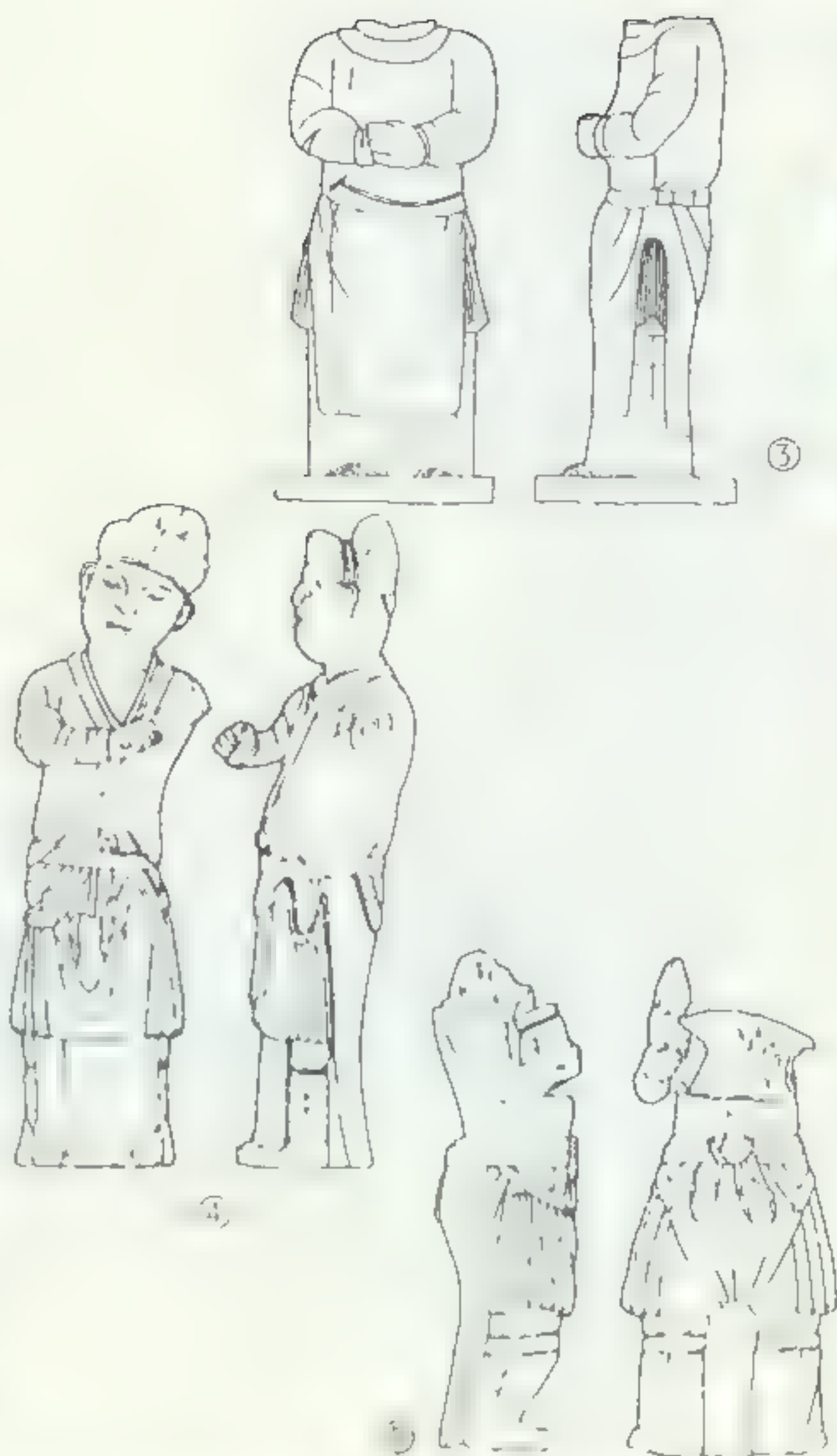
唐代时期也继续使用皮甲，从敦煌 261 窟彩塑的形象来看，皮甲好像都是用大块的皮革制成。这种大块的皮甲与初唐时期 322 窟彩塑天王像的甲很相似（参见唐代彩图 I—15），但大块的皮甲与南北朝时期而精致的皮甲片不仅不能吻合，而且相差甚远。敦煌彩塑的塑造手法都很写实，若是南北朝、隋代所塑造出来（同是 322 窟的天王像，腿部和颈项的甲片就刻划得很清楚），因此有人曾作另外的解释，即根本不是皮甲，而是铁甲片或铁甲片。相对而言，把镇国寺天王像的甲片作为皮甲更为可信，虽然据有关资料证实，镇国寺天王像曾多次被修塑过，原来的风貌已失去许多（参见《文物》杂志 1954 年第 11 期曹寿等《两年来山西省新发现的古建筑》一文），但服饰的各部分大结构是不可能被改变的，所以它仍具有参考的价值（彩图 I—2、3）。



J—3 山西平遥镇国寺万佛殿彩塑天王像



图J—6①敦煌莫高窟第61窟西壁壁画“五台山图”：河东道山门西南“巡道军士”图。②敦煌220窟甬道北壁供养人像。③福建闽王王审知墓出土残仆俑（因是侍从俑，原来手中可能还持有兵器）。④同墓出土的仆俑。此俑身上的缺胯衫好像是短袖。⑤同墓出土的仆俑，此俑上身残，好像是赤膊，手上捧的好像是靴。上衣脱下折起后，用双袖系在腰间，衣身前后摆一兜住裆下，一披在臂后，其穿衣方法甚为奇特。③④⑤俑均录自《文物》1991年第5期。



兜鍪、盔也沿袭盛唐以后的形制，基本分为两种：一种是晚唐时期顿项向上翻卷的式样（有的只有两侧护耳翻起），另一种是顿项披垂的式样。披垂的顿项有时分成三片，左右两片较窄，后面一片较宽；有时只有脑后一片，披垂的顿项都是用甲片编制的（参见图J—1、3、4、5）。图J—2的顿项则属于个别现象，看上去完全像纺纺品，这或许更能旁证其身上的绢甲。兜鍪、盔的正面沿口，出现比较宽的盔檐，中间部位镶以各种饰品，眉心处仍像唐代一样伸出保护眉心的锐角。顶上一概饰以红缨（或其他颜色），缨有二种装法：一种竖直向上，另一种披垂于脑后，有的还保留着隋代的盔脊和唐初的半圆形胄顶（参见图J—1、4、5；彩图J—4）。

五代时期的戎服也一如唐制，武官和士兵一般都戴幞头，服缺胯衫。士兵的缺胯衫比唐代的



J—4 江苏江宁南唐李昇墓墓门石刻守陵武士像

稍短，武官的仍保持了唐中期的长度，衣衫的下摆后面比前面稍长一截，与唐代短后衣正相反。袖有宽窄两种，以窄袖为多；领也分为盘领、交领；两侧的衣衩开到腰际，特意露出一截内衬的短衫作为装饰。侍从或士兵为便于行动，有时还将前衣摆提起，揷在腰带内。下穿裤，裤口较小，接近于现代的直统裤。足穿长靴或履，靴头有的平，有的尖而起翘（参见图J—6①、②、③、④）。除缺胯衫外，还有一种交领短袖衫，是否属缺胯衫的一种，尚不能最后肯定。穿这种短袖衫时，前衣下摆要兜住裆下，服上这种服饰的可能是最底层的侍役、杂务人员（参见图J—6⑤）。

五代时期变化最多的是幞头的脚。《幞府燕闲录》说：

五代帝王多裹朝天幞头，二脚上翘，四方僭位之主各创新样，或翘上而反折于下，或如团扇、蕉叶之状合抱于前。伪孟蜀始以漆纱为之，湖南马希范二脚左右长丈余，谓之龙角，人或误触之，则终日头痛。至刘汉祖始任晋为并州衙校，裹幞头脚左右长尺余，横直之不复上翘，迄今（宋）不改其制。这里所说的都是幞头的造型。朝天幞头脚始于唐末（参见图J—7⑤），合抱于前者辽、金时仍使用，而马希范所创，后来成了宋代皇帝的常服冠（参见图J—7④；彩图J—5）。据记载，这时期的幞脚往往还镶嵌珠宝作为装饰，武将所戴亦如此。

不仅是幞脚，幞头的造型也有变化。唐后期幞头千变万化，顶与巾子两部分的差别已不甚明显，使人象一顶圆锥形高帽。晚唐起两部分差别重又明显起来，至五代，往往习惯用桐木等把幞头的正面撑得有楞有角，在幞顶和巾子之间，用带，有时还裹上小木棍（或其他材料的小棒），紧紧压住幞顶，使隆起的巾子垂直向上。这样的幞头从正、侧面看，都是方方正正的了（参见图J—7①、②、③）。

抱肚在这时广泛流行起来，但一般仍束于铠甲外，戎服外还不使用。抱肚很长，大都要垂至

膝下，外形也有所改变，唐代S形缘已经过时，方形圆角开始流行（参见图J—4、8；彩图J—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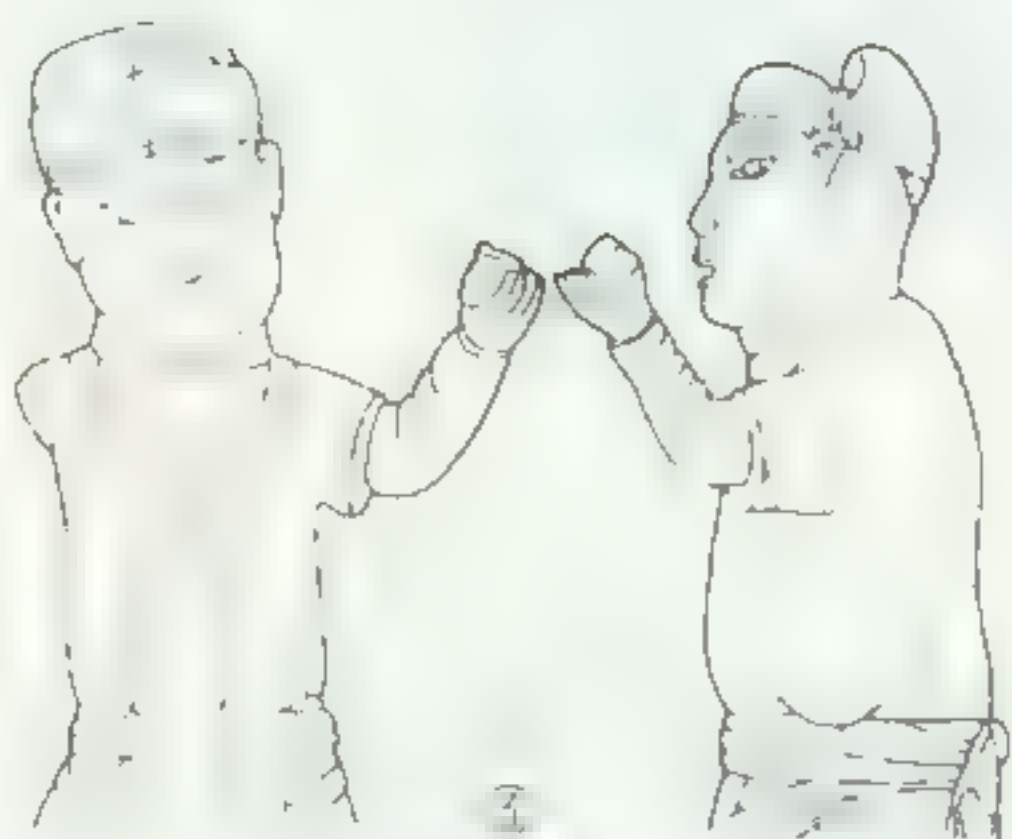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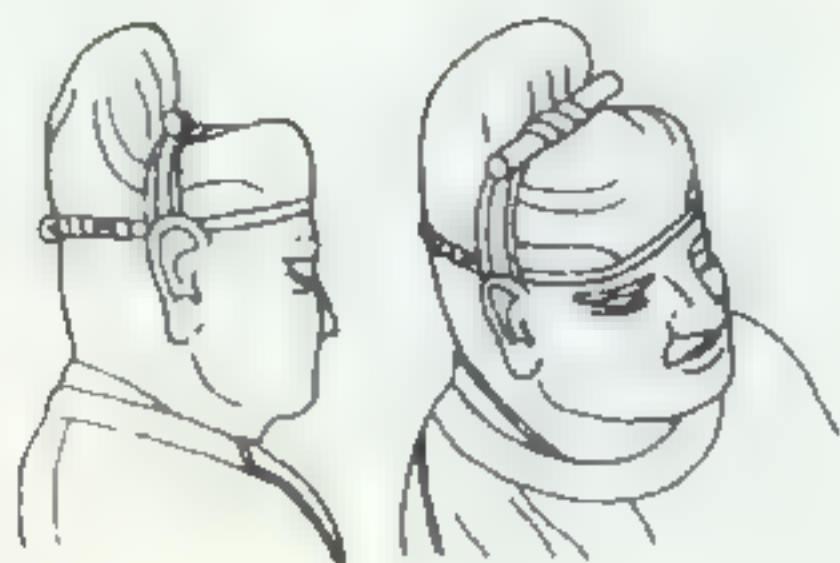
唐末，铠甲的护项逐渐被取消，继而代之的是在颈间系肩巾。五代开始大量使用肩巾，一般以锦帛为之。系肩巾除了能使颈部保暖防尘外，主要可能还是为了装饰。这种装饰，在宋元明等朝更为流行（图J—8）。

五代时期使用最普遍的腰带有两种：一种是唐末出现的双带扣、双钗尾腰带；另一种是双带扣、单钗尾腰带。王建墓出土的一条玉大带，就是此类型的腰带，在当时似乎是帝王勋贵使用的。这一时期的敦煌壁画上的供养人像，好像都束这种带（参见图J—6②），它的最大优点是不插带尾。王建墓的玉大带曾由专家进行复原并制作了复制品，这件复制腰带如束于腰间，带钗



J—5 托西大王曹议金供养像，见《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四川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6月出版。曹议金的幞头直脚中间细、两头宽，角圆形，不同于宋代的粗细一致、方头，两侍从的幞头为合抱于前的式样。





图J—7 ①四 成都王建墓出土的王建石象原 据照片绘制，王建墓博物馆藏 ②王建石象大部的侧府、侧背面形象 ③福建周王王审知墓出土陶俑，较大形象与王建象基本相同，来自《文物》1991年第5期 ④宋嘉定年间刻本《天竺灵签》木刻插图，人物所戴为直脚幞头 ⑤《斗鸡图》中人物，顾闳中作，图上所戴为冲天幞头



图 J—8 江苏江宁南唐李昇墓出土武士俑



图 J—9 左：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供养像，张大千临摹，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此像腰间佩挂的饰物，可能是鱼袋。从唐至宋代的鱼袋实物至今没有发表过，判定为是鱼袋的形象都是根据文字资料推测的，这幅像中的鱼袋，很可能是唐宋之间的一种新式样。右：敦煌第146窟窟顶壁画，中西北角北方天王旁持伞力士像。

都在背后，这与墓内石棺旁的石雕力士和王建石像所系腰带的情况相符（参见彩图J—7；图J—2）。但从敦煌壁画上的形象来看，有的带铐装饰在腰带正面（彩图J—1），有的则在左右两侧和后背，空出腹部中间一段不装带铐（参见图J—6②；图J—9）。据此，笔者设计出一种新的复原方法，供参考和讨论（图J—10）。



图 J—10 带铐在后背，双带扣在腰两侧的单蛇尾腰带复原图。



J—6 王建墓出土玉大带蛇尾，王建墓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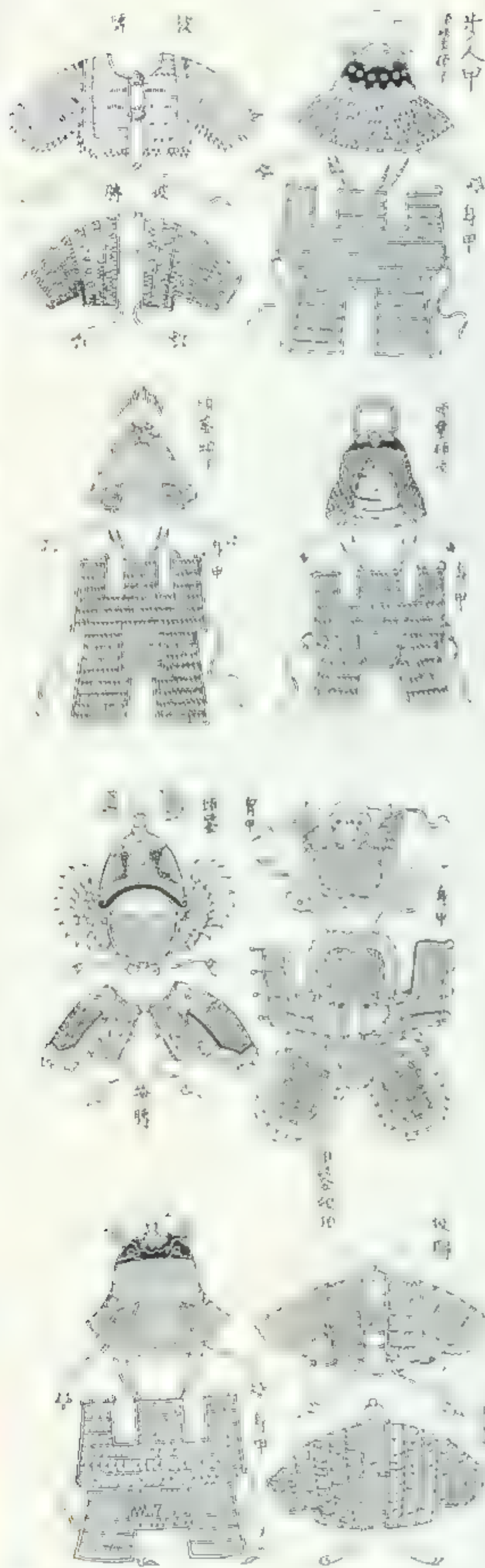


J—7 王建墓出土玉大带复原制品

宋代武士复原图

铠甲根据河南巩县宋陵石刻、山西运城关帝庙石刻、四川广元宋墓石刻、山西太原晋祠铁铸像、四川彭山庾公著墓壁画等形象复原；胄根据山东郯城宋墓出土实物和《武经总要》上的插图形象复原；戎服根据河北定县静志寺出土鎏金天王像、宋人绘《薛仁贵像》、四川广元宋墓石刻和四川安定毗卢寺石刻等形象复原；革带根据宋人石刻、嵩山中岳庙铁铸像上的形象和江苏武进等地宋墓出土带具实物复原。兵器采用传世实物“李纲钢”和杭州岳王庙陈列兵器实物形象。





图K—1《武经总要》甲冑插图，录自郑振铎编《中国古代版画丛刊》。

宋代

(公元 960 年——公元 1279 年)

后周大将赵匡胤利用柴世宗早逝、率军出征的良机，发动陈桥驿兵变，建立了北宋皇朝。出于统一战争的需要，他十分重视军队建设和军备生产。他的“旬课”措施（每十日一次亲自校阅首都皇家南、北作坊制造的各种军事装备），极大地促进了铠甲等兵器制造技术的提高，使北宋初年的“戎具精劲，近古未有”（《文献通考》卷一六一）。但晚唐以来武将骄横日滋、拥兵割据的弊病和宋太祖自己夺取皇位的事实，促使宋皇朝制定出一整套以文制武、兵权分立的措施。这些措施被奉为宋室治军的家法而代代相传，一开始颇有实效，但经过后来几位庸帝的滥意发挥，使北宋军队出现了冗兵、积弱和对外战争每战必败的严重局面。公元1127年，北宋皇朝终于蒙受“靖康之难”而被迫逃亡。

南渡以后，南宋小朝廷也一直处于孱弱状态，以宋高宗为首的主和派抱着偏安一隅的心理，极力阻挠军队和人民的抗金斗争，甚至不惜纳币称臣，以杀害岳飞和解除主要抗金将领的兵权为交换条件，与金签订屈辱的和约。因此南宋一朝根本无心顾及军备生产，铠甲制造处于落后停滞状

造成铠甲生产停滞的另一重要原因，是火器的发明。北宋初炼丹家发明的火药，很快被制成火器开始用于战争，虽然这些火器的杀伤力在当时还很有限，但却使军事家们看到了它的发展前景。经过不断改进，南宋时火器威力已有很大提高，这就使人们认识到铠甲在战争中的防御作用已越来越小，尽管以后还使用了数百年，但它已不像从前那样受到重视了。

有关宋代的铠甲资料较为丰富，既有史料书籍的文字记载，也有很多形象资料，但实物资料却几乎没有。

北宋初年的铠甲，据《宋史·兵志》记载，有金装甲、长短齐头甲、连锁甲、锁子甲、黑漆顺水山字铁甲、明光细网甲等多种铁甲；还有一种以皮革作甲片，上附薄铜或铁片制成的重量较轻的软甲。当时专门从事铠甲制造的东、西作坊把



铠甲制造的过程分成五十一道工序，对铠甲各个部件的甲片叶数、重量都有明确规定，使铠甲生产走向规范化。正因为如此，目前全国各地发现的宋代文物上的铠甲形制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成书于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的《武经总要》，是我国一部记述有关军事组织、制度、战略战术和武器制造等情况的重要军事著作，其中刊录的五领铠甲的插图，是宋代铠甲形制的第一手材料（图K—1）。

这五领甲冑中，第一领看来是将帅用甲，另四领为一般军官和士兵用甲。从图上可以明显看出，甲身的胸、腹甲和腿裙、鹤尾连成一体，展开时形成一个平面，背甲分成左右两片，在中旬用纽扣或布带束扣。胸甲上缘有两根肩带以连接背甲，这是五代以来的两件套铠甲，披膊和护肩作为另一件的形象在这里表现得更为清楚和容易理解。

立体形象资料首推河南巩县宋陵石刻，巩县宋陵葬有北宋太祖至哲宗七个皇帝，每皇帝墓前都有数量相同的石刻造像，原样制作的铠甲武士全都是顶盔贯甲，手持金钺，雕刻手法传神、写实。彩图K—1、2、3分别是永熙陵（太



K—2 河南巩县回郭镇陵区永裕陵镇陵将军像



K—1 河南巩县西村陵区永熙陵镇陵将军像



K—3 河南巩县孝义陵区永昭陵镇陵将军像



图K—2 山西太原晋祠北宋铸铁像 据实物写生

宗赵光义墓)、永昭陵(仁宗赵祯墓)、永裕陵(神宗赵顼墓)前的镇陵将军,这些石刻成于公元997年——1085年。从这些石像身上的铠甲可以看出,在前后约90年的时间里,形制没有什么变化,与五代时期相对照,永熙陵武士的兜鍪、前额的装饰、顶上红缨的装法与王建墓力士像的基本相同(参见五代图J—1)。只有顿项的式样不同,永熙陵、永裕陵顿项的护颊、护项连成一体,披垂下来后覆盖了整个肩部,用带在颌下系结,这种顿项起到了护项和护肩的双重作用。披膊披挂于身甲之外,胸甲有的是大块甲片的(彩图K—1),也有用与身甲相同的小甲片编成的,背甲则一律是小甲片编成(彩图K—2、3)。

永昭陵、永裕陵镇陵将军的兜鍪两侧还出现了凤翅形的装饰,缨饰向上竖起,胸甲前有兽面铁护。这些石像的年代与《武经总要》成书的年代较近,如果把石像与插图两相对照,可以发现很多的相同之处。与《武经总要》的插图更接近



K—4 山西运城关帝陵石刻半身武士像(据照片绘制),关帝陵博物馆藏。



K—5 成都东郊三〇八厂出土三彩武士俑(据实物写生),成都市博物馆藏。



K—6 陕西勉县老道寺出土红陶武士俑（据实物写生），西安历史博物馆藏。

（彩图K—4、图K—2），虽然一是半身，一有残缺，但留存的铠甲部分塑造得都十分细致，使我们能清楚地观察到各个部分的结构。处于北宋后期的永昭陵镇陵将军的铠甲，除了兜鍪的顿项变小，正面不再合拢系束颌下外，其余各部结构一如旧制。

综合上述石刻、铸像，加上成都东郊、勉县老道寺出土的两件陶俑的铠甲形象（彩图K—5、6）可以发现，北宋铠甲基本沿袭了五代时的形制。只有披膊的结构和穿戴方法有时略有不同。至于束甲，除了少数仍用皮带外（参见彩图K—1），一般都如五代时期，用丝带或帛带横束。

南宋时的铠甲也还是上述形制（图K—3①②；彩图K—7），首铠出现了形如凉帽的盔，山东郯城曾出土了一件铜制的，式样与虞公著墓壁画的武士头盔很接近（图K—3③）。从此时盔还用铜铸这一点，似乎可以看出南宋时期铠甲生产的落后和不受重视。



K—7 成都龙泉驿西河公社南宋墓出土三彩武士俑（据实物写生），成都市博物馆藏。



图K—3 ①贵州遵义永安乡南宋杨聚墓墓门石刻武士像，《中国美术全集》雕刻专集。②四川彭山虞公著墓壁画，录自《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③山东郯城出土南宋铜盔，铜盔檐口铸有“宝祐四年吉日翼”七字铭文，“宝祐”系南宋理宗赵昀的年号，宝祐四年为公元1256年。



图K—5上:《武经总要》马甲插图, 录自《中国古代版画丛刊》。下: 根据《武经总要》马甲插图所作的宋代马甲复原图(供参考)



图K—4 四) 元宋墓墓室石刻
左 西室西壁女武士像 右 西室
东壁女武士像 录自《文物》1982
年第6期 (根据照片绘制)



K—12 河南巩县回郭
镇陵区永裕陵神道武
官石刻像

宋代，一品官戴“犀角冠”，元丰后改为七、八、五、四、三、二、一等，七等冠为三品官所戴，以后官阶数不再增加，而是在冠上加簪巾（与唐代不同，唐代加簪巾即可，参见唐代图版I—28）。从石像上看，宋初的冠不很突出，所以不容易看出等级数，因此，以后逐渐增高，等级数就明显地显示出来了（参见图版K—11、12）。戴并齐发髻，上用斜罗布及髻网之（髻一般用玳瑁、犀角做成），下用布带系之，布带、冠体皆以金根。

口常开，吐舌伸舌，又有多时闭口，吐出唾液有
臭味，如臭鸡蛋、臭肉、臭、牛粪、甜花、烂草等味。
图 14

朝服是：上穿朝衣，不称衣冠，只称朝服。朝衣，为计袖长中（对袖），下穿朱裳（裙），左衽交领，腰间系有带（一般为唐代所始），朝服常以散髻（即披发）（对图10）。朝服上也有变化，如袖用布缚束于腋下（参见彩图X-1），唐代以后，散髻上。朝服的领上还有“朝服”二字，如作“朝服”二字，据记载是从隋代开始使用，但唐代所穿朝服上都有



K—14 宋范仲淹像 明人（佚名）作，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K—13河南巩县回郭镇陵
区永昭陵神道武官石刻像



图K—6 永定陵神道武官石刻象，河南巩县芝田陵区。

没有发现这件饰品。这种曲领是用硬质材料制成，套在领间用于压住衣领不使隆起的。穿朝服时，脚上则穿舄，形制与隋唐时基本相同（参见彩图K—11、12）。

公服是武官的戎服之一，为交领、盘领袍，大袖，一侧开衩，袍的下缘膝盖下有横裰，袍长至脚背（图K—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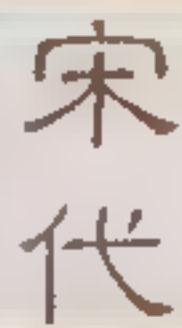
武官还服用一种一般军校都用的戎服窄袍，窄袍即缺胯袍，小袖，两侧开衩，盘领，其长短时有变化，长的至脚背，短的不过膝，一般则在膝下离地一尺。通常如在军中，袍服外还束抱肚，这种袍服“便坐视事则服之”（《宋史·舆服志》），为平时使用最多的服饰。裤为小口裤，足穿皮靴或履，靴头圆而平直，大部分不起翘，头上“皆皂纱折上巾”（同上，图K—7）。

士兵的戎服也是缺胯袍，袍的形制与武官的窄袍基本相同，两侧衣袂像五代时那样开得很高，有时也将衣袍下摆提起塞入腰带内，穿小口裤，脚上一般都穿履或草鞋，头上也戴幞头（图K—8）。



图K—7 左：江西乐平县北宋壁画墓壁画仪卫武士图，录自《文物》1989年第10期。中、右：南宋绘画《中兴四将图》中侍卫将校，《中国美术全集》两宋绘画专集。





宋代

宋代

宋代



图K—9①山西太原晋祠铁人铸像。②嵩山中岳庙兵库铁人铸像。③河南方城宋墓出土施彩石雕俑(据照片绘制),《中国美术全集》历代雕塑专集。④宋画《却坐图》中侍卫。





图K—11 永定陵客省使石刻像，河南巩县芝田陵区



图K—13《凌烟阁功臣图·薛仁贵像》，宋人绘，画中虽是唐代人物，但服饰都用宋制。



图K—12《骑射图》中人物，宋人绘，录自《中国古代兵器图集》，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9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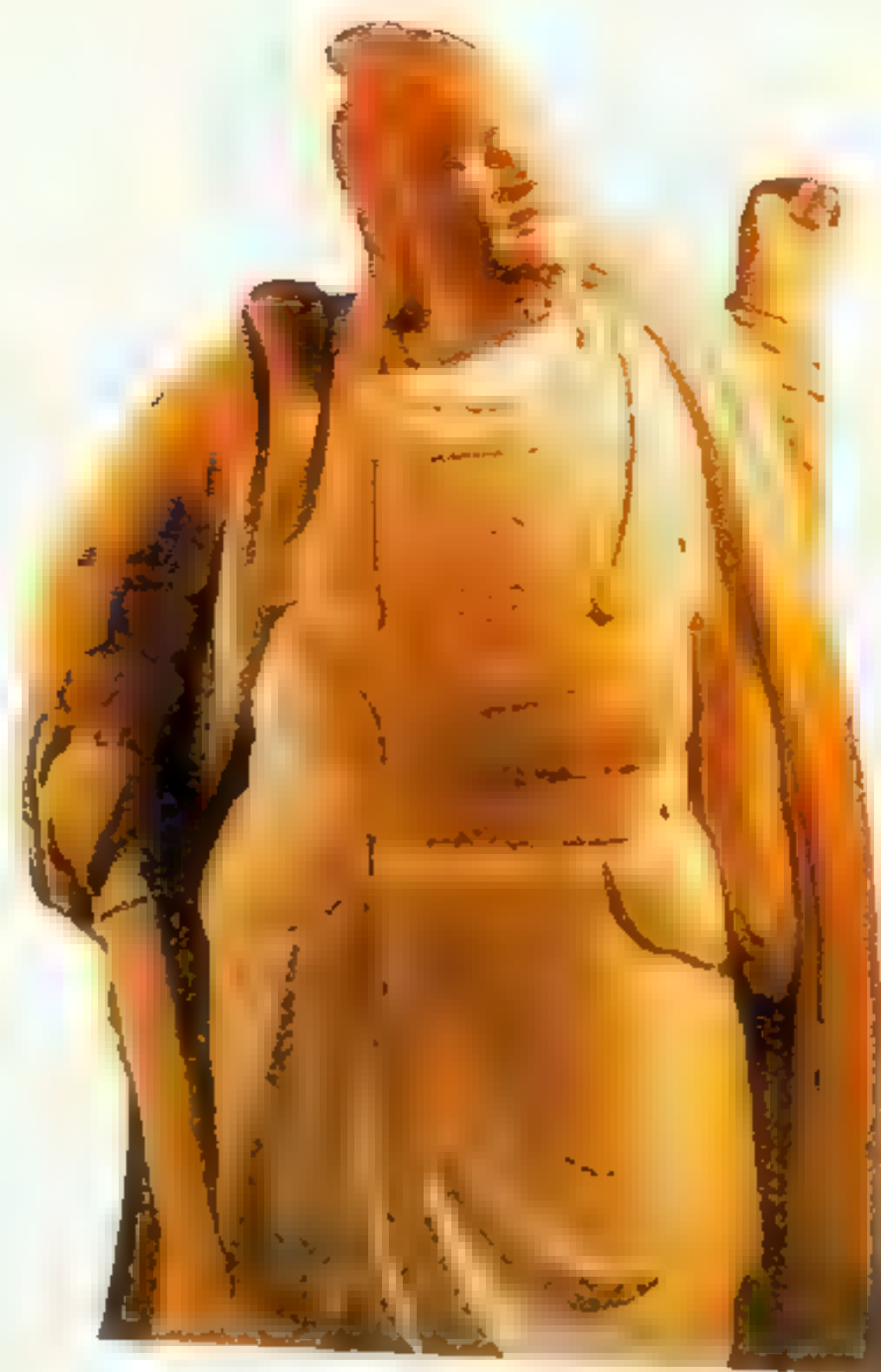


K—15 河北定县静志寺塔地宫出土铜鎏金天王像，见《中国美术全集》金银器专集





图K—14 左 山西太原晋祠铁人铜像 右 嵩山中岳庙兵库前铁人铸像



K—16 四川大足北山第14窟毗卢道场全形像，洞窟开于南宋时期。



图K—15 两件均为嵩山中岳庙兵库铁人铸像，另两件铁人像见图K—9①、②。



K—17 四川安定毗卢洞第六号龕天王像



图K—16 ①、②永熙陵文吏、控马官石刻像幞头及幞脚的式样。③永昭陵文吏石刻像，幞头两侧有凤翅装饰。④宋太祖赵匡胤像，头上是硬裹直脚幞头。

的石雕俑和《却坐图》中侍卫的胸前都有勒帛束衣，值得注意的是，中岳庙、晋祠的六件铁人身上的勒帛一律都横过胸背，从腋下反折向上包裹肩部后，有的在后背，有的在胸前打结（参见图K—9 ①②、14、15）。这种束法很特别，有可能是“时服”的一种专门束法（因勒帛也是赐服中的一项）。勒帛除了勒束衣领外，还用于束腰。束腰时往往在腹前打结后垂下一段作为飘带（参见图K—9），元、明二朝这种束法十分流行。

冠饰方面使用最普遍的仍是幞头。宋代的幞头式样很多，从隋末的平头小样到五代的硬裹幞头都使用，幞脚的变化也层出不穷，五代时马希范所创的直脚幞头在宋代是帝王百官的公服，到了宋代，直脚幞头变得如马希范初创时那样，伸得十分长，以至有碍人的行动。军中则多用软脚幞头，有的在脑后打结垂于两肩，有的反折向上。幞头的两侧有时还饰以凤翅（参见图K—16），卫士戴黑漆无脚幞头（参见图K—8）。硬裹幞头则形如帽子，用藤或草编成巾子做衬里，外表用纱做面，涂以黑漆，用时只需戴上便可。

宋代的武士也常戴抹额，《东京梦华录》卷一：“帝幸射殿射弓时，‘驾诣射殿射弓，侍立，列招箭班二十余人，皆长脚幞头，紫绣抹额……’”将帅则学汉代常戴幅巾，朱仙镇的岳飞铜像，头上戴的就是幅巾，与汉魏时相比已有很大的变化。宋代幅巾像幞头一样要包裹头顶，用两根带子系在脑后，系好后，长出的巾脚垂于两侧（图K—17）。

宋代的武士还时兴戴束发冠，这种冠是用金、银、玉等材料制成，戴时用笄横贯发髻后，冠上常加巾。《宋史·礼志》：“‘冒下戴小冠簪，以帛束发，谓之束发冠。’”室中，则去帽见冠簪，谓之束发冠。《却坐图》中侍卫戴的头巾，与河南方城石雕俑头上小冠的外形很相似，前者是在小冠上再束头巾才形成这种形象的（参见图K—9、14、15）。武士戴束发冠的习俗由来已久，洛阳出土的一件西周的铜车辖，上面





图K—17上左：宋画《文会图》中戴抹额人物。上右：四川成都天回山东汉墓出土戴幅巾陶俑，录自《文物》1980年第3期。中下：河南朱仙镇岳王庙岳飞铜铸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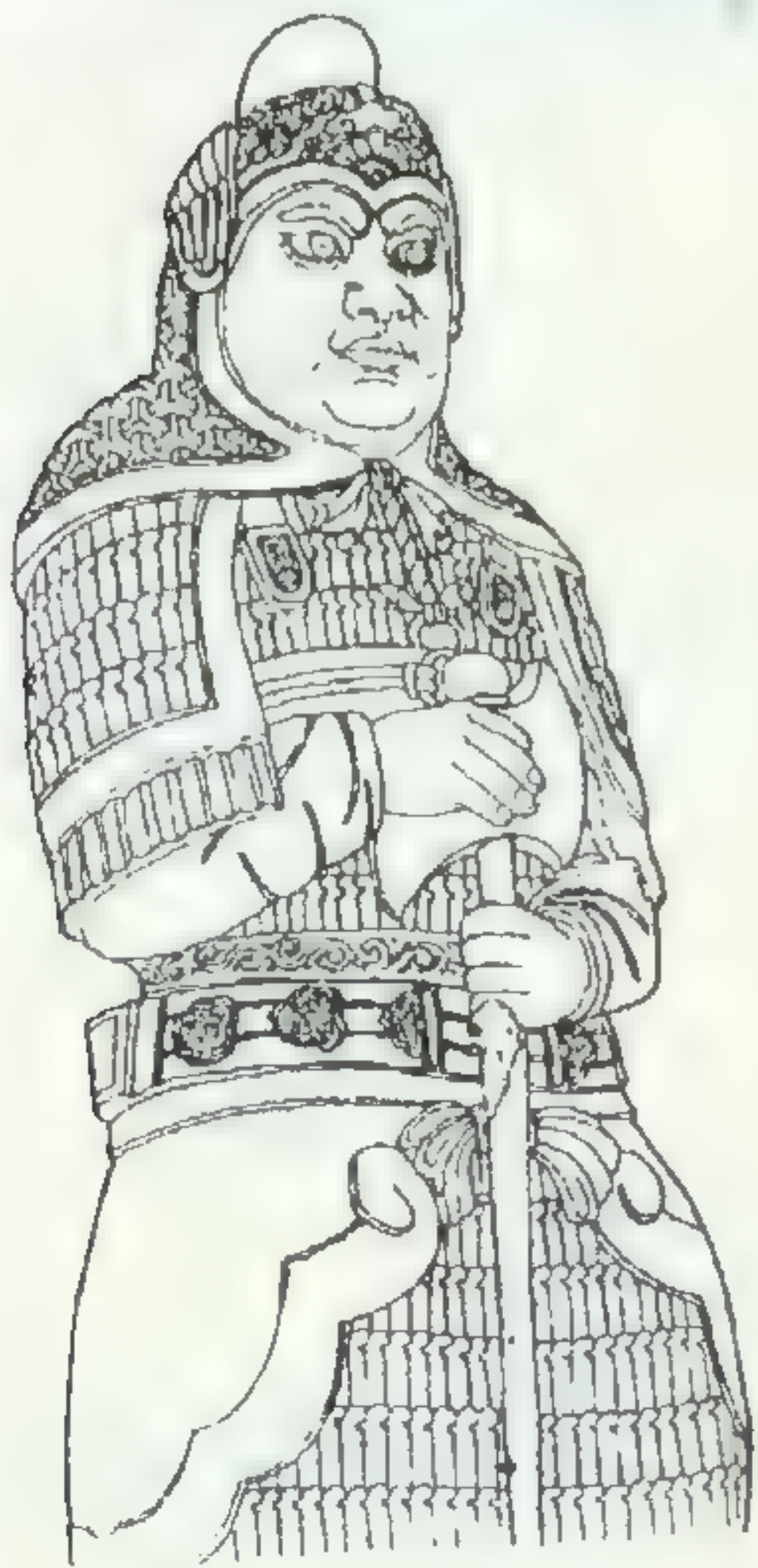
的人平冠就是一种中发冠(参见图例B-3)。南北朝时的中发冠也属于这种冠，盛唐时武官常用一种类似今天女士所用的发卡卡髻，也是中发冠的变种(参见图例D-21)。宋代的束发冠承袭了南北朝时期的体制和戴法，这种束发冠很受上层社会的欢迎，士大夫就常戴束发冠，他的作品《听琴图》中，弹琴者(其他文人)戴的就是束发冠。在元明两朝，束发冠一直是公子皇孙、儒士之流偏爱的冠饰。若短后衣、靴等服饰宋代还是元代卫的服饰，军队中的将士没有这种束发冠。

宋代军士的束发冠只存在于民间，只有平民百姓戴，武士戴的是皮笠子，《东京梦华录》中称之为“皮笠子”，这种皮笠子“用于挡风雨，一用于保护面部”，王圜在《武经总要》、《武备志》等书中都画了皮笠子(图K-18)，与今天所见的明代军士戴的皮笠子戴的很相似(图K-18)。

宋代的束发冠在宋代很流行，不仅平民百姓戴，而且士大夫也戴，这种束发冠在宋代很流行，不仅平民百姓戴，而且士大夫也戴，这种束发冠在宋代很流行，不仅平民百姓戴，而且士大夫也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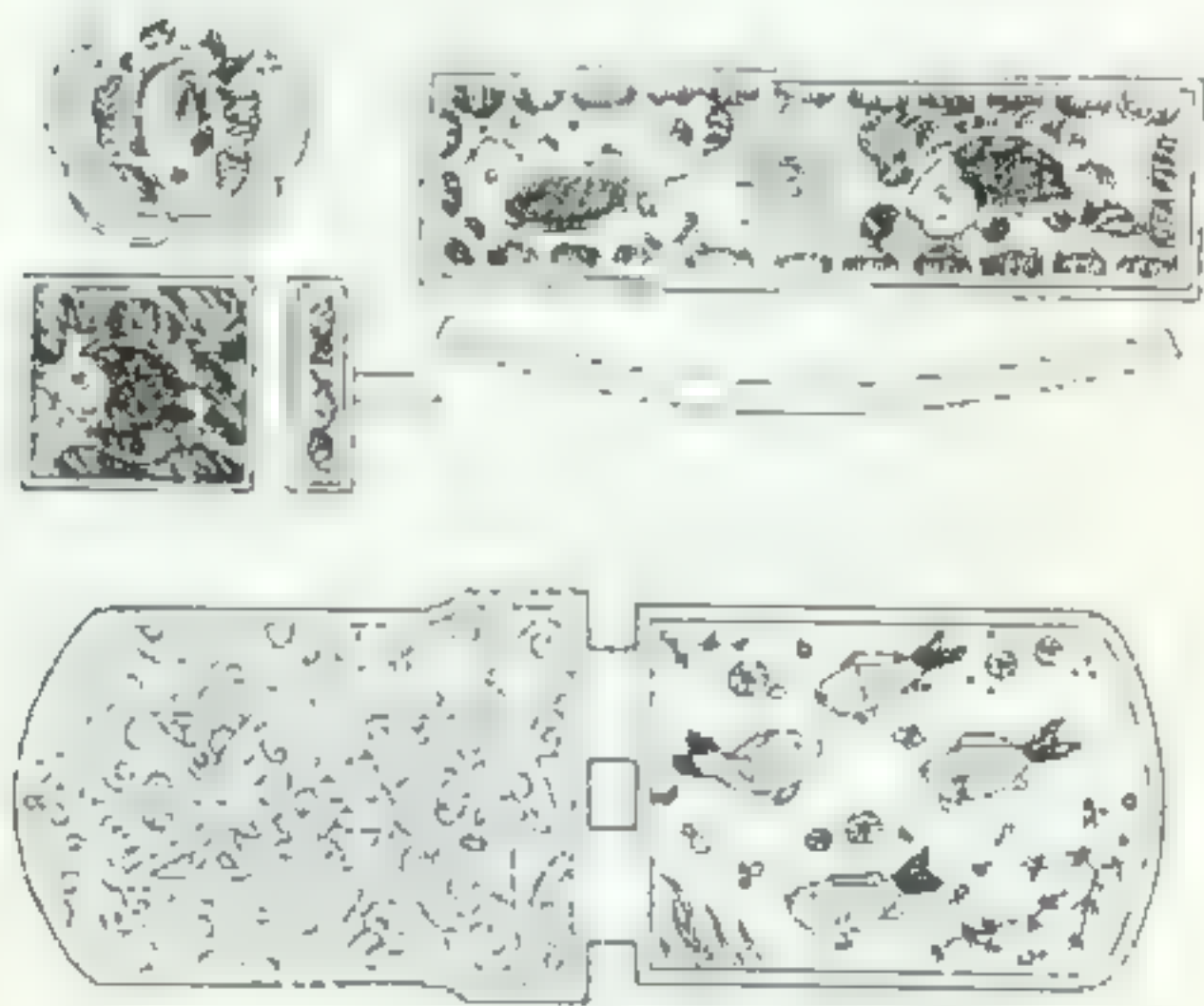


图K—18上：《武经总要》攻城器械插图中宋军士兵，录自《中国古代版画丛刊》。下：《武备志》插图“腰绁上弩弦图”中士兵形象，录自《文物》1985年第5期。(《武备志》为明代兵书，其中插图的人物服饰大都是明式，此图中士兵的笠与图左的笠在外形上基本相同，故收入)



“以金；服绯者，饰以银……亲王武官、内职之校皆不佩”（同上）。这种佩鱼在辽墓中曾有出土（参见辽代部分），宋陵石刻中也有可见（图K—20①）。

宋代官服的颜色，据《宋史·仪卫志》记载，有青、黄、朱、白、黑、金、银等色，至于仪卫服中，色彩如唐代，可能更加丰富。将帅、公服，初期照搬唐代的制度，元丰后有所变化，六品以上绯色，九品以下青色，同时用各种不同的织锦来区分等级，有所变化。至于普通将士的服饰，禁军、厢军、各方面军、不同兵种，服饰有所差别，颜色可能很多。除了九品以下青色外，还有青、黄、朱、黑、黄（淡黄色不能见）等色。腰带的带鞬只有饰金、玉带鞬和铁带鞬，一般都用黑色。当然也有不分级别都可使用的服饰和颜色，如《东京梦华录》中提到的红上团花背子、紫上杂色小花绣衫、锦绣袍肚等，就是例子。



图K—20 ①：嵩山中岳庙兵库铁人铸像（腰带上可见前后两种带鞬）。②：永裕陵镇陵将军石像（正面为桃形带鞬）。③：江苏武进南宋墓出土银带鞬、铊尾，南京博物院藏。



图 K—22 ①江苏吴县吕师孟墓出土金荔枝纹带铸，南京博物院藏 ②（美）波士顿美术馆藏秦金铜荔枝纹带铸 ③永定陵客省使石像上佩鱼形象，与《舆服志》说的“垂于后”情况不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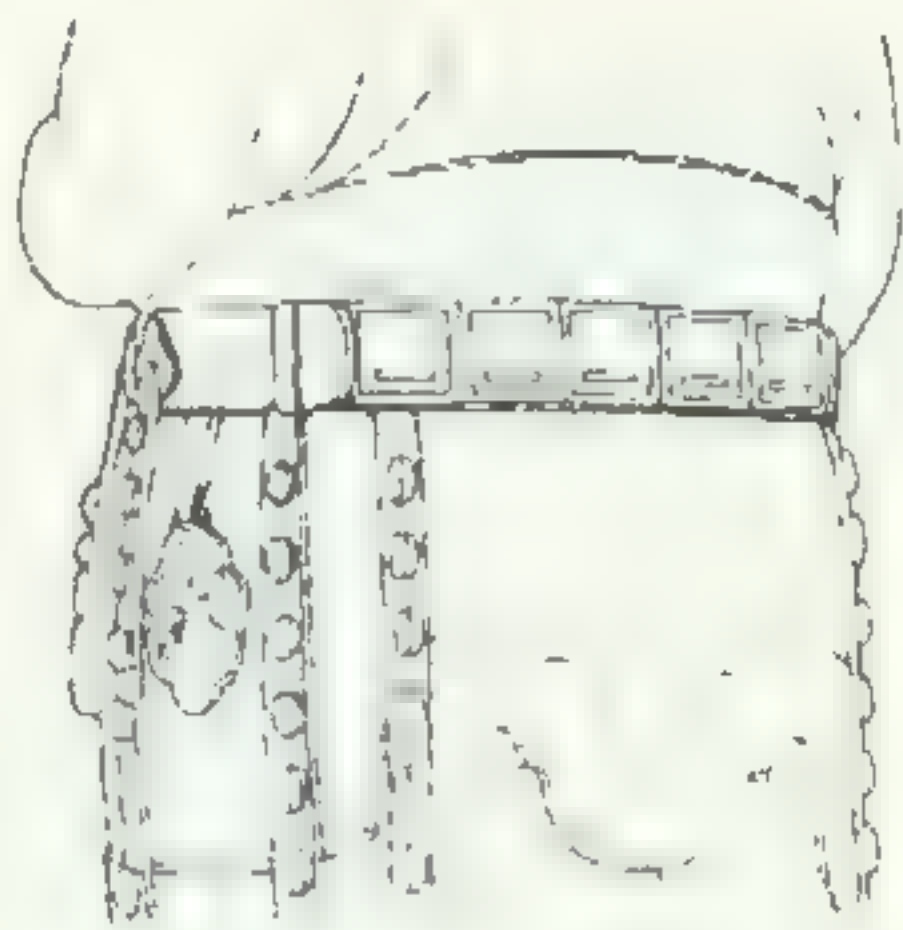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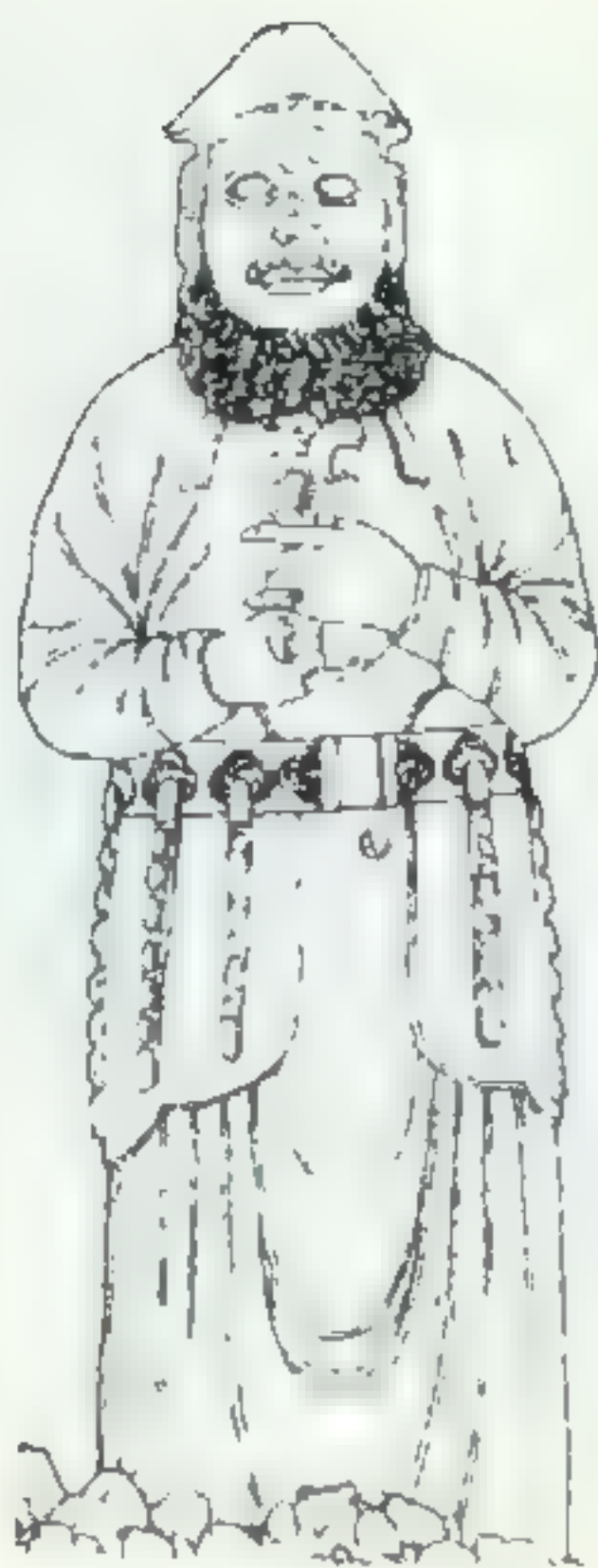


图 K—21 左上 永昭陵神道客省使石刻像，河南巩县回郭镇陵区 右上 永昭陵文吏石刻原（蛇尾插法），永定陵神道客省使石刻，象背部（有古眼的带蛇）





辽

辽代武士复原图

铠甲根据山西大同观音堂彩塑天王像、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辽墓壁画等形象复原；胄根据内蒙古赤峰市辽墓出土实物复原；戎服根据河北宣化张世卿墓壁画、内蒙古库伦旗辽墓壁画等形象复原；革带根据内蒙古奈曼旗、通辽县二林场等地辽墓出土实物复原；兵器采用辽宁建昌龟山辽墓出土实物与杭州岳王庙陈列兵器实物形象





L—1 山西大同观音堂辽代彩塑天王像（据照片绘制），此像的盔上原有凤翅装饰，已毁坏。

辽

（公元 907 年——公元 1125 年）

辽是由契丹贵族耶律氏建立的，契丹为东胡后裔，属鲜卑的一个部落，世居今天的西拉木伦河上游地区，以畜牧射猎为生。五世纪中叶起，通过与中原互市，开始“务稼穡、种桑麻、习织组”（《辽史·仪卫志》），开矿冶铁，制造铁器。后梁贞明二年（916），耶律阿保机利用中原混战之机，自立为帝，建立起契丹国。公元 936 年，应后晋石敬瑭之请，出兵相助，实力从此大增，并于 946 年攻灭后晋，次年改国号为辽，与北宋长期对峙。后因统治残暴，境内反抗不断，最终为金所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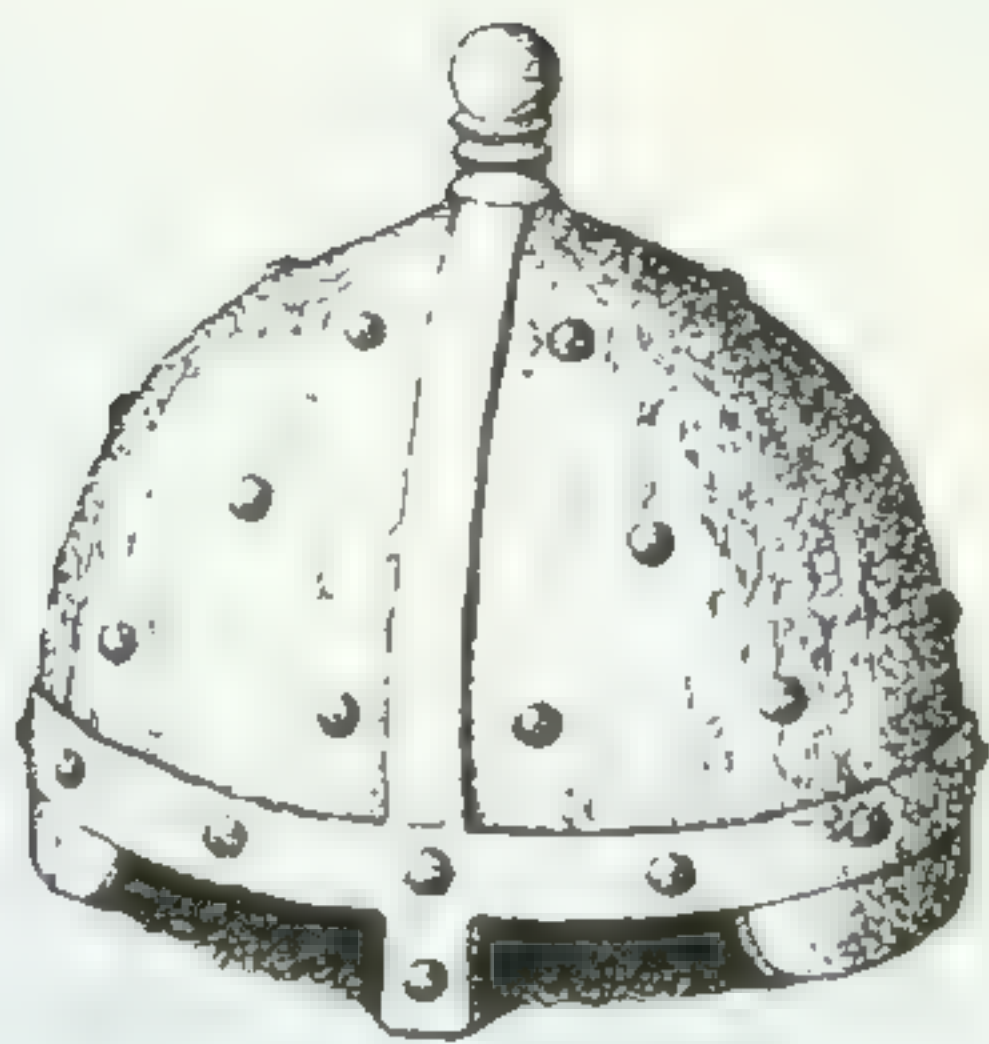
契丹在短时期内很快强盛，主要是吸收采纳了中原先进的文化、生产技术和制度，其中自然也包括军戎服饰。

铠甲方面，据《辽史》记载，还在契丹国时，军队已都使用铁甲，从掌握的资料来看，主要是采用唐末五代和宋的式样，以宋为主，比



L—2 沈阳市天坛净光舍利塔地宫南壁壁画。见《中国美术全集》墓室壁画专集





图L—2内蒙古赤峰市大营子辽墓出土铁盔，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



图L—1①、④内蒙古解放营子辽墓壁画，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摹制。②内蒙古白彦尔灯辽墓壁画。③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辽萧义墓壁画，录自《考古》1989年第9期。

辽代彩塑（彩图L—1）。其铠甲的上部分结构，与北宋中期的铠甲相同，只有腿裙明显地比宋代的短，前后腿裙的宽度也比宋代的窄，只保护了膝盖部分，而足背上的护甲，在中原地区是很少见的（彩图L—2、图L—1）。这种铠甲在制上都具有唐末五代的特点，时代上观音堂彩塑早于此。

辽代铠甲护腹的圆护，是用皮带吊挂在腰间的（彩图L—1；图L—1），然后用腰带的扣子固定。宋代的皮甲是相同的（参见彩图L—1），而胸前正中的大型圆护，是辽代特有的。盔与兜鍪的两侧都有风翅形护耳，有的像五代时那样向上翻起，有的像宋时那样披垂于后。铁盔在内蒙古赤峰曾有实物出土（图L—2），出土实物与观音堂彩塑、天坛净光舍利塔地宫壁画上的盔在外形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参见彩图L—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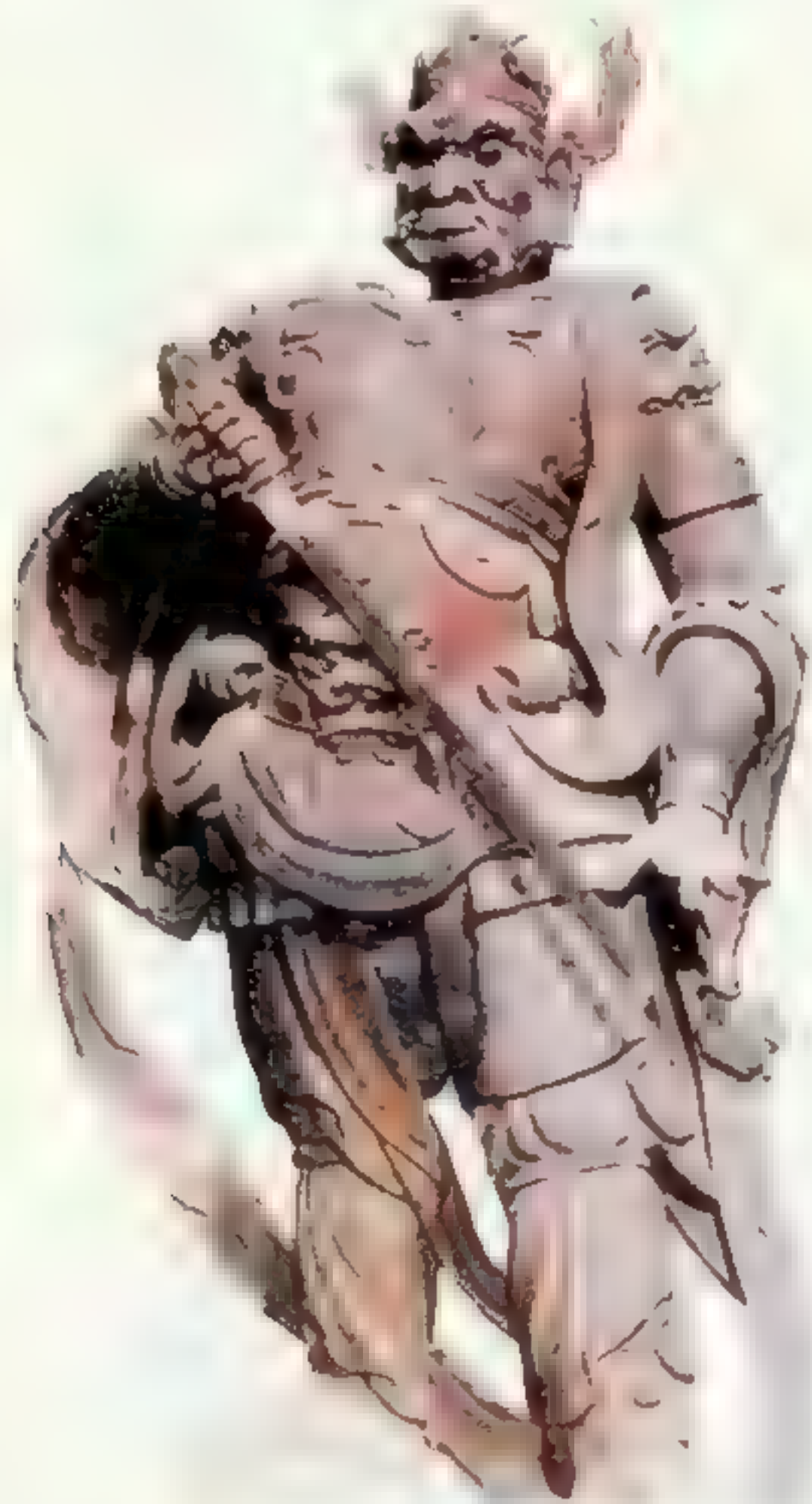
辽朝除铁甲外也使用皮甲，山西大同下华严寺辽代彩塑天王像（彩图L—3）身上，除铁甲外，还配有双尾腰带、横束甲皮带、胸前的明光甲圆护等装饰品以后，可以看出其唐末形制的特征（如双尾腰带，横束甲皮带，胸前的明光甲圆护等）。根据铠甲上没有塑出甲片和腿裙极短的现象，可以基本判断是皮甲，但在肩、胸、腹等主要部位配备了铁制部件，这种皮甲在大同观音堂的另一尊彩塑像身上也可见到（彩图L—1）。



图L—3山西大同观音堂辽代彩塑天王像



L—4 沈阳市博物馆藏辽墓壁画残片 (据实物写生)



L—5 山西大同市下华岩寺辽代彩塑天王像

3、5)

辽朝也有表甲制,《辽史·仪卫志》说:“太祖丙寅岁即皇帝位,朝服表甲,以备非常”,但这方面的形象资料没有发现。

辽朝的服饰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为契丹服,一类为汉服,戎服亦如此,这种现象从契丹国建立时就已经形成。《辽史·仪卫志》载:“会同中,太后,北面臣僚国服;皇帝,南面臣僚汉服。乾亨以后,大礼虽北面三品以上亦用汉服;重熙以后,大礼并汉服矣。常朝仍遵会同之制。”从墓室壁画等形象资料来看,汉服主要是宋朝服饰,契丹服则与唐代的盘领戎服窄袍相似。

武官的契丹服分公服(又称“展裹”)、常服(又称“盘裹”)两种,其外表式样好像并没有明显的不同,可能后者只是比前者更紧身一些。这内,图L—4壁画上武士身穿的盘领、窄袖、前开襟(衣襟



L—6 内蒙古库伦旗七号辽墓墓道南侧壁画, 见《中国美术全集》墓室壁画专集。



图L—3 内蒙古库伦旗二号辽墓墓道北壁壁画，来自《中国美术全集》墓室壁画专集



图L—4上：辽宁北票莲花山辽墓壁画。下：内蒙古昭乌达盟敖汉旗辽墓壁画，录自《考古》1984年第11期。两像的冠部分正好都剥落损坏，所以只能作一个大概的参考。



路便是，正如《辽史》上说“衣皆左衽”）长袍，就是这类“国服”。契丹袍长至膝下，袖两侧不开衣衩，内衬交领缺胯袍，骑马时将外袍袖口挂搭在朝一样提起来掖入腰带。下着直裰裤，脚穿黑靴，皮靴内衬琉球，琉球高至膝前一截（图L—3），这种习惯直到今天在很多草原民族中仍然保持着。

普通士兵的契丹戎服也是这身打扮（彩图L—6）。事实上，当时国中的契丹族男子可能差不多都穿一样的服饰，因为作为国家的统治者，一定要建立一支以契丹人为骨干的比较强大的军队。契丹族人口有限，因此不得不把许多年轻的男子悉数征兵，如此一来，戎服就成了国服，这种现象在当时几个小国家（如西夏）也有存在。

穿契丹戎服时，品级较高的侍卫武官一般戴毡冠或皮冠，“毡冠，金花为饰，或加珠玉翠凤，或加金花，织成夹带，中贮发一总。或加金花，或加珠玉，或加木缀珠”（《辽史·仪卫志》）。图L—4的侍卫、武士头上所戴的可能就是这种毡冠或皮冠，它和辽代的金代线装袍的装饰有相似之处，无法与中原的冠帽一样，从外形上看，是有点像日本武士的帽子。

一般军士和普通士兵穿契丹戎服时，在多数情况下是髡发束发。契丹人髡发的习俗由来已久，《后汉书·乌桓鲜于徒传》（晋书卷九）“乌桓者，本东胡也……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其俗尚髡发。”辽朝在《宋史》中也有记载：“又有渤海首领大和利与模敦……并髡发左衽，窃为契丹之饰。”（《宋史·高丽传》）图L—5是出现在墓葬中的髡发束发。

髡发束发也可以戴巾，内蒙古化德县辽墓壁画中有髡发束发，头上戴着类似头巾样式的头巾，巾的上方还戴有一种圆形的饰物。这种圆形的饰物在其他地方和《辽史》的记载中还未发现，可能是当时使用的冠饰（图L—6）。

汉式戎服的上衣是缺胯窄袖袍，袍一如宋制，内衬交领短衫，为便于骑马，像契丹戎服



图L—5契丹人髡发发型①②辽东陵壁画的髡发发式。③④内蒙古库伦旗前勿力布格6号辽墓壁画的髡发发式。⑤⑥“契丹人骑马出猎图”中髡发发式。



图L—7河北宣化下公里张世卿墓前室西壁壁画(出处同L—5)



图L—6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韩师训墓壁画“仪卫人物”图, 录自《文物》1992年第6期。

一样,将袍前下摆提起掖在腰间,露出内衬短衫和束腰带的两根垂带,下穿直统裤,脚上穿履,与1986年出土的石刻控马仗马官装束完全相同。头束幞头,幞头两脚交叉向上,有的露出髡发,有的露出马尾,只这一点与宋朝略有差别。(图L—7、彩图L—7)至于武官的汉服,也分朝服和常服两种,常服又称“穿执”,早期采用五代石晋的服饰,中后期则用宋制。

辽朝用于束衣的腰带也分汉与契丹二式,文官束单带扣单铊尾或双带扣双铊尾,武官束双带扣单铊尾或双带扣双铊尾。1986年在内蒙古奈曼旗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内,出土了三条用丝织成的腰带,保存完好的腰带,三条中两条为双带扣,一条为单铊尾双带扣带(图L—8)。双带扣由长短两根组成,据专家论证,短的一根为束衣时使腰带加长而备用的,平时则束单铊尾的单带扣单铊尾腰带。(详见李正康《从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的腰带谈起》,《文物》1987年第11期)

此外还发现有双带扣、双铊尾带的带铐、带扣和铊尾实物,这种实物在内蒙古通辽县辽墓中也出土过。考古工作者根据现场的带铐、带扣和铊尾腐烂的痕迹进行了复原,复原后的形象如图L—9。(详见张柏忠《内蒙古通辽县二林场辽墓》,《文物》1985年第3期)

鞞鞞带的带铐、带扣出土实物更多(图L—



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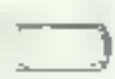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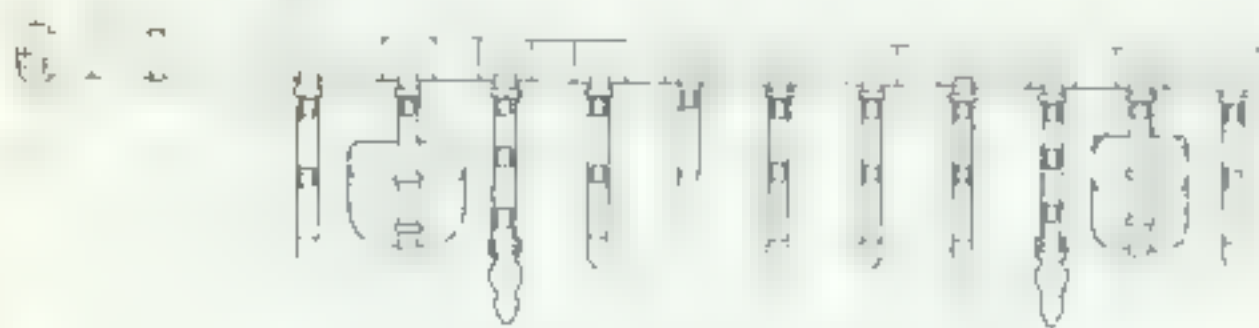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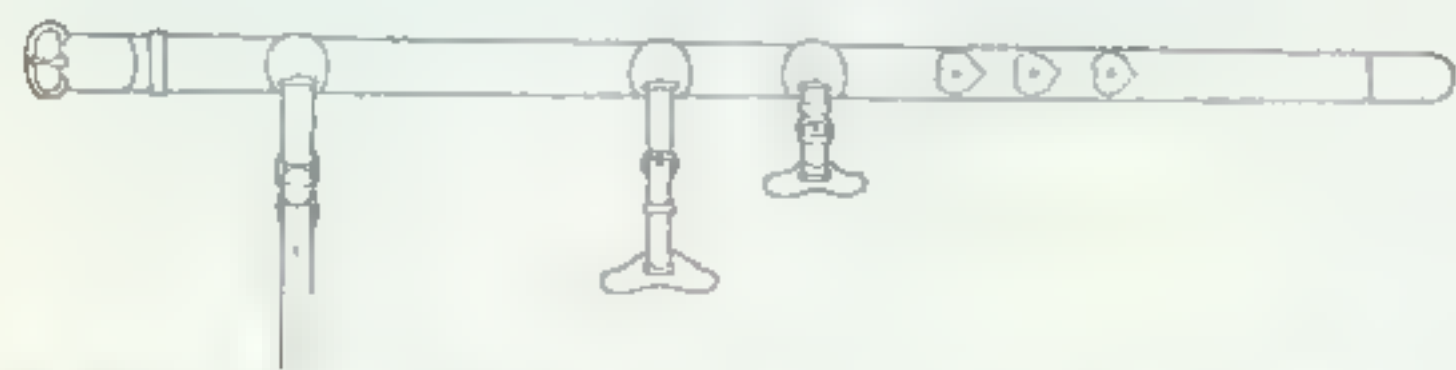
图L—7 河北宣化辽墓壁画持杖门吏

10), 从这些出土实物上可以看出, 辽朝的腰带装饰十分考究华丽。鞞鞞带的小带用来佩挂随身物件如刀子、锦囊等饰物, 这在唐代部分已经说明, 辽驸马墓的带鞞鞞带上还装着把手式饰件 (参见图L—8), 这些饰件则是用来佩挂较大型的物件 (如猎物等) 的。

有的汉式带也装有很少的鞞鞞, 这可能是更于系束者佩挂如佩鱼等表明身份的饰物。吉林省扶余县辽墓出土的一套玉带铐、玉觚尾和金带扣、金饰件就属这种情况, 玉带铐中只有两块有装鞞鞞的古眼, 说明这根带只装两根鞞鞞带, 这两根小带正好用来佩挂金饰件。长春市博物馆曾对这条带进行了复原, 并制成复制品展出, 复制品的形象参见图L—11①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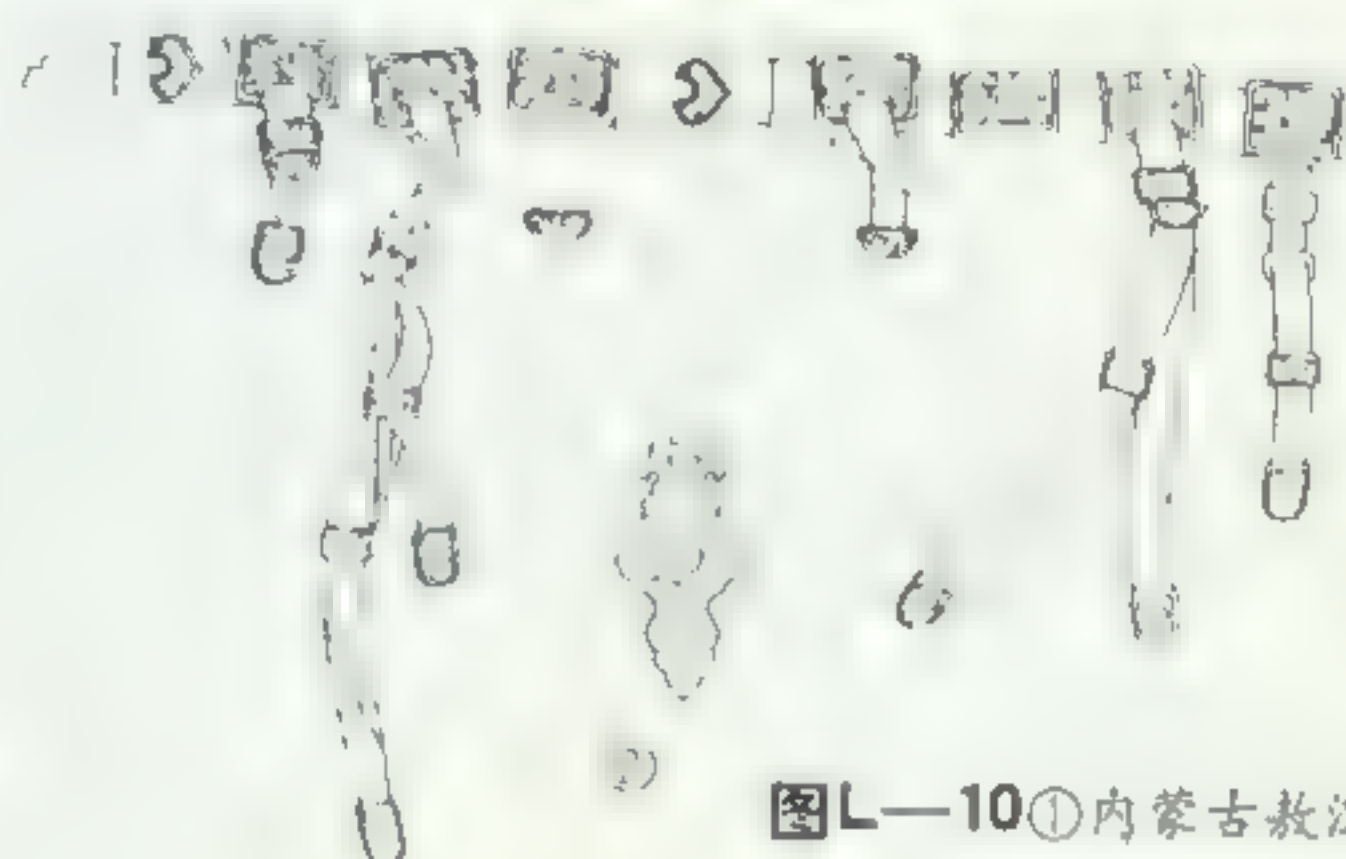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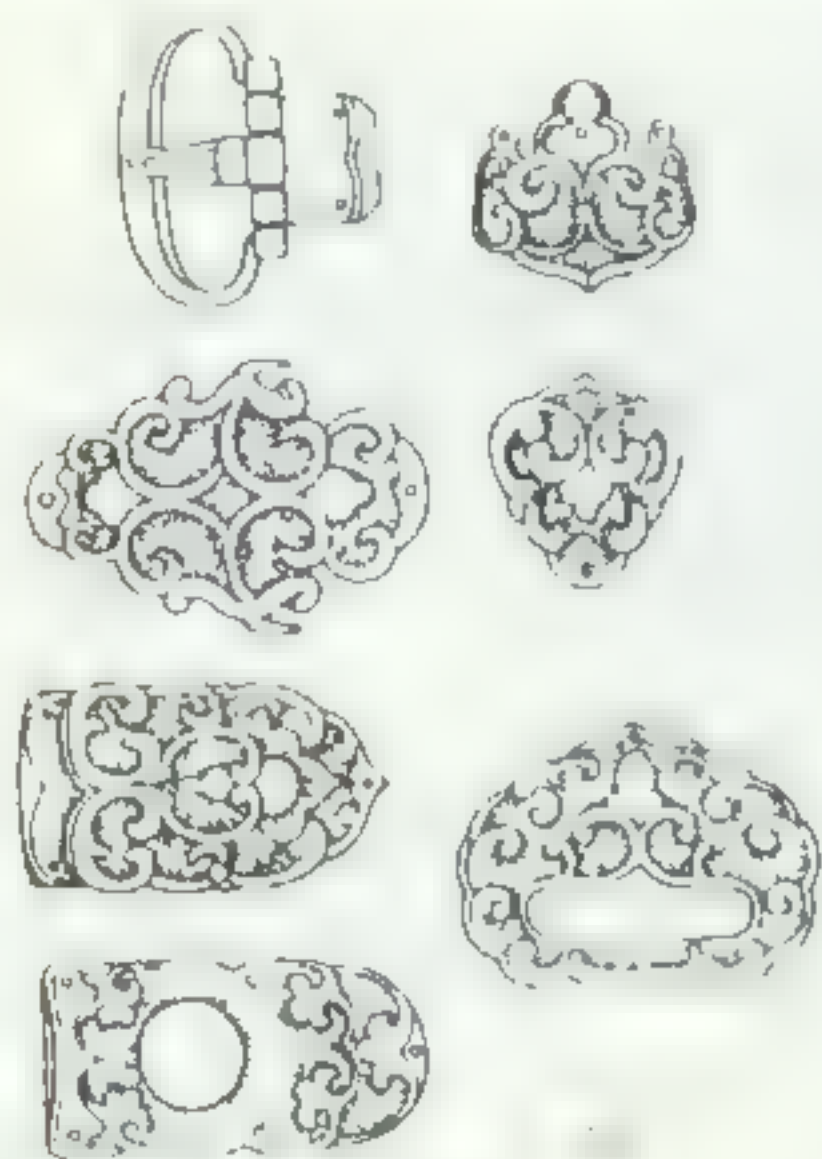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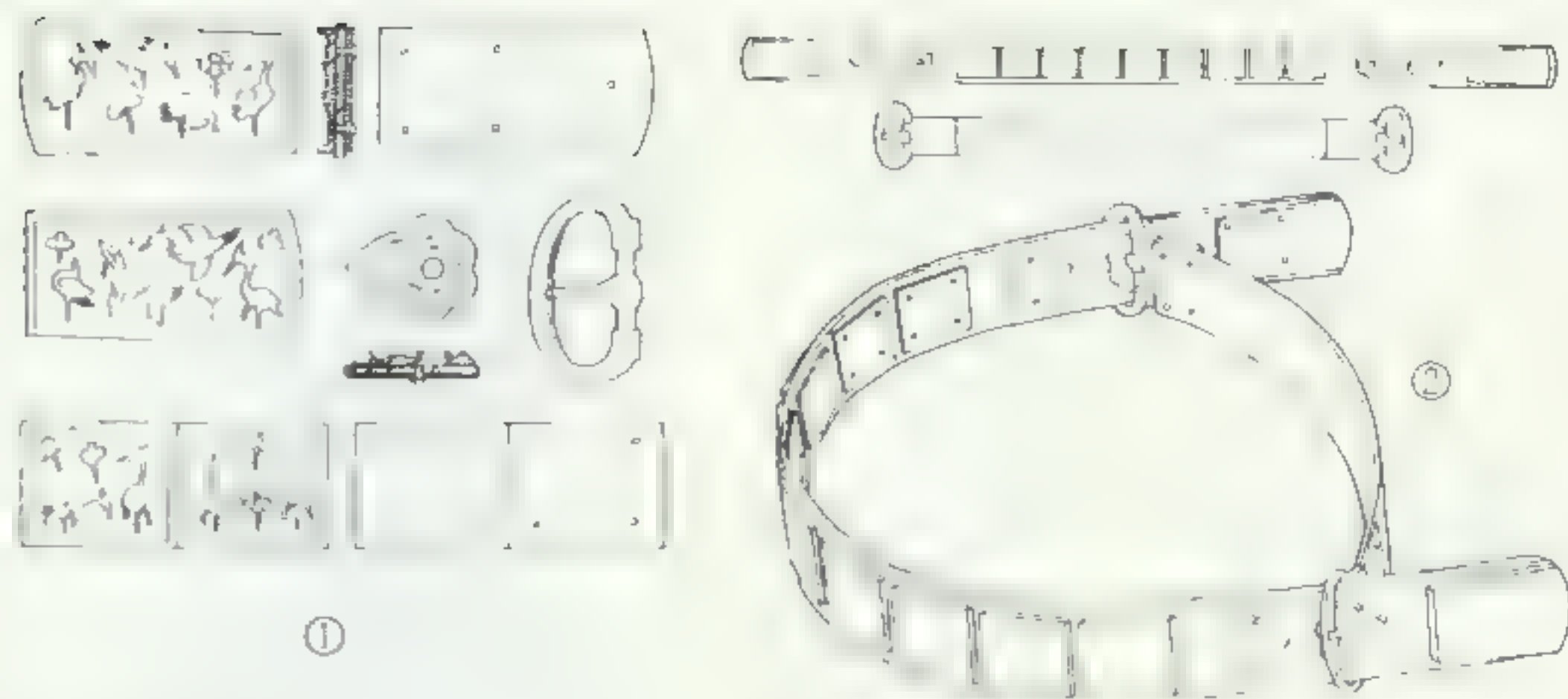
辽朝的佩鱼不同于宋代, 皇帝的大祀服上也有悬鱼一项。佩鱼不仅是百官的品级标志, 也是一种尊贵的象征。佩鱼实物参见图L—11③。

辽朝戎服的颜色, 无论契丹、汉式, 都以紫色为最高等级。连貂裘等毛皮服饰, 也以紫黑色为贵、青次之, 一般五品以上方能服用, 六品以下用绯色, 八品以下绿色, 下级军士则多蓝、褐黄等其他杂色。铠甲中铁甲多为金、银色, 《辽史》中曾多处记述辽主阿保机有金镀、银镀铁甲, 除此之外是用红、黑等色漆髹甲。腰带一般以黄、红色绦裹革为鞞。



图L—8 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银皮鞞金带铐腰带。上、中: 契丹服 111式鞞鞞带。下: 汉服双带扣单觚尾腰带。录自《文物》1987年第11期。

图L—9①内蒙古通辽县二林场辽墓出土双带扣、双铊尾腰带的带铊、带扣和铊尾实物(铜质),录自《文物》1985年第3期。②双带扣、双铊尾腰带复原图



图L—10①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辽墓出土辽代早期金带饰。②内蒙古赤峰大管子辽墓出土金带铊鞅带,图中描绘的带鞅是尚未完全腐烂的部分。

图L—11①吉林省扶余县辽金墓出土玉铊、玉铊尾、金带扣、金带环和金饰件,录自《考古》1963年第11期。②根据长春市博物馆复制品绘制的复原图。③内蒙古通辽县二林场辽墓出土鍍金铜鱼,这是目前发现的并已发表的唯一一件佩鱼实物。④内蒙古库伦旗6号墓墓道东壁壁画上穿契丹服、束汉式带的侍卫形象。





金

Golden Age of China

金代武士复原图

甲冑根据山西稷山马村、襄汾金墓砖雕、吉林金丞相完颜公墓石刻形象复原；戎服根据山西闻喜寺金墓壁画、山西汾阳金墓砖雕与《文姬归汉图》、《明妃出塞图》等形象复原；革带参照辽、宋实物复原；兵器根据黑龙江宾县金墓出土实物复原设计。





M—1 山西侯马金董明墓出土彩绘砖雕武士像。见《中国美术全集》雕塑专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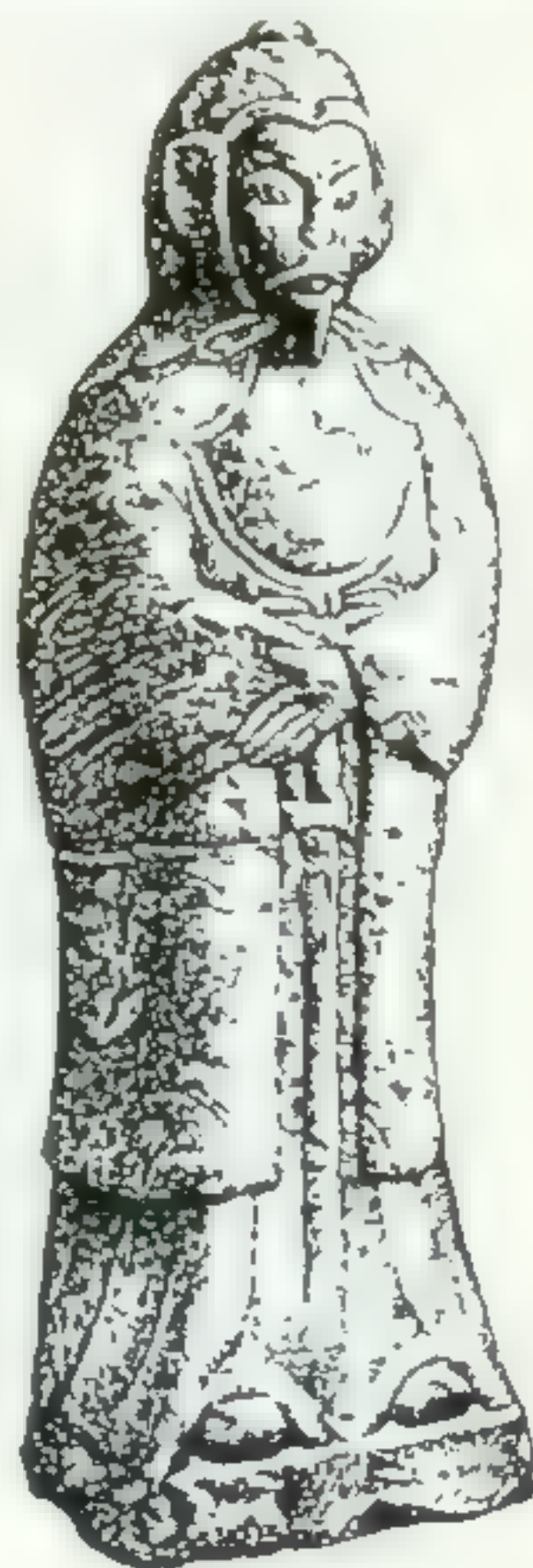
金

(公元 1115 年——公元 1234 年)

金是女真族建立的。女真原居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过着渔猎生活。1115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定都会宁（今吉林农安）。金太祖在位期间，将势力扩展至松花江外，灭辽、北宋，占领了古塔、敦化和延吉一带，并“建女真国，号大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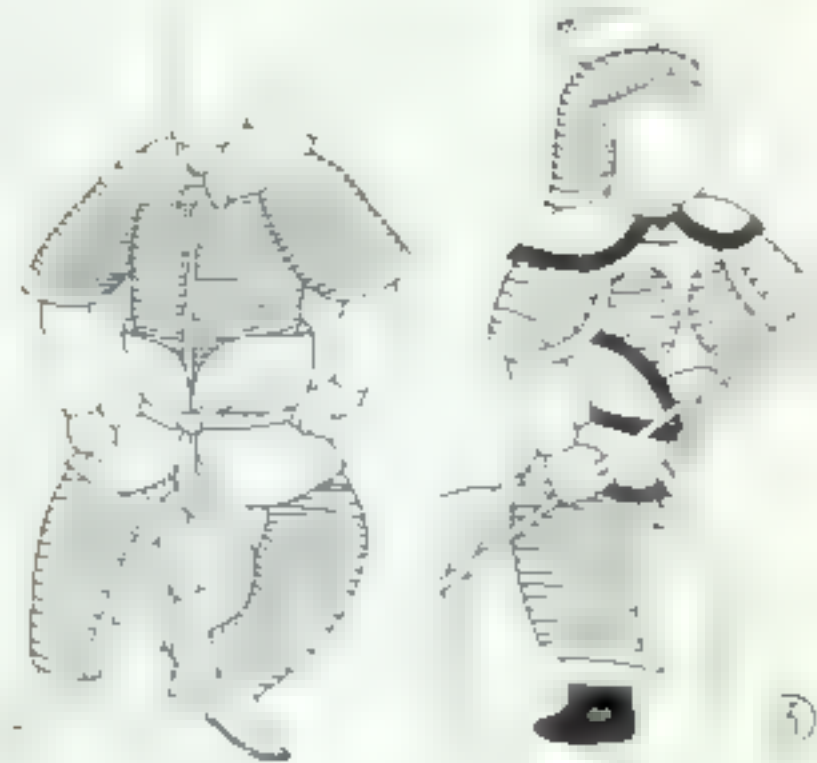
金太祖死后，其子完颜亶继位，即金太宗。金太宗在位期间，金国继续扩张，于1125年灭辽，占领了辽东半岛。金太宗在位期间，金国与南宋对峙了百年左右，最终在1234年被蒙古所灭。

金国的军事制度与辽国类似，实行兵民合一制。金国的铠甲只有半身，下面是护膝，在护膝上上了两件陶俑，下身均不见腿。



图M—1左：山西省襄汾县荆树沟上庄村金墓出土陶武士俑，山西省博物馆藏。右：金左丞相金源郡贞宪王完颜公墓石刻镇墓将军像，吉林省博物馆藏。（均据实物写生）





图M—2①山西稷山马村金墓出土砖雕 ②山西襄汾金墓出土砖雕(浮雕) ③山西长治石哲金墓壁画

中其数量、种类已较前充备，且金華壁
上各层上的灰层都有很厚大的层积，其防
护面积均与军寨、胡方无异，胡方也受到上
帝王子的恩惠，在胡方的遗址中，在以胡方
村东南角，胡方村、胡方村的小型方甲片、
圆形、扁圆形、方圆形和圆形甲片的绳索、
金華壁遗址（M—2、M—1）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1 - \int_{-\infty}^{+\infty} f(x) \delta(x-a) dx = 1 - f(a) = \int_{-\infty}^{+\infty} f(x) \delta(x-a) dx, \quad f(a) = \int_{-\infty}^{+\infty} f(x) \delta(x-a) dx$$
[illegible]

性。在“双头”牌人、门等上又出现、
、等，基本上在木和
的范围内变化。图M-4(1)的位
置，与图M-4(1)相同，应是交脚膝分
同是甲子年基址已出土的人物戴的是双头冠。



图 M—3 《中兴积应图》中全人马图

(图 M—4 右), 稷山马村金墓的砖雕上, 将军身后站立的两个士兵, 头上戴的幞头, 左部外结有一个大圆球, 很可能是拳脚幞头 (图 M—6)。而图 M—4 (中) 的幞顶像双乳, 则又是一种不知名称的幞头。上述几种除交脚幞头外, 都是软裹幞头, 但幞头里面可能都加巾子。

毡笠与宋军士兵一样, 不仅平时, 战时也戴, 这种实情见于《续资治通鉴》的记载: “建炎三年, ……时金人自滕县以五千骑趋临淮, 皆金装白毡笠子。” (卷一〇三) 图 M—8 为几种不同的毡笠式样, 其中第一种可能不是用于军戎服饰。

金代的巾称作“蹋鵒”, “以皂罗若纱为之, 上结方顶, 折垂于后。顶之下际两角各缀方罗一许, 方罗之下各附带长六七寸。当横额之前, 或为一缩襍积。贵显者于方顶循十字缝缀珠, 其中必贯以大者, 谓之顶珠。带旁各缀半带, 垂之, ……” (《金史·舆服》)



图 M—4 左 山西长治市金墓壁画 中 山西闻喜寺底金墓壁画 画中人物均为侍卫 右 河南焦作金墓壁画, 此像疑为女着男装



图M—5 上：山西汾阳金装出土砖雕，大同《文物》1991年第12期。下：山西长治金墓壁画，此处的军袍好像是短袖。

《下》文中有，一种口和它的截法很

《...》...
...
...
...
...
...
...
...
...

...
...
... M ...

1. 设 $f(x)$ 是定义在 $[a, b]$ 上的连续函数，且 $f(a) = f(b)$ 。证明：存在 $\xi \in (a, b)$ ，使得 $f'(\xi) = 0$ 。

不仅和契丹人、回鹘人一样，而且与契丹人一样，穿皮衣、戴皮帽，骑在马上，弯弓搭箭，大显身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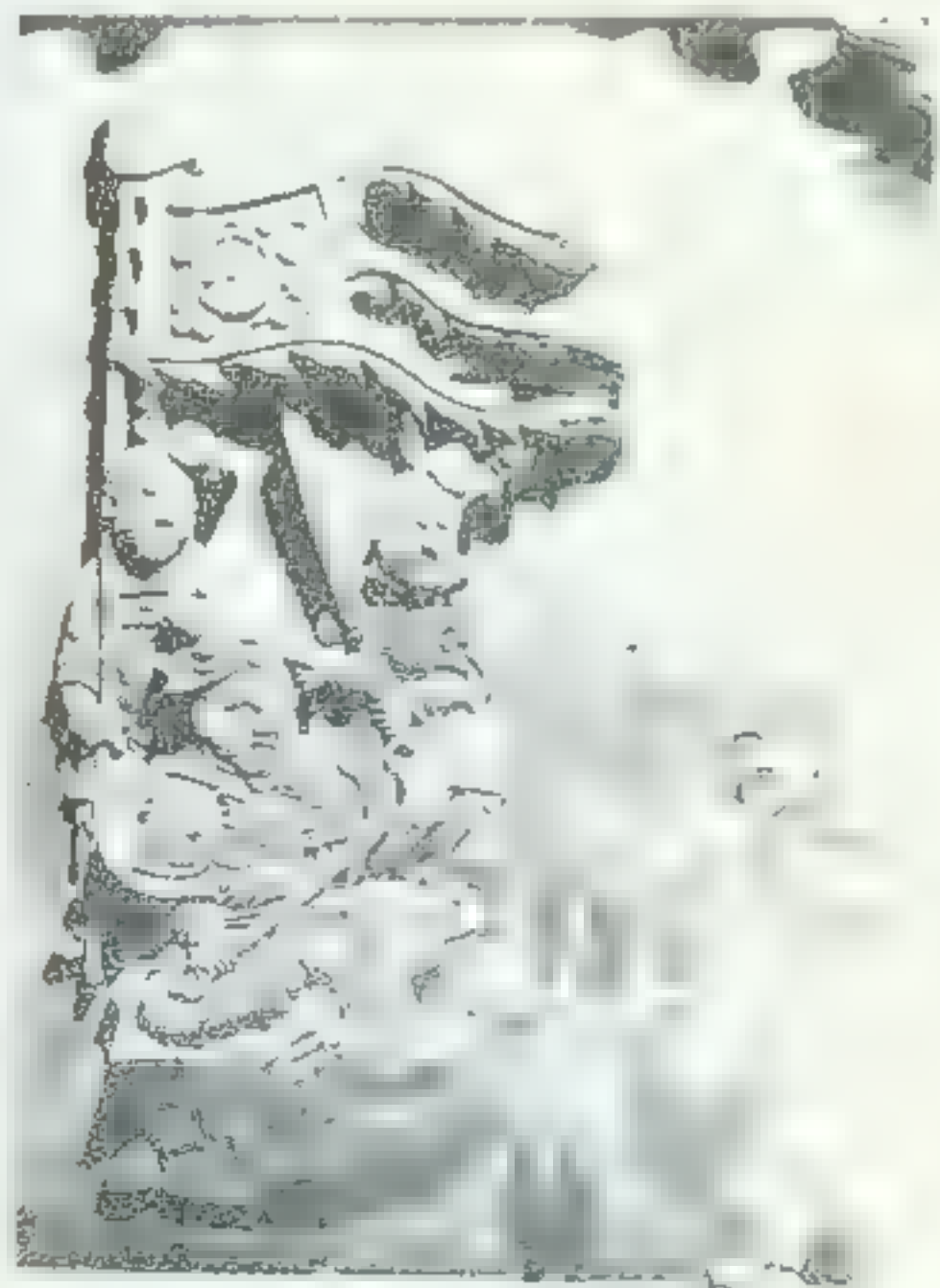


图 M—6 山西稷山马村金墓墓室砖雕,《中国美术全集》雕塑专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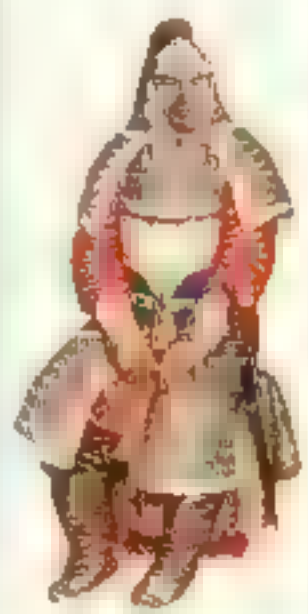
图 M—7 山西稷山马村金墓墓室砖雕



图 M—8 左 河南焦作金装出土陶俑 中 山西沁源正中村金装壁画 右 山西长治金装壁画



图 M—9 左、中 金张瑄作《文姬归汉图》中之貂帽形象 此画虽是描绘汉代故事，但人物身上衣服全是金人服饰。右：宋佚名《明妃出塞图》中鞬帽形象，录自《天籁阁旧藏宋人画册》





金



图M—10①：金张瑄作《文姬归汉图》中髡发形象，画家没有明确画出发髻的细节，但如不是髻的话，就不可能分成如此两条，而应完全披散开来。②：宋佚名画《明妃出塞图》中金朝官员像，此像的发髻情况比右上图清楚。③：河南焦作金墓出土陶俑，此俑的发髻表现很清楚，但俑塑造的是儿童，可供参考。

金朝武官的官服一律为紫色，以服装面料上的花纹大小来区分品级，品级越高，花纹越大。戎服颜色有紫、绯、朱、黑等色，以朱为主。普通士兵的戎服用白色的比较多，将校军官的袍服上，胸前、肩袖处还用金线绣上花纹，卫士亲军一般都穿团花锦袍。腰带的带鞬用红、白、金、银等色。铠甲则以金、银色为主，穿联铁甲的丝带或皮条染成紫、黄、青等色，称作“紫茸”、“青茸”、“黄茸”，装备有这些丝带编缀的铁甲军队，称“紫茸军”、“青茸军”，是女真部队的主力。

用于束衣的腰带称为“吐鹞”，基本沿用辽宋式样，但带后所垂的笏头好像比宋朝的要长（参见图M—4中）。带饰材料“玉为上，金次之，犀象骨角又次之。铸周鞬，小者间置于前，大者施于后，左右有双钭尾，纳方束中，其纹琢多如春水秋山之饰”（《金史·舆服志》下）。金朝的武官没有佩鱼制度。

金朝武官的官服一律为紫色，以服装面料上的花纹大小来区分品级，品级越高，花纹越大。戎服颜色有紫、绯、朱、黑等色，以朱为主。普通士兵的戎服用白色的比较多，将校军官的袍服上，胸前、肩袖处还用金线绣上花纹，卫士亲军一般都穿团花锦袍。腰带的带鞬用红、白、金、银等色。铠甲则以金、银色为主，穿联铁甲的丝带或皮条染成紫、黄、青等色，称作“紫茸”、“青茸”、“黄茸”，装备有这些丝带编缀的铁甲军队，称“紫茸军”、“青茸军”，是女真部队的主力。

西夏武士复原图

甲冑根据甘肃武威西夏二号墓出土木板画上形象复原；戎服根据敦煌莫高窟409、418窟壁画上的形象，参照黑水城遗址出土的《义勇武安王关羽图》中的人物服饰进行复原；革带根据银川西夏陵出土实物，参照敦煌壁画、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舞乐图》等形象复原；兵器复原的参考资料同前。





西夏

(公元 1032 年——公元 122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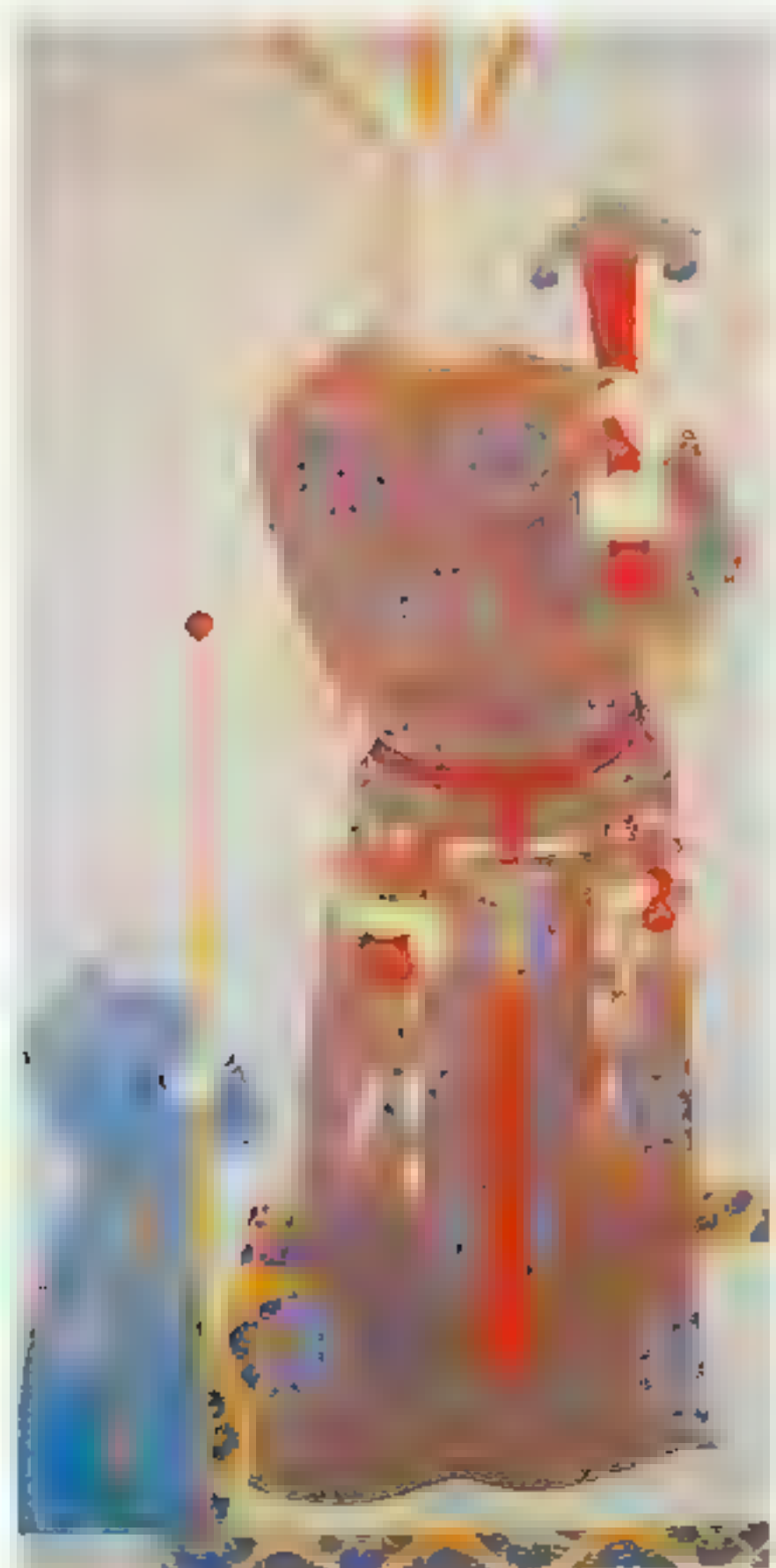
西夏是由党项羌贵族拓跋氏建立的多民族王国，本名大夏，宋人称西夏。党项原居今四川省西部边界，八、九世纪时逐渐向甘肃、宁夏和陕西一带迁移。唐末，移居夏州（今陕西靖边县）的部落首领拓跋思恭因助唐围剿黄巢起义军有功，被封为夏国公，并赐姓李。北宋初，因与宋发生矛盾转而臣事辽，首领李继迁被册封为夏国王。

1032 年，继迁子李元昊继立。他大肆扩张领土，于 1038 年称皇，定国号为大夏，并仿效北宋建立官制、兵制和官民服制，1227 年为成吉思汗的西征军所灭。西夏的众多文物典籍均毁于这次战火，因此我们今天所掌握的西夏文物与文字资料极为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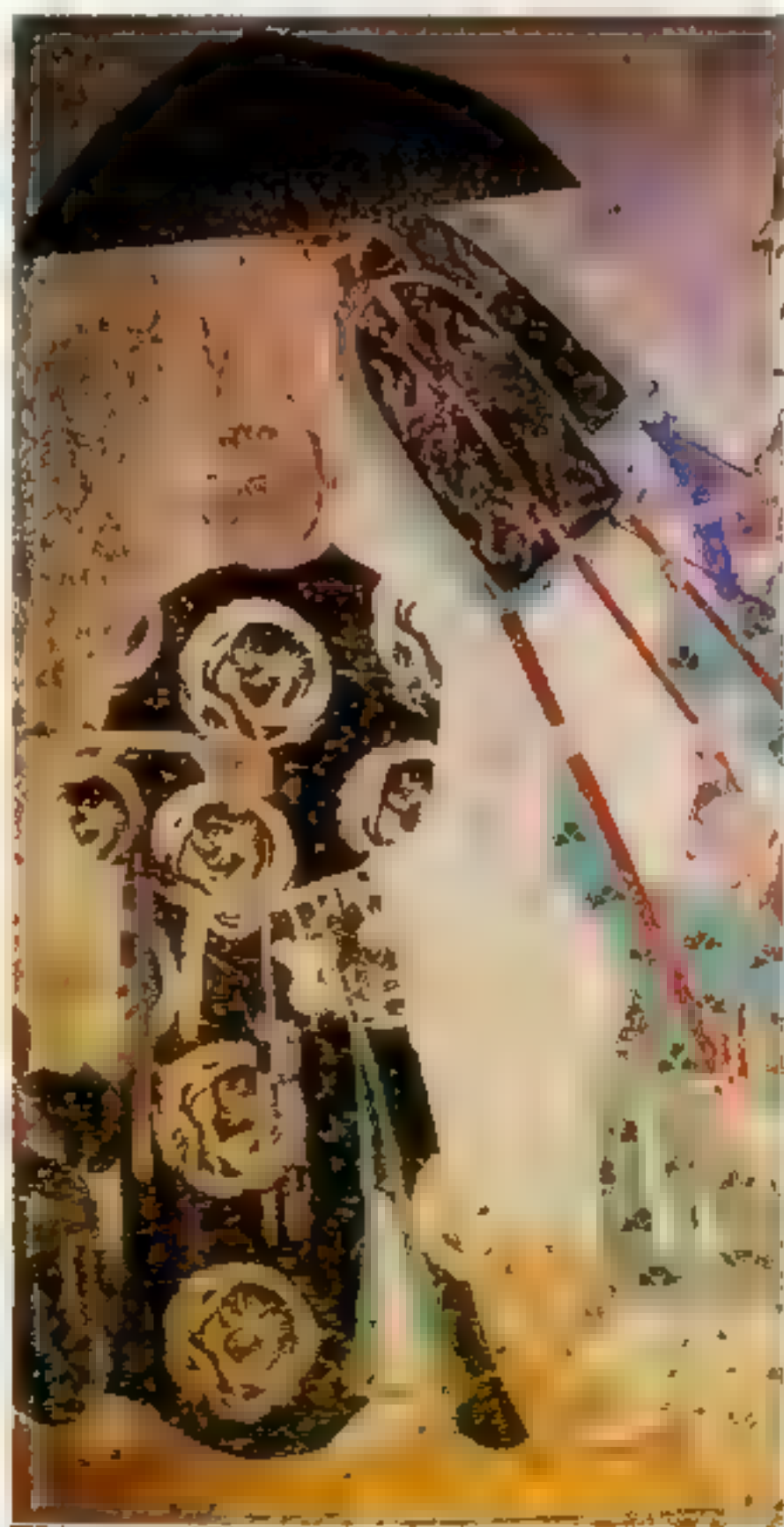
元昊称帝后，在其都城兴州（今银川市）设置“军器监”，专门制造甲冑兵器，其所造甲冑“皆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矢不可入”（田



N—1 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二号墓室出土彩绘木板画，甘肃武威地区博物馆藏。



N—2 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回鹘人供养像



N—3 敦煌莫高窟 409 窟西夏王供养像



图N—1义勇武安王关羽图（版画局部），1909年出土于黑水城遗址，现藏俄罗斯彼得堡爱尔米塔什博物馆。这幅版画据考证认为是经金国，从中原地区流入西夏的，但观察人物服饰，关羽身穿的显然是唐代的戎服，而靴和高出靴统的统袜，完全与辽代的相同。左侧一将铠甲外罩的短衫，则又与宋代一样。关羽背后右侧和右前侧三人的幞头上的装饰，是辽、金、宋朝都没有的。综合这些特征，要说明图中人物的服饰倾向于宋或金朝，好像都不合适。因此，是西夏服饰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而且还有右侧二将身上的铠甲也可作一旁证。



图N—2 宁夏银川西夏陵区8号墓室出土铜甲片，短的长5.8厘米，长的有9.9厘米，比北燕冯素弗墓中出土的甲片还要长。图中白色部分为鎏金残片（宁夏自治区博物馆藏）

[illegible]

“要自高祖始，制定于元昊初焉。其制”
据《宋史·夏竦传》，记载：“……此即《通鑑》上
所云‘鑄一、二錢’之說也。……大抵此制
(鑄戶在天下約十萬)，每歲鑄錢……





图N—3 敦煌莫高窟418窟西夏供养人像



图N—4①银川西夏八号陵出土的金荔枝纹带铃、金桃形、银质鎏金花瓣形带铃饰，宁夏自治区博物馆藏。②莫高窟148窟南壁西夏供养人头像。③1909年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舞乐图》中西夏跳舞男子像，俄罗斯彼得堡爱尔米塔什博物馆藏。

便服则紫皂(皂)地绣盘球子花旋襖,束带。”记载上说的旋襖,是党项羌的民族服饰,从敦煌壁画上可以看出,式样上掺糅了唐代服饰的因素,其形象可参考西夏王供养像右侧的侍卫人物、莫高窟418窟的供养人像和张大千临摹的回鹘人供养像身上的服饰(图N—3、彩图N—2、3)。这些人都穿的是窄袖、盘领、紧身窄袍,袍有长短两种,短的在膝上膝下之间,长的垂至脚背。头上戴的是形如盆或像倒扣的小盘似的冠,这两种冠属于《宋史》记载中的哪一种已很难确定。从冠后有披垂之物、对照“[冠]上果顶,冠顶后垂红结绶”(《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五)的记载来看,可以知道这两种冠为毡制,冠以带系颌下。(参见图N—3、彩图N—2、3;图N—4②),下穿裤,足穿靴,腰间一般系两条腰带,里层是帛带,外层是鞅鞅带,带的钁尾拖长一段垂于腹前,有的亦采用反插垂头的方法,带钁的图案、式样大多采用宋制(图N—4①③)。

西夏的上述服饰,既可作官服,亦可作戎服,如辽的契丹服一样,两者并没有明显的区分。由于西夏社会的封建程度还不是很深,人与人的关系一般来说还是比较平等,如元人余阙在《送归彦温赴河西廉访使序》中就记有“岁时往来,以相劳问。少长相坐,以齿不以爵”的情况,因此服饰上的等级观念也不是那么强烈。军队中的官兵,至少是党项羌人的戎服基本上是一种式样,这从彩图N—2的供养像上也可看出端倪。像中主人、侍从的人物比例虽然相差很大,但服饰还是一样的(冠除外),只有袍服上的图案告诉人们,其衣料要比侍从贵重、华丽。

李元昊的父亲和他的子孙辈中间,有好几位是汉族文化的崇拜者,他们虽然经常与中原皇朝为敌,但却十分迷恋汉族的生活方式。因此汉族服饰在西夏国一直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汉式戎服也肯定存在。武威西夏二号墓出土的木板画上,驭马人身上的服饰可能就是汉式戎服。从外形上看,很像宋代的交领缺胯袍,参照关羽图中将士的服饰,可以大致了解到:穿



图N—6 上:《舞乐图》中髻发形象。下:安西榆林窟第29窟西壁北侧男供养人像中髻发形象。

西夏语西夏国名称作“邦泥定”，译成汉语为“白上”，上，尚也，白上即尚白的意思，可见西夏是以白色为贵的。西夏是信仰佛教之邦，佛教又认为白是净行善业，尚白可能与宗教信仰有关。但从形象资料上看，服装上红、绿、黄、黑都有，唯独白色很少出现，而李元昊制定法律以紫色为贵，可见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出土的西夏金、银色为主，出土的铜甲片上就残留有金、银的痕迹。

元代武士复原图

铠甲根据沁水县元墓武士俑、日本画《蒙古袭来绘词》中元军形象复原；胄根据日本博多元寇纪念馆收藏实物复原；戎服根据乌鲁木齐齐盐湖古墓出土实物、陕西宝鸡元墓出土武士俑、山西汶水北峪口、内蒙古赤峰等地元墓壁画形象复原；革带根据山西永乐宫壁画形象复原；兵器根据盐湖古墓出土实物、山西汾阳五岳庙壁画、宝宁寺明代水陆画上的形象复原。





0—1 宝宁寺明代水陆画《大将军黄幡豹尾白虎金神青羊乌鸡众》中穿元代铠甲的将军图像

元代

(公元1279年——公元1368年)

12世纪初，当南宋与金因“绍兴和议”而暂罢刀兵、隔水（淮水）对峙时，北方草原上又一个少数民族正在崛起，这就是产生伟大统帅成吉思汗的蒙古族。蒙古原是蒙兀部落的名称，唐代称“蒙兀室韦”，蒙古草原统一以后，才成为各部落的通称。

大约在12世纪时，蒙古族通过辽金政权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开始从事农业并使用铁器。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草原，建立了蒙古国，被各部落尊称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即位后，在1218年至1258年的四十年间，数次率军远征，先后攻灭西辽、花剌子模、金等国，攻陷巴格达和达（大）马士革等城，使蒙古成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大汗国。从1236年起，蒙古开始对南宋发起进攻。这期间，忽必烈于1271年即帝位，改国号为元。在灭了大理、吐蕃等国以后，再次挥师南下，于1279年灭了南宋。嗣后又出兵日本、安南、缅甸、占城和爪哇，兵锋遍及东南亚。



0—2 宝宁寺明代水陆画《地府五道将军等众》，前右一将军为明代表甲，后三人为元代表甲，兵士脚上穿的履与居庸关云台元代石刻上的士兵所穿的履完全相同。



0—3 青海省西宁市红塔尔丰堡西吐蕃武士像

元朝之所以能东征西讨，依靠的是一支强大的军队。据《多桑蒙古史》记载，蒙古主力军“怯薛”军全部是骑兵，作战时每人配备战马数匹，用于昼夜驰骋时轮流坐骑。这支军队不但组织严密、装备精良，而且还配有火器。在精良的装备中，尤为突出的是甲冑。

在今俄罗斯彼得堡宫中，收藏有一领当年元远征军留下的铠甲。据描述，甲身全用网甲（*net armor*）制成，外边用铜铁丝缀满甲片，甲片大小不一，制作十分精巧。遗憾的是没有这领铠甲的照片，不能了解它的形制如何。能反映元代铠甲样式的是宝宁寺水陆画上的形象（彩图0—1），从图上可以看出，其腿裙很宽大，披膊用皮带交叉套束于身上，十分便于两臂运动。甲片很细小，这种小甲片好像很难用丝绳组编，而更易于用铜铁丝缀连，前臂甲也用同样的小甲片编制而成，整领铠甲的防护面十分大。



0—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北庭回鹘佛寺遗址南部配殿群东北角105配殿西壁壁画《分舍利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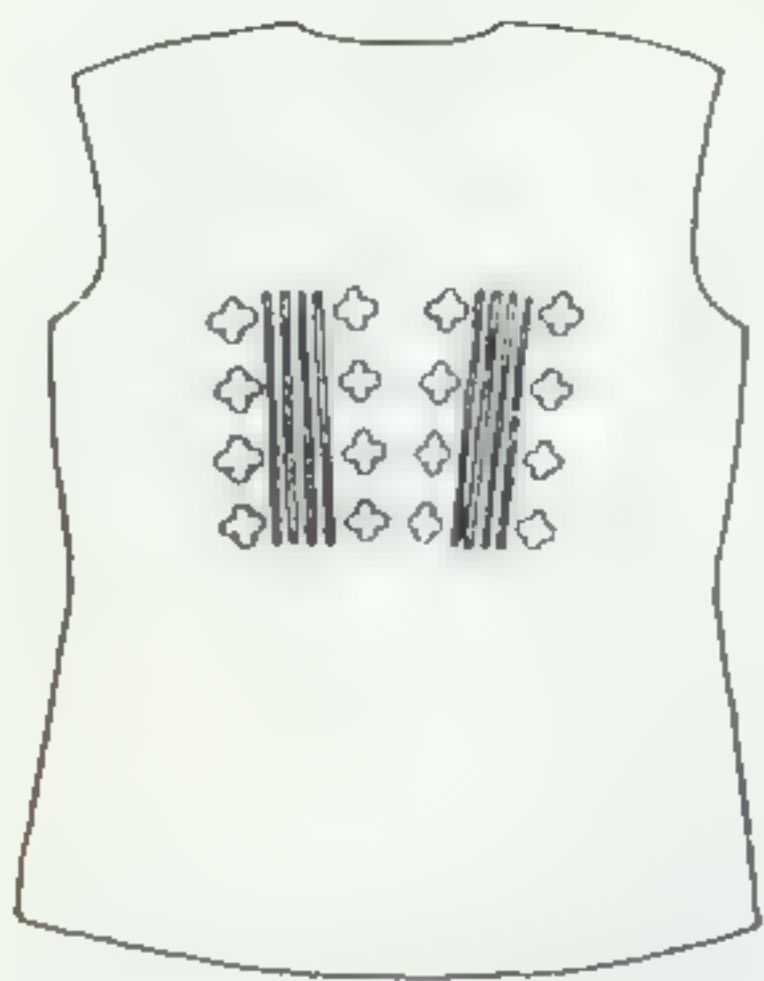


图0—1 皮胸铠，厚块漆皮制成，内联以钢丝，前胸部表面镶嵌银丝和花片，高640厘米，重6公斤，摘自《中国兵器史稿》。

可以抵御因炸弹碎片飞溅而造成的伤害，内外附甲片则因为当时的炸弹洞穿力还较弱，一般还不能连续击穿多层防护的缘故。

元代的铠甲从另外几幅水陆画上反映出长短两种，士兵好像都穿短甲，有的还无披膊。披膊去掉后可以看出胸背甲像两当铠一样，是在肩部用皮带系连的（彩图0—2）。元代铠甲的形成可能也受到过被征服民族的影响，塔尔寺的壁画和新疆维吾尔回鹘佛寺的壁画上，吐蕃与回鹘武士的铠甲都与元代有相同之处。史料也反映了蒙古初期的很多方面是从畏兀（回鹘）人那里学来的（彩图0—3、4）。

除上述这几种之外也有身甲与腿裙分为两截、腿裙较小、披膊披在肩上的铠甲，在披膊上还罩有皮革制成的、称作“贾哈”的披领（彩图0—6）。同时也采用南宋铠甲的形制，四川华阳出土的武士俑，从头上的盔到身上的甲，基本上都是宋朝样式（彩图0—7）。

元代也使用皮甲。山西沁水县出土的一件彩绘骑马武士俑，很清楚地塑造出元代皮甲的形制（彩图0—5），这件皮甲全部用大块皮革制成，身甲像一件皮背心（在周纬的遗著《中国兵器史稿》中也记录了这种皮胸铠，图0—1），披膊穿于身甲之内。最为特别的是甲裙，左侧一片并无异样，右侧一片呈“巾”形，伸出的三



0—5 山西沁水县出土彩绘武士俑（据实物写生），山西省博物馆藏。



0—6 宝宁寺明代水陆画《善恶二部牛头阿傍诸官众》中穿元铠甲将军像



0—7 四川华阳保和乡第五号元墓出土釉彩陶武士俑，四川省博物馆藏。



图0—3元代的胄和盔①②③：铁胄。①的眉庇下有面罩。上述三种胄原藏日本博多元寇纪念馆。④：皮胄。胄顶铜管用于装缨饰。日本福岡市元寇纪念馆藏。①—⑤摘自（日）原田淑人等《支那古器图考·兵器篇》。⑤⑥：铁胄。⑤为士兵胄。摘自《中国兵器史稿》。



图0—2②日本画《蒙古袭来绘词》中元军士兵，摘自《中国古代兵器图集》。此画为日本古代画家竹奇季长所作，他当年曾参加了与元军的战斗，图中所绘都是他亲眼所见，所以很有参考价值。

角正好作为前下腹的护甲。如果这件陶俑的彩绘没有剥落，我们也许能够发现更多的东西。

元代还出现了布面甲，日本福岡元寇纪念馆收藏了一领实物，日本画《蒙古袭来绘词》中也描绘出了它的形象（图0—2）。布面甲用布帛做表里，面上钉甲泡，内衬铁甲片（在要害部位）。这是一种比较轻便的软甲，其形制完全像一件上衣下裳或连成一体长袍。这是我国甲冑史上最后一代铠甲，明后期与清代基本上都采用这种甲衣。

元代还使用过蹄筋翎根铠。《涌幢小品》说：

元太宗攻金，怀孟人李威从军，患世之甲冑不坚，得其妇兄杜坤密法，创蹄筋翎根别之。太宗亲射不能入，宠以金符，威每战先登，不避矢石。（卷十二）

这种铠一定很轻软、坚韧，但是如何制造，形制怎样，现均已无任何资料可供查证参考。

元代的胄和盔，在日本保存有很多实物，都是用铁和皮革制成。将帅用的皮、铁胄，都用金银丝镶嵌出华丽的花纹图案，胄的前檐装有眉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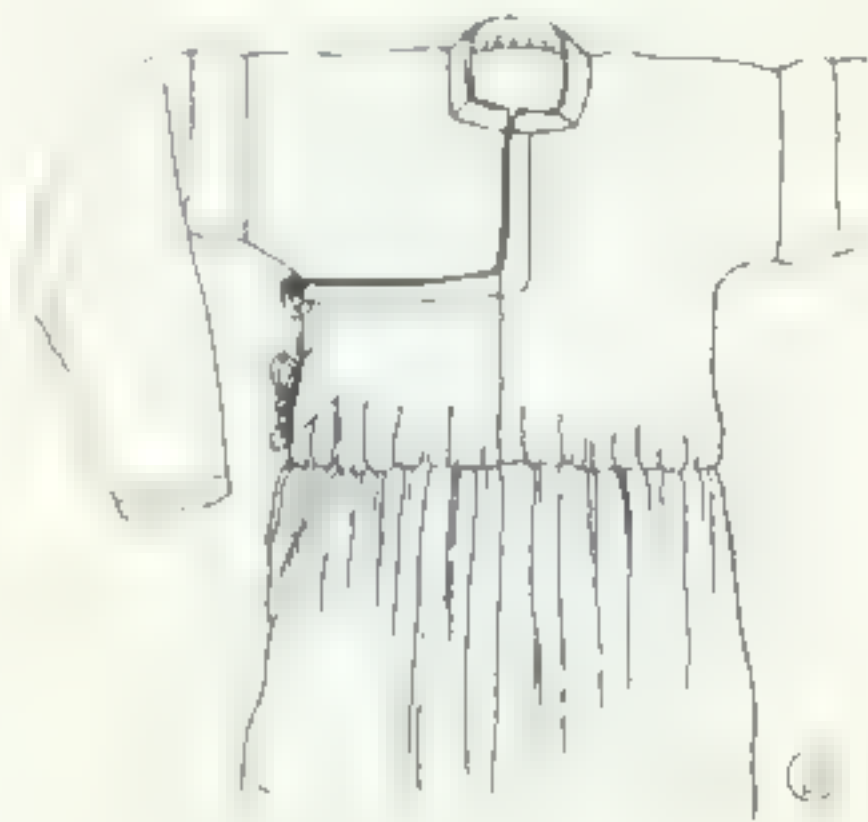
图0—2①日本福岡元寇纪念馆收藏的元代布面甲。

眉底下有的还装有面罩。面罩就是唐代的面铠，外形与唐代之前的已不相同，保护部位主要集中在脸的上半部。胄脑后的顿项有两种式样：一种分为二片，纯用绢布做面里，或在面里间衬以铁网，表面钉上甲泡做成。一种护耳护项连成一体，用甲片编成（参见图〇—3）。同时也使用宋代的凤翅盔和唐代的兽头盔（参见彩图〇—1、7），兽头盔上的兽头已明显变小，差不多变成了盔顶的装饰。布面甲的胄的顿项，护耳下端于下颌处合拢，遮住了整个喉项部位（参见图〇—2），此式顿项后来为清代所采用。

元代的戎服，在建国之初无论将帅士兵（实际是无论皇帝和百官），只有一种本民族的服饰——质孙服。《元史·舆服志》载：“质孙，汉言一色服也，……冬夏之服不同，然无定制。凡勋戚大臣近侍，赐则服之。下至于乐工卫士，皆有其服。粗细之制、上下之别虽不同，总谓之质孙云。”它是紧身窄袖的袍服，有交领和方领、长和短两种，长的至膝下，短的仅及膝。方领式在腰间裁开，裁开处打有很多襞积收腰，交领式则一通到底。两式袍服的两侧均不开衩，



〇—8 宝宁寺明代水陆画《往古庭典婢妈弃离妻子孤魂众》中穿有细褶的质孙服的元人形象



图〇—4①：西安南郊出土男立俑，录自《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0期。②：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旗墓出土方领质孙服，甘肃省博物馆藏。③：元太宗窝阔台像身上所服即方领质孙服，故宫博物院藏。



元代



0—9 河北石家庄市郊上京村毗卢寺后殿南壁壁画《三界诸神图》中元朝差吏头上戴的是草或藤帽，袍服外披的是“比肩”

但下摆都很宽大，以衣料和颜色的不同来区分尊卑品级。两式袍服在甘肃漳县和内蒙古集宁市都有实物出土，在元代的墓室壁画、陶俑和绘画作品中也经常出现（参见图0—4；彩图0—8）。

另有一种式样与质孙服完全相同，但在腰部细褶上钉有密密的横向装饰用彩线绣成的纹样，称作“辫线袄”。辫线袄也有出土实物，可惜这件实物的前襟已朽烂，无法了解衣襟的开法和衣领的式样（图0—5），但墓室壁画的形象弥补了这一缺憾（见图0—1）。辫线袄在《元史·舆服志》中多处提到，如：“羽林将军二人，……着紫罗衫，……紫袖细褶辫线袄”，“宫内导从……佩宝刀，……着紫罗衫，……紫袖细褶辫线袄”，“服紫罗辫线袄”等，是元代的蒙古式戎服，军服和官服都有使用，武士都习惯用。

元式戎服中还有一种称作“比肩”的无袖长袍，穿着时“襟于膝间”，其式样与唐、宋时代的背子基本相同，为帝王和职位较高的官



0—10 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区永营子沙子梁元墓壁画，（见《中国美术全集》墓内壁画专集）。



0—11 宝宁寺明代水陆画《往古文武官僚宰辅众》中穿元式戎装和官服的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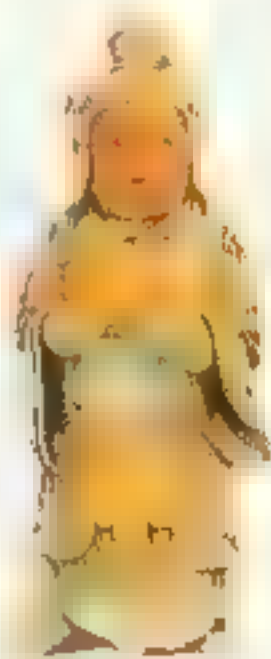
图0—7①元世祖忽必烈像，头上戴的是金答子暖帽。故宫博物院藏。②山西大同元代冯道真、王青墓出土藤、草帽，大同市博物馆藏。③元代刻本《事林广记》插图，此图中人物头上所戴即是冯道真墓出土的藤草帽。④⑤太原市小井峪元代墓壁画，图中人物头上所戴均为毡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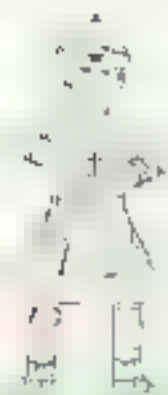


图0—5新疆乌鲁木齐盐湖古墓出土的黄色油绢织金锦边袄子（背面），腰部钉有三十道辫线，共宽9.5厘米。辫线用数股丝线扭结而成，在腰的右侧，每两根辫线合并成一根，上面装有一细纽。由于腰部并不开衩，所以辫线、细纽都只是装饰。录自《文物》1973年第10期



图0—6佩剑骑士俑，山西省博物馆藏。





图〇—8 上左：前檐帽，棕丝编制，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前檐帽见《元史·世祖昭睿顺皇后传》记载：“旧制帽无前檐，帝因射，日色炫目，以语后，后因益前檐。帝大喜，遂命为式。”上右：凉帽，丝织材料缝制，顶上饰有串珠。出土、收藏地点同上，彩图〇—8后面两人即戴此帽。下左：山西沁水出土元骑马俑，头上所戴即饰有红纬的笠，山西省博物馆藏。下右：陕西省宝鸡市元墓出土陶武士俑，头上所戴为髻笠，录自《文物》1992年第2期。

员所服，一般罩于质孙服的外面（彩图〇—9）。

宋代的貉袖元代也继续使用，貉袖这时已变成小方领、中长袖、前襟用衣扣的短褂，这种短褂是清代马褂的前身（图〇—6）。

蒙古式戎服的冠饰是帽和笠。穿质孙服时，冬服戴暖帽，夏服戴笠和凉帽，笠和帽的颜色要与袍服的颜色相近、相配。穿辫线袄时，戴汉式幞头或元式笠、帽都可，比较随意。

暖帽有金答子暖帽、貂皮暖帽、毡帽、鞑帽等几种，凉帽有草帽、藤草帽、檐帽等几种。草帽和藤草帽的式样很奇特，帽顶是正方形或六角形的（图〇—7；彩图〇—9）。檐帽有前檐帽和大檐帽两种，前檐帽用棕丝编成，额前有帽檐，脑后为软檐披于后。大檐帽如今天的草帽，用丝织材料缝制，这四种凉帽都有出土实物（图〇—8上左、右）。笠有髻笠和顶上饰有红纬的笠两种。髻笠的外形像锣鼓器乐中的

钹，所以又称钹笠。顶上饰红纬的笠在清代称作“红纬帽”，是百官的官帽（图〇—8下左、右）。

蒙古贵族统一中国后，为了巩固政权，争取汉族上层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支持，在各方面都“遵行汉法”。定都北京后，朝廷制定百官的礼服、公服，“近取金、宋，远法汉、唐”（《元史·舆服志》），大都采用汉制。

武官的公服与宋代完全相同。只有腰带的带尾像金朝，拖得较长，下级武职人员的公服则采用辽金的服饰，头上戴无脚硬裹幞头（彩图〇—11、13）。

侍卫武士的汉式戎服是唐宋形制的短后衣，身上束两层袍肚，内层是金的式样。元代称为“捍腰”；外层是宋的式样。头上都戴辽的交脚硬裹幞头，幞头上一一般都系扎各种颜色的抹额（彩图〇—12）。

宋辽时期罩于铠甲外的短绣衫，元代也仍然使用，其式样也没有任何变化。（图〇—9）

据《元史·舆服志》记载，元代的仪卫服饰有交角幞头制、凤翅幞头制、锦帽制、平巾幞制、巾制、兜鍪制、衬甲制、云肩制、裯裆制、衬袍制、辫线袄制、士卒袍制等三十三种服饰。在穿戴时，一般以其中的一种冠或袍服为主，配以其他的服饰。根据元代的各种形象资料，现综合出如下一些仪卫服饰的穿戴方法，供读者参考：

1、戴交角幞头、凤翅幞头时，身上所服为缺胯袍、辫线袄两种，袍服外要系袍肚、捍腰，足穿靴（参见图〇—10①、②、③）。

2、戴锦帽、髻笠时，身上穿交领或方领质孙衣，有时腰间要束带系汗巾，前腹后臀上垂有皮质的蔽前蔽后，足穿靴或鞣靴（参见图〇—10④、8下右）。

3、戴巾时可穿方领质孙衣或短后衣。穿质孙衣时，腰间要束带系巾。穿短后衣时，要束袍肚、胫甲和臂甲（参见图〇—10⑤、⑥）。

4、戴平巾幞时，身上所服为盘领窄袍，袍盖手，腰间也要束带系巾，垂蔽前蔽后，足穿鞣靴（图〇—11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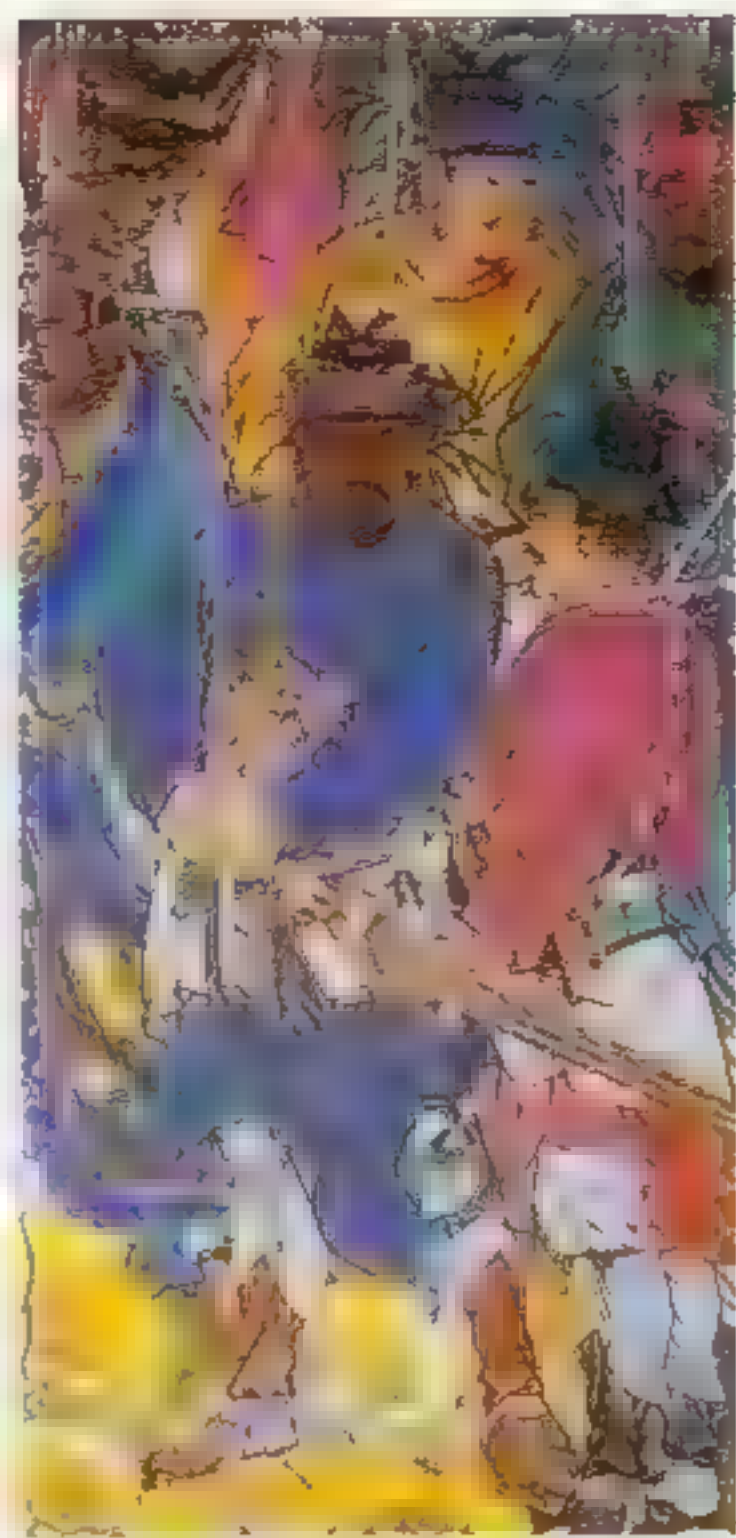
5、戴兜鍪或毡笠时，身穿裲裆甲，有的甲外罩绣衫，为表甲制。铠甲一般只穿身甲，披膊和腿裙都不用，铠甲内衬短后衣，有时还系肩巾（图〇—11中、右，12左）。

6、戴交角幞头时，也可穿短后衣，短后衣外罩绣衫，为表甲制（图〇—12右）。第5、6两种的穿法中，腿上均要束胫甲，缚裤，有时还要束臂甲，脚上穿靴或履都可以，视其身份不同而定。

上述介绍的各种服饰的穿法中，除少数几种采用蒙古服以外，大部分都是汉式衣冠。

蒙古人因惯于骑马，平时一般都穿靴。靴的种类很多，有鹅顶靴、毡靴、鹄嘴靴、云靴、皮靴、鞣靴、高丽式靴等，这些靴有的已无法根据形象资料来辨认，只有鹅顶靴、鞣靴、云头靴等几种比较容易识别。普通士卒则有穿鞋袜的，鞋袜用麻制成（图〇—13）。

元代的腰带也有汉式与蒙古式两种。汉式基本上是宋辽金的腰带，没有变化。带铐以玉



〇—12 山西芮城永乐宫三清殿东壁壁画《朝元图》中天丁力士形象。前二人肩上都背了一条用战国式带扣的锦带，不知何用，可能不只是一种装饰。



〇—13 山西芮城永乐宫重阳殿西壁壁画《王重阳》中穿元代官服和侍卫服饰的人物，官服与（〇—11）中的完全相同。





为一品，分素面和镌图案二种；花犀为二品，一般是素面；黄金为三、四品，用荔枝图案；五品以下用乌犀，铸款只能是八铸，带鞞为六品。蒙古式则是一根一头有环的皮条，围在腰部后，另一头打结穿入环中，伸出的带子称为鞞带，其束发与系法参见图〇—14。

蒙古族男子皆束发，“全收吉思汗”及国入皆礼崇拜，如束发小，一搭一搭束在额前者，稍长则束之，在额下者束于后垂于肩”（《蒙古鞞备录》）。正中一搭长至眉间的，蒙语称作“不狼儿”，两侧两搭余发可编成辮发，也可扎成发

髻（图〇—15）。

元代服饰一般都是金、银黑色，衬于铠甲内袍的衬袍也以白色为主，夹杂以红、青、黑等色。公服一至四品为紫色，六、七品为绯色，以衣料上花纹直径的大小来区别，八、九品用绿色，为无花纹的罗。元代服饰的等级颜色很多，冬服九等，夏服十二等，以制衣锦缎的优劣、名目程度来区分等级，颜色大致有大红、桃红、紫、蓝、绿、黄、黑、白、青、褐、灰褐、茜红等多种颜色。



图〇—9 元佚名《搜山图》中鬼神形象，短绣衫的袖口比宋辽时期的要小 故宫博物院藏



图0—10 ①山西汾阳五岳庙水仙殿元代壁画。②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元墓壁画，二图中的人物头上戴的都是凤翅幞头。③山西文水北峪口元墓壁画，左侧一人戴的是交脚幞头。④内蒙古赤峰三眼井元墓壁画，前一执鞭人物头上戴的是锦帽，参见元太宗窝阔台像（图0-5右下）。⑤山西汾阳五岳庙五岳殿南壁西侧门神（曾经清代重画）。⑥故宫博物院藏元卫士俑，俑头上戴的巾可能是宋代的硬裹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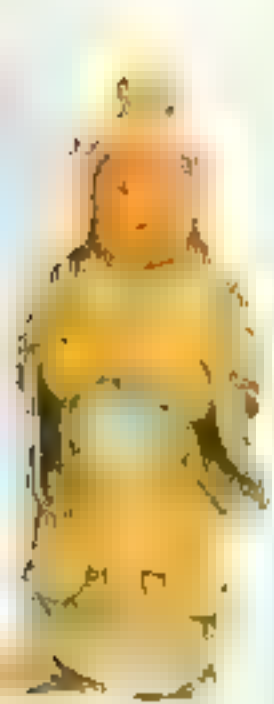


图0—11左：陕西户县元贺氏墓出土兵士俑，头上戴的可能是平巾幘。《元史·舆服志》曰：“平巾幘制，黑纱革为之，形如进贤冠，以皮加黑漆，唯黄为缘。”此俑的冠与记载基本相符。中、右：北京市昌平区居庸关云台元代石刻（局部）



图0—12左：山东济南千佛山元墓壁画 右：宝宁寺水陆画《日月年时四直功曹使者》



图0—13 元代的各种靴和履。从左至右：鞣靴、皮靴、鹤顶靴、云靴、鞋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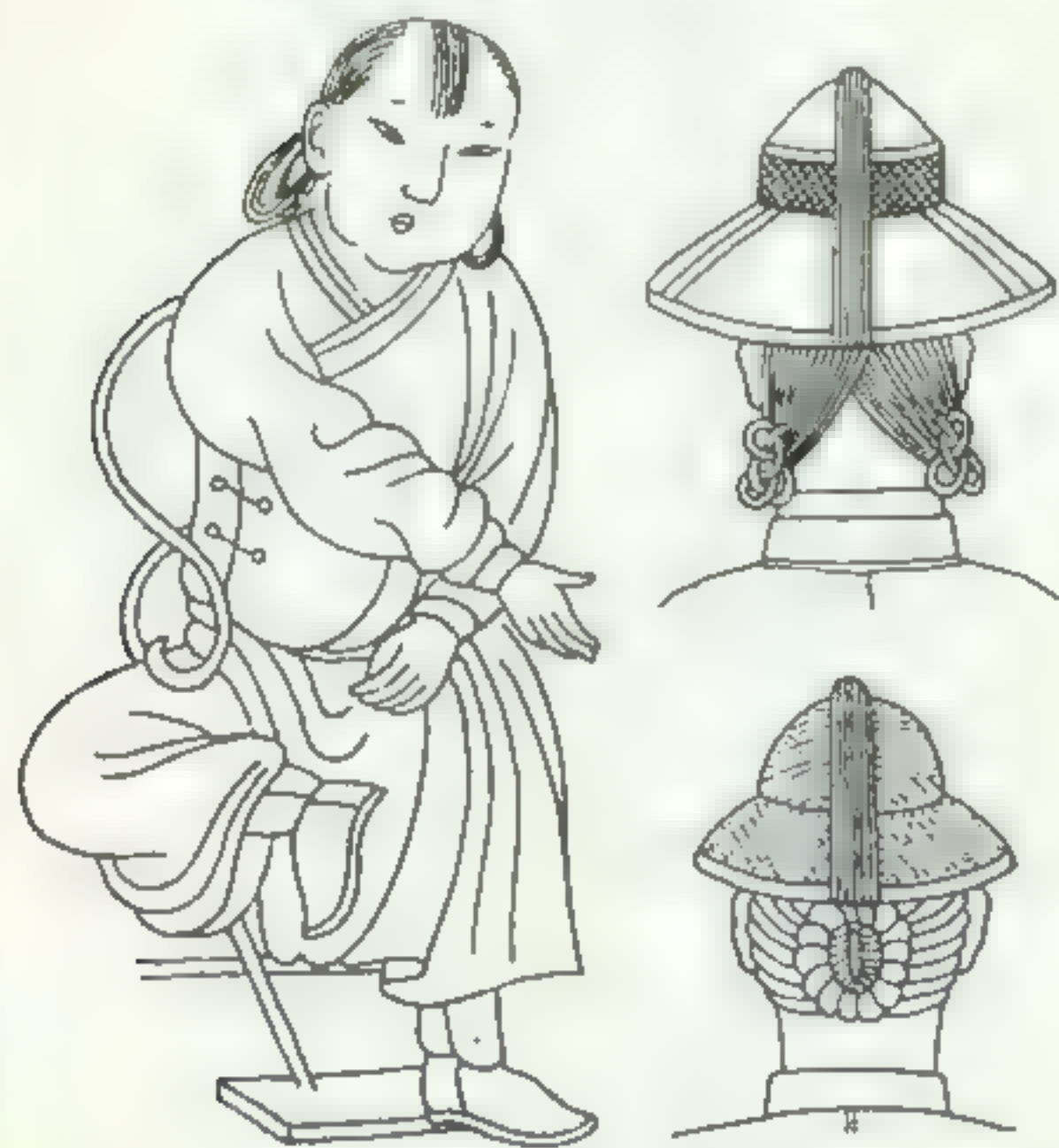


图0—15 上：元成宗像，故宫博物院藏。下左：元刻本《事林广记》插图中判妾供头人物。下右：陕西宝鸡元墓出土戴笠俑，为两种余发的编束样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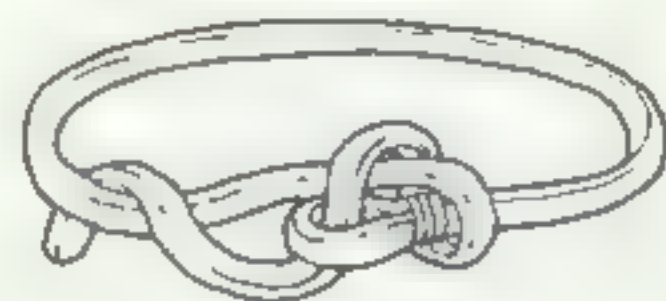


图0—14 上：陕西宝鸡元墓出土的陶俑。下：蒙式腰带系扎法示意图



明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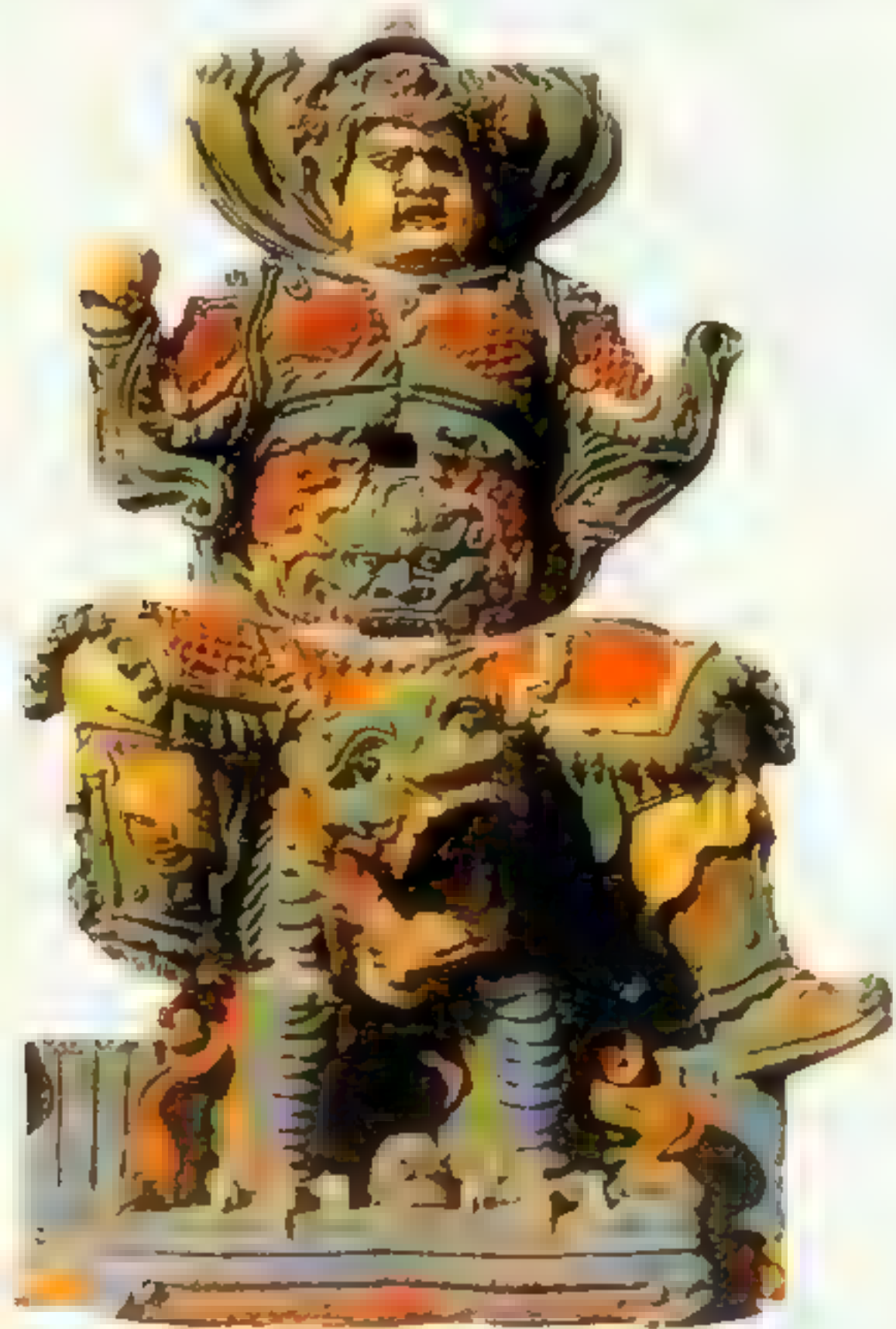
明代武士复原图

甲冑根据敦煌市、山西省博物馆收藏实物、十三陵石刻与出土实物、山西浑源梁疏美墓石刻复原；戎服根据《王琼事迹图》、《义烈传》插图、湖北武当山金顶殿铜像、山西平遥镇国寺壁画等形象复原；革带根据江苏南京、辽宁鞍山倪家台等地明墓出土实物复原；兵器采用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戚继光钢刀、李自成起义军用铁刀、成都凤凰山明墓出土铁刀、铁弓、日本有马成甫藏铜手铳，参照《乡约》、《练兵纪实》等书插图复原、设计





P—1 北京昌平十三陵神道石刻镇墓兽形象



P—2 山西省洪洞县广胜上寺飞虹塔琉璃像

明代

(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

元末爆发的红巾军大起义，使元朝的统治走向了崩溃。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也参加了起义军，经过几年奋斗，很快从一个下级指挥官成为据有今山东、河南、苏江东南等地的大军阀。1360年脱离红巾军，就以未来帝王的身分开始进行统一战争，次年八月，北伐军攻进元大都（北京），元朝灭亡。与此同时，朱元璋也在南京登基，建立了明朝。

明皇朝建立之初，北有元的残余势力，南有夏等割据政权，沿海各地的倭患也很严重。这些都促使明皇朝积极采取措施，发展军事生产，提高火器和铠甲制造的水平，不断加强国防力量。

据《明会典》记载，明代的甲冑绝大多数用钢铁制造的，技术十分先进，种类有齐腰甲、柳叶甲、长身甲、鱼鳞甲、曳撒甲、圆领甲等。铠甲的各部件都有严格的重量规定，在形制和式样方面也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众多的资料表明，明初的铠甲基本上是北宋的形制，有些还采用了唐、五代时期的式样。比较典型的形象是北京昌平十三陵神道上的武将石刻（彩图P—1），身上的甲冑除各种形制一如宋制，连袍肚、胸前束带打结也与宋陵石刻上的方法一样（参见宋代彩图K—2）。唯一不同的是前胸正中增加了护心镜，这是从辽朝的铠甲中吸收来的。与这件石刻相同的铠甲形象是广胜寺飞虹塔上琉璃雕像和抚顺市元帅府的石刻武将像（彩图P—2、3），后一雕像的两片腿裙中间，出现了长长的鹞尾，这种三角形的鹞尾是明代特有的。

在山西浑源紫微墓神道上，有一尊保存很完好的入塔石武将雕刻像。甲冑服饰各部细节刻画十分细致，是很好的参考形象（彩图P—4）。

这尊石像表现的是明中期的甲冑形象，虽然仍保持了明初的基本风格和样式，但很多地方已开始发生变化。首先是兜鍪，已不再是宋代的凤翅盔，盔檐两侧的装饰像卷云。顿项为





P—3 辽宁省抚顺市元帅府明代石武士将军像

式，但不同于五代时期的外形和安装方法，据说各片甲片，是用皮革制成的，上面钉有甲泡，系于颈下的系带平时几乎紧贴身体，护心镜用带子束于胸前，这一点与十二陵和抚顺元帅府的石刻像明显不同。袍肚的式样则像南宋的，腰部有兽头护腹甲（护腹甲被两手挡住，从像上难以看清），垂于腹下的鹞尾，与抚顺元帅府的石刻像翻卷的形象来看，有可能是用布或皮革制成的，甲片上，缘处各有小孔，以便穿系带，皮带的扣环，有用于挂腿裙而设的装置，在披膊上也有连接臂甲与披膊的装置。臂甲和保护臀部与大腿上下两片甲，很像是用皮革制成的。细节上不够明确的是胸背甲，在方形甲片的上面还有如卷云的纹图案，图案上又钉有甲泡，这或许是雕刻师加上去的装饰。



P—4 山西省浑源县清泰疏美墓神道上大理石武将雕刻像



P—5 山西太原崇善寺明代彩塑天王像
(据实物写生参照照片绘制)



明代

可以清楚地看出,稷益庙天王像为典型的宋初铠甲,与湖南明皇陵石像的铠甲完全一样(彩图P—7)而宝宁寺水陆画的神将铠甲则与五代王建墓宝盖盖上武将银饰片的铠甲相同,特别是束于腹部的圆形护甲如出一辙。相比之下,较写实的是平遥清凉观的两座神像,除了腿裙膝部的兽头比较夸张外,其余各部分都属合理,这二式铠甲是明中期的典型形制(图P—1)

仔细观察太原崇善寺、平遥双林寺和清凉观的神像,可以发现明代铠甲的甲片出现不少新的变化:甲片已不再是薄平片,而成为有棱有角的、中间突起的甲泡,这种甲泡不仅增加了甲片的强度,也改变了甲的编缀方式。明代的甲片表面已看不出编甲片的绳索,甲片之间都是用甲钉钉在甲衬上的,所以明代的甲片看上去都很小。

明代中期火器制造得到进一步发展,欧洲的佛朗机和红夷大炮也相继传入。这些近代兵器的出现,将旧式铠甲无情地淘汰了,代之而起的新式铠甲主要是锁子甲和布面甲,特



P—8 山西省新绛县稷益庙正殿东壁壁画



P—9 宝宁寺明代水陆画《守斋护戒诸龙神众》中穿明式铠甲的神将



P—10 明崇祯山西总兵周遇吉所属宁武路静乐营二队鸟枪手守长赵勇所穿盔甲实物,山西省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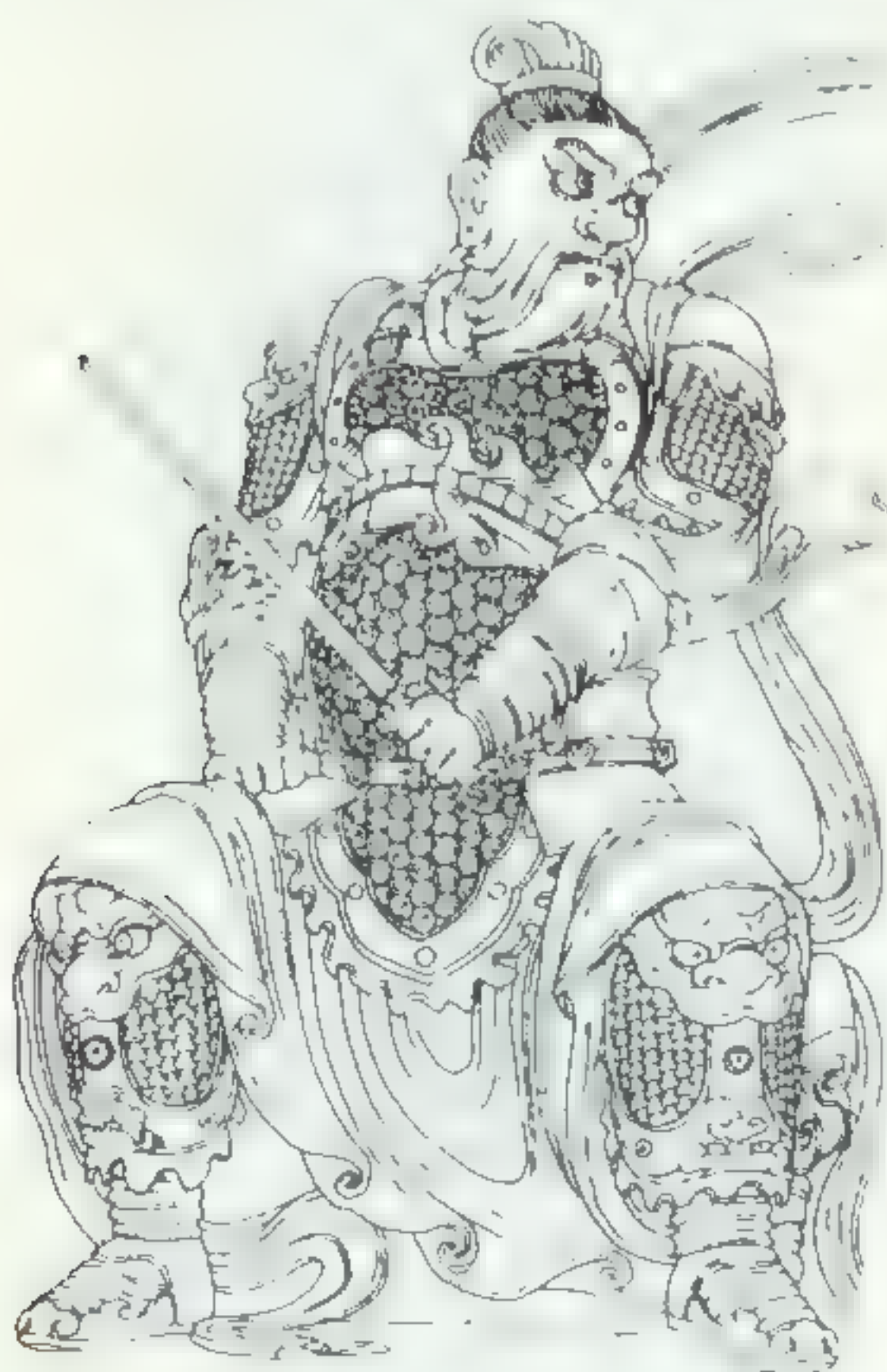
图P—2左：明代短袖锁子铁甲，敦煌市博物馆藏。右：明御林军使用的长袖、有腿裙的锁子铁甲，山西省博物馆藏。

轻便、结构简单而遮盖面大。

锁子甲在汉唐时称环锁甲，是以小铁环相互套连编成的铠甲，当时还属于十分贵重的稀珍物品，元代时使用已较普遍。但元代的锁子甲外表缀有铁甲片，可能铁环也比较大。到明代时，锁子甲都用直径一厘米左右的铁圈编连，也不再缀甲片配内衬了，直接套于戎服之外。

明代锁子甲的形制，根据《武备志》记载，大部分都是半身的，少数也配有腿裙。这种锁子甲与旧式铠甲相比，同样是钢铁制造，但是要轻便得多（图P—2）。

布面甲是从元代继承而来的，制造方法分两种，一种是元代那样，以布为面甲，中间缝以铁线，表面钉甲钉（彩图P—10）。另一种称绵甲，“其制以布为面，缝如夹袄，两臂过肩五寸，缝线横直。缝紧入水，浸三日，铺地，用脚踏实，以不肿胀为度。晒干收用，见雨不重，霉鬓不尽，鸟铳不能大伤”（《涌幢小品》卷十二）。这两种布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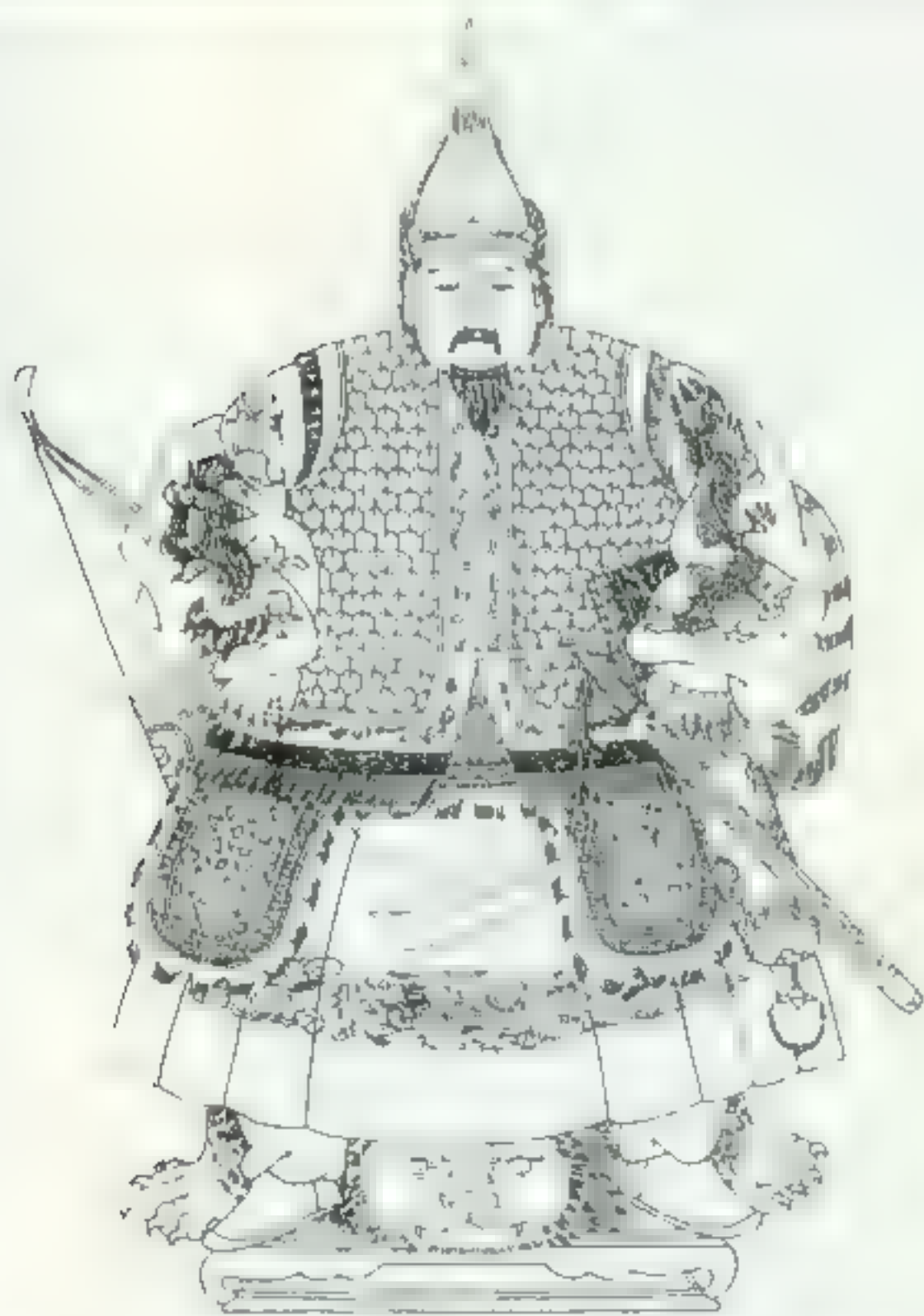
图P—1山西平遥清凉观明塑护观神将（据照片绘制）。



明代



图P—3 明皇陵石刻镇陵将军像，洛阳市关林石刻陈列馆藏。



图P—4 明人绘《王穉登迂图》中穿罩甲提督。此图罩甲内穿的是蟒服，《明史·舆服志》载：“……永乐以后，宦官在帝左右，必蟒服，制如曳撒，绣蟒于左右，系以鸾带，此燕闲之服也。……贵而用事者，赐蟒，文武一品官所不易得也。……又有膝裯者，亦如曳撒，上有蟒补，当膝处横织细云蟒，盖南郊及山陵扈从，便于乘马也。或召对燕见，君臣皆不用袍，而用此。”图中的袍服图案与上述记载相一致。蟒服应属公服一类，此图可以证明公服有时亦可做为戎服穿于铠甲之内。

但是专门用来对付管形火器的，这些软甲在明后期大量使用的事实，实际上宣告了铠甲的历史使命行将结束。

在重甲更为轻便的是罩甲，罩甲出现于明中期，分为两种：一种是用甲片编成的，形如裙甲，有腿裙而无披膊，有腿裙者一般称为裙甲（图P—3、4），士兵则穿无腿裙的罩甲（图P—5上）。另一种纯用布为面料，中间不敷甲片，开始只有军队使用，到后来民间士、市井平民都争相仿效，“金绯盛服者，比比于上”（《明史·舆服志》）。朝廷只得于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下令禁止民间人等穿罩甲，其余的颜色则听便（当然不包括龙袍的颜色），所以罩甲后来成为明代百姓的一种时装（图P—5下）。

明代沿海和少数民族地区在嘉靖年间出现过很多民间武装，这是在倭寇大举入侵时，为



图P—5上：宝宁寺明代水陆画中穿短罩甲的明军士兵。下左：明万历刻本《元曲选》插图中穿布罩甲的将士。下右：明刻本《义烈传》插图中穿布罩甲的吏卒。



图P—7明代的各种盔①②铁盔，此式应是沿袭元代。③④御林军用铁盔，按《明会典》记载，应称为水磨锁子护项头盔。此四图录自《中国兵器史稿》。⑤一块铁盔。⑥四明盔，可能即四瓣明铁盔。⑦六叶盔，可能即六瓣明铁盔。⑧皮穿柳叶盔。此四图录自《武备志》。



图P—8宝宁寺明代水陆画中的足护甲形象

保卫家乡而自发组织的。这些民间武装就地取材，曾使用皮革、牛角片、藤等材料制甲。《武备志》等书对这些特殊的甲冑都做了记录(图P—6)，其中的皮甲在今天的凉山彝族地区还收藏有很多实物。其传统的制甲技术到解放初期也仍在使使用，制造出的皮甲曾作为珍贵的礼物送给毛主席等中央领导，这些皮甲反映出古代制甲工匠的高超工艺水平(彩图P—11)。

明代后期的铠甲虽然日趋轻便简单，但保护头部的盔却相反变得越来越坚固、考究，这可能是身体轻便灵活，躲避较为方便后，头部常常成为主要攻击目标的缘故。

据《明会典》记载，明代的盔有铁帽、头盔、锁子护项头盔、抹金凤翅盔、六瓣明铁盔、八瓣黄铜明铁盔、四瓣明铁盔、摆锡尖顶铁盔、水磨铁帽及头盔、水磨锁子护项头盔、八瓣盔，《武备志》中记录了六种并有附图。(图P—7下面四种)《中国兵器史稿》中也收录了一些，其制的插图也比较准确(图P—7上面四种)。从盔的名称来看，基本上都是钢铁制造的。从式样来看，有的明显是沿袭元代的，余如凤翅盔，应是仿照宋代的，铁帽的形象则可参考图P—10。



图P—6上:《武备志》书中记录的粤兵盔甲，左为铁制盔帽，右为甲衣，披膊是用牛角片制成，身甲为革制。下:《筹海图编》记录的赤藤甲，左为甲衣，右为盔笠(正、俯图)，制作方法，将藤浸晒后编成，外涂桐油，轻坚利便。



P—11 明代彝族皮甲盔由三块圆甲片组成，头顶一块，两耳处各一片，中间用皮线连系。身甲的腰以上由十块大甲片组成胸、背、肋甲，甲裙由四排小甲片编成。编缀用的都是皮绳。臂甲和膝甲都用厚皮块制成。甲的表面髹漆，上面绘有精美的彩绘，有的还镶嵌了银饰。肋甲的边上都注有制作年代，有时还写上一些表示吉利的赞语。





P—12 宝宁寺明代水陆画中穿朝服(左二人)、公服(右一人)的明代官员形象



P—13 宝宁寺明代水陆画中的貂蝉冠形象

保护足部的卫足正式见于记载是在明代,一种是用铁网制成的甲靴,另一种如辽金时期的护甲。护甲以皮或厚毡裹于胫部,或连接在胫甲上,用带在踝骨处束紧,伸出的部分覆盖住脚的背面,五代宋代的靴鞋,护甲也可用木或竹片,或竹片上;图P—8、9)

明代建立后,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完备,在戎服方面,统治者为了加强专制,采取多种手段加强专制,其中一种就是制定了一整套十分周密的官制和复杂的礼仪制度。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朝廷曾七次下诏规定文武百官、士大夫乃至社会各界人士的服饰,简直是样样都有定制,不可随便逾越、违背。

武官九品以上有四种官服:朝服、公服、常服和赐服。这四种服饰中,公服和常服在明初是合二为一的,中期开始分开,除常服使用较普遍以外,其余三种都属宫廷服饰,不属戎服范围。

图P—12、13为朝服和公服形象,朝服为唐宋以来的传统样式,除了梁冠的外形、各品级服饰颜色有小的变化以外,其余没有什么不同。公、侯、伯级的官员,在朝服梁冠上戴笼巾,有笼巾的梁冠也称貂蝉冠,外形与朝服基本相同

公服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制定,“每日早晚朝会及侍班、谢恩、见辞则服之。在



图P—9四川成都凤凰山明朱悦嫌墓出土陶武士俑,此俑的靴上覆盖有护甲,护甲可能与胫甲相连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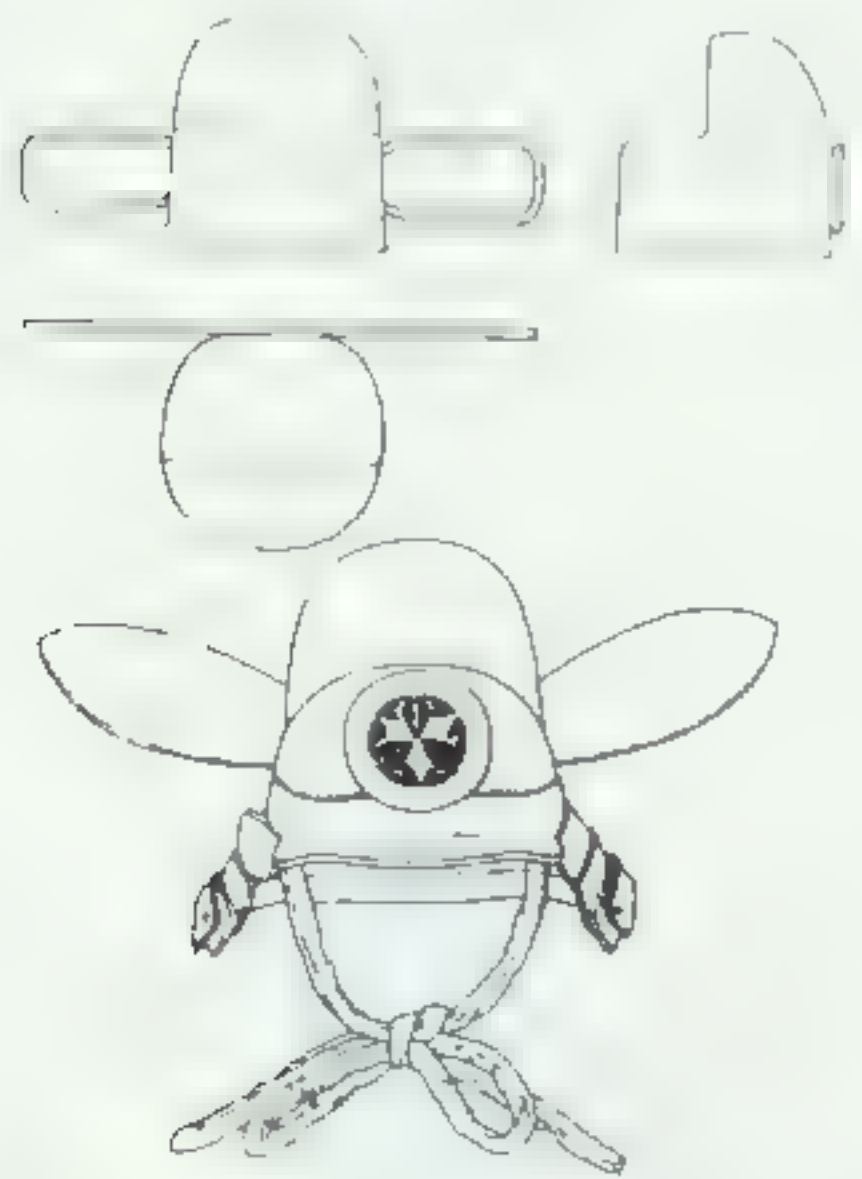
明代

外文武官，每日公事服之”(《明史·舆服志》三)。这也是宋制，除幞头的展角尖微有变化外，其余都基本一样。

常服定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是文武官员“常朝视事”的制服，使用场合较多，在没有制定公服制之前，它实际上就是公服。袍服的形制与公服相同，以胸背上的补子和袍服颜色区分品级。常服在江苏泰州明刘湘墓中有实物出土，各品级的补子在《三才图会》书中有图录(图P—10)。

穿常服时要戴乌纱帽，乌纱帽在上海卢湾区发现过实物(图P—11上)，据记载隋文帝时就使用过这种官帽，唐高宗时一度也使用过。可能因为使用的时间都较短，所以在隋唐时期的形象资料中，至今没有发现过戴乌纱帽的人物。这种乌纱帽还流传到日本，被制成日本武士上的一种头盔(图P—11下)。

明代的赐服与宋代的时服性质相同，但内容有所不同，所赐服饰只有公服常服形制的补服一种，而且专指品级未到而早于时穿的官服。最贵重的有三品：一品蟒服、二品飞鱼服、三品斗牛服(正德十三年曾变更为一品斗牛、二品飞鱼、三品蟒，至嘉靖元年又重新改回)，以胸前



图P—11上 上海卢湾区出土的明番氏墓出土乌纱帽(正视图，上海博物馆藏)下 [日] 斋藤直成收藏鎏金唐冠形兜鍪，录自《日本甲冑图解辞典》。



图P—10上：武官九品补子一、二品：狮子补，三品：虎补，四品：豹补，五品：熊黑补，六、七品：彪补，八、九品：海马补 录自《三才图会》下：织狮补服，南京博物院藏。



P—14 王翥写真像明佚名画《明史·舆服志》载“单蟒面皆斜向、坐蟒面正向、尤贵……当膝处横织细云蟒……”此服应为单蟒服



P—15 山西省太原市关帝庙彩塑关羽像

的绣纹图案来命名。蟒、飞鱼、斗牛外形均像龙。蟒为四爪（比龙少一爪），飞鱼龙首、鱼尾，身上有鱼翅。斗牛也是龙首，但牛角、鱼尾，飞鱼服在山西省博物馆藏有实物，蟒、斗牛的形象可参考明李邦镇、王鏊画像（彩图P—14、图P—12①②③④）。

常服和赐服虽也不属于戎服范围，但常服作为武官的品级制服经常要穿戴。明皇朝继承宋的衣钵，在政治上以各种方法抑制将帅，武将如要获得较高的官职，都要经过文试才能进入仕途，重文轻武的风气影响整个社会。因此，武职人员除了作战和必须穿戎服、铠甲的场合以外，平时都穿常服（文武官相同）和士大夫的服饰。为了比较明显地区分文武官的制服，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规定：“文官衣白领至肩，去地一寸，袖长过手，复回至肘。……武官去地五寸，袖长过手七寸”（《明史·舆服志》），《明史·舆服志》（《明史·舆服志》）。明后期由于绵甲已变成与袍服一样的形制，武官的常服，甚至赐服此时也经常作为戎服穿着（图P—14、图P—15、图P—16、图P—17）。

明代常服，其形制如唐代的窄袖宽袍，这种袍无领、无扣，右衽，裹襟与外襟在前身重叠时大襟在上，以勒帛和腰带在胸部和腰部系束。除袍服外，常见的有两种穿法：一种是袒露右臂，右侧衣袖掖入背后腰带（有的袍服根本就没有右衽）；另一种是穿双袖，但袖口宽大，袖口处有衣甲，其形象参见图P—13、彩图P—15、17。这种戎服或称“缺胯袍”，其形制与常服相似，一般都戴巾或幞头。

明代常服时的短后衣和缺胯袍，在明初穿法与宋元时期相同，既穿在外表，也衬于铠甲内。这两种穿法同时又是军队和宫廷内的侍卫、仪仗服饰。服短后衣穿铠甲时，一般只穿身甲和腿裙。短后衣或缺胯袍穿在外面时，则像元代时束两层袍肚，肩系四垂巾，这两种仪仗服饰在明代很盛行。与这些服饰相配的冠也比较随便，可以是凤翅盔，可以是幞头，也可以戴巾和小冠（参见图P—14、图P—16、图P—17）。





明代



图 P—13 湖北武当山金顶殿真武大帝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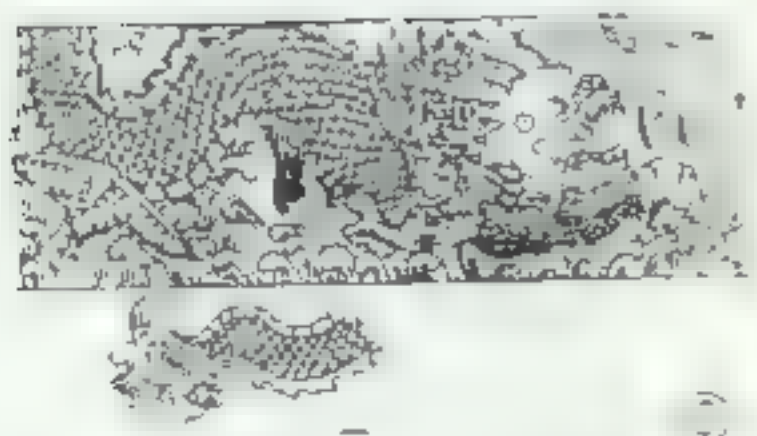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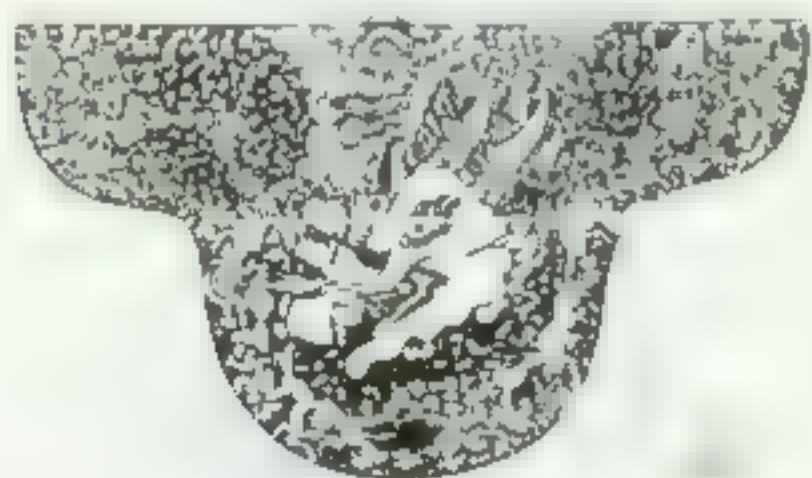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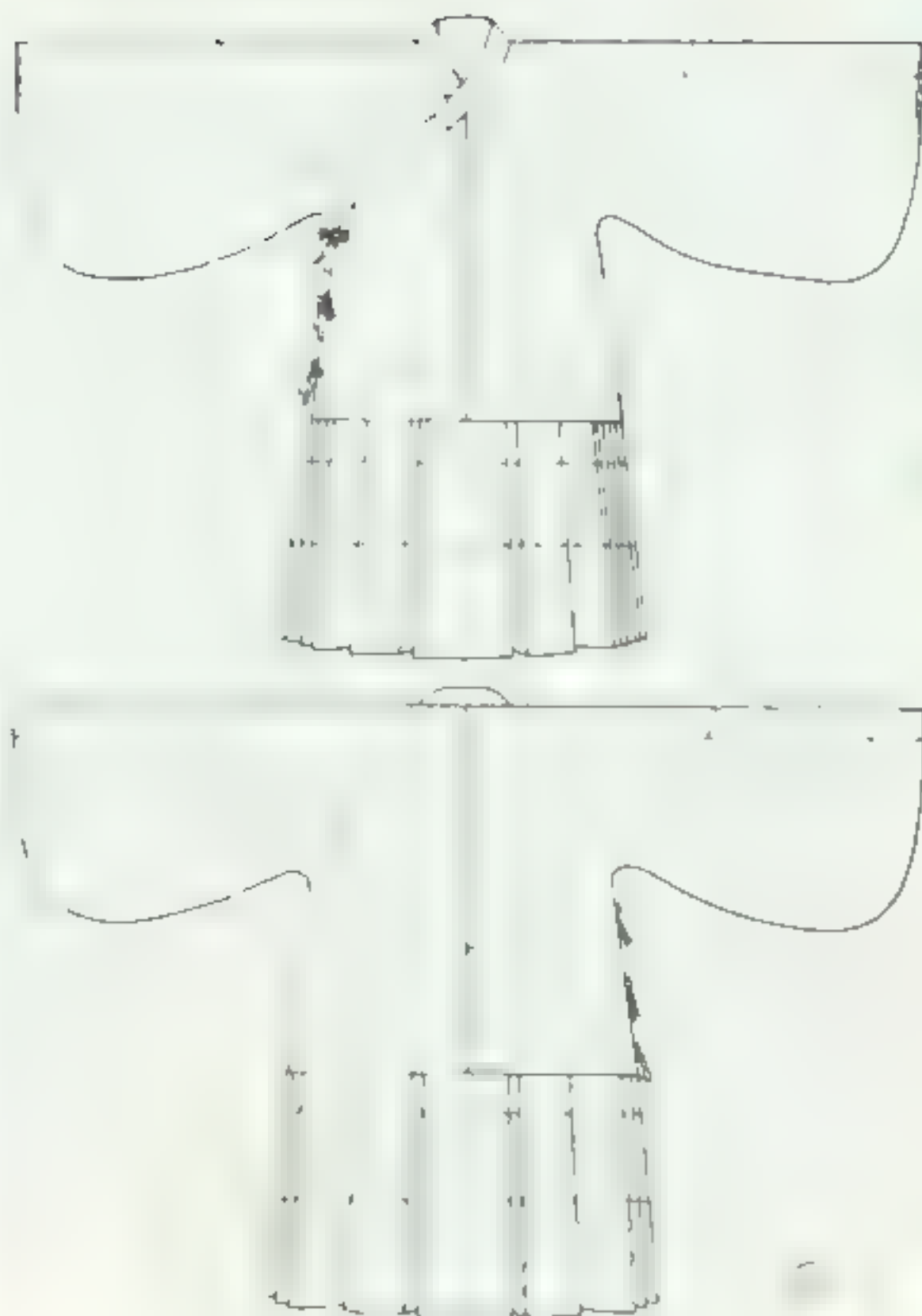


图 P—12 ①山西省博物馆藏明代飞鱼服实物上 为袍服正面，下为背面，虚线是图案所布位置，下裳折裱，正面右侧五折，左侧七折，背面左右两侧均为四折。②背部飞鱼纹图案③膝裱处飞鱼纹图案④临淮侯李邦镇画像，录自《歧阳世家文物图像册》身上所服为斗牛服。《名义考》曰“斗牛如龙而牛角”，此像上的斗牛图案与南京出土的带铐上的图案完全相同（参见图 P—21）。





P—16 山西平遥镇国寺明代壁画



P—17 宝宁寺明代水陆画中关羽（左第一人）和兰陵王（右白衣人，即南北朝戴假面作战者）像，两人的宽袍穿法均与真武大帝像相同。

19、2、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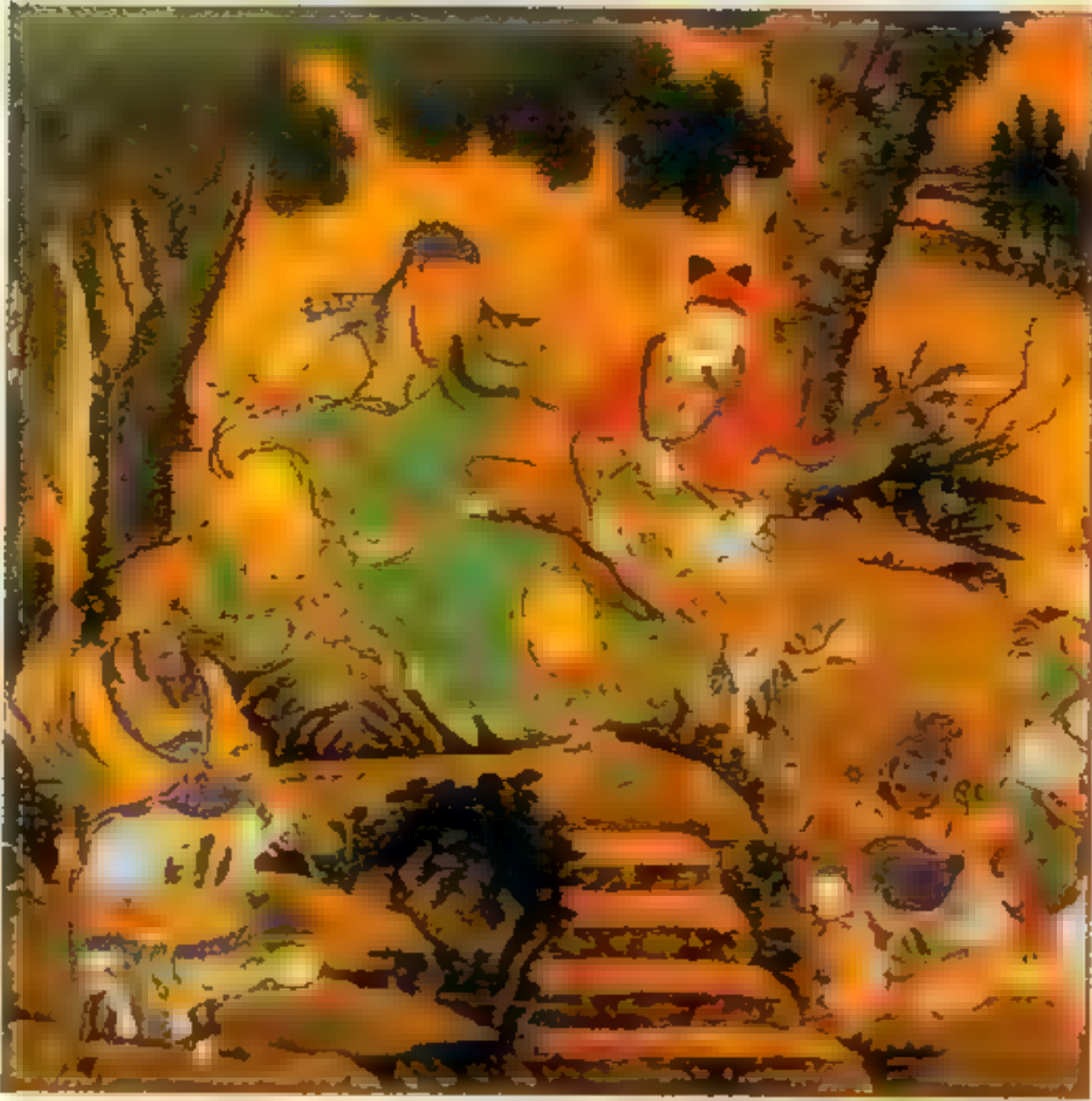
宋代罩于铠甲外的绣衫，明代也继续使用，其式样完全恢复了宋制（参见彩图P—18、21）。宋制在明代可能止存在于中期之前，后期因铠甲形制的完全改变而不复使用。

明代的戎服还吸收了元代的质孙衣，《明史·舆服志》载：“（洪武）六年令校尉衣质孙”。后改名曰“曳撒”，永乐以后，曳撒服成为宫廷宦官和皇帝随侍文武官员的燕闲之服，曳撒上如绣有蟒纹，为很显贵的赐服，“文武一品官所不易得也”（《明史·舆服志》三）。山东邹县出



图P—14上：四川成都东郊龙泉驿区明蜀僖王墓出土武士俑，成都市博物馆藏。下：四川平武县明王玺家族墓墓室内浮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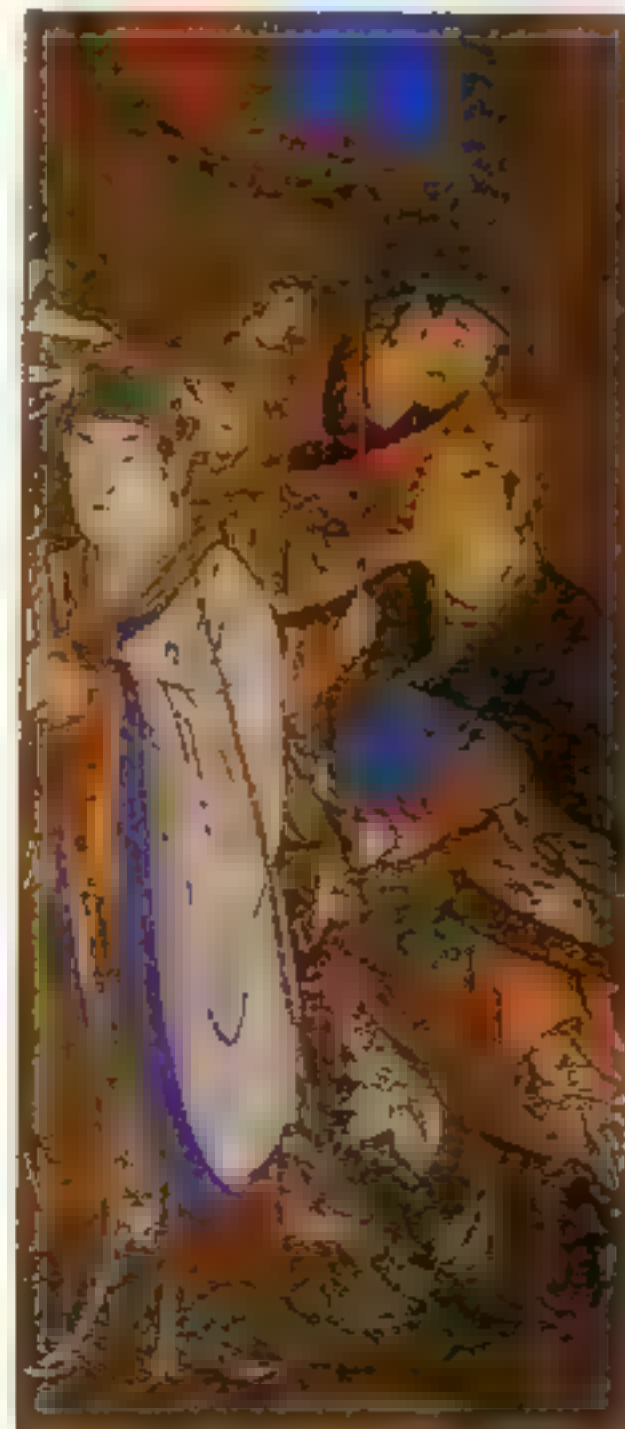
P—18 明画《关羽擒将图》，关羽穿的是窄袖右袒宽袍，周仓、关平则在铠甲外罩绣衫



P—22 江苏省盱眙县明祖陵神道石象



P—19 成都市郊保和乡出土明仪卫俑，成都市博物馆藏。此俑的腿部好像有大块皮革做成的腿裙



P—20 宝宁寺明代水陆画中仪卫人物服饰



P—21 山西平遥镇国寺大殿大门两侧外墙壁画，人物的短衫好像罩在袍服外面

中国的织金缎蟒纹袍，就属于这种曳撒（图P—15）

明代军人在穿戎服时，既可戴盔冑（其中一部分盔是用布仿铁盔制成，专为穿仪仗戎服时戴用），又可戴巾、帽、冠，这一点在前面已经提到过。明代的巾名目繁多，其中有一些是幞头的变名（如折上巾），大部分巾各式人等都可戴用，无明显界限。明后期的军人基本上都戴巾，特别是水军将士。这些军人戴的巾大多如隋唐时的平头小样幞头，当然也有加巾子的硬裹巾（参见彩图P—23、24；图P—16）

帽为红笠军帽，与宋代一样为武将所戴，一般用毡制成，其式样、外型与宋代差无几。（图P—17左）还有一种形如软帽的“膝脑”，为将军、力士、校尉、旗军所戴。《明史·舆服志》：“（洪武二十一年）定军服，将军、力士、校尉、旗军，常戴头巾或膝脑。”（图P—17右、彩图P—25）



图P—15 织金缎蟒纹曳撒袍，山东邹县明朱檀墓出土，山东省博物馆藏



P—23 宝宁寺明代水陆画中穿公服、戴折上巾的官员形象



图P—16 四川平武县明王玺家族墓墓室内浮雕侍卫像，头上所戴应是硬裹幞头。





P—27 上：苏州枫桥明王锡爵墓出土的忠静冠（据实物写生），苏州市博物馆藏。下（1）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冲榘墓出土玛瑙七梁小冠（高3.5厘米，据照片绘制），江西省博物馆藏。（2）南京市明徐備墓出土琥珀发冠，南京市博物馆藏

和《战迹图》都是明代所作，可靠性应比较大，小旗图旗后来是否同属于英，尚有待日后发现。

明代的下级军人一般只能穿履，而不能穿靴。穿履时腿一展一收，有土军多为短靴（筒靴），有皮靴，也有月缎制的，出土与传世靴的形制多属靴头尖、靴底平、靴尖，少数靴头圆、靴底高的（图P—19）。

腰带有双带扣和单带扣两种，双带扣、双銐尾带大都用来束甲，其结构、式样保持了北宋时期的形象。单带扣带改变比较大，有的开始用卡簧系接，束带卡簧是明代的一种发明，其制作工艺十分精巧（参见图P—20⑤）。用卡簧束带无形中去掉了带尾，带銐中的銐尾失去了原来所处的位置，这时变成为带銐的一部分排列在腰带的左右两侧（参见图P—21）。而用单带扣束甲时，也不再像过去那样要插带尾，而是将带尾的銐尾与卡簧后叉插入腰带的甲面，表面上不露带尾部分，因此这时期的带扣上用于束甲的卡簧（参见图P—20②、21）。

腰带上的带銐也具有明代特点，正面的中间位于带扣下方三方銐，正中一大方銐，两侧两小方銐，合称“三台”，三台两侧各排三枚桃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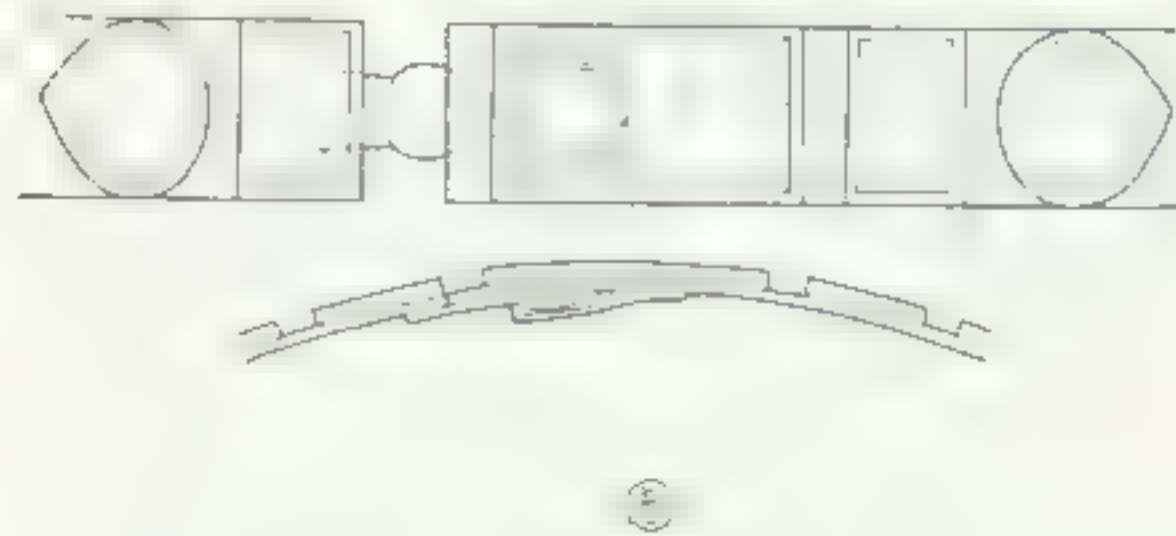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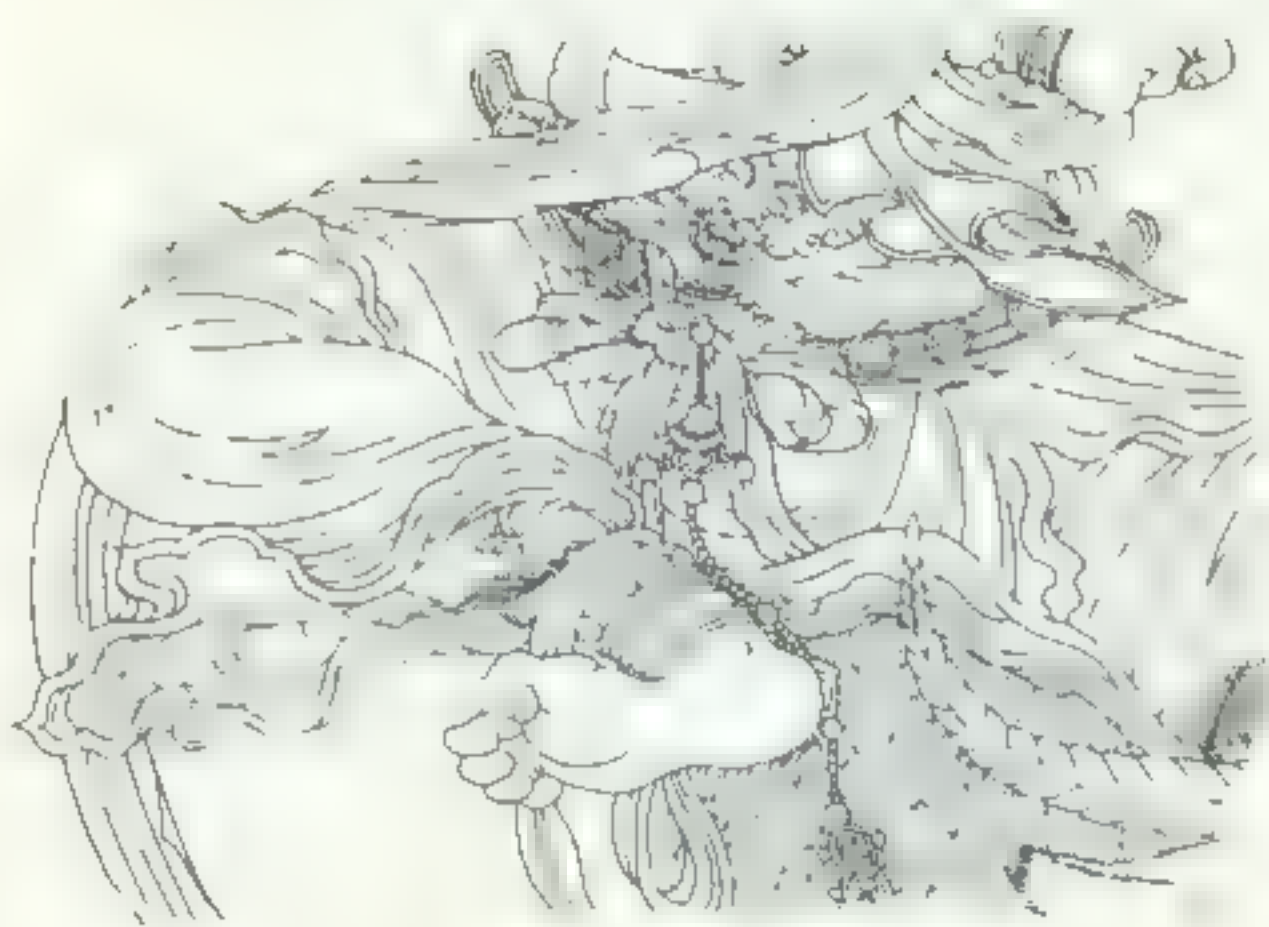


P—26 山西太原崇善寺的明代彩塑





图P—18上左：宝宁寺水陆画中戴簪花幘头插翎羽的形象。上右：《邢玠抗日援朝战迹图》中在军笠帽上插翎羽的形象。下左：《武备志》卷一二九《木火兽》插图。下右：《战迹图》中戴插有三面小旗的盔的军官。



图P—20①—④宝宁寺明代水陆画中各种腰带的形象：①②单带扣腰带；③④双带扣、双蛇尾腰带。⑤鞍山倪家台明崔源族墓中出土的鎏金整花银革带带卡簧的细部结构图，录自《文物》1978年第11期。



图P—19明代的靴、履。①短靴，上海市宝山县出土，上海博物馆藏。②朝靴，山东曲阜孔府藏传世实物。③明代瓷俑上的云纹靴头短靴，四川省博物馆藏。④明琉璃俑上的履，出土、收藏地点不详。



图P—21①—⑤：江苏南京太平门外板仓明墓出土黄金带铐，南京市博物馆藏。这组带铐的图案全部为斗牛纹饰，有可能是一条赐带，带铐的图案镌刻十分精美（据实物写生）。⑥：斗牛纹带铐排列分布图。⑦—⑨：辽宁鞍山倪家台明崔源族墓出土鎏金螭花银带铐、带扣，录自《文物》1978年第11期。

铐，一枚小方铐、一枚钝尾，其后为七方铐。全国各地出土的明代带铐实物，如南京发现的斗牛纹饰的黄金铐，辽宁鞍山倪家台崔源族墓发现的银鎏金、玉带铐，虽然外形微有变化，但带铐数量、大小形制、排列方法都基本相同（参见图P—21）。

制作带铐的材料品级按《明史·舆服志》卷三的记载，公服腰带的带铐：“一品玉，或花或素（指有无镌刻图案）；二品犀；三品、四品金荔枝；五品以下乌角。”常服腰带的带铐：“一品玉；二品花犀；三品金扈花（指一种图案）；四品金；五品银扈花；六、七品素银；八、九品乌角”。九品以下武职人员和普通军士只能用铜铐，仪卫人员则用涂金、涂银带铐。

明代官服外的腰带，都束而不着体，用细纽扣住腰带垂悬于腰间，作为象征身份显贵的装饰。只有用于戎服和铠甲外时才真正系束。从不少形象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公服的腰带上一般还要再系一条装饰带，它悬于胸前，带的左右两头插垂于腰带下，这条装饰带是明代特有的，象征着周代前后衮冕服中的大带。古代



明代



图P—22 左：宝宁寺水陆画中穿公服束两条腰带的形象。右：江西吉州窑遗址出土官吏残身像泥塑，录自《文物》1982年第12期。



图P—23 明王杼所佩象牙腰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

帝王的袞冕服，要束革带、大带两条腰带，革带在里，大带在外，明代于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恢复了这一古制。这条装饰带用锦绮制成，表面无带铐装饰，只在带头缀有二个铈尾，在出土的整套带铐中都有两个铈尾（而带扣大都只有一个），这两个铈尾也很可能是用于这条带上的（参见图P—21、22）。

明代军七品至四品，佩带金牌，洪武四年所造。阔二寸，长一尺，上扈双龙，下扈二伏虎，牌首尾为圆窝，贯以红丝绦。指挥佩金牌，双鱼龙，双虎符。千户佩镀金银牌，独云龙，独虎。百户素云银牌符。太祖亲为文扈之曰：“上天祐民，朕乃率抚。威加华夏，实……”（公元1373年）以后又创制了金字银牌和牙牌制度，颁发给卫军、锦衣卫和百官佩带，以作为……—23。

明代的铠甲以金、银、黑色为主，后期的绵甲因为以缎布为面，所以色彩较多，有青布甲、黄罩甲、青白绵布甲等。盔、巾的颜色也多种多样，幞头仍是黑色。皮靴有黄、黑二色，缎面靴则有棕、紫黑、黑等色，靴面有时还用红、蓝、白、黑等色材料缘边，镶拼。戎服则因“武事尚威烈，故色纯用赤”（《明史·舆服志》），间以紫、青、黄、白等做为配色。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还使用一种“表甲是”的军士服，谓之“鸳鸯战袄”，这是为了便于军队改换服色。武官的公服、常服，一至四品为绯色，五至七品为青色，八、九品为绿色。在同一色彩中，以衣料花纹直径的大小来区分等级，如一品用大独科花，径五寸，以下依次递减，这一点与元代相同。腰带的带鞞则有赤、青等色，官服外一般都用青鞞。

附录一

历代铠甲形制图解

前式



战国



汉代



战国 (随县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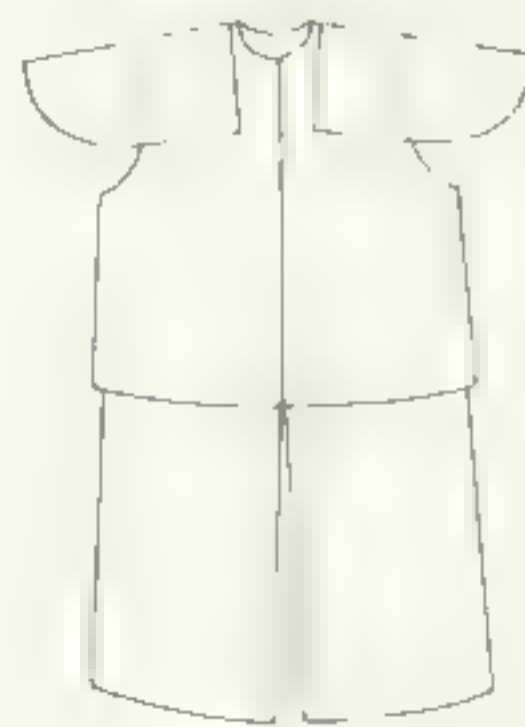
汉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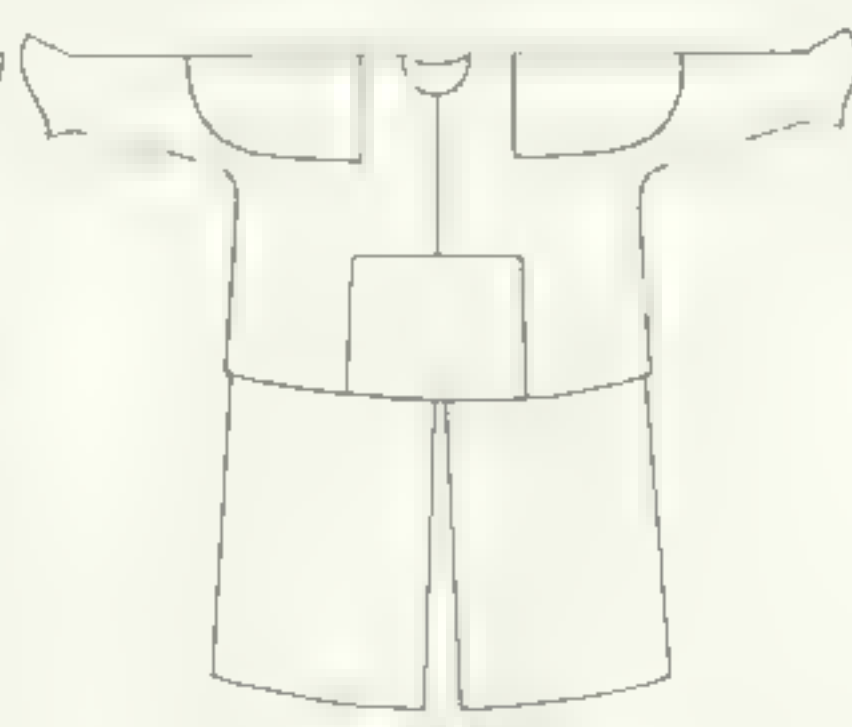
汉代



魏晋



明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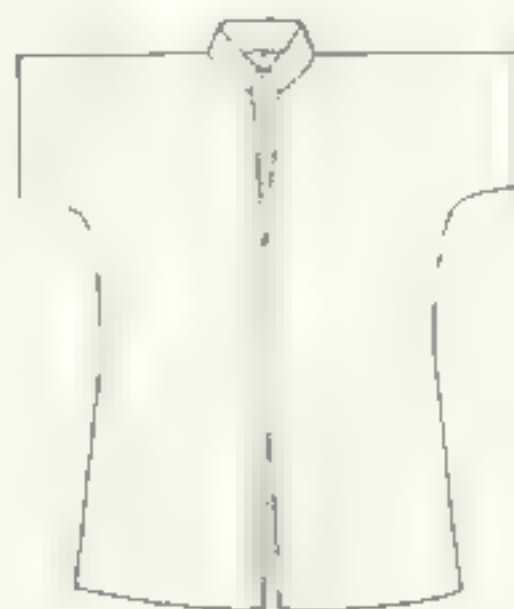


清代

后式



魏晋 (筒袖铠)



明代



清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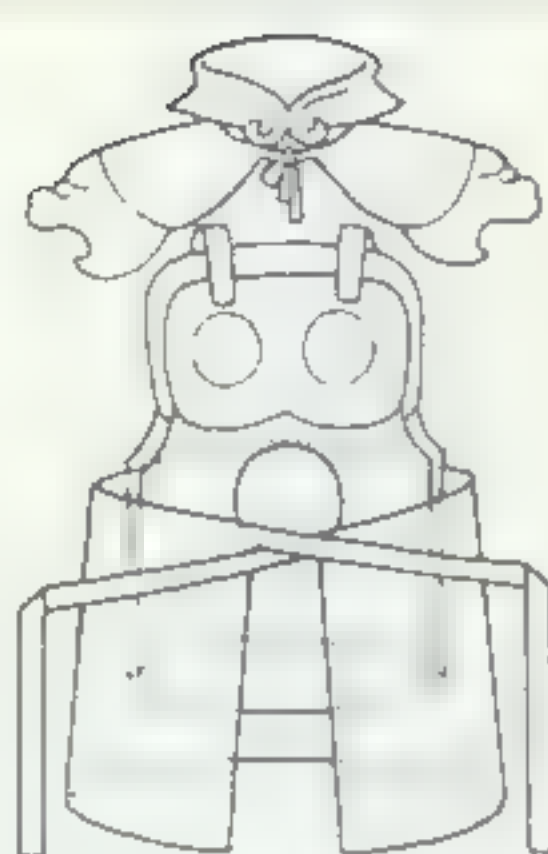
12
图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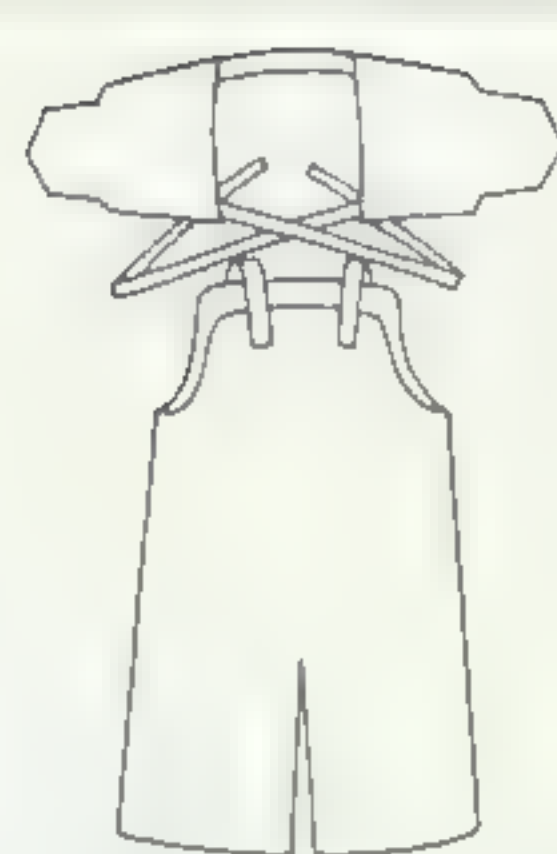
图式 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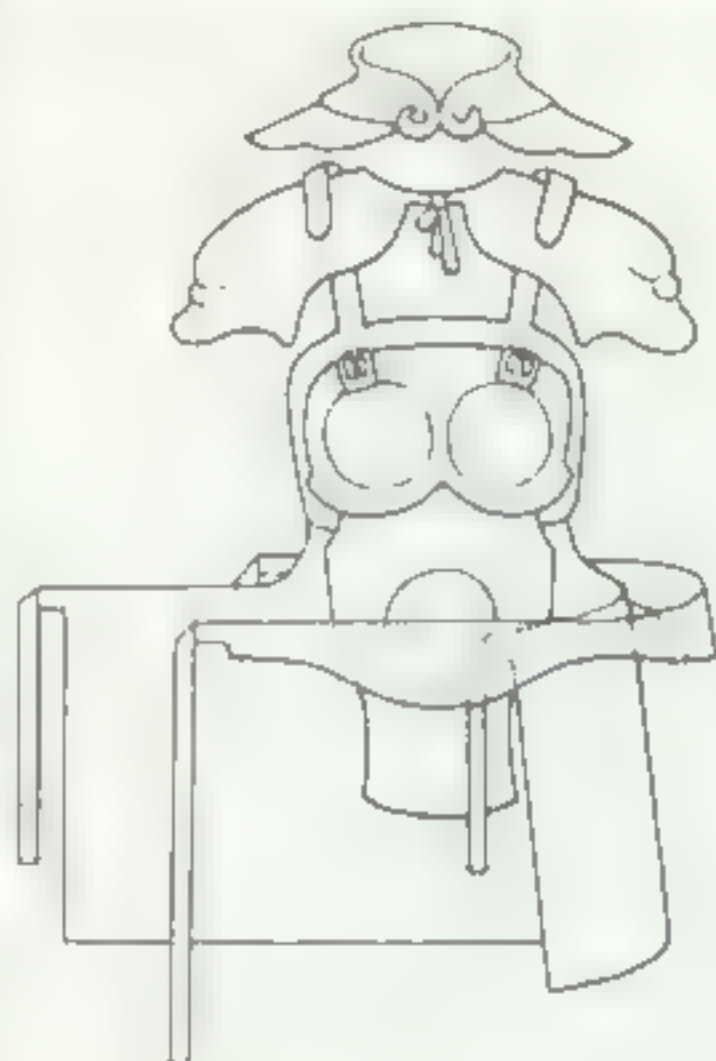
图式 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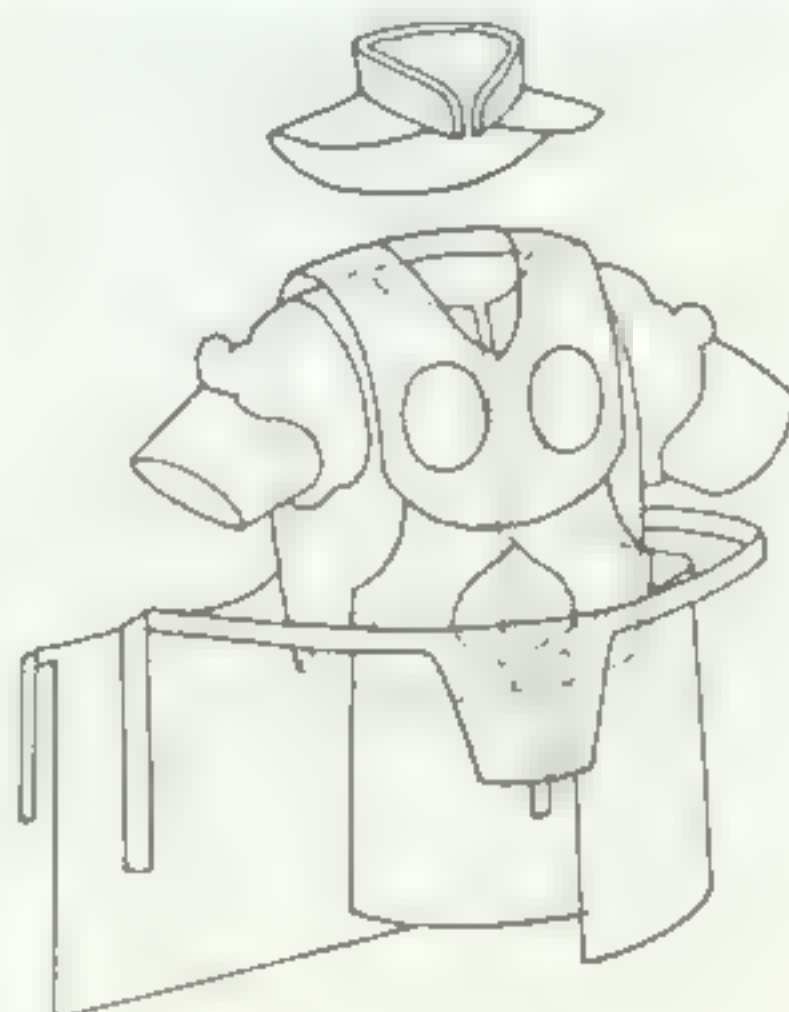
图式 12-3



图式 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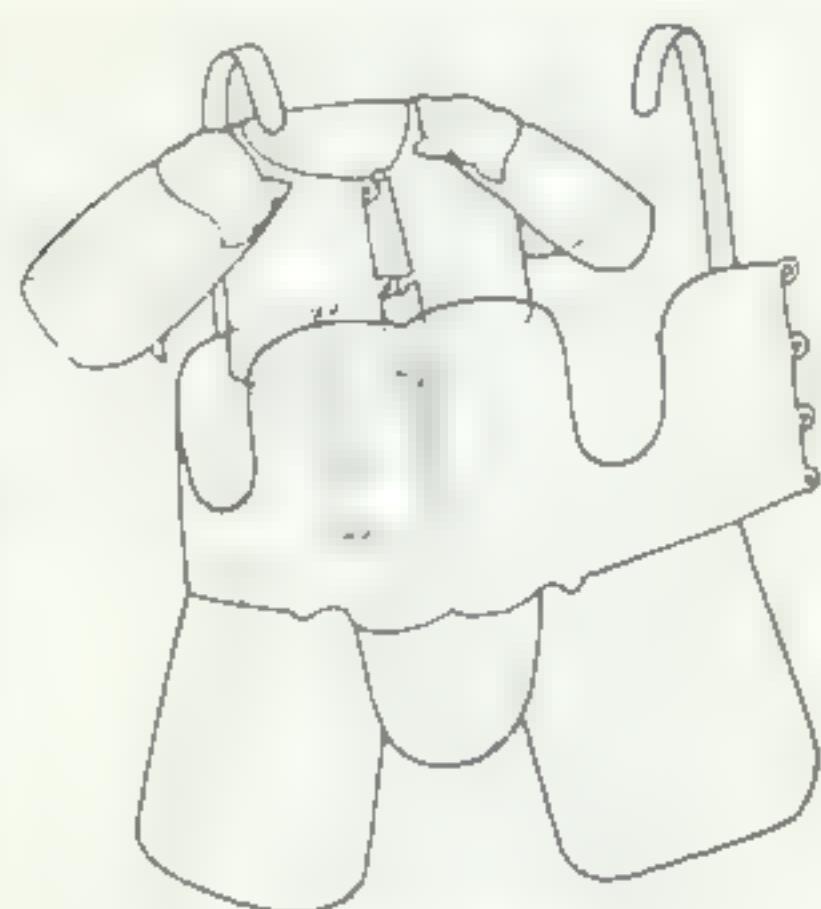
图式 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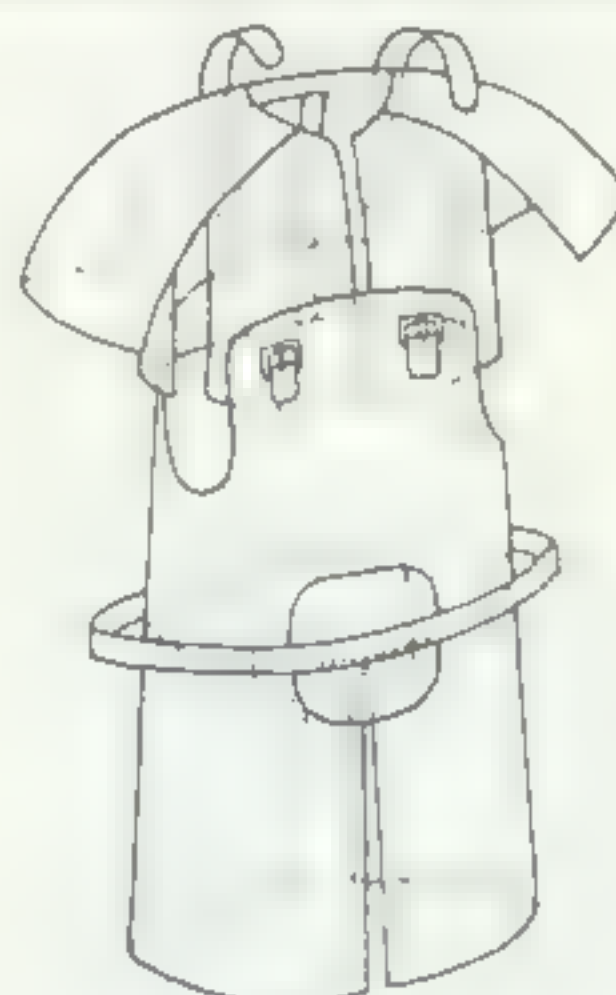
图式 12-6



图式 12-7



图式 12-8



图式 12-9

附录二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铁铠甲的复原（节录）

甲片的组合材料均以丝带为之。

（三）铠甲各部位的组编方式

以零散甲片组成一件铠甲，在各个不同部位的排列次序，都是具有特定规律的。在这件没有伸缩结构的铠甲上，纵向排与排间的甲片一律都是自上而下依次叠压的，上排片的底孔与下排片的顶孔重合组编；各横排上的甲片则是前胸居中的一片在最上，分别依次从两侧向后叠压，直到后背之正中，共同压在最中的一片上，片与片间是利用各片相邻的侧边上一对孔重合组编。

1. 胸片是由 I 式甲片组成的长方块，上下共五排，每排 16 片，计用 80 片组成

胸部甲片的组编痕迹，被卷在筒形之中层，故未能见到，参考后背上段甲片的组编痕迹，推测其不是一一编起横排后再纵向连成块的，而很可能是先编出纵列的五片为一侧，然后向另一侧推进，每纵排甲片逐片累加，直达终端为止。这是一种较为特殊的组编方式，我们称之为“纵横向累加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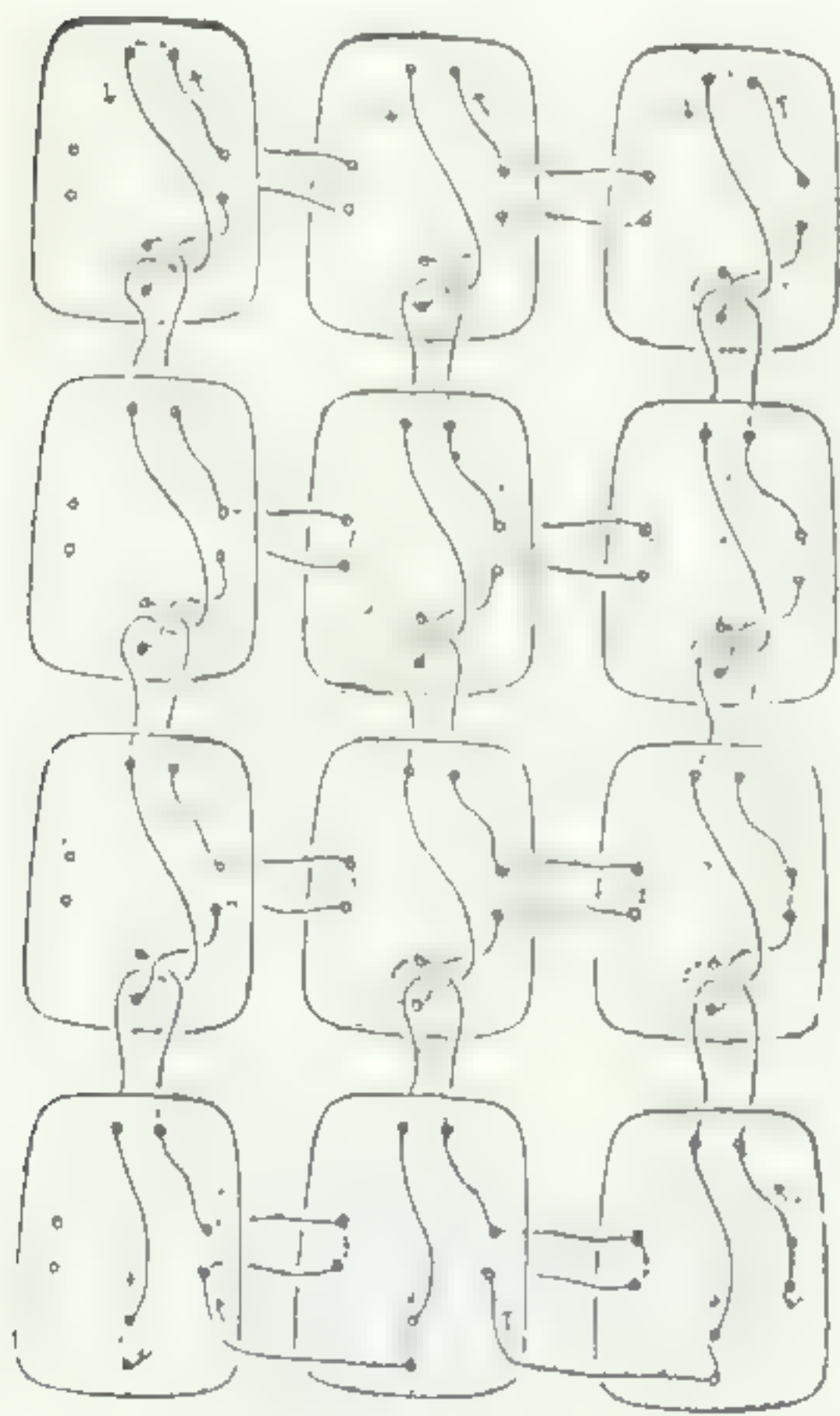
2. 腹片是由 I、II 两式甲片组成的长方块，自上而下十排，底下一片为 II 式片，以上九排均为 I 式片，每横排各由 16 片组成，计用甲片 160 片，排列形式与胸部相同。

此部位甲片的编联方式与胸块不同，上面九排是先编出单个横排，然后再纵向组合。这是一种较为常用的编联方式，我们称之为“连横合纵式”；最底下一排是利用两侧孔和上端四孔中的下两孔，因为属 II 式甲片，下端无孔，上端 4 孔，故横排编出，上端的另外两上孔则与上排片底端的一对纵孔组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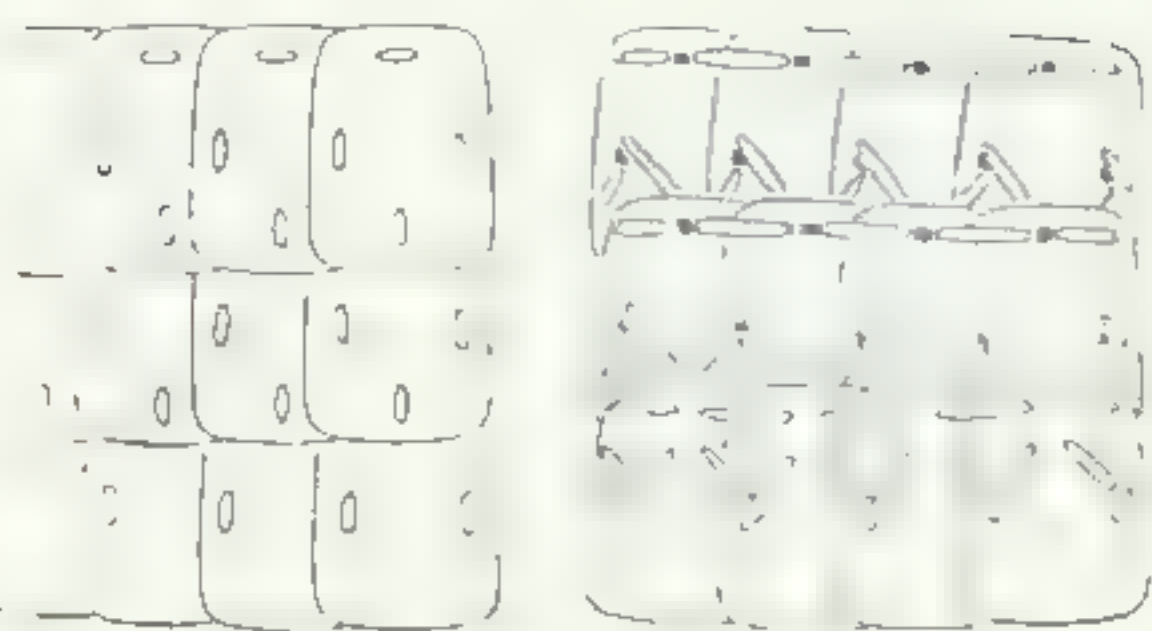
腹片之顶排片与胸片之底排片相连贯，从正面看并没有任何界限。

3. 右前侧片此部分纵向十排，横向 8 片，由 80 片甲片组成竖长方形，除底排用 II 式甲片外，其余九排均用 I 式甲片组编。其编联方式亦如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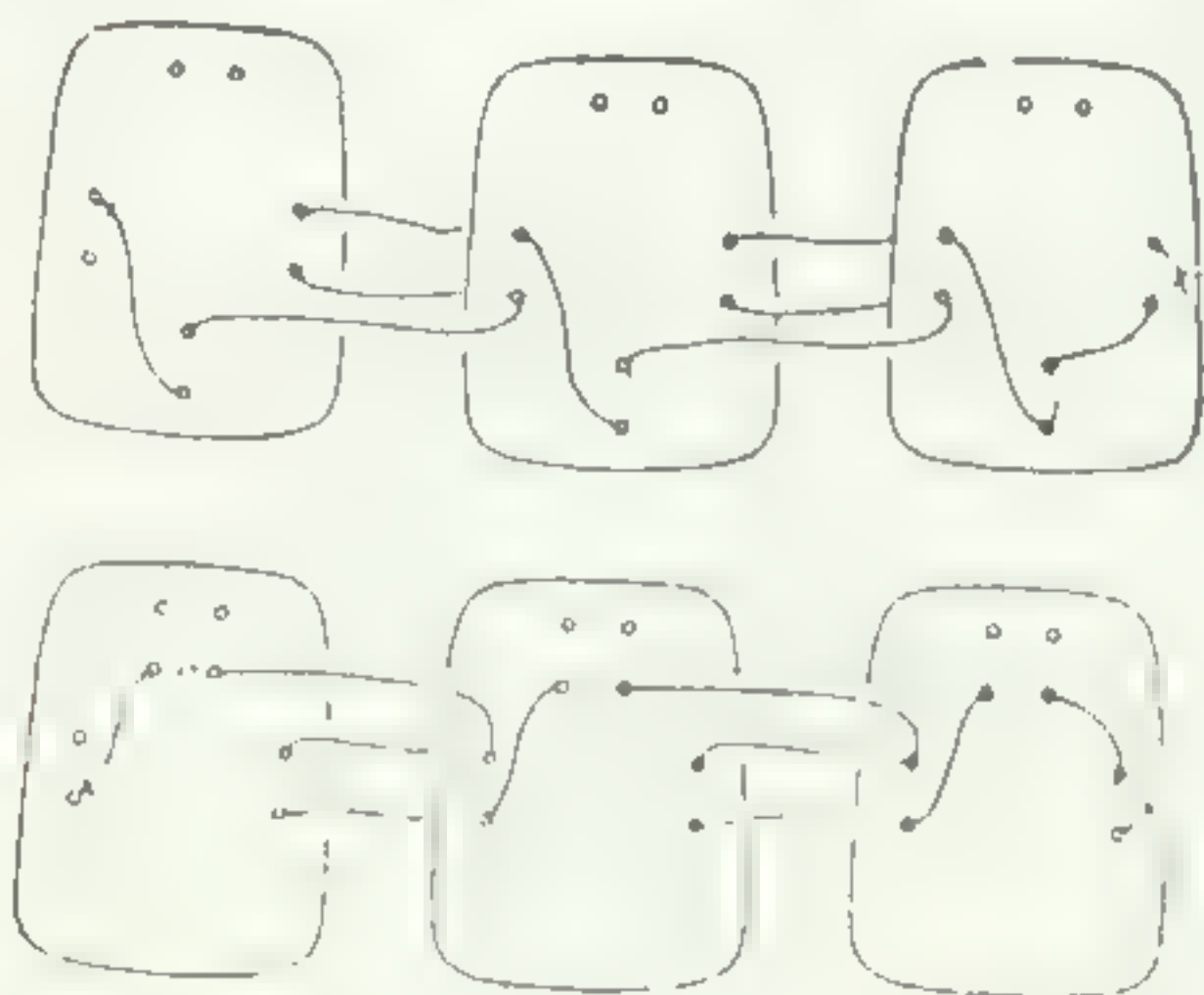
上段甲片编联 左：正面 右：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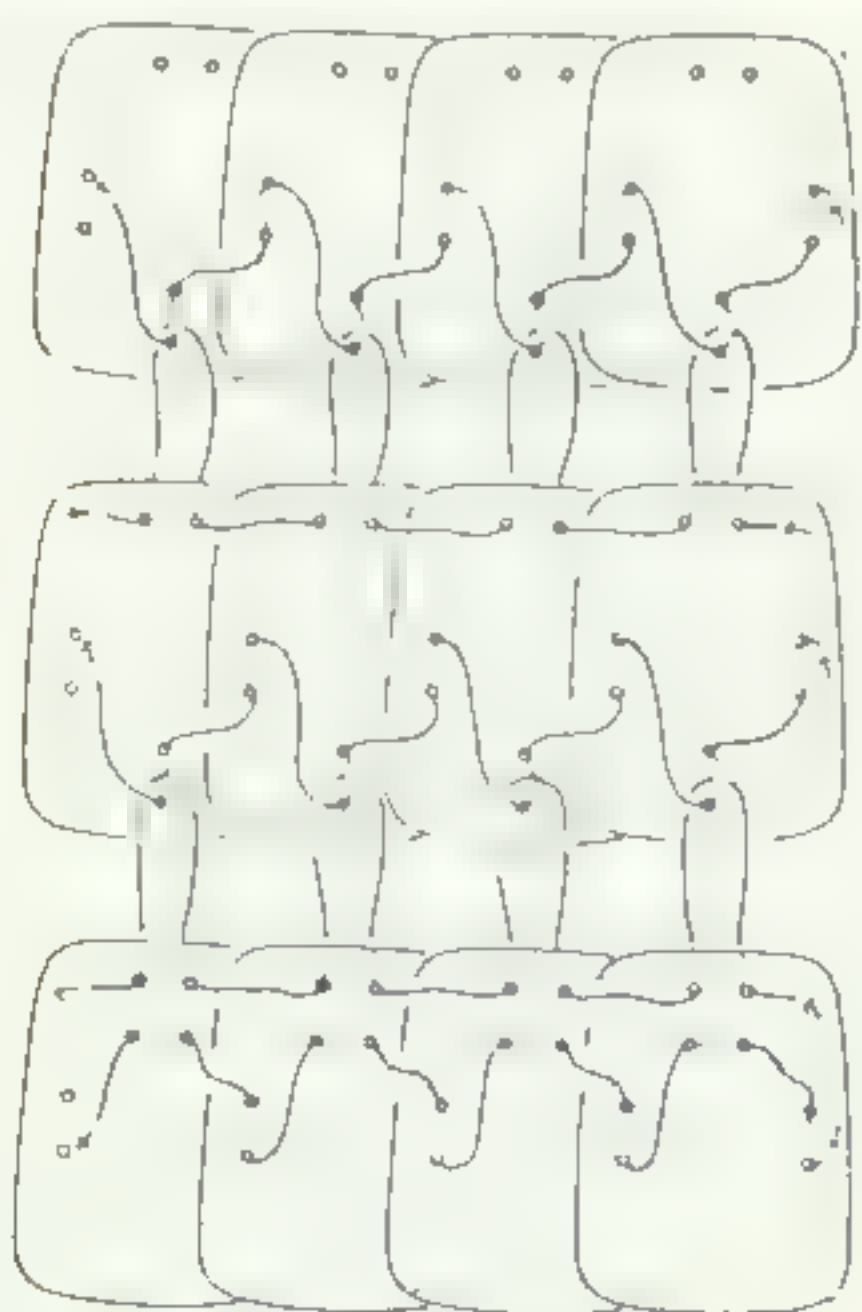
上段甲片组编方法示意图



下段底边二排编联



下段横排甲片组编方法示意图上：底缘以上诸排下：底排



下段底边三排甲片组编方法示意图

片，属“连横合纵式”。右前侧片处于甲体的右肋部位，一侧与腹片连接，和前后身右半边及右肩片之间构成一个可为右臂出入的孔洞。另一侧边穿着时则搭接于后背之下段边际之上。

4. 左侧片位于甲体左肋部位，与右前侧块基本对称，纵向十排，每排4片，由40片甲片组成更窄的长方形，最底一排为Ⅱ式甲片，其余为Ⅰ式甲片，编联方式亦属“连横合纵法”。两侧与前后身之相应侧边连接，并与左肩共同构成一个左臂可以出入的孔洞。

以上四个局部片组成铠甲的前半身，在作战中除能保护胸腹外，尚有维护左右肋安全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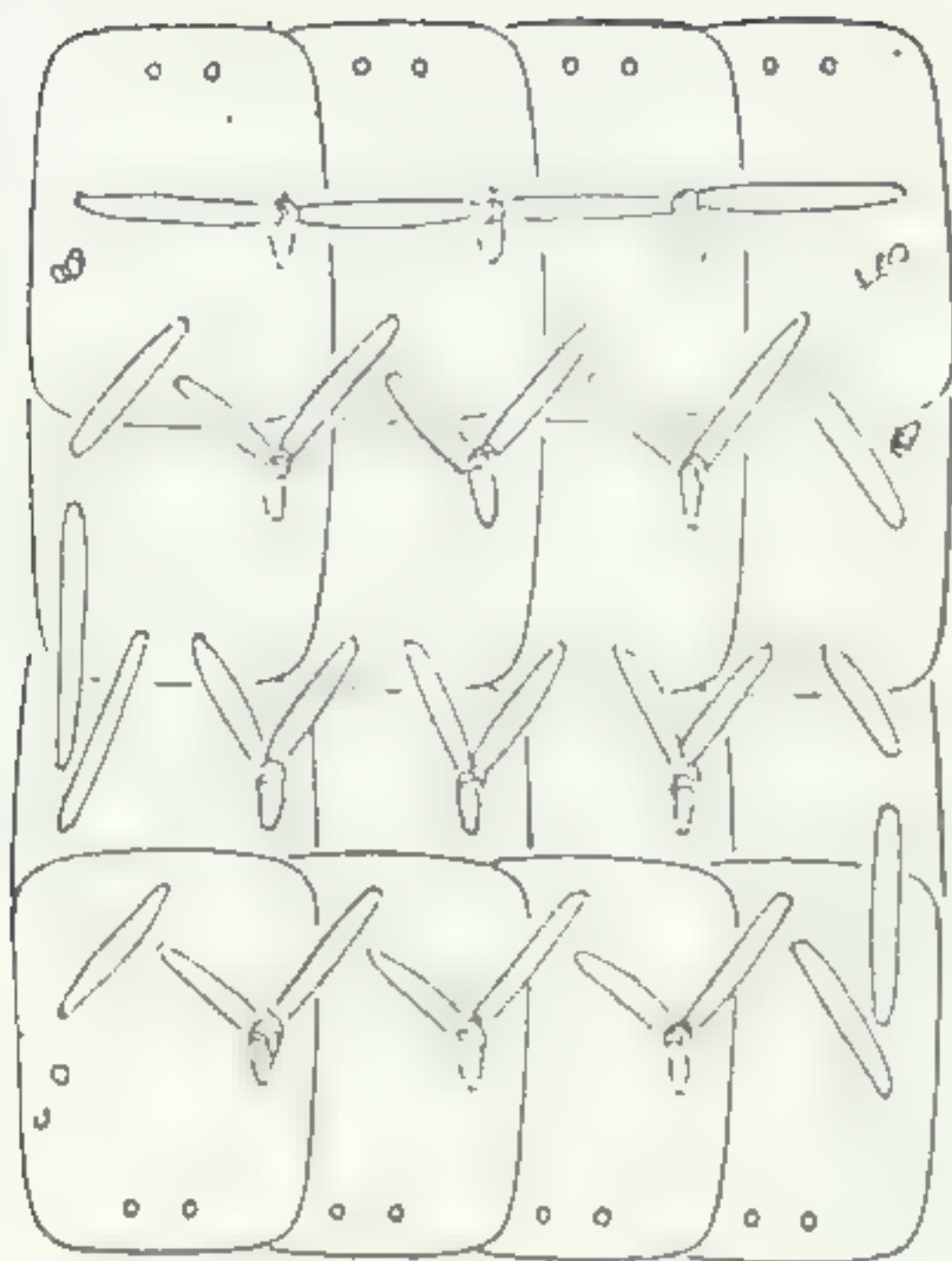
5. 后背上段是由Ⅰ式甲片组成的长方块，上下七排，每排15片，共用105片甲片。各排当中一片被叠压在最下面。因每排片均为奇数，故左右两半片数对称。根据内面保留下来的组编痕迹，判明甲片之编联方式是从侧边一个纵列开始，而后一片片逐行累加，亦称为“纵横向累加式”（图四；图五）。

6. 后背下段形近方块，上下十排，每排15片，计用150片甲片组成。底排片为Ⅱ式甲片，其余均属Ⅰ式甲片。据内表保存的组编痕迹，复原甲片的编联方式为“连横合纵式”，即先编出一个个横排，而后将各排上下连贯。其顶排与后背上段之底排连接，其左侧则与前身左侧片连接（图六；图七；图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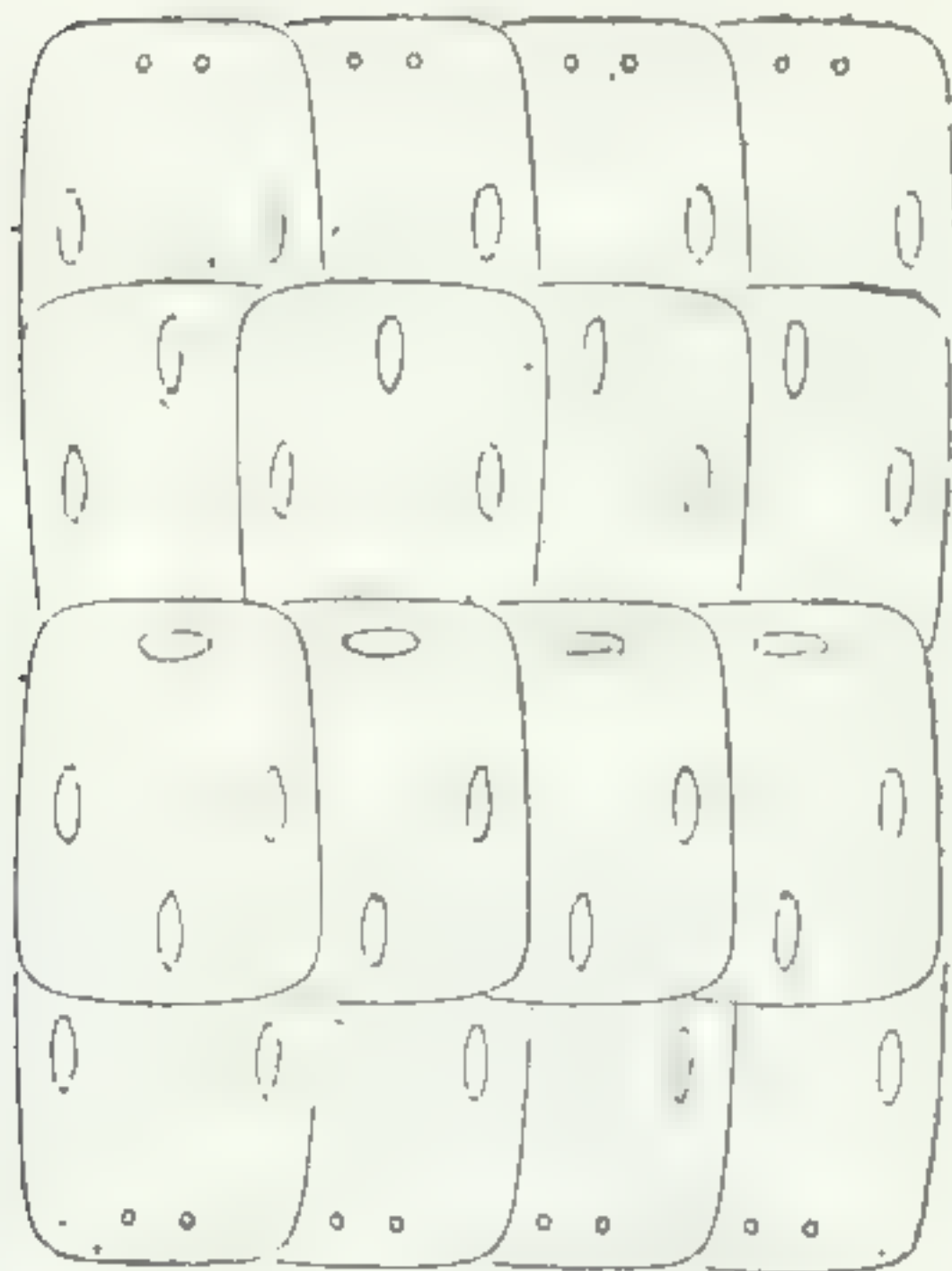
7. 右后侧片呈纵长方形，连接于后背下段之右侧，纵列十排，上面九排用Ⅰ式甲片，底下一排用Ⅱ式甲片，以连横合纵式组编而成，每排5片，合计50片。此部分位于甲体右肋，穿着时基本被压在右前侧片之下。

以上三个局部片组成铠甲的后半身。

8. 左肩片为一长条块，以Ⅰ式甲片组成，纵列五排，每排4片，计用甲片20片。其纵向排列次序，以第三排片在最上，分别向上下两端叠压，且二四两排片均上下颠倒使用，即第二排片顶孔与第三排片对应之顶孔重合，第四排片底孔与第三排片对应之底孔重合；继之第二第一两排片之对应底孔重合，而第四排与第五



右肩片局部正面编联



右肩片背面局部编联

排之顶孔重合。

组编此部位甲片的过程，均以本横排片的组合为主，同时兼及相临下排各片，我们将此编连方式称之为“连横兼纵式”。各横排甲片叠压顺序是自右向左，即肩部自内向外，左肩片总体呈桥形，上下两端与前后身片编连固定，内侧形成领口之左边，外侧边则靠近左肩头。

9. 右肩片大致形状及所用甲片均与左肩同。差别在于结构上纵列为六排，每排仍为4片，计用甲片24片。其纵向排与排的叠压次序与左肩片略同。第六排与后背右上缘编连固定，而第一排则与右胸片相叠压呈开放式，穿着时以丝带系定。横排上甲片的排列有一些片并非是按规整顺序依次叠压，可能是组编时疏忽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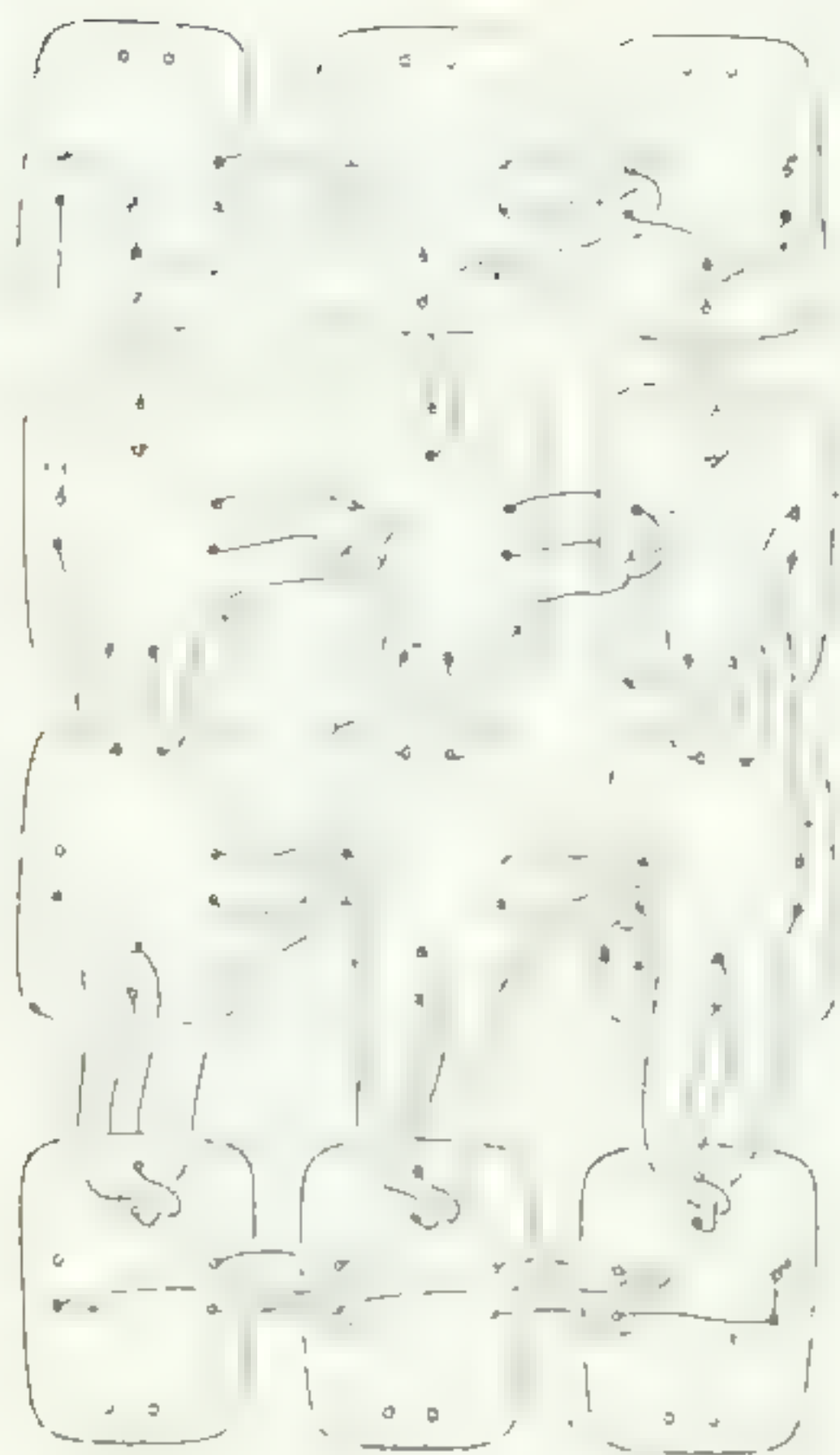
左右肩片甲片的组编方式相同，据右肩局部残块背面的编联痕迹复原如图（图九：图一）。

以上左右肩片与前后身片组合后，其间形成一个领口，领口横宽约15、前后空档为12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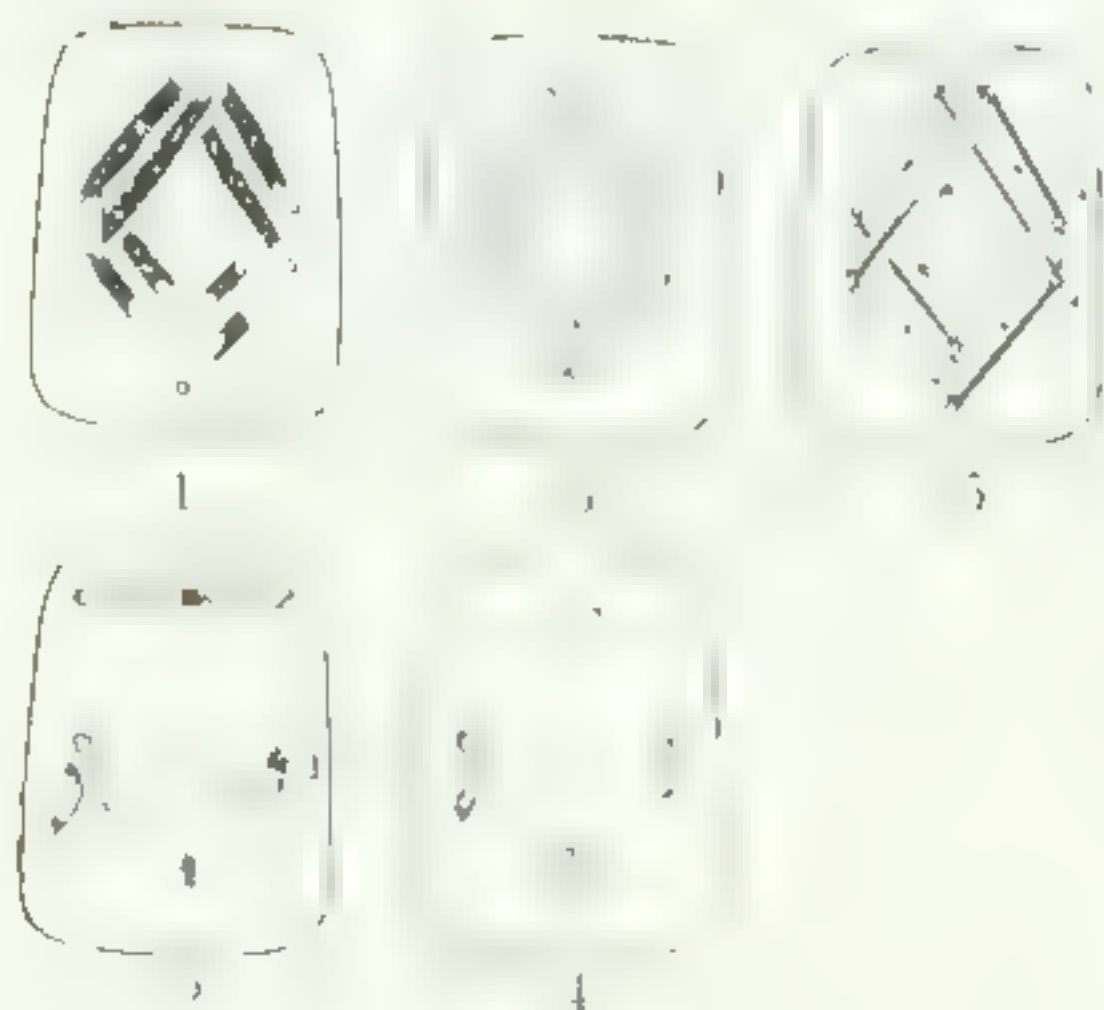
（四）铠甲右胸及右肋部位的系带

甲体在结横上有两个开合点，即右胸与右肩部位和右肋部位，穿着时需要打开，穿上后则以丝带系住。在原标本右肩片前数第二排中间两甲片的两对外侧孔的位置上，残存着系带的痕迹。丝带的拴合方法是自孔中穿过，在临孔之上下两面打结卡住，正面长出的部分为一个带扣。在右胸片上的第二排由外向内数第二三片之外侧边孔处，与右肩系带对应部位也有相同的丝带痕迹。此种系合法与秦始皇陵出土的着甲武俑右胸之方式相似，但未发现有类似的柱状别棍，推测只是以打结形式将两者连系起来的。

右肋部位之系结痕迹，仅在右前侧片的下数第三排向内第三片之下端孔上有一些残存，至于右后侧片上的系带，因被卷在最里层而难以观察到，据测算右肋部位的系带应有二至三对。从复原模型的穿着系结得知：右胸带着甲者尚可自系，而右肋部位之系带偏后，本人系结不便，在穿着或脱卸时当以他人协助为宜。



图一—右肩片组编方法示意图



图一二甲片上的丝带装饰示意图1、2：原状正背面3、4：复原后正背面的装饰部分5：丝带编饰方法

(五) 甲片表面的装饰

在此领铁甲之下半部，除底缘及侧缘包边部位外，在数百甲片之上于组合前均以丝带穿过甲片上的孔眼而于正面编饰出一个相互套合的菱形图案。

经分析，编饰图案所用丝带在甲片正面四对孔眼间均为空白。而四对孔眼间透出的带子，位于侧边的是横排甲片组合所用的丝带，顶端和底端孔间者，则属纵排连贯时所用的丝带。以上的情况，从甲片正面看。因丝带均已退变为棕褐色而难以区分，但从甲片表面各丝带的叠压关系——从四对孔眼间透出的带均压在最上面，这就明确地反映出每个甲片是先行编饰图案，而后才组编成甲体的（图一二、1、2）

推测原来作图案装饰的丝带与组编甲片的丝带在颜色上是有区别的。我们曾仔细观察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出土的彩绘陶俑（简报见《文物》1966年第3期），有些铠甲片上装饰有菱纹图案，在施彩上有红白两色可证。

根据甲片表面的组成菱形图案的丝带重叠情况（排除了甲片间组合的丝带）复原其编饰方法如图（图一二、3、4、5）。

(六) 铠甲的包边与衬里

在铠甲肩部及底缘等一些部位，残存有以锦类织物包边的痕迹。正面包边较宽，约2厘米，背面一般则较窄，宽仅1厘米许，至于颜色则难以辨别了。包边皆压于编带之上，显然是整件铠甲编出之后统一施行包边这道工序的。包边方法应是在正面将线反折在里面，将织物从正面折向甲片背面而以细线缝定。

在铠甲的内面，残留着一些衬里的痕迹，其作用在于穿着时避免甲片磨伤内衣，同时遮盖内面的编带形迹而增加了美观。衬里所用的材料，以右肩为例可知，贴近甲片的一层为皮质材料，在其上则是一层绢类织物，颜色难辨。从右肩片痕迹还可看出，衬里是压在包边之下的。这些情况与满城汉墓所出的刘胜铁甲的包边衬里的情况大致相同。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术室、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载《考古》1987年第9期）

附录三

唐宋时期的甲冑制造技术

唐宋时期生产的铠甲，主要是铁甲。一副铁甲的制造，是相当花费工时的，制造时，大约需要以下几道工序，首先要把铁制成甲札（甲片），再经过打札、粗磨、穿孔、错穴并裁札、错棱、精磨等工序。将甲札制好以后，再用皮革条编缀成整领铠甲。铠甲里面还要挂衬里，以防止磨损披铠战士的肌体。因此造成一领铠甲，往往需要几十天乃至上百天才能完成。由于工艺繁杂，所以，在北宋东、西作坊中共分五十一作，其中与制造铁甲有关的有铁甲作、钉钹作、铁身作、纲甲作、柔甲作、错磨作、鳞子作、钉头牟作、磨头牟作等，加上制造马甲及皮甲等的马甲作、马甲生叶作、漆衣甲作、马甲造熟作、皮甲作，以及打线作、打磨麻线作等，占了很大的比例。因系手工操作，而一领铠甲又包括几百片或多到千余片甲片，制成后的重量往往有差别，以致于在战士领取了铠甲以后，要清数铁甲叶的数量和称量铠甲的重量，然后分别进行登记。

关于铠甲的型号，据《唐书·马燧传》，当时制造的铠甲，是根据士卒的高矮，分别规定

了大、中、小三种尺寸不同的型号，以区别不同对象，按体分型发给，以利于进趋战斗。又因为铠甲重量较大，所以选兵时先要注意到是不是能够“胜举衣甲”，过分羸弱的则予以淘汰。

关于宋代的铁甲仅《宋史·兵志》中保存一些南宋时期的资料。据《宋史·兵志》，绍兴四年（1134年）规定全装甲的总重量是45—50斤，不得超过50斤。甲叶共计1825片，要求内外磨铤，每个部分的甲叶数、分重和每叶甲叶的重量如下：披膊：504叶，每叶重0.26两，共重8斤3两4分甲身：332叶，每叶重0.47两，共重9斤12两4分

腿裙鹤尾：679叶，每叶重0.45两，共重19斤1两5钱5分

兜鍪帘叶：310叶，每叶重0.25两，共重4斤13两5钱

又，兜鍪子眉子重1斤1两，皮线结头等重5斤12两5钱，以上合起来总重据纪录为49斤12两（实际是48斤11两6钱5分）。稍迟至乾道年间，各部分甲叶的重量都有所减轻，但甲叶的数目则有所增加，这就使铠甲更加精工和细密，并且按不同的兵种设计了铠甲的重量。乾道四年（1168年）三月十五日王琪进三色甲，分别

	甲身		披膊		头牟		总量
	甲叶数	重量	甲叶数	重量	甲叶数	重量	
枪手甲	1610—1810	31斤4两 36斤14两	1028—1298	10斤9两4钱 14斤	507—674	9斤 10斤12两	53斤8两 58斤1两
弓箭手甲	1812—1818	31斤12两 36斤12两	646—850	7斤12两 10斤	349—420	6斤10 8斤8两	47斤12两 55斤
弩手甲	1178—1326	22斤10两 25斤18两	630—836	7斤8两 9斤8两	355—420	6斤12两 9斤	37斤10两 45斤8两

按：原文弓箭手甲，“甲身叶一千八百一十八斤”，斤为“片”字之误。弩手甲“头牟叶三百五十五斤”，斤为“片”之误。又弓箭手甲，甲身的甲叶数“一千八百十八斤至一斤百百一十二片”，斤为“片”字之误，而一千百百一十二片，似为一千六百一十二片之误，因三十六斤十二两作一千八百一十八片，每片约三钱二分重，则三十一斤十二两，应作一千六百余片较合适。



附录

Ancient Chinese Armour

有枪手甲、弓箭手甲和弩手甲三种，现将有关数字列表如下：

以上这些甲，都是“皮线穿举”。由这一材料，可以知道当时制造的铠甲，根据不同的部位，甲叶的重量是甲身的最重，头牟的次之，披膊的最轻。如以枪手甲为例，甲身每叶约重0.31—0.32两，披膊每叶约重0.17两，头牟每叶约重0.28两，比绍兴四年的全装甲的甲身叶和披膊叶轻得多，仅头牟叶的重量稍重一点。

制造铠甲的工数和费用，据《宋史·兵志》：“绍兴三年（1133年）提举制造军器所言：以七十工造全装甲一，又长齐头甲每一甲工百四十一，短齐头甲用工七十四。”又朱熹《与曾左司

事目札子》讲到了打造“步人弓箭手铁甲”的用工和费用：“打造步人弓箭手铁甲，一年以三百日为期，两日一副，昨已打造到一百五十副了毕，申乞迟发继准枢密院札子，检坐元降指挥只令如法椿收，窃缘上件铁甲计用皮铁匠一万八千，工钱五千二百余贯，……”可知每副铁甲需用皮铁匠工一百二十，工钱约三贯半左右。建炎三年（1129年）江东漕臣褚宗谔造“明举甲”三千，每副工费“八十缗有奇”。足见当时制造一副铁甲所需的工时和工费是相当可观的。

（摘自杨泓《中国古代的甲冑》下篇《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军戎服饰 / 刘永华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9 (2006.6 重印)

ISBN7-5325-3536-3

I . 中 ... II . ①中 ... ②刘 ... III . 军服—中国—古代

IV . E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7478 号

责任编辑 曹明纲

美术编辑 何 陽

技术编辑 陈文彪

中国古代军戎服饰

作 者 刘永华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市瑞金二路 272 号)

发行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制 版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承 印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mm 24 开 9 1/6 印张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3,101—4,900

书 号 ISBN7—5325—3536—3/K·509

定 价 55.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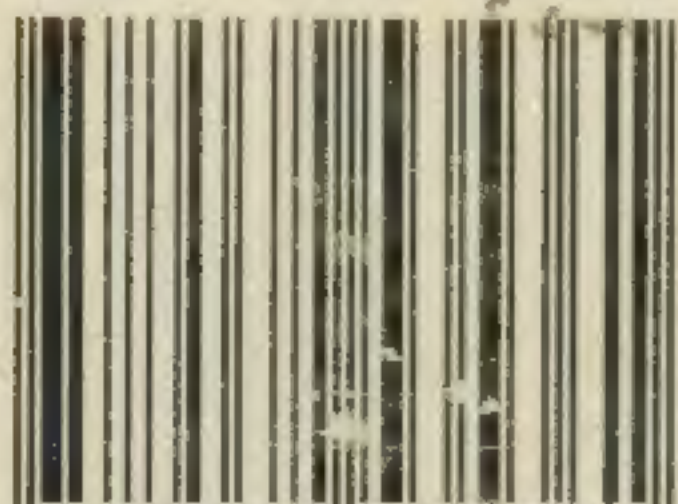
本书 1996 年获第十届中国图书奖
Ancient Chinese Armour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K·509 定价: 55.00 元

ISBN 7-5325-3536-3



9 787532 535361 >